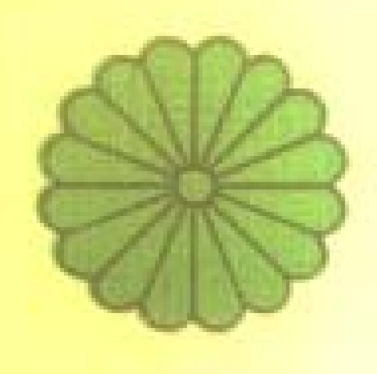
当代日本人

——传统与变革

〔美〕埃德温·奥·赖肖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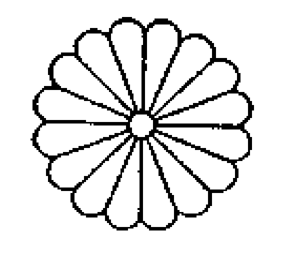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丛书

当代日本人

——传统与变革

〔美〕埃德温·奥·赖肖尔 著

陈文寿 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Edwin O. Reischauer

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1988年版译出

日本丛书

当代日本人

——传统与变革

〔美〕埃德温·奥·赖肖尔 著

陈文寿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197-3/K·215

1992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9千
印数 2500册	印张 11 3/4

定价：6.20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希尚垂察。

编　者

1991年4月

前　言

70年代前后，在日本曾经出现过所谓“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的热潮。今天，这个热潮虽已平静下来，但它提出的日本民族性格的特征问题，仍然是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引起各国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这里向读者介绍的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赖肖尔著《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一书，就是欧美学者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代表著作。

赖肖尔于1910年生于日本东京，1990年9月于美国去世，是美国著名的日本通。他长期从事日本研究，一度担任美国驻日大使，著述甚丰。《当代日本人》是其新著。1977年，赖肖尔曾写过一本《日本人》，在美国和日本轰动一时，中译本出版后也很畅销①。新著虽以旧著为基础，但除个别章节（如历史）外，均为改写或新写。从书名、结构和内容看，新旧两书是不同的两部著作。与旧著相比，新著不仅补充了许多新材料、新事实，论述更深刻，逻辑性更强，而且观点也有很大变化。如果说，旧著还多少有些西方人看不起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么，新著已彻底改正过来了。

例如，旧著以否定的语调描述日本社会：

> 他们穿着相同，外貌似乎也都差不多，迈着坚定的步伐，秩序井然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加上他们与众不同的语言，使人感到与他们隔着许多无形的墙。这种景象，在外国人看来，无异于机器人一样的社会，而将来我们也会面临这样一个世界。

---

① 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译者

新著则改成了肯定的语调：

> 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迈着坚定步伐，秩序井然地奔向目的地的庞大人群外貌相似，衣着相同。这似乎是等待着我们一切人的机器人一样的未来的景象。然而，如果人们能够透过语言障碍的帷幕而加以更密切的观察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未来的某些模式可能是拥挤的、雷同的，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机勃勃而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和人类的未来。

又例如，旧著把日本的国际性现象说成是“表面的肤浅的国际主义”、“形式上的国际主义”，并对日本能否国际化表示怀疑：

> 应该指出，日本年轻人尽管目前采取这种态度，他们最终可能会被推回到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日本人模式中去。但是青年人或许能够打破这种框框。总之，要把日本从一种过于浓厚的与世分隔的感情转变到具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可能更多地要通过世代更迭而不是靠制度上的改革来达到目的。

而新著认为“80年代后期，从某些方面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富于国际性的重要国家”，对于日本的国际化也充满信心：

“今天，独特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困扰着日本人，但这个问题将会按照有利于国际主义的方向解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态度。”因为“历史证明，他们能敏锐地判断形势，把握时机，迎接新的挑战，达到其目标。今天也会再次获得成功，何况与以前的变革相比，这些目标是微不足道的。”

赖肖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批判美国人以西方社会为模式，视日本为凝固不变社会的单向思维，因而对日本的观察比较全面，比较公允，也比较客观。赖肖尔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总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的各种社会现象。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使赖肖尔提出了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这里就我认为最有意

义的，列举一二：

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日本研究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国际学术界，包括我国的研究家在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或附和这种看法。然而，赖肖尔在看到日本人的群体倾向的同时，也强调“他们以其他方式保留着非常强烈的个性”。他指出：“在这个群体社会中，日本人的个人抱负和自我奋斗，并不是异常现象，相反它是这个社会古老而基本的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日本人确实仍然保持着一种很引人注目的坚强性格。”应该说，这个观察是深刻的。因为，集体总是由个人组成的。任何集体离开了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都将变得死气沉沉而无所作为。

近代时期，日本是亚洲唯一实现民族独立并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从政体上探究其成功的原因，日本及国际学术界一般都归之于明治集权制。赖肖尔独排众议，提出明治政体是分权制的论断。他指出：“明治领导人继承了集体领导的一般模式”；“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暗杀以前，和伊藤博文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宪法时，都享有某种程度的优势。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基本上也是作为集体的成员之一发挥作用的，如同运动队的一个选手那样”；甚至后来的“东条英机的权力也只是一个领导集团的权力，而不是一个独裁者的权威。1944年当战局恶化时，他顺从地弃权离职。”赖肖尔并且认为，这种分权制从13世纪镰仓幕府时代已形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对独裁权力乃至领袖权威的反感和对群体合作的强烈偏爱，构成了日本政治遗产的特征。”我认为，赖肖尔的这个论断符合历史事实。如果我们认真剖析一下明治政体的构成，不难发现，它确实既不是天皇专制，也不是寡头政治，而是天皇、元老、内阁、议会、官僚、政党等多种政治力量互相制约的政体。这种政体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且能够最灵活地应付各种事态。

善于吸取别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这是举世公认的日本民族的优点。然而，这个优点除给日本民族带来积极作用外，是否也有消极的一面呢？人们似乎很少这样提出问题。赖肖尔总结了日本人两次大规模地向外国（古代向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发现“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在先进文化面前，日本人产生自卑感，不得不兢兢业业、专心致志地模仿、学习。但是，随着他们同化所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文明时，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它落后的国家，自卑感为优越感所取代。“日本人向外国学习每次都转向对抗。”优越感的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危险境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所发生的那样。”赖肖尔发现的日本民族在对外关系中自卑感—优越感周期钟摆式晃动的规律，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如果人们，包括日本人自身在内，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规律，那就会自觉地去发扬其积极面，而注意克服和防止包藏于其中的消极面。否则，盲目地被这一规律所支配，社会就会陷入歧途而重蹈历史的覆辙。

就方法论而言，赖肖尔这本书也有其特色。一般的“日本人论”着眼于日本人的生活、习俗、心态等文化社会现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居多。赖肖尔不迷恋于生活琐事，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综合研究日本人的性格。这个结构看起来似乎有些陈旧，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从更高层次去发掘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在各个领域的体现和渗透以及其对日本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五花八门的“日本人论”中，可以说，它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当然，美国学者为美国人写的书，目的又在于纠正美国对日本的偏见，因此，强调的面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不尽相同，是

不足为奇的。例如，强调东亚人的种族歧视并不亚于美国人，强调美国占领对日本发展的作用等，这些显然带有美化美国的味道；又如为了批评西方人看不惯日本的制度，而又过分美化了日本的民主制度，对于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和残暴很少揭露；西方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极权主义国家，赖肖尔也因袭了这种偏见；所有这些问题，我国读者无疑会自己作出正确判断。总的来看，我以为，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仅对我们了解日本，了解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而且对我国日本学的建设也有参考意义。

沈 仁 安

1990年10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住所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在中国的文化儿女中，日本是最出类拔萃，最与众不同的。对中国来说，日本近几年来已经成为所有外国中最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在不远的将来，肯定会变成最至关重要的国家。在地理上，日本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文化上也是如此。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对日本知之不多，对日本人了解更少。

日本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日本人很清楚，他们的许多早期文明渊源于中国，他们也没有忘却近现代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此感到非常羞愧和内疚。但是，他们对当代中国和中国人也同样不甚了解。

中日两大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拥有许多共同的文化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他们彼此之间竟是如此陌生。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化传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产业大国；另一个国家人口位居世界前十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将来，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肯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既决定着他们自己，也决定着全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对于这两个民族和全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首先是为了帮助美国人了解日本人而写的，其次是为了帮助日本人通过局外人（如美国人）的视野来认识他们自己。我希望它也能有助于中国人了解日本人。尽管它是为不同的读者创作的，但是，关于日本的基本事实，不管人们的观点如何，都是相同

的。如果本书对中国人了解日本人也有所贡献，从而对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和友谊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感到莫大的快慰。

埃德温·奥·赖肖尔

1988年12月21日

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市

序 言

自哈佛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日本人》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编辑们感到出版一部最新的修订本是适宜的。然而，仅作少许改动，增补过去十年的材料，显然是不够的。日本人本身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确实没有很大变化，但是，外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及其对日本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日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四个国家之一。人们在叙述日本时，必须考虑到读者可能比他们十年前知道得更多，他们关于日本的观念也可能变得大为不同了。

《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基本上是一部新的著作，其原因即在于此。尽管有些部分实际上与《日本人》完全相同，但其他部分差不多完全是重写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历史背景，该编未作重大修改。另一典型是关于经济的一章，它扩充成全新的第五编。最后一编即第六编“日本与世界”基本上也是重写的。新书的副标题“传统与变革”在进一步强调贯穿两书的一个主题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两书之间的关系。

“日本人”是一个涉及面广而多样的研究课题，这样篇幅的一本书显然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值得欣慰的是，已有许多专门著作涉及了我所不打算论述的领域，如：日本琐碎迷人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戏剧和日本人的其他文化成就以及日本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等。我侧重的是日本人本身，亦即他们的当代社会、政治制度、企业组织以及日益重要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不仅要自己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且还要充

分利用众多日本和国外学者和作者的研究成果。由于他们人数太多，即使只列举最重要的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曾在《日本人》一书中对提供建议和打印书稿的朋友表示谢意。在这本书中，我还要感谢埃拉·L.拉特利奇和鲁伊科·康纳为本书的打印做了大量工作，感谢他们两人和南希·德普图拉在核对专有名词和事实细节方面给予的帮助。我还要对安·霍索恩出色的编辑工作表示谢意，并感谢史蒂文·埃里克森博士为本书编写了“阅读书目”，彭布罗克·赫伯特图片研究咨询处为本书提供了插图。这些插图和地图差不多都是新制的。①

① “阅读书目”和插图，中译本从略。——译者

第一编 地理环境

第一章 国土

日本人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塑造而成的。其地理位置、气候和自然条件这些固定不变的因素，决定了他们发展的限度，促成了特殊的发展方向。

大部分人认为日本是一个小国，甚至日本人自己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从世界地图上看，日本也很小，不过是辽阔的欧亚大陆东海岸之外、滨临浩瀚的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如果将日本与近邻的中国或苏联，或者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或加拿大相比，它无疑是个蕞尔小国。但是，国家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将日本与西欧诸国相比，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与其说日本比加利福尼亚小，或者说把它放在西伯利亚将小得找不到，不如说日本比意大利大得多，它的国土面积是英国的1.5倍。对于美国人来说，最恰当的比较是，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总数，日本都大致相当于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缅因州以外的新英格兰各州的总和。

衡量国家大小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平方英里绝不是最重要的标准，实际上它经常将人引入迷津。南极洲、格陵兰和新几内亚的1000平方英里，还不如莱茵河下游或伊利诺伊州丰饶农业区的10平方英里。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西北部横断于矿藏和适宜居住地带之间的广阔地区，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经济上的累赘。

衡量国家大小的一个更有意义的标准是人口。世界上有4个

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大约10亿，印度接近8亿，美国和苏联均已超[4]过2亿。印度尼西亚和巴西有成为人口大国的地理条件，人口都已接近2亿。日本人口居世界第7位，尽管其地理面积还不到上述6国中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的1/5。日本的总人口遥遥领先于不久以前还被视为世界主要大国的西欧国家。早在17世纪初，日本就有大约2500万人口，比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要多得多，是英国的好几倍。今天，日本人口已超过12200万，比西欧四大国（西德、意大利、英国、法国）中任何一国的人口都多一倍以上。

衡量国家大小的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国家的生产能力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所开发的资源、人口、技术（这最重要）诸种因素的总和。根据这个标准，日本是世界巨人之一，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遥遥领先于西欧各大国，并且迅速接近苏联，尽管苏联人口是日本的两倍，国土面积是日本的60倍。（本书此处和其他地方都有意省略国民生产总值等具体数字，因为过时的统计数字最容易遗忘。当代世界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大部分数字很快就会过时；而经济增长数字往往由于通货膨胀而变得名不副实。因此，我更乐意采用概数和比率，这种数字不会很快过时。）

我们只习惯于根据普通地图判断国家的大小，因此运用两幅别具一格的图也许不无裨益。以人口总数和国民生产总值为基准，分别绘制出人口图和国民生产总值图。1964年，我首次设计了这种图，其目的是为了向仍然低估战后日本发展的日本人指出：日本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大国了。这两幅在旧图基础上绘制的图表明，根据经济指标，日本近几年来已经变成举足轻重的世界巨人。现在，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10，而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40。

统计数字是这些地图的基础，但它们，特别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往往是非常不稳定的。然而，只要允许一定的误差存在，这两幅图加在一起就反映出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世界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以及一大批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但世界生产能力大多集中在日本、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图的细节因时而异，但人口众多而未实现工业化的穷国和工业化富国之间的不平衡，无疑还会持续多年，乃至不断加剧。总而言之，穷国增长最快的是人口，富国增长最快的却是国民生产总值。这或许是最难解决的国际问题之所在。

* * *

虽然根据某些标准，日本是一个泱泱大国，但就地理面积而言，日本实际是一个小国，甚至比平方英里数所显示的还要小。日本山多地少，适于进行农业和其他经济开发如林业、采矿和水力发电活动的平地不到国土面积的1/5。按国土面积计算，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口密度比日本高；但如果按可居住面积计算，日本则比这两个国家都要拥挤。其实，除了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城市国家，就每平方英里可居住土地上的人口密度和生产率而言，日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高得多。

日本的山脉由于比较年轻，几乎无例外地陡峭险峻，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山的高度只有几百至几千英尺。日本大部分地区是连绵不断、森林茂密的山丘，狭长的谷地交织其间，形成条块状耕地和居民点。日本到处耸立着火山堆，既有死火山，也有活火山。日本最大岛本州中部的几条山脉合在一起有日本的阿尔卑斯山之称，海拔高达10000英尺左右。富士山也矗立于这一地区，这是一座典型的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1707年。富士山海拔12385英尺，从背面看犹如拔海而起，直入云霄。古往今来，雄伟壮丽的富

士山一直倍受日本艺术家和文学家的青睐。

日本只有一个相对来说算是广阔的平原，即东京周围的关东平原。但这个平原最长的伸展部分也只有120英里。此外，日本的可居住地区还包括一些窄小的沿海冲积平原、相当狭长的河谷以及山区的几个盆地。险峻的山岭和崎岖的山脉将这些盆地隔开。

日本分成许多小地区，这助长了地方分裂主义，为中世纪时期权力分散的封建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地形上的这种区分无疑是古代日本划分成许多自治性"小国"的基础。这些小国家到8世纪时演变成传统的68个州。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现今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边界，9/10仍然完全沿用早期作为州界的山岭。

虽然日本依自然条件分成几个部分，但日本人的特征是统一和单一性，而不是分裂和多样性。日本人可能受到有上千年历史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模式的影响，早在7世纪就把自己视为生活在一个统一国家的一个单一的民族。虽然日本有好几个世纪是一个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国家，但这是他们坚贞不渝的理想。现在，像日本人这样人口众多而又属于同一民族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尽管日本的地理障碍比英国更难于克服，但英伦三岛上那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分裂在日本列岛上几乎不存在。

在现代铁路、公路开辟建成以前，日本国内的陆路交通极其困难。所有的河流都只有很短的一段可以通航。但是沿海海上交通一直比较方便；在岛屿星罗棋布的美丽迷人的濑户内海，水上交通尤为发达。内海一直是日本西半部的中央交通大动脉。从九州北部与大陆的主要接触地区到内海东端古代的首都地区，是日本人早期历史活动的中心。

农业民族对哺育他们成长的土地总怀有一种深深的眷念之情。但是，日本人除了这种普遍性的情感之外，还有一种对自然美的特别强烈的意识。日本各地距海都不超过70英里，高山峻岭举

目可见。雨量充沛，到处森林茂密，绿草如茵。季节交替使景色更为绚丽多姿。最早的日本文学就已热情讴歌海景山峰，咏叹森林幽谷之美；当代日本人更是酷爱观光旅游，几乎达到如痴如狂、毁灭名胜的地步。除无与伦比的富士山外，“日本三景”宫岛、天之桥立和松岛也遐迩闻名。宫岛位于广岛附近的濑户内海中，是一个以神社出名的岛屿。天之桥立位于京都北面的日本海沿岸，是一片苍松覆盖的砂洲。松岛位于日本北部城市仙台附近的一个海湾之中，是一松林茂密、风景如画的群岛。日本的许多地方都可能有地方性的三景或八景，还有成千上万的风光胜地和温泉景区以及无数名气较小的美丽风景区。

日本的自然美与美国西部的浩瀚广袤全然不同，大多小巧玲珑，令人倍感亲切。这种小巧或许赋予了日本人善于捕捉并保持纤细的自然美的气质和技巧。例如，日本在拥挤不堪、空间极其狭窄而有限的城市中巧妙地设计了微型家庭花园，其间摆放着精心挑选的碧石碎块，种植着刻意修剪的乔树灌木，还挖掘了水池。这是雄伟壮丽、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的缩影。日本的风景中也有与这种小巧玲珑的风格迥然不同的，那就是日本中部的崇山峻岭以及北海道北部岛屿蜿蜒不断的峡谷风光。北海道在19世纪末叶并入日本之前，景色磅礴，人口稀少。这里颇具北美风光，而与日本其他地区有天壤之别。

然而，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虽然酷爱自然，但也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破坏着自然。日本是世界上可居住土地上人口密度最大、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因此，这也许在所难免。美丽的青山被夷为平地，优美的海滨被填平开辟成耕地，建起厂房和住宅。工业烟雾笼罩着远处的群山，城市的自然环境恶化也蔓延到许多乡村田园。为城市旅游者建筑的摩天大楼使山间风光黯然失色，宾馆、饭店、杂货商店部分地埋没了风景名胜。但是时至今日，日本大部

分地区仍然人烟稀少，任何人迹罕至的地区都还是风光明媚、景色宜人的自然乐土。

* * *

日本人口稠密，农业生产率很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的气候与欧洲大不相同。欧洲的农业受南方干旱的夏季和北方阴冷的天气所制约；而日本的夏季炎热，雨水充足，降雨量主要集中在从早春到初秋的生长季节。因此，相形之下，日本的农业经营[10]方式是精耕细作，从而农业人口也比欧洲多。

日本的气候与北美东海岸类似，而不同于欧洲，这主要是由日本和美国东海岸之间相似的大陆块、海洋与季风关系造成的。如果将日本列岛置于同一纬度的北美东海岸的地图上，就能得到关于日本的气温和气候的一般认识。在地图上，日本四大岛（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差不多从缅因州的北部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一[12]直延伸到墨西哥湾。冲绳（琉球）群岛与佛罗里达半岛位于同一纬度，千岛群岛（二战后被苏联并入自己版图）与纽芬兰岛平行。日本的东京和大部分城市与北卡罗来纳州处于相同的纬度。

由于日本不是大陆块的组成部分，而是位于距大陆数百英里之外的海洋中，因而，日本比同纬度的美国东海岸更具有海洋性气候特征，夏季不很炎热，冬天不太寒冷。日本的降雨量较多，年平均降雨量约100～300毫米。日本的晚秋和冬天比较干燥，大部分地区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这是因为聚集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和蒙古上空的高气压促使寒冷、干燥的气流在比较寒冷的月份里从大陆流向外部。

但是在日本也有一个重要例外。冬季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吸收了日本海的大量水分，在经过本州中部的山脉时凝结成雪降落下来。这与北美五大湖区东岸的“雪影”相似，只不过规模更为壮观而已。因此，有“雪国”之称的本州西北部沿海地区，冬天大雪纷

飞，很多地方积雪达五、六英尺厚，是世界上人口稠密区中降雪最多的。

在日本北部山区，山脊两侧截然不同，一侧是阴霾笼罩的雪国，另一侧却是阳光明媚的一马平川；有时，仅隔几英里的铁路隧道，气候也有很大差异。这种自然条件，再加上日本的主要城市都集中在日本列岛的太平洋沿岸地区，使那些自称为“内日本”①的居民产生了某种自卑感和怨恨之情。相比之下，南部突出在太平洋之中的半岛格外温暖，近似亚热带气候，这是由日本海流即日本人所谓的“黑潮”造成的；黑潮冲刷日本东南沿海，就像墨西哥湾暖流冲刷着美国东南海岸一样。

除北海道以外，日本大部分地区的作物生长期平均为200—260天。高温炎热的夏季时间不长，一般从7月延续到9月初。这段时间天气确实很闷热，气温高还在其次，最烦人的是非常潮湿。

日本的冬天不太冷，但如果缺乏足够的暖气，日子也不很好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仍普遍缺少暖气设备。虽然除北部和高山地区外，气温很少下降到超过零下几度，但是，日本大部分地区冬季有一两个月夜间气温会骤然降到零度以下，冲绳以外的日本各地多少都有降雪现象。由于冬天的寒冷不至于冻死足不出户的人，因此，和生活在类似气候下的任何其他民族一样，近代时期以前的日本人发展起来的取暖设备只能稍微减轻一点冬天的严寒。日本传统的住房光线明亮，通风良好，夏季凉风习习，冬天却挡不住风寒。日本人主要的取暖工具是火盆，人们用它烤手，据说这会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有些农[illegible]。夜间，洗热水澡会令人感到暖和，睡前不觉得冷。白天[illegible]和服

---

①：指日本西北面向日本海一侧的地区。——译者

的阳光会使房子短时间内暖和到过得去的水平，因此，房子朝南是很重要的。现在，私人住宅还未普及暖气，但电炉、煤气炉和油炉已经代替老式的火盆，再加上住房结构也比过去更加坚固，因此，冬天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了。然而，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冬天仍然要穿又长又厚的内衣。

可见，日本的夏季和冬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也不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况且时间也比较短。一年的其他 8 个月则令人心旷神怡。这与美国大部分地区不同，日本四季分明，温度变化慢而且有规律性。

日本是典型的温带气候，与热带型气候不同。热带全年是生长期，高温使人们不得不放慢生活节奏。日本人为了渡过寒冷的冬天，在其他季节必须兢兢业业，辛勤耕耘，以积蓄更多的食品。他们认为正午为避炎日的午休以及轻松的劳动节奏都是不必要的。日本的东亚近邻朝鲜和中国也是如此。这种气候条件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三个国家的人民都以艰苦奋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闻名于世。起初只是生存的简单需要，后来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和显著的道德规范的熏陶，看来在日本人及其东亚邻居中产生出可能是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劳动美德。

日本气候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经常有巨大的气旋即台风，在夏秋之交给日本很多地方带来灾害。台风与偶尔袭击美国东海岸的飓风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由相同纬度地区的陆地与海洋之间的一般关系造成的。但是，日本受到的台风袭击更为频繁；由于日本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台风最先登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因而受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一般也更大。

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但是，这种心理状态也是由其他自然灾害促成的。由于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有许多活火山。

日本经常有火山爆发。浅间山是最大的活火山，它于1783年喷发，毁灭了本州中部数百平方英里的地区。日本列岛还有大量的断裂带，经常发生破坏性地震。1923年9月1日正午，日本发生大地震，所引起的火灾几乎将东京和横滨夷为平地，13万人在地震中丧生。由于江户(今东京)大约每隔60年就周期性地发生强烈地震，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自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来，已经过去60多年了，现在将发生另一次地震。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思考：东京这个现代地铁网络密集、高楼大厦耸入云天、大街小巷拥挤不堪的城市又将如何生存？总之，日本人既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发奋图强。

第二章　农业与自然资源

15

在到处存在的山区和日益扩展的都市之间，耕地现在只占日本国土总面积的12%，另外土壤总的来说也不很肥沃。但由于生长期比较长，雨水充沛，精耕细作非常普及，农业技术很高，因此虽然日本面积狭小，但仍是一个农业产量高的国家。

农业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很晚，大约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中国北方是许多东亚文明的发祥地，这里主要种植小米。但传到日本的是水稻种植型农业，这似乎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南方。到公元二世纪，日本的水稻种植业已经相当发达，种植方式相当先进。小块水田为沟渠环绕，由纵横交错的人工小水渠进行灌溉。秧苗一般是在专门的苗床上集中培养，然后移植到大田。早期是人工插秧，现在基本上已用机械插秧，插秧可以确保水稻的均衡生

长。在日本比较温和的双季种植区，插秧还使农田能够空出较长的时间，保证冬季作物的成熟。

在日本的小块冲积平原和狭长的谷地，这种类型的农业不需要大型的水利控制工程来控制大河水系的破坏力、发挥农业潜力。有人认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北方的大型水利控制工程促成了这些地区规模浩大的专制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日本所需要的只是各小群体在分享水源时密切合作。或许正是这种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合作精神，造成日本人酷爱集团意识和集团行为。

日本人经营的那种灌溉型水稻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其单位面积产量要比西方旱地小麦高得多。因此，日本人千方百计地将耕地改造成水田，千方百计地挖沟排水，把沼泽、湿地和沿海浅滩改变成良田。在其他地方，水田沿河流而上，比比皆是。只要是有水源的地方，人们就引水上山，修筑人造梯田。在更高的山坡或无法灌溉的地方，是种植其他作物的旱地。在日本，水稻种植已经传播到北海道的西北部，全国大约40％的耕地种植水稻。

双季作物种植区的单位面积产量更高，一般是夏季种植水稻，冬季种植各种谷物和蔬菜。从东京稍北到京都以北本州的西海岸一带，日本西南部的一半地区均可种植双季作物。

由于精耕细作种植水稻，加上推行双季作物种植，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自古以来就养活了比寒冷而干燥的西亚和欧洲国家更密集的人口。至少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仅中国的人口就相当于甚至超过欧洲人口的总和。从公元三世纪开始，日本的人口就已经遥遥领先于面积相当的欧洲国家。这样，日本人许多世纪以来就一直生活在比西方人口稠密的环境中。这些条件也许促进了日本人发展他们的集团行为倾向和群体组织才能。

当代日本的农业经营方式仍像过去一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与高度机械化的美国大规模农业相比显得相当原始。即使应用现代化机械，日本农业的人均单位时间生产率也仍然不高，但单位面积产量却非常高，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举例来说，直到前不久，日本水稻的亩产量就已经是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2—4倍。日本人重视单位面积产量而不强调人均生产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地少人多。因此，日本在每平方英里可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力是西德的几乎10倍、美国的100倍以上。

然而，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说，日本农业的效率很高，经营方式也是科学的。日本人充分利用每一平方英尺的可耕地，精心地将水稻和其他作物排种成行，绝不浪费一点点的土地。农民将土地仔细地深耕到1—2英尺深，这在早期是用东亚的长齿锄犁的。他们将耕地中的杂草除得干干净净，并充分使用肥料。以前使用的是有机肥料，包括臭气熏天但经济合算的城市粪肥。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仍在使用，但近来实际上已不再使用了。日本农民主要依靠化学肥料，并且大量地使用。他们还广泛地利用塑料薄膜建成简易温室，种植蔬菜。

甚至在近代时期，日本人就已经有意识地推进农业科学化了。18世纪的农民写下许多农学著作，论述了品种改良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垦出所有适宜耕种的土地（当时还很不发达的北海道边疆地区除外）。政府和农民都想方设法增加产量。因此，进入19世纪时，日本拥有3000万左右的人口，这可能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前工业化国家所能维持的最大人口限额。

19世纪中叶，日本对世界贸易开放，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和现代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农业得到飞速发展。在这一时期，先进农业技术比较迅速地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轮船和铁路提供的廉价运输促进了大规模的地区性作物生产专业化。北海道

也得到开垦。最后，官方的农业协会还提倡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到20世纪，日本已普及使用中国东北的豆饼和其他进口肥料。19世纪末叶，从农业中取得的余额提供了日本政治现代化和产业增长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但是，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增长，到20世纪初，日本的粮食已经不能自给，需要进口2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日本粮食奇缺，饥饿的人们处心积虑地在城市的废墟和尚未利用的土地上种植作物。但是，随着经济的恢复，人们放弃了这种徒劳无益的作法，甚至抛弃一些特别不经济的土地。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促成了农业生产率的又一次飞跃。日本早已广泛地使用化肥，一直实行大量投入。农业终于实现了机械化，从而造成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在战后初年的萧条时期，日本将近一半的人口从事农业，此后农业人口比例迅速减少。如今日本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其中只有1/4即2%的人是专业农户，大部分人是兼业农户。他们既在祖传的农地上干季节性的农活，又从事其他活动。更为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农村人口在距离不远、交通方便的工厂、公司和商店从事非农业性活动，他们只在周末和早晚耕种农田。有段时期，妇女和退休老人承担了主要的农活，但在老人过世后，妇女往往和丈夫一起从事其他工作，因此，日本的专业农户日益减少。

日本的农业机械化模式与美国相去甚远。只有北海道的农场规模比较大，但按照美国的标准还是很小的。在日本的其他地区，农场平均面积只有2.5英亩，折合成当代日本人使用的单位公顷，为1公顷左右。农业人口的减少最终将导致农场的合并，但大规模的合并尚未开始。总之，不管个体农户耕种多少土地，地理条件决定了日本的大部分水田和旱地面积狭小，用平方码（约等于0.8平方米）比用英亩（约等于4000平方米）或公顷（等于10000平方米）计算更恰当。日本的农场规模小，不可能使用联合收割机和大型拖

拉机。所以，日本人发明了一些别具一格的拖拉机、打谷机、插秧机和其他类型的联合收割机，这些机械比较适合日本式的农业及其狭小的耕地；顺便说一句，这些机械也很适合东亚国家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小块耕地和农业经营方式。日本每个农户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机械，但这些机械由于耕地有限而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因此，日本农业可能是世界上最超机械化的。

尽管战后日本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但农业仍然出现飞速发展。稻米生产每年都创新记录，而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加多样化的食品，因此人均大米消费量却同时下降了。日本人忽然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大米供过于求。然而，日本的人口已经比18世纪增加4倍，日本人目前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他们需要进口30%的粮食。如果加上国内肉类生产消费的饲料粮，日本则要进口50%以上的粮食。

粮食短缺导致日本人神经过敏。为了消除这种神经过敏，从政治上拉拢农民的选票并防止农村地区出现激烈的变革，日本政府继续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尽管农业的人均生产率比大多数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低得多，并且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日本政府对农业丰厚的补助使得日本粮食价格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得多。例如，日本进口的同等质量的美国大米的到岸价格只是日本国产大米价格的1/5。为了保护日本农业不至于被外国的廉价产品挤垮，日本政府实行严格的农产品进口控制。为了维持生产并帮助农户赶上普遍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日本政府还人为地提高大米价格。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也守着土地不放，这不仅是因为热爱土地，还由于日本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土地奇缺，地价以天文数字暴涨，远远超过了农业价值。

如上所述，日本的农业人口已经急剧减少，而城市还在不断扩展，继续吞噬着周围最丰饶高产的农田。但是，日本人也许希望保

21

持他们目前的粮食自给水平。日本的农业生产率低，规模小，是经济上的累赘。但它使日本人不必完全依赖外国的粮食，尤其是大米，从而得到某种安全感和心理上的满足。

* * *

日本的饮食结构和烹调习惯受其农业性质的影响。大米一直是主食，在不久以前，一日三餐主要是大米。在日语中，米饭和吃饭其实是同一个词 gohan（御饭）。日本的主要传统饮料清酒就是用大米酿成的，酒精度为 15～20%，比大多数葡萄酒稍微浓一些。日本人不惜成本地在所有可灌溉土地上种植水稻，在旱地种植其他谷物、蔬菜和著名的水果，包括许多温带品种和各种中国柑桔。

日本的畜牧业不太发达，牧场主要分布在比较寒冷的北部，还不到全国面积的 2 %。过去，牲畜是用以耕地拉车的，而不是供人食用的，在日本历史上，由于牲畜不多而佛教又忌杀生，因此，长期以来大部分日本人都不食肉。他们从鱼类摄取蛋白质。日本周围海域水产丰富，但当代日本人的食用鱼主要依靠世界性捕鱼业和进口鱼类。他们将各种鱼切割成片，做成所谓的生鱼片（sashimi，刺身），或者与紫菜和醋米饭混合卷成“寿司”（sushi，即饭团）。近年来，“寿司”在美国也颇受欢迎。蛋白质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一直是用途广泛的大豆。今天，日本基本上从国外进口大豆，用于制作豆腐、豆酱和酱油。

日本的传统烹调单调乏味，与举世闻名的中国烹调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在日本的传统膳食中，不加调料的精白大米饭不仅是充饥之物，还是非常珍贵的食品。日本人大口大口地吃着大米饭，菜肴只有一些鱼、蔬菜和腌菜。中国的宴席上摆满大盘小碟，丰盛异常，而日本的宴会只有各种各样的小碟，放着一块煮鱼、几块生鱼片以及一些青菜和腌菜，仅此而已。中国式烹调琳琅满目，令人

大饱口福，而传统的日本式烹调只追求味鲜色美。日本菜虽不讲究口味，但富于艺术性，往往优美怡人。

当然，正如其他事物一样，最近几十年来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也迅速发生了变化。随着日本人口味的多样化，人均大米消费量下降了。早餐，用进口廉价小麦烤制的精美的欧式面包基本上取代了米饭。肉类，无论是进口的还是用进口饲料生产的，都已经成为现代饮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人均肉类消费量还不到美国的1/5。日本人还食用不久以前还令所有东亚人厌恶的乳制品。更有甚者，优质的德国式啤酒、苏格兰式威士忌和其他西式饮料也逐渐代替了日本清酒。

日本人喜爱各式各样的面条，中餐非常流行，西餐，从法式大菜到麦克唐纳面包和肯德基炸鸡这类美式快餐，也很受欢迎。日本人还制作许多与传统风味迥然不同的风味菜肴，并因此而闻名于世。其中有一种菜称为“鸡素烧”(sukiyaki，汉字为寿喜烧)据说是19世纪中叶一些离经叛道的医科学生发明的一道牛肉菜；另一种称为“炸虾”(tempura，天麸罗)，据说是16世纪从葡萄牙人那里学来的。日本的牛肉以鲜嫩著称，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牛食用制啤酒的麦芽和有人给按摩的缘故。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日本牛实际上是圈养的，由于牧场狭小，牛不可能大量活动，因此牛肉也不会变得坚韧。

日本人的传统食物是大米、蔬菜和鱼类，而西方人却大量地消费肉类和脂肪。如果日本人恰到好处地用盐，并且不要把营养丰富的米糠去掉，那么，这些食物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保健饮食。这种饮食结构是日本心脏病患者比美国少的部分原因，但精白大米可能造成日本的胃癌患病率比美国高。

在人类生长的早期阶段，这种饮食结构也许过于简单而不利于儿童的发育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儿童的身高

已增高几英寸，体重也增加数英磅。身高增加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席地而坐的时间少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可以将腿伸展开去。但主要原因和体重增加一样，是食物更加丰富多采，既有乳制品，又有更多的肉类和面包。当代日本人无疑比他们的前辈魁梧高大，从前极其罕见的肥胖儿童现在则已屡见不鲜了。

* * *

日本的可耕地资源相当有限，其他自然资源也很贫乏。唯一丰富的资源是水。日本降雨量充沛，因此能够推行精耕细作，并使全国2/3的土地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现在，大部分森林地区都推行科学植林，以求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国土狭小，但木材产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尽管木材产量还不能满足本国工业造纸和民用建筑巨大需求的一半。日本的传统建筑几乎都是木结构的，因为砖石结构极易为地震所毁坏。即使到了现在，大部分民房和小商店仍然是木结构的。日本的河流短小湍急，水电资源丰富。然而，虽然河流已得到充分开发，目前水电只能满足日本浩大的电力消费的5％还少一点。

周围的海域是日本巨大的经济宝库。日本人主要从鱼类和被广泛使用于烹饪的、富含维生素的海藻类食品摄取蛋白质，这些都取自大海。沿海水域为日本人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当代日本人还大量养殖鱼类、贝类和海藻。日本是世界上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渔船到世界各海域撒网捕鱼。这与日本是世界上人均鱼类消费量最多的国家的地位相称。

海洋还为日本人提供了便利的国内交通，是日本通向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的捷径。除古都京都外，日本的6大城市和大部分中等城市都地处海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城市可以向海洋发展，修筑新的港口设施，并在大片浅海区填海造地，建设工厂。为了交通方便，日本的大部分重工业不是建在内河航线和铁路沿线，而

是直接建在滨海地区。

日本的矿产资源非常贫乏，不能满足现代需求。日本列岛是火山型岛屿，硫磺资源丰富，石灰石、瓷用黏土和沙也很充足，但是，日本几乎缺乏所有的矿物资源。日本列岛的矿藏还有待于进一步勘探。虽然这些资源能满足前工业化时代的需求，但却只能为日本现代工业提供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原材料。例如，日本的煤炭资源丰富，这对于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日本的煤层很薄，又有断裂，不易开采。现在，日本的进口煤是国产煤的6倍以上。日本虽然曾经一度是铜出口国，但如今即使是铜也几乎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日本列岛比较丰富的两种矿产是锌和铅，但锌的2/3和铅的6/7必须仰仗外国。其他重要的矿物质，包括铁矿石，全部或几乎全部依靠进口。最为严重的是，日本实际上缺乏石油这一关键性能源资源，而石油却大约占日本能源总消耗量的3/5。此外，日本近海石油的开发前景暗淡，核燃料也极其短缺。

* * *

虽然日本自然资源贫乏，耕地面积狭小，但20世纪以来，日本人口已增加一倍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数倍。不言而喻，只有高速工业化才能实现这种增长。然而，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工业化导致日本对外国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日本必须出口工业品以换取不可缺少的物资进口。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煤炭、铁矿石以及其他许多矿物的进口国，它还大量进口棉花、羊毛、木材以及各种其他商品。尽管日本也曾经生产棉花，但早已将棉田改种粮食，而从国外购买棉花了。日本甚至还变成生丝的纯进口国；蚕丝是一种劳动集约程度高的半农产品（因为养蚕需要桑叶），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它一直是日本最大宗的出口物资。要生存就必须依赖世界贸 25

易，这是日本经济地理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工业化自然意味着城市化，当代日本确实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但是事实上，甚至在18世纪日本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前工业化国家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中央集权化，出现了大得惊人的城市。1700年前后，当时称为江户的东京大约有100万人口，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最大的贸易中心大阪和古都京都也都有数10万人口。在其他地区还分布着许多人口10万以上的城堡型城市，这些城市是大约265个半自治的封建藩国的首府。

19世纪中叶，日本的城市人口已经相当可观，此后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现在，仅东京的主要市区（城市划分为区）就有800万人口，加上东京郊区的人口则超过1100万。东京附近的横滨市大约有300万人口。东京和横滨之间的川崎有100万人口，其周围的重工业区和郊区也有许多人口。东京都的人口与纽约市不相上下，是世界上最大的四五个大都市之一。

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是另一个大都市区，人口超过1200万。关西地区（关原以西）足以与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区（关原以东）相匹敌。除大阪人口超过260万以外，大型港口城市神户和稍靠内陆的古都京都也均有近100万人口，此外还有许多小城市。

名古屋位于关东和关西的中央，是又一个人口远远超过200万的密集区，北海道的首府札幌有150万人口。福冈是九州北部的旧都，北九州是由一些分散的城镇组成的工业重镇，因其位于九州北部而得名。这两个城市人口都在100万以上。广岛位于濑户内海之滨，人口将近100万。此外，日本还有194个中小城市，人口在10—80万之间。工业扩张到许多人口众多且交通方便的农村地区。

日本的工业区位于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的平原地带，在日本历史上的旧干线（东海道）沿线地区分布格外稠密。这条干线以东京为起点，沿太平洋海岸向西延伸，经名古屋到关西地区，然后沿濑户内海北岸抵达九州北部。在这个地区，厂房建筑几乎连绵不断，其间点缀着农田，偶尔为山脉隔断。这个滨海地带集中着将近一半的日本人口，足以与美国东海岸的城市地带相媲美。

在过去的120年间，日本由于实现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和接着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当代日本的国内交通网四通八达，都市区拥有非常先进的铁路网。东京市和大阪市还有优秀的地铁系统。在城郊的铁路枢纽区，随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辅助性商业区，如东京以西5英里的新宿。虽然交通网四通八达，商业区星罗棋布，但东京和大阪这些大都市区的几百万人口，每天上学下班都要花费一两个钟头的时间。

日本有一个复杂高效的铁路网将全国联系在一起，现代化高速公路也正开始伸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各主要岛屿之间正因架起桥梁、开凿隧道而相互连结在一起。九州和本州业已沟通。本州到北海道的海底隧道也即将完工，该隧道比西方人计划建设的英吉利海峡隧道还要长。一条连接四国和本州，跨越濑户内海的大桥正在施工中。航空线覆盖着日本列岛，但是以东京为中心，经关西到福冈、也可达本州西海岸和北部的一系列新干线以平均高达10[illegible]英里的时速承担了大部分运输任务。这些列车对开频率高，每15分钟对开一列火车，而且极为准时，从东京到大阪343英里的路程只要3小时。飞机远不如火车可靠，如果将从市中心到机场的时间计算在内，飞机实际上并不比火车快多少。

日本最令人羡慕的特征并不是城市和工业的普遍扩展。日本工业化的速度极快，而且是在与西方大不相同的条件下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部分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而重建工作不得不

在经济赤贫时期进行。因此，城市规划被人们抛在脑后，经济需要似乎凌驾于一切之上，许多建筑简陋粗俗。

现在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比较稳定，可以注意到经济生产以外的事情了。但是，日本仍然问题重重。按可居住面积计算，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日本人痛感空间奇缺，这种情况在城市尤为严重。日本地价昂贵，私人住宅和公共设施拥挤不堪。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天地，但许多城市居民被迫到称为“团地”(danchi)的4到10层的公寓建筑群寻找安身之所，多数大城市周围都为这种建筑环绕。这些团地中心的一套公寓一般还没有美国住宅中的一间大房子的面积大，却可能被划分为寝室和起居室两个小间以及一间更小的厨房兼盥洗室。东京有1/3的住房平均面积只有12平方英尺，大部分日本人仍然没有抽水马桶设备。几年前，有位坦率直言的英国记者将日本人的住房比为“兔子窝”，这使他们深受刺激，至今仍义愤填膺。

东京和太阪的路面分别只占城市的12%和9%，纽约却高达35%。由于在东京只有拥有停车场(街道除外)的居民才可以置备小汽车，因此许多家庭的出入口形同小型汽车库。东京市每人平均享有的公园面积还不到纽约的1/10，只有伦敦的1/20稍多一点。与日本城市的环境相比，即使最拥挤的美国城市也像神话中的开阔世界一样。

总而言之，日本的城市及其郊区不仅非常拥挤，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而且与自然的美背道而驰。虽然许多小街小巷引人入胜，深院高墙内的私人庭园是美丽宁静的岛国风光的缩影，但大部分城市粗俗丑陋，几乎达到无可言状的地步，与未受工业化摧残的壮丽的大海、秀美的山脉和乡间风光形成鲜明的对照。东京市中心的皇宫护城河和高墙赋予东京一种宁静肃穆的气氛。然而日本人刚刚开始注意到城市的外表与美观，比如从杂乱无章的房屋

群中开辟出通衢大道，并建起有时高达40—50层的富丽堂皇的新型建筑。

日本缺乏空间，过去又较少投资于永久性的道路和耐久性的砖石建筑，这意味着日本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可能要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数所显示的要低。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这并不能从我们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出来，但从空间狭小角度看，日本人所说的他们的生活水平要比国民生产总值所表明的要低的看法不无道理。总之，在日本的城市，工业规模浩大，生活朝气蓬勃，但可悲可叹的是拥挤不堪。人们在这里见到的情景如同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成就灿烂辉煌，问题层出不穷。

第三章　孤立状态

31

相对孤立是日本地理环境的最后一个关键性特征。日本列岛位于旧大陆的东端，正如英伦三岛位于其西端一样，但它离大陆比后者要远得多。日本的主要岛屿与朝鲜半岛的距离大约是多佛尔海峡宽度的5倍，有100多英里。在航海设备和技术很原始的时代，这是一道很大的交通障碍；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450英里左右海面则更是难以逾越的。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中最孤立的国家。在16世纪海洋贸易时代到来之前，日本只与朝鲜和中国这两个毗邻国家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更遥远地区的影响是经过这两个国家的过滤才传到日本的。近代初期，日本统治者利用天然的地理孤立条件，确立了一条坚决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政策。在1638年到1853年的200多年间，日本几乎断绝了与外国

的一切往来。在世界其他地区国际关系和区域性关系加速发展的时代，这是绝无仅有的经历。

天然的地理孤立被人为的孤立所强化了；日本人因而被迫生活在比任何一个人口和文明程度不相上下的民族更为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也许有人会说：自然的孤立状态，加上人为的孤立，使日本人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方式发展。遍观历史，日本人确实始终是一个文化上格外与众不同的民族，甚至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朝鲜的文化模式也有泾渭之别，尽管日本的许多高度文明渊源于中国和朝鲜。时至今日，日本作为一个没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脱颖而出，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和全面的现代化，在世界大国之林中具有独特地位。

32

孤立产生一些重要的副产品，它导致其他民族，甚至近邻朝鲜人和中国人，都觉得日本人总有些与众不同，同时致使日本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以及一种在外人面前感到极不自然、几乎达到痛苦程度的自我意识。这些感觉很难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但日本人确实断然地将世界分成"我们"和"他们"两部分，一边是日本，另一边是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包括在文化和种族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朝鲜人和中国人。日本人在整个历史上无时无刻不热衷于区别舶来品和国粹，几乎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孤立致使日本人对外来事物格外敏感，并且尤其注意这些事物的渊源。与自己的发明相比，任何国家的文明都更多的是外部影响的结果。如果剔除英国文化中渊源于国外的成分，那么英国的文化将所剩无几。但是，学习借鉴外国往往是一个缓慢的无意识的过程，至少是无案可查的。日本人却总是旗帜鲜明地区别"国粹"和"舶来品"，并使学习借鉴外国文化成为他们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日本人既给自己也给其他人树立了这种形象，即他们是独特的文化借鉴者。一个神话应运而生，即

日本人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只是模仿者，缺乏创造性，甚至不能理解引进事物的本质。实际上，孤立也许使日本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民族创造出更多自己的文化，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日本人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模仿别人，而是在学习和改造外国文化时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的那种特性和能力。其他民族曾这样努力过，但成效不大。

孤立的另一个副产品可能是日本异乎寻常的文化单一性，这一点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当然，孤立性并不一定就引起单一性，英伦三岛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也许有助于超越日本列岛的地理障碍，把单一型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

单一性是我们要反复阐述的一个主题。然而，关于单一性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说明是所谓日本人的种族构成，这可以视为日本文明的自然背景的一部分。日本人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都是长期的、很大程度上没有文字记载的血统混合的产物。其实，日本人多样化的脸型就已经说明过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混血。但是，重要的是，不管他们的血统如何，当代日本人确实是世界上最统一、文化上最单一的民族。足以与此相比的可能只有中国北方人。在日本列岛，所有日本人的体格大同小异，尽管各地习俗和口音略有不同，但是，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同，日本人中间没有英伦三岛上说盖尔语的人与说英语的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法国说法语的人、说布列塔尼语的人、说德语的人与说巴斯克语的人[①]之间那样显著的差异，也没有南部和北部意大利人之间那样全方位的深刻差别。

---

① 巴斯克人：住在西班牙与法国的比斯开湾边界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脉西麓的一个民族。——译者

日本列岛实际上形同死巷，先期漂流到这里的各种人，除了与后来者混合生活以外，别无出路。阿伊努人①是其中之一，它代表着现代人种完全形成以前的一支早期种族。他们既有某些白种人的特征，尤其是脸上和身上的毛发重，又有其他种族的特征。因此，有些日本人的毛发比其他蒙古人种重，可能是因为他们与阿伊努人有关系。因为阿伊努人，至少是有阿伊努血统的人曾一度占领过日本列岛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到公元 8 世纪，他们还控制着本州北部 1/3 的地区。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被日本民族的主体征服和同化了。现在，保留着自己文化特性的阿伊努人不到 20000 人，他们生活在北部岛屿北海道，甚至也处于被完全同化的边缘。

日本人与其亚洲大陆上的邻居极其相似，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考古材料和历史记载表明，曾经有大量的人口由东北亚经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尤其是在公元后的700年间。南方人和南方特色的文化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来到日本，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一些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民族共有的"南方"特征。早期中国南方的文化和人口可能既向南传播，也向东经朝鲜进入日本。日本文化的南方渊源可以解释日本的一些神话传说以及早期建筑的那种单薄的热带特征，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人在体格上更像中国南方人，而不像邻近魁梧高大的朝鲜人和中国北方人这一现象。

零星的历史记载表明，直到公元 8 世纪，日本列岛西部还存在着一些人种差别；又据可靠的材料，到那时还有大量人口从朝鲜进入日本。但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大量新血统人种进入日本了。实际上，1000多年来移居日本的其他人种寥寥无几。因此，日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进行种族融合，形成了高度单一性的文化。从17

---

① 阿伊努人：可能是一度广泛分布在亚洲北部地区的早期高加索人的后裔，现分布在北海道、库页岛（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译者

世纪到19世纪，人为的锁国无疑促进了这一过程；此后，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过程。但是，日本人在很久以前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特而“纯粹”的民族，他们总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一的大家庭。这种思想在原始部落民族中屡见不鲜，在现代大国的公民中却是极其罕见的。

日本在近现代时期推行军国主义，在当代进行全球贸易，因此，近几十年间吸收了一些外国人。朝鲜人是人数最多的集团，大约有70万人。他们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输入日本顶替出征的日本工人的朝鲜劳工及其后裔。日本还有几万中国人，其中主要是商人。他们一部分来自日本的前殖民地台湾，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此外，还有几千来自亚洲其他遥远的地区和西方的外国人。

所有外国人的总和远未达到日本人口的1%，只有朝鲜人才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真正的种族问题。朝鲜人与日本人的体格大同小异，语言也非常相近，因此，他们在文化和种族上很容易日本化。在日本出生的朝鲜人确实也经常忘记祖辈的语言，这和非英语民族出身的人在美国从语言上被同化一样。但是，日本人由于其极端的种族优越感，总是将朝鲜人拒之于日本社会的门外，不让在日朝鲜人成为日本社会的完全成员。朝鲜人对这种态度和日本过去在其祖国的殖民统治非常愤恨，往往刻意保持自己的特性。由于旅日朝鲜人都狂热地支持南朝鲜或北朝鲜两个敌对的政权以及这两个政权各自在日本政治社会中的支持者，因此，他们实际上给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注入了分裂性因素。但是，与北美的种族多样化问题或者北欧国家因战后移民和季节性工人大量流入而引起的问题相比，朝鲜人问题是微不足道的。 35

然而，在日本人的单一性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外值得一提，这就是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贱民集团。他们过去有种种名称，包

括"秽多"①，现在一般称为"部落民"，是"特殊部落民"的简称。部落民不到日本总人口的2%，他们的来源各种各样，比如战争中的俘虏和从事所谓低贱工作的人。部落民无疑也包括从事皮革业和屠宰业的人。因为佛教忌杀生，所以其他人都歧视这些行业的人。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军事贵族统治的封建社会中，杀人害命却从未受到鄙视。

从1871年起，部落民在法律上享有完全的平等地位，但社会对他们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虽然他们外表与其他日本人并无不同，文化上也基本相似，只不过是社会地位低下而已，但是为了维持家族血统的纯洁，大部分日本人不愿与部落民接触、通婚。在当代已经高度城市化的日本，部落民变得越发难于辨认；但在日本人这样一个近乎纯粹的单一性民族中，他们仍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集团而存在，这就格外惊人。

* * *

现在，日本的孤立不过是一种心理残迹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最接近的国家。显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只有依赖大规模的世界贸易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日本几乎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牢固的贸易关系。过去曾将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开的海洋，现在却把日本与世界各地有效地联系起来；过去，日本与一切国家相距遥远，现在，现代交通工具已将其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几分钟内就可以对大洋彼岸的国家给予毁灭性的军事打击。广播电讯和电视图像瞬间即传遍世界。在日历上的同一天，人们既可以在东京，也可以在纽约出现。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的出现使海洋运输费用直线下降，比陆运便宜得多。高山、沙漠、热带丛林和极地冰川仍

36

① 秽多：日本近世时期的主要贱民，从事处理死牛马、清扫等行业和乞讨等，也有从事农耕者，处于社会最底层。1871年宣布解放，但仍受严重歧视。——译者

然是发展商业的严重障碍，但更难于克服的也许是人为的障碍。如今，海洋是把世界从经济上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因此，我在绘制人口地图和国民生产总值地图时基本上略去了海洋，只留一些部分作为各国和各大陆的分界线。另外，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日本置于世界的边缘，而是将它放在世界的中央，因为任何一个大规模地参与世界性贸易的国家都有资格获得这种地位。

从一个多世纪前的近乎完全孤立的状况转变成当代完全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变化，就是历史学所说的突变。过去，外部世界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的冲击，由于远隔重洋和人为的障碍而延缓下来。孤立的后遗症仍然影响着日本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其他民族对日本人的态度。日本人在语言上仍然是相当孤立的，他们的语言与众不同，文字异乎寻常，极其难懂。但是，原来意义上的地理孤立以及近代初期的人为孤立状况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激烈变化。现在，曾经与他们过去的世界地位相适应的心态和技巧已经过时了，但适应新环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日本人对于他们的世界地位，甚至对于他们的民族特性都很迷惘。当代日本人意味着什么？日本在当代世界上又将扮演何种角色？这些都是日本人经常扪心自问的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一编，我还要探讨这些问题。

第二编　历史背景

第四章　早期日本

41

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促使日本人选择了他们走过的道路，但仅仅这些自然特征不足以说明当代日本人。不了解他们过去的经历，就不能真正了解当代日本人及其潜力。我们回顾历史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日本人不同于美国人，而与其他东亚民族一样，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他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自己，在分析自己的当代特性时会追溯到1000年以前，甚至更加遥远的过去。为了了解日本人及其面临的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背景知识必须有所了解。因此，在侧重论述当代日本社会以前，简略地回顾一下过去将大有裨益。

旧大陆的高度文明传到日本列岛的时间比较晚。在日本也曾发现一些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但与欧洲、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相比，日本列岛农业的出现晚了数千年，青铜和铁的使用也晚了几个世纪。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金属大概与农业同时传入日本列岛。

公元3世纪的中国文献提供了关于日本人的最早的明确记载。据这些文献记载，当时日本人有严格的等级区分，以农业和捕鱼为生。他们分成100多个部落，分别由具有半宗教地位的女（或男）酋长统治。文献中所说的“女王国”对其他部落拥有某种程度的霸权。女性统治者的存在说明日本曾经存在过母系制度，这与42历史上皇族的祖先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神话传说不谋而合。

从公元200年左右开始，日本可能屡次受到来自朝鲜半岛的骑马民族的侵扰，至少遭到从朝鲜来的文化的冲击。此后3个世纪，日本列岛西部2／3的地区出现许多大型墓葬，这说明军事贵族已经集中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和权力。到6世纪，一个集团以大阪稍偏东的丛山中的小小的大和平原（即奈良平原）为中心，确立了对日本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明确的领导地位。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组织虽然相对来说还比较原始，但已经变得相当复杂。所谓“氏”的半自治部落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土地，他们通过神话传说中的纽带或真真假假的血缘关系，与大和国家的统治家族联系在一起。“氏”有自己的领袖和部落神，还控制一些附属的“氏”以及农民、渔民、织工和各种工匠组成的准家族集团（部民）。

早期日本人的宗教仪式后来称为“神道”，以区别于外来的佛教。神道的核心是“神”(kami)崇拜。神的种类五花八门，既有自然现象，也有神话传说中的祖先，而这些祖先往往又是自然神，如天照大神。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不同凡响或令人敬畏的人很容易被奉若神明。领袖既是高级祭司，又是世俗统治者。在日本语中，“宗教崇拜”和“国家政府”，“神社”和“宫殿”所用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词①。这种宗教思想与伦理观念无关，只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意识以及一种追求纯洁仪式的观念。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日本人酷爱洁净和喜欢洗澡的原因。

* * *

到公元6世纪，邻近大陆文化的影响形成一股巨流涌入日本，农业、青铜和铁的传入就是例证。到6世纪中叶，这股文化巨流加快了速度，而日本人也以未曾有过的方式意识到它。大和朝廷内

---

① 分别为“社稷”和“宫”。——译者

部围绕着是否接受佛教的偶像和信仰，把它看作一种与神道同等甚至更为强大的宗教体系，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以佛教的拥护者的胜利而告终。经过一代人之后，圣德太子在593至622年期间以其姑母推古天皇摄政的身份，积极支持新宗教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陆文化。

43

圣德太子亲自阐释佛教经典，修建佛教寺院，幽雅的法隆寺便是其中之一。该寺位于奈良附近，以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和保留许多该时代的精美佛像而闻名于世。圣德太子还派遣使节到中国都城，直接向这一高度文明的发祥地学习。他开始仿照中国的政治制度，起草了一部所谓的宪法，其中包括佛教和中国的训诫。

44

其后一代，改革者集团在645年所谓的“大化革新”[①]中夺取朝廷政权。他们更加饱含热情地学习、引进中国的技术和制度。这种大规模地借鉴中国的浪潮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直到9世纪才减弱下来。虽然学得并不是完美无缺，但日本通过模仿中国而从一个落后的部落地区一跃成为高度文明世界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当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已经开始确立此后将近1000年的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在西方的历史上不存在足以与日本那样自觉而大规模地借鉴外国文化相媲美的例子。18世纪初俄国的彼得大帝可能是个例外，但彼得大帝所处的时代要晚得多，他学习外国的规模也比较小，因而也比较容易。然而，中国文明周边的其他民族都有某些相似的例子，如朝鲜人和今中国东北的满洲部落民族。东西方的这种差异是由于中国文明灿烂辉煌、具有强大吸引力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日本人和其他中国周边民族特殊的民族性所使然。相形之下，

① 大化革新：7世纪中后期日本发生的政治改革，因始于大化元年（645）而得名。——译者

罗马帝国这时不过是一腐朽没落的模型而已。总之，以前明显比北欧民族落后的日本人后来居上，在从6世纪到9世纪这300年内在艺术、文学、技术、政治和社会制度各方面都走在了前面。日本人还形成一种明确的意识，严格区分他们文化中的“舶来品”和“国粹”，因而得以在很早就认识到向其他国家学习的价值，但这同时也给人留下口实，认为日本人缺乏创造力，专事借鉴别人。

古往今来，中国人就视政治统一为文明的核心，日本人和其他东亚民族都接受了这种统一的政治制度高于一切的思想。南亚和西亚重视宗教，视为统一的因素。西方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接受了宗教统一而政治分裂的思想，这些都与东亚人的思想不同。东亚人对政治统一的强调有助于说明这个举世公认的事实，即在当代世界国家之林中，只有中国及朝鲜和日本直到今天仍然维持着它们各自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7世纪时所形成的政治单位。

日本人还接受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思想，企图将他们自己半神化的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此后，天皇在理论上就具备了双重性格和职能，既是国家神道的宗教领袖，又是中国式的世俗国家君主。然而，天皇实际上很少起后一种角色的作用。有史以来，天皇从未作为征服者获得权力；到了7世纪，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权威的象征，而不是大权在握的君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个别性格刚毅的天皇想扮演名副其实的国家统治者，但在多数情况下，庞大的皇亲国戚、众多的朝廷公卿以及后来居上的地方封建贵族操纵着天皇。因此，天皇只能履行繁琐的礼仪性职能，而不能行使统治大权。因而到了9世纪，天皇提前退位几乎成为惯例，也就不足为奇了。天皇目前具有的仅仅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的地位，是1000年前形成的，不是现代出现的反常现象。

45

在天皇之下，日本人借用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机构。全

国划分成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管理。中国的法典几乎一字不差地被照搬过来。日本人还仿效中国在首都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机构；不过为了更好地适应日本的实际情况，他们改造了中国的模式，如将中国政府传统的六部改为八省（部），增加了宫内省和中务省①，并且还设立了代行天皇的宗教职能、与太政官②平起平坐的神祇官。

日本人还设置了中国式的复杂的朝廷位阶制度，并且设置大量官职。按照中国的制度，政府高级官员由在复杂的高度学术性的国家考试中脱颖而出、才华横溢的人担任，7世纪末期以后尤其如此。但是，日本人开始借鉴中国模式的时候，这种制度尚未健全和充分发展；另外，这种制度与高度贵族化的社会格格不入，因此可能难以为人接受。日本官僚制度中的品位和职位很快就变成取决于世袭的家族门第，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日本人在学习中国中最令人吃惊的方面之一，就是采用了中国的那套极其复杂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土地在理论上都归中央政府所有，其中大部分定期平均分配给农户。每个农户要缴纳统一的人头税，承担农产品税（租）、纺织品税（庸）和劳役（调）三种赋税。这种繁琐的制度即便在中国也不能运转自如，到一定时期就会失灵。如果在仍然比较落后的日本能够得以实行，那倒是件怪事了。但是，这种制度显然在日本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并以某种形式维持了几个世纪，尽管可能从未重新分配过土地。这种制度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农民向政府服劳役的办法创建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从未付诸实践。海岛就是日本人的天然防御

46

① 中务省：日本古代国家机关之一，为八省之首，主管有关天皇国事行为的事务和后宫事务。——译者

② 太政官：日本古代最高执政机关，负责起草、审议政策，明治维新后废除。——译者

屏障，无需建立庞大的步兵。大多数情况下，军人仍然是贵族的职业。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需要一个作为首都的中心城市。从前日本人甚至连城镇都没有，但在这个时期，他们却想按照中国首都的模式，建设一座以宏伟的皇宫和官府建筑为中心的都城。第一座存在时间较长的城市是平城京，即后来所说的奈良。奈良按照中国都城的棋盘格式建在大和平原。由于它从710年至784年一直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8世纪一般被称为奈良时代。第二座长期的首都是平安京。它于794年建于大和平原以北的一个小平原上，所以此后几个世纪称为平安时代。平安京也模仿了中国的棋盘格式，这从京都的街道布局仍然可见一斑；平安京就是后来的京都。

虽然日本学习中国主要是在政治革新方面，但它所有较高层次的文化都受到了影响。日本人广泛钻研中国的学术、哲学和文学，因此思想风格和生活习惯深受影响。在纺织、漆器、冶金等许多不同的领域，技术得到了飞跃发展。从中国和朝鲜学来的、由乐队演奏的宫廷音乐和舞蹈一直保留至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真实可信的音乐舞蹈传统。日本的艺术焕然一新。在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日本人按照中国风格，创造了足以与中国的杰作相媲美的艺术佳品。

艺术品大都以佛教这一新宗教为中心。佛教与神道不同，它是一种高度复杂而富有吸引力的宗教。它在传入日本1000年前产生于印度，强调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生不断轮回转世而永恒不灭，是一种痛苦，但经过潜心修行，就可以大彻大悟而达到涅槃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得到解脱。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佛教传播到东亚地区，积累了浩瀚的文献、丰富的艺术品和众多的佛像，并 47

形成形形色色的教义和信条。最初，佛教吸引日本宫廷的是某些信条的神秘色彩和佛教艺术的光辉，而不是原始佛教的苦行信条。这个新宗教起初基本上局限于宫廷，8世纪和9世纪时才开始广泛传播到全国各地。

日本人非常幸运，可以向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中国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最遗憾的是，汉语和它的文字体系不适合日本语言的需要。当时，中国以西地区流行的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日本人其实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采纳，用于书写。汉文这种由成千上万个独特的符号即方块字构成的文字体系，难于为其它语言，尤其是像日语这样变音极多的文字所采用。结果日本人不得不用一种外国文字来保存档案，书写官方文献。在这几个世纪内，日本文化取得了巨大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以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语言以及一种极其困难的文字作为媒介取得的。毋庸置疑，这是非同凡响的成就。

在这个时期，日本人克服上述种种不利条件，撰写了大量著作。中国人把过去的经验看作当前有益的借鉴，认为编纂精确的历史档案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日本人也一丝不苟地记载下他们贫乏的历史，试图把自己尽量推前到一个令人尊敬的时代——实际上追溯到公元前660年。这种努力的结果便产生了两部早期历史著作，即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又称《日本纪》）①。这两部历史著作记载了日本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以及比较真实的近期历史。

* * *

从7世纪到9世纪，尽管声势浩大的外国文化浪潮席卷了日本，但日本人看来设法保持了对其固有特性的清醒认识。这就使人联想到过去的一个世纪，日本人虽然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但却保

① 《古事记》：日本现存的最古的史书，共3卷，为稗田阿礼默诵，太安万侣撰录。《日本书纪》：日本最古的敕撰史书，共31卷，为舍人亲王等编修。——译者

存了自己的特色。地理位置和语言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两个事例。日本人由于地处海岛而从未像朝鲜人那样，屡次受到中国的入侵，因此他们能够保持强烈的独特意识。他们的语言也有助于他们摆脱中国文化的同化影响，不致完全陷入中国的文化圈里。正如日语与英语大相径庭一样，它与汉语也迥然不同。虽然当时的日本人不得不用汉字书写，但他们只讲日语，而不是汉语。他们很好地运用自己的语言抒发诗情画意，尽管他们确实创作了一些汉文诗歌，但他们早期诗词的最伟大的成就是成书于739年之后不久的诗歌选集《万叶集》，它收集了4516首日本本国诗歌。日本人把汉字作为拼音符号，不厌其烦地按音节将诗歌逐字记录下来。

日本人不仅经受住来自中国的文化洪流的冲击，而且从9世纪开始将中国文化与固有文化熔于一炉，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混合文化。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从中国引进的制度和文化适应了日本的环境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并进一步与日本固有文化融汇贯通，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不言而喻，这种文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是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日本早期文化的新型文化。

新文化出现的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日本人于9世纪发明了行之有效的书写日语的文字，即假名表。在假名表中，汉字被简化成拼音符号，代表日语的音节。假名使日本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大量记录本国的诗歌。这些诗歌几乎毫无例外地是31个音节构成的"短歌"，其中的佳作收集在奉敕编辑的诗集中。他们还开始大量创作散文。宫廷妇女经常写下长篇日记（日本人从那时起就是世界上最热衷于记日记的民族），从日记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小说，即紫式部夫人于公元1000年前后创作的不朽名作《源氏物语》。它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部文学杰作。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日本的宫廷生活。这种宫廷生

活不仅与中国的宫廷生活迥然不同，与当时欧洲的粗野生活更有天壤之别。这些撰写日记和小说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美好的心灵感受以及他们的生活圈子里人物的行为举止、衣着式样和作诗风格，世上的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以及普通百姓仿佛都不存在一样。对于身居宫室、职高位尊的这些人来说，世间的那一切也许确实是不存在的。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文雅宁静的宫廷生活背后，是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从中国引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大量的国有土地流入往往完全免税的私人所有者手中。这一趋势在8世纪就开始了。政府为了鼓励农民扩大农业投入开垦荒地、增加灌溉水田面积，承认私人对新垦土地的所有权，起初暂时拥有，后来就变为永久性的了。到9世纪，随着担任政府高官要职的朝廷贵族占有这种土地并极力将法律改变得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一进程加速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权威显赫的宫廷家族和与朝廷有联系的势力强大的佛教寺院和神道教神社手中，变成免税程度不断提高的永久性私有财产。地方上的小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赋税，也心甘情愿地将土地献给这些家族和寺院神社。到了12世纪，私人庄园已经瓜分了全国的大部分耕地。这些庄园一般是由分散的土地组成的，并且常常享有免税特权。即使剩下的纳税土地也逐渐变成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因为任命地方官和控制税收正在成为一些家族的特权。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土地所有形式。最底层是真正的耕作者，其上是为不在领主经营庄园的地方实力人物，再上边是仅有名义上的所有权的宫廷显贵和寺院神社，更上面可能还有更有权威的保护人，他们保证庄园享有免税特权。他们都享有一定份额的收入。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按照税制上交给国家的农产品就更少了，更多的是地方庄园交给住在首都地区的所有者或保护

人的贡物。

这些发展使中央政府的财源枯竭，并使其行政职能丧失。因此，复杂的中国式中央集权政府的结构开始衰弱，新发展起来的比较简单的政府机构取而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旧制度已经完全消声匿迹。所有品阶制度和官僚职位仍然存在，不过已经变成威望和宫廷礼仪的象征，不再是真正权力的工具而已。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了《源氏物语》所描写的那种人们格外注意炫耀外表和风度的风俗。与此同时，宫廷豪族和宗教机构维持的私人行政机关，越发变成国家的真正权力机构。 50

对中国制度的另一改变，是9世纪期间一家宫廷贵族确立了对皇室的控制，这就是公元645年大化革新的领袖之一的后裔藤原氏。他们权倾皇室的根本原因是拥有大量的私人庄园，并日益垄断政府的高官要职。他们控制天皇的方法是，藤原氏的族长相继长期担任天皇的摄政，并把女儿嫁给天皇，从而将外孙扶上天皇宝座。只有不受礼仪束缚的退位的天皇，才能够向藤原氏的霸权提出挑战，比如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有些母亲碰巧不姓藤原的天皇这样做了，并取得相当的成功。

日本在这个时期演化而成的整个制度，确实已经与中国模式相去甚远。这种制度可能只有在日本这样孤立的国家才能实行。如果在中国出现日本式的权力分散，将会招致邻近游牧民族的征服，或者由一个精力充沛、能够更有效地抗击侵略的人物推翻旧王朝并取而代之。相形之下，日本没有外部压力，因此，统治权力的分散以及在不改变皇统的前提下实行宫廷实权的转移都是可能的。孤立使日本人能够保留过时的制度与形式，即使现实已经抛弃它们。因此，日本的文化以其特有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从9世纪到12世纪，日本社会的变化不仅仅限于经济、政治和宫廷生活，而且还涉及各个文化领域。日本文学正在独辟蹊径，走

向与中国模式完全不同的新路。在艺术领域，日本人也发挥了他们的特殊才能。譬如在绘画方面，日本人虽然仍然运用从中国学到的技巧，但创造性地创作出所谓“大和绘”，即日本画。他们在“大和绘”中大胆尝试运用色彩和构思，这至今仍是日本人的艺术情趣有异于中国人的一个原因。日本人因此不仅表明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性，而且还显示出他们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

第五章　封建主义

12世纪，日本的历史进程开始进一步背离东亚的发展模式，这就是封建制度的发展。在此后的7个世纪，日本封建制度的各个发展阶段与9世纪到15世纪期间的西欧封建社会的历史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共同性不能归结为相互的影响，因为两者毫无往来。这些相似之处可能是类似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即部落社会和比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两个地区融合的结果。在西方，日尔曼部落集团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行政机构和土地制度的残骸。在日本，岛国部落采用了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制度。在日本和西方，这两种因素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中长期相互作用，互相融合，从而产生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军事贵族统治下的个人忠诚以及公共权力与私人地产权的相互融合为基础的。

在日本，随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力量的衰落，地方上不同集团的首领为了互相保护而结成联盟。这些集团是由原来的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地方庄园的经营者或所有者组成的。最初，这些集团的核心往往是富有领导才能和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成员包括其亲戚

和邻居。日本人特别重视世袭的权威，因此，皇族后裔比任何人更富有感召力。这样，许多集团最初都投入了被赐姓“平氏”和“源氏”的皇族旁支的麾下，他们原先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移居地方来收敛钱财的。

这些集团本质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维护治安的武士团。武士是地方小贵族，与欧洲封建时代早期的骑士大同小异，也是披甲骑马的战士。武士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弯刀。他们能够在马背上娴熟地使用弓箭，而日本弯刀后来则发展成举世闻名的最优质的钢刀。他们的盔甲与西方的迥然不同，主要是用色彩鲜艳的皮条将小钢片编串而成的，重量不大，穿起来仍能活动自如，也许更利于作战。

53

这些武士团在地方上慢慢地发展起来，到12世纪开始卷入京都中央政府的事务。威名显赫的藤原氏和皇族围绕着天皇继承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召来各自地方庄园的武力作为后盾，并于1156年和1160年打了两场短时间的战争。平氏的领袖在战争中取得超过朝廷的绝对优势。他定居京都，控制中央政府，并且仿效藤原氏把女儿嫁给天皇，而后把外孙扶上天皇宝座。

与此同时，战败的源氏领袖的继承人源赖朝在日本东部的关东地区举兵反叛。1185年，他的军队将平氏扫荡殆尽，他因此成为全国无可否认的军事统治者。但是，源赖朝没有定居京都担任朝廷高官，而是要了“将军”即天皇军队统帅的头衔，在今天日本东部即东京的近海地区镰仓建立根据地。他没收了战败者经营和领有的庄园，赏赐给自己的追随者，使他们当上新的庄园管理者（“地头”①），并在“守护②”（保护者）的领导下，按地区把地头组织起来

---

① 地头：镰仓、室町幕府的官职名称，主要管理庄园土地，征收赋税，行使警察权等。——译者

② 守护：镰仓、室町幕府的官职名称，主要掌握地方军事权和警察权。——译者

镇守地方。

从理论上讲，源赖朝没有改变旧的中央政府，朝廷贵族依然担任高级文官，并从他们领有的庄园获取收入。但是，旧的天皇制已经名存实亡。在天皇制的空壳内，源赖朝把一些忠于他个人的武士从关东派到全国各地的庄园，建立起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源氏在镰仓的简单的家族政权机构向所有的武士团发号施令，并根据地方习惯法，而不是按照朝廷的中国式旧法典进行审判。由于封[54]建时代以前的旧政府和旧经济体制基本上维持不变，因此，镰仓体制只是封建制度的雏型，但它经受住两次极其严峻的挑战而存在下来，并且有效地延续了一个半世纪。

第一次挑战是源氏的过早绝嗣。个人忠诚是整个镰仓体制在理论上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源氏则是个人忠诚的对象。起初由于源赖朝猜疑近亲同族，随后由于他的遗孀及其娘家北条氏玩弄权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条氏是平氏的后代），致使源氏于1219年绝嗣而没有将军继承人。从此，北条氏控制了将军政府，操纵藤原[55]氏和皇族出身的傀儡将军，进行统治。这再次表明日本人总是允许把最高权威变成纯粹象征性的东西，同时也说明日本人始终希望集团的领导，而不是个人的独裁。权力往往是由两个官员或整个集团共同分享的。

对镰仓体制的另一次大挑战是蒙古的入侵，这是日本从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面临的一次严峻的异族侵略。蒙古人先是占领了朝鲜、中亚、中东大部和东欧，随后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征服了中华帝国。接着，他们企图侵略日本。1274年和1281年，蒙古人两次派遣世界空前规模的海外远征军侵入日本，但均被击退。这主要是由于天气的缘故，而不是严阵以待的为[56]数不多的日本武士团的功劳。1281年偶然刮起的大台风即所谓的“神风”使蒙古人的入侵化为泡影，这使日本人进一步相信他们的

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以分散各地的武士的个人忠诚为基础的镰仓体制最后在动乱中土崩瓦解了。对祖传财产的反复分割使许多地头的后代变得穷困潦倒，日益依赖于当地的权威人物（他们往往是守护的后代）。此外，经过几代人之后，人们对镰仓的中央权威偶像的忠诚也逐渐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对闻名遐迩的地方领袖的忠诚。

这种发展趋势导致14世纪整个镰仓体制的突然崩溃。后醍醐天皇是违反时代常规的人，1333年，他企图夺回政治权力。镰仓政府派到京都征讨天皇的大将倒戈归顺天皇，曾经铁板一块的武士团立即四分五裂，变成地方色彩更为浓厚的领主家臣集团。

镰仓的叛将足利尊氏①（日本人姓在前，名在后）很快与后醍醐天皇分道扬镳，在京都另立天皇，自己袭用"将军"的头衔。但是，要在一个领主的统率下重建一个统一的武士团已经不可能了。足利尊氏及其后代定居京都，担任将军职务，一直延续到1573年。反过来，足利尊氏和他的后代企图建立一个三个等级的封建制度。他们是最高领主，统率各地的武士首领（陪臣），这些所谓的陪臣控制各自地区内的武士，武士是陪臣的家臣。

实际上，这种整齐划一的制度从未出现过。后醍醐天皇及其后裔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对立的朝廷，一直延续到1392年。各地领主和陪臣集团也针锋相对，互相残杀，表面上是为了两个争夺皇位的对立的朝廷，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利益互相冲突。朝廷重新统一之后，足利氏对京都附近的日本中部地区行使了几十年大权，但是，远方的领袖人物我行我素，轻视乃至无视足利氏的最高领主权。

1467年，在活跃于京都将军府中的大领主之间爆发了一场持

① 足利尊氏（1305—1358）：又称足利高氏。室町幕府创始人初代将军。——译者

久的战争，日本其他地区的领主也分成两派，加入混战。实际上，在
57 此后的一个世纪，日本全国硝烟弥漫，发生了彻底的权力交替。足利氏将军的权力丧失殆尽，大部分大领主也被新兴军事贵族所控制。足利时代早期的大领主基本上是镰仓体制下的地方“守护”的后裔，他们的名义领地往往大于实际控制区域。但是，1467年战争爆发后，在漫长的战争时期，一些新兴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其中大多数人拥有的领地虽然不大，但他们牢牢地控制着武士，从而基本上取代了守护家族。这些新首领后来变成日本封建时代的“大名”即封建领主。他们对自己的家臣和武士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在16世纪来到日本的欧洲人眼中，他们俨然是些小国王。

从14世纪起，战争席卷了日本。在战争期间，掌握地方权力的武士有许多机会削减京都政府以及贵族家族的税收和庄园收入，以中饱私囊。到15世纪末，庄园完全停止向朝廷和贵族上交捐税。因此，虽然朝廷和宫廷处心积虑地维持原有的品位、官职和仪式，但他们其实已经穷困潦倒、日薄西山。曾经大权在握显赫一时的藤原氏后裔，几乎完全要靠京都商会交纳的款项为生。据说，天皇甚至要偷偷出卖书法真迹度日。旧的天皇制已经名存实亡，日本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封建国家。

* * *

日本的封建社会在许多基本方面与欧洲类似，而与中国不同。武士统称为“侍”(samurai)，即“侍从”，特别讲究勇敢、刚毅、荣誉、律己和视死如归等军人美德。日本没有禁止自杀的宗教戒律，因此，武士战败时往往自杀身死，不愿成为俘虏而遭受耻辱和可能的酷刑。采取令人厌恶的极其痛苦的剖腹自杀成为表达坚强意志、维持荣誉尊严的一种仪式。这种光荣的自杀形式俗称“切腹”，比较正式的名称是“剖腹”。直到今天，偶尔还有人采用这种方式自杀。
58 采取其他不那么困难的方式自杀也被看作是一种摆脱困境的方

法。日本人认为，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基本上也是光荣的。

日本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一样，都依靠个人的忠诚纽带。当然，在这两个制度中，忠诚实际上是最薄弱的环节。在日本和欧洲的中世纪历史上，背信弃义的情况层出不穷，变节者屡见不鲜。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以罗马法为背景的，领主和封臣的关系被视为相互的契约关系，换言之，即法律关系。但是，日本引进的中国式制度重视道德甚于重视法律，法律要从属于统治者的道德准则。因为，在理论上统治者的统治权是以其智慧超人、品德高尚为基础的。这样，领主与家臣的关系被认为是家臣对领主单方面的绝对无限忠诚，而不是两者间的法律契约关系。所以，日本的政治权利观念没有发展的余地，这与西方不同。

在中国的儒教体系中，对统治者效忠是至关重要的，而对家族的忠诚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在儒教的五种基本伦理关系中，实际上有三种与忠孝有关。在日本，效忠领主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凌驾于对家族的忠诚之上，虽然后者也很重要。因此，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集团，它比家族本身还要重要。所以，在近代时期，日本人比较容易地转向对国家和其他非血缘集团的忠诚。

然而，在中世纪的日本社会中，家族门第和荣誉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继承权决定了一个人的权力、威望和财产权。这样，家族的连续性自然十分重要。西方的继承制度有许多限制，日本人的继承制度则比较简单，他们可以在儿子中挑选最适者作为继承人。如果没有男性继承人，还可以收领养子，女婿、年轻的亲戚甚至毫不相干的人都可以被收养成为完全合法的继承人。今天，继承权虽然已不再是日本社会的基石，但这类收领养子的事仍屡见不鲜。

日本的封建社会在另外两方面也与欧洲封建社会迥然不同。日本没有那种虽认为女性脆弱、低人一等，却又将她们置于浪漫的地位而大献殷勤的骑士气概。日本武士希望自己的女眷能够像他

们那样刚毅勇敢，为效忠领主或家族而牺牲自己。此外，日本的武士虽然与西方的骑士一样是舞枪弄剑之人，但他们决不像西方封建贵族那样经常露骨地蔑视学识修养和高雅的艺术，而是以飘逸的书法和写诗作歌的能力为荣。在日本，宫廷文化和上升中的地方武士社会长期共存，这也许促进了前者将文艺修养和思想观念比较完整地传授给后者。

中世纪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与当代日本社会已有天壤之别。但是，当时发展起来并在长期封建时代的各阶段得以保存和改造的许多思想观念，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因此，现代日本军队复活武士道精神及其价值观念是轻而易举的；另外，从封建时代留传至今的强烈的忠诚、尽职、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塑造了当代日本人的性格。

* * *

京都朝廷缓慢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使人们把日本的封建时代描绘成一幅黑暗时代的画卷。但是，正如欧洲的封建时代不是黑暗时代一样，日本更非如此。封建时代的日本文学、艺术和学术有着令人惊奇的连续性。一度基本上局限于首都地区的高度文化也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自然，文学和艺术领域都出现了新主题和新风格。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军事物语)描写了12世纪的军事业绩。这些传说以及佛教寺院的历史与佛教高僧的生活，被画在精美的画卷上，栩栩如生。13世纪，雕刻艺术得到复兴，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镰仓的大佛至今仍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像之一。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从京都的足利幕府中发展起一种精致的戏剧，这就是“能乐”。为数不多的演员头戴面具，身着戏装，通过响亮的合唱、有节奏的动作以及庄重的舞蹈，表演历史故事和古代神话。能乐的主题常常是佛教的生即是空的观念以及神道的神的精神世界贯穿于自然界和人世的思想。能乐

运用有乐器伴奏的合唱补充戏剧情节，这使人联想到古希腊的戏剧。

在地方武士的统治下，农民的地位从纳税人降为农奴。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获得了安全保障。不管怎么样，平民在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中毕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似乎通过传播佛教受到佛教精神的启示而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新方法。过去，宫廷贵族感兴趣的是那种强调法术和仪式的佛教，但是到了11、12世纪，在日本人中尤其是在平民中出现了新的宗教倾向，相信只要信佛——即靠众神发慈悲——就可得救并进入极乐世界。这种观念几乎与原始佛教背道而驰，原始佛教认为只有通过严峻的苦修而大彻大悟，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民间僧侣传播这样的思想，即在所谓佛教已经不那么纯正的“后世”，人们已经没有力量依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彻悟，因此必须通过凭借“他力”。

12、13世纪，这种思想促致新教派纷纷兴起，有些后来演变成日本最大的佛教教派。净土宗即是其中之一。它信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即净土，提倡教徒集体诵经，而不用到寺院中去进行有组织的禁欲修行，此外，还提倡僧侣结婚制度，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教派所提倡。另一个教派是日莲宗，它得名于其创始人日莲。日莲宗的信仰核心是《法华经》。日莲的思想具有特殊的民族色彩，他强调佛教在印度和中国已经相继衰落，只有日本才是这种宗教的中心。这些新教派在15、16世纪发展了大批信徒，甚至在有些地方与封建武士争夺政治权力。

许多武士酷爱另一个别具一格的佛教教派，这就是镰仓时代初期从中国传入的禅宗。禅宗强调静坐冥想，简洁朴素，与自然融为一体。禅宗寺院的简朴生活吸引了许多斯巴达①式的武士，他 62

① 斯巴达：古希腊的城邦之一。斯巴达人以刚强、勇敢、简朴、艰苦、好战和严于律己著称。——译者

们认为禅宗在静坐沉思中实践着严格的自律，是培养武士的行为方式所不可缺少的自我控制和坚强性格的方法。在封建领主的庇护下，镰仓和京都附近的禅宗寺院成为中世纪日本的重要文化中心。禅宗僧侣出任足利将军的顾问，在与中国的往来中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些僧侣的传播，日本人对中国的学术和文学的兴趣再次高涨，中国书法也重新流行起来。禅宗僧侣还将当时相当新颖的宋代风格的水墨风景画引进日本，日本的艺术家又像过去一样掌握了中国画的技巧。禅宗传入的其他事物还有园艺和饮茶，这些是为了保证坐禅时头脑清醒。

日本人围绕着禅宗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审美观点，这些思想观念成为日本文化的永恒因素。日本人认为：纤细、简单、自然乃至畸形怪状，比庞大、壮观、造作和整齐划一珍贵。在建筑方面，纹理自然的木材和弯弯曲曲的原木比造型整齐并经过油漆的材料更受青睐。依地势起伏的简单而不规则的架构比雄伟匀称富丽堂皇的中国式建筑更受欢迎。日本人将小庭院设计成生机盎然、争奇斗妍的自然界的缩影，这与西方规模浩大的几何造型风格迥异。京都著名的假山花园龙安寺集中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情趣。该寺建于15世纪，在一块狭小的地方，用沙砾和错落的石块构成一幅壮丽的海景。在绘画方面，风格粗犷、技术娴熟的几笔水墨比用尽所有色彩、画出一切细节的画卷更能抓住自然的神韵。茶道是作为对美的崇拜而发展起来的。在素朴的环境和优雅的气氛中使用简单的器皿举行饮茶仪式。中世纪的禅宗思想非常适合封建时代日本人的简单生活；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对现代西方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代西方人沉湎于由于技术无限的发展而造成的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富裕生活中。

日本与大陆贸易的巨大增长为禅宗僧侣与中国的密切往来创造了条件，而贸易的增长反过来是日本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结

果。折扇、屏风和倍受赞赏的东洋刀等制造品的出口日益扩大，这表明日本列岛在技术上已开始与中国并驾齐驱了。国内商会和手工业行会的发展是商业增长的标志。如同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一样，在日本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也需要行会来保护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对付苛捐杂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

9世纪以来，日本与大陆的往来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到了13世纪，海外贸易又开始恢复。在15世纪的一段时期内，足利将军把海外贸易变得合乎中国的朝贡关系，包括由中国的皇帝册封将军为日本“国王”，试图以此垄断贸易。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磨灭的耻辱。海外贸易的一个更重要的特征是，日本商人在商业目的受挫时，往往摇身一变而成为海盗，用刀剑掠夺他们通过贸易得不到的东西。日本海盗开始活动于邻近的朝鲜沿海，后来成为中国沿海的一股祸害，到16世纪时已经蔓延到东南亚各海域。

第六章　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

64

公元16世纪，效率比较高而又高度组织化的新型封建领主，征服并吞并了弱小的领地而势力大增，到16世纪末已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了日本。实际上，日本建立了一种几乎与欧洲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度完全相反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制度。其基本模式是足利氏企图建立而未曾建成的那种制度：最高领主严密控制家臣领主，家臣领主又控制各自的家臣和武士。

欧洲人在这时期出现于日本，可能促进了重新统一的进程，因为他们带来了新式的军事技术。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到达印度后，又迅速向东推进。1542年(或1543年)，一些人来到九

州南端的一个小岛。葡萄牙人追求的是贸易，但随之而来的是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到17世纪初已赢得了近50万教徒。这个数字在当时日本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当代日本基督徒所占的比例高得多。

然而，日本人对葡萄牙人的枪炮更感兴趣。火枪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帮助比较富强的封建领主取得成功。城堡建筑也增多了，这可能受到了欧洲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白墙木质结构的城堡主要是装饰性的，但四周有宽阔的护城河和可以有效地抗击当时的大炮轰击巨大的心土石墙。日本的城堡更像16世纪欧洲的要塞，而不像城堡。16世纪初建成的许多城堡包括位于大阪西边不远的美丽的姬路城，至今仍然完好无损。位于东京市中心的皇宫则是这种巨型城堡建筑的典型。

日本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基本上是三位相继当政的军事领袖的功绩。第一位是织田信长。1568年，他以支持足利氏的末代将军为名占领京都，接着征服了日本中部的小领主，并摧毁了强大的佛教寺院。1582年织田信长被暗杀后，他的杰出部将丰臣秀吉继承了他的事业。丰臣秀吉原来只是一个出身寒门、地位卑微的普通步卒，甚至连自己的家姓都没有。到1590年，他击败了所有的敌对领主，或迫使他们称臣，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

丰臣秀吉从未取得"将军"的头衔，但他确实在旧的天皇政府中担任要职。朝廷在他的庇护下恢复到中等程度的富裕。他垄断了当时一本万利的对外贸易，并在全国进行检地，根据各地土地的实际情况和农业收成分封领地。他没收了农民的武器，使农民和武士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级。武士不是在农村生活，而是居住在各自领主的城堡，日益变成领取薪俸的职业军人。

丰臣秀吉从1592年开始征服朝鲜，这无疑是他征服世界（在他看来，世界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第一步。日本人在朝鲜北部受到

中国军队的堵截，经过长期对峙，在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撤退。朝鲜人对历史上日本的入侵念念不忘，这是他们和日本人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

由于丰臣秀吉没有留下成年继承人，所以，他死后紧接着就爆发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1600年，丰臣秀吉最重要的家臣德川家康取得了一场大战的胜利。德川家康曾经被分封到江户（今东京）。他没有迁居到京都，而是把自己的根据地保持在日本东部，殚精竭虑地在丰臣秀吉确立的模式基础上巩固德川氏的最高统治权。德川家康在这方面得以如愿以偿，他的后裔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的统治者。

德川家康袭用“将军”的旧头衔，并且将全国划分成自己的领地和封臣的领地(藩国)。他把全国1/4的土地以及所有的大城市、港口和矿山留给自己。在245到295个(数目因时而异)拥有将军封赐的土地的领主即大名中，领地最小的只能年产大米10000石(一石大约等于 5 蒲式耳，相当于人均一年的口粮)，最大的领地在理论上能生产1022700石大米。领主大多分成三类：“亲藩”是德川家康的儿子或近亲同族。“谱代”即“世袭”大名，是1600年前臣服德川家康的大量家臣，他们的领地较小。“外样”即“外部”大名，是他的主要盟友和1600年战争的一些失败者，他们被允许在日本的西部和北部边远地区保持比较大的领地。此外，将军和大名一样，还维持着大批的直属武士和家臣。

德川氏在江户的中央政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谱代”大名和将军的直属家臣在其中任职。这个官僚机构体现了日本人那种分享权力和群体决策的旧倾向。最上层是两个枢密院“家老”和“老中”①，其下有两个或四个官员负责幕府各个部门；督察

① 家老，江户幕府临时设置的辅佐将军的最高官职，位居老中之上；老中，亦称年寄、宿老等。日本江户幕府常设的最高官职，直属将军，总理政务。——译者

全国。后来，将军基本上成为天皇似的傀儡，主要是权威的象征，江户的军人政府在理论上代表将军进行统治。

藩国的发展模式和趋势与中央政府大体相同，大名往往变成傀儡，武士官僚通过评定所和群体决策实行统治。在理论上，藩国是完全自治的领地，不向中央政府纳税，但实际上处于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它们要承担耗资巨大的城堡和宫廷建设以及海防义务；德川幕府还很快制定了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所有大名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年，同时把家庭留在江户作为永久性人质。大名还对领地的治安和有效的管理负完全责任，否则可能因失职而被剥夺或削减领地，这在德川时代初期尤其如此。

68

德川家康及其继承者为了确保德川政权的稳固，迫不及待地要消除一切隐患。他们感到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的活动格外危险，因为传教士和教徒倾心于外来的权威和偶像。先是丰臣秀吉，随后是德川氏，都对该教进行迫害，使之到1638年实际上销声匿迹。对外贸易也成为反基督教狂热的牺牲品。1636年禁止海外日本人回国，因为害怕他们重新传播基督教的病毒，并且禁止制造远洋航行的大船，只允许制造沿海航行的小船。日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只限于与朝鲜、通过冲绳（琉球）与中国进行少数接触，以及同长崎的荷兰小贸易商站和一些中国商人进行严密监督下的贸易。从此，日本开始进入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时期。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间，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世界贸易导致商业革命，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然而，17世纪初曾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驾齐驱的日本，到19世纪在技术上已经大大落伍了。但是，孤立确实促成了日本的国内稳定。日本在两个多世纪间维持了名副其实的绝对和平，只有周期性出现的改革运动和昙花一现的农民骚动点缀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史。最扣人心弦的政治事件是1703年的“47浪人事件”（浪人是失去领主的武士）。一个遭受剖腹

惩罚的小大名的旧家臣为了替主人复仇，在江户的邸宅中杀死造成他们的主人下台的那个官员一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剖腹自尽。虽然日本是一个实行陈旧的封建模式的社会，但是，17和18世纪的日本无疑比当时欧洲的任何国家更为秩序井然，在许多方面实行着更统一、更有效的统治。

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也为日本人发扬光大他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时期，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文化上成为单一性色彩更浓的民族。与此同时，由于一种基本上是封建性质的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此，中世纪的封建观念，如尊崇军事领袖，盲从愚忠以及重视集团组织等，都不合时宜地遗留到近现代。藩国的高度组织化和长期延续尤其进一步加强了集团意识。 70

* * *

17世纪初建立的政治模式，到19世纪中叶基本上保持不变。这种模式虽然与16世纪后期的情况非常协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了。然而，在这个严密僵化的政治结构中，确实也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

最根本的变化是经济的巨大增长。17世纪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了生产的飞跃发展。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刺激因素是领主轮流到江户居住的制度。这种制度迫使各藩国在德川幕府的首都至少维持一个庞大的机构，并将很大一部分收入花费在维持这个机构的开支以及大名及其随从往返于藩国和江户的旅费上。因此，各藩国为了获取现金以充作旅费和在江户的开支，就必须生产剩余的大米和土特产，到城市和全国各地出售。结果造成了程度相当高的地区性生产专业化以及比当时任何其他亚洲国家先进得多的全国性贸易经济的发展。

这些条件促成了城市的出现。江户（今东京）在任何时候都汇集着全国半数的领主和数量可观的武士，它发展成为一个逆 100

万人口的城市。大阪是西日本的大商业中心，京都是拥有优秀工业的天皇首都，这两个城市的人口也分别达到几十万。

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相应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日本经济高涨时期，日本的人口确实也增加了。但是，在日本人口达到2500万或3000万之后，即使技术和生产还有缓慢的持续发展，人口也保持着相对稳定。因此，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超过了养家糊口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和早期欧洲人一样，比马尔萨斯先行一步，已经实行了人口控制。其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可能的因素之一是封建的继承模式与日本式的收领养子相结合的结果。根据日本的继承方式，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继承人，收领养子使非嫡生子也可以成为合法的继承人。因此，日本人不需要数目众多的子女以求得经济的保障和家族的延续。而且，他们实际上认为大家族常常是累赘，而不是什么财富。据说，德川时代的农民还用杀婴的方法减少需要抚养的家庭人口。所以，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虽然经济增长了，但人口确实相当稳定。人们的生存得到保障，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有助于说明下列事实，即19世纪时的日本人不仅识字率比较高，而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也比较高。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当时日本人表现出的活力和精神。

封建社会自然偏重于农业，因此在德川时代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矛盾现象。政治领袖重视农业就对农民课以重税，轻视贸易就只对商业收取少量间接税。这种状况以及全国性的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富有的城市商人阶级的发展，在幕府直接统治和保护之下的大城市尤其如此。17世纪，大商行从酿酒、纺织品零售和借贷等经济活动中脱颖而出，蓬勃发展。三井商行就是其中一例，它在近现代时期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私有企业之一。

各藩国和武士因为只有从农业税中得到的大米这项固定收

入，所以日益负债于城市商人。这种状况侵蚀着整个德川体制。因为社会在理论上划分成四个等级：武士是统治者，农民是财富的主要生产者，手工业者是财富的次要生产者，而商人则处于最底层，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虫，而不是生产者。这种将社会划分成四个等级的观念借鉴自中国早期的思想，但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幕府将军和藩国大名经常想方设法削减家臣的俸禄，推行禁止奢侈法和其他限制商人的法令，以节约开支，扭转统治阶级负债越来越多的局面。他们还歇斯底里地建立商业垄断，但这根本无济于事。统治阶级对理论上最低贱的阶级所欠的债务继续增加。

丰臣秀吉时代在农民和武士之间所划的鲜明界线，使日本农村摆脱了封建统治者的严密监督。实际上，丰臣秀吉曾经强迫日本的乡村武士作出抉择，或者跟随领主到城堡式城市充当领取俸禄的武士，或者留在农村成为农民。许多武士害怕失去大量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乡村的头面人物或农村社会的领袖人物。因此，农村有了强有力的地方领袖，他们保留了武士阶级的许多价值观念和伦理思想，在处理自己的事务、分配和收取赋税等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72

随着德川时代国民经济的发展，生活在比较先进的日本中部地区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从旨在养家糊口的粮食种植转向日益增长的商品作物生产。比较富裕的农民发现，把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自己集中精力从事食品、丝绸和其他农产品加工，比纯粹的农业经营更为有利可图。18世纪后期，这类经营企业活动在日本农村出现了名副其实的激增。比较贫穷的农民越来越多地习惯到比较富有的邻居或附近的城镇企业工作，赚钱补贴家庭收入。因此，日本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封建社会的一般水平。

在德川时代的和平环境中，武士阶层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武士包括普通军人和封建政府机关的下层官吏和办事人员，他们大约占总人口的6%。虽然武士在德川时代初期基本上是一支作战力量，但他们逐步变成世袭的文职官僚，而不是常备军了。武士佩带传统的双刀作为等级标志，并且企图保持自己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舞文弄墨者，而不是舞枪弄剑之士了。

实际上，整个武士阶级均已变成文人，大多数商人和富裕农民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再次对和平时代的日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日本人从17世纪开始深入钻研早在12世纪就已在中国规范化了的儒教思想。儒学者活跃在江户和各雄藩。汉文技巧又一次有了飞跃性大发展。8世纪时日本人就已知道的印刷术也开始推广使用。

73 领主及其家臣轮流在江户居住的参觐交代制为全国性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17世纪时，这一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和学术活动的迅速增长。日本各地的文化名人彼此频繁交往，江户和各藩国大规模地交流学生和教师。正如日本按照其他亚洲国家未曾有过的方式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统一体一样，它在文化上也成为一个统一的单位。

然而，中国的儒教哲学及其影响下的历史研究包含着一些侵蚀封建制度的文化因素。中国观念认为，统治者是由受过高级教育、品德高尚的人担任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出身高贵。但是，在德川体制中社会地位基本上是由门第出身决定的，个人才能只起次要的作用。毋庸置疑，这两种体制水火难容。因此，到了19世纪，雄心勃勃的下级武士日益要求任人唯贤。

儒教哲学及其历史研究还使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是由皇帝而不是由封建领主统治的；日本也曾存在过这样的制度。因此，日本人日渐重视天皇，从而开始怀疑将军与天皇的关系。在平民中还兴起了所谓"国学"。国学产生于18世纪，起初研究日本的

古典诗歌、《源氏物语》以及8世纪的历史著作《古事记》，后来越来越多地强调日本的真正光荣在于天皇是神的子孙和皇统万世一系。这种思想对于德川氏的统治无疑具有潜在的破坏力。

孤立往往导致文化上的停滞，但是，德川时代长期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增长却促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高涨。形形色色的儒教流派和其他哲学流派纷纷涌现。18世纪，一些与长崎的荷兰商人有接触的日本人开始对西方科学，尤其是医学、冶金和枪炮产生浓厚的兴趣。由于这门学问是孜孜不倦地从荷兰文书籍和百科全书中发掘出来的，因此称为"兰学"。可见，与世隔绝的日本在文化上始终是生机勃勃的。

* * *

德川时代早期出现了许多装饰华丽的建筑物，时至今日仍然可见的最优秀的建筑物是位于日光的前几代德川将军的陵墓。从中国式绘画或日本式造型构思中涌现出了许多绘画流派，它们在将军和大名的宫廷中得到发扬光大。18世纪末，一个尝试运用西方油彩和透视法的绘画流派从"兰学"中脱颖而出。瓷器制造在日本也第一次成为一项伟大的艺术，艺术家在漆器、纺织品和锦缎上也大显身手。

74

然而，德川时代最令人感兴趣的文化发展是一种与武士统治阶级的文化风格迥异的城市商人文化的崛起。这种文化以城市的娱乐区为中心。在这里，一些本质上勤劳而又会赚钱、并且有妻儿老小的人摆脱了家庭和商务的责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令人窒息的清规戒律，在职业女招待(近代称为艺妓)的陪伴下休息行乐。这种娱乐区声名狼藉，但却从中成长起一种与武士的艺术风格迥异的丰富多采的艺术以及戏剧和文学。这种新型的商人文化于17世纪末成熟于大阪和京都，后来主要集中于江户。

这种商人文化的艺术被称为"浮世绘"，即"无常世界的画卷"。

"浮世"原本是一个佛教观念，但已经包含了"现世"的意义。"浮世绘"的风格令人联想起7个世纪以前注重色彩和造型的"大和绘"。但是，它们的题材很不相同。"浮世绘"主要描绘美貌的妓女、著名的演员以及人们耳闻目睹的城市生活场景。从"浮世绘"发展出一种也叫"浮世绘"的多色木版画，从而满足了繁荣着的城市社会对艺术品的巨大增长的需求。"浮世绘"版画也刻画美貌妓女和演员，后来还描绘自然风光，如富士山、城市娱乐区和路边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木版画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的大众艺术，也是图画明信片的先驱。

起初，商人文化中的戏剧基本上局限于木偶戏，但是，后来由演员表演的"歌舞伎"脱颖而出，颇受欢迎。歌舞伎风格规范，比中世纪的"能"更加生动逼真，并且发展了精心制作的、栩栩如生的复杂舞台布景以及可以快速转换布景的旋转舞台。

77 武士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是学术性和文化性的，然而，诗歌不仅受到武士，而且受到其他阶层的欢迎。由17个音节组成、情趣横溢、妙语连珠的"俳句"尤其受欢迎。其他大部分文学形式完全出自商人社会，娱乐区的导游手册演变成城市社会的众生相，后来发展成淫秽小说和传奇小说。

因此，虽然日本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相隔绝，外来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其空间和多样化景观足以使日本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文化的生机勃勃的社会。由于聚集在大城市中的人口众多，乡村人口也很稠密，又加上受到复杂而又压抑性的封建制度的束缚，日本人发展了高超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才能以及集团合作技巧。虽然总的政治模式僵化不变，但是在表层之下，儒教思想与封建价值、经济增长与僵化的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具有很大活力的张应力。日本远没有在孤立的状态下变成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它依然是一个能够进行巨大变革的国家，正如它在19世纪后半叶所突出表现

出来的那样。

第七章 明治维新

78

德川体制内部虽然问题重重，关系紧张，但是，直到19世纪上半叶，它还没出现瓦解的迹象。如果日本能够维持其孤立状态，那么它也许还能延续更长的时间。但是，西方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日本不可能再保持孤立了，工业化和蒸汽船开始把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带到日本海沿岸。随之而来的压力远远不是17世纪初期被德川幕府赶走的欧洲人施加的压力所能比拟的。

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的航海大国已经完全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占领东南亚许多地区，并且正在叩打中国的大门，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半殖民地制度强加在它身上。俄国人经过大肆扩张，已经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并转而向南，向日本北部的岛屿推进。美国船只在去中国的航线上经过日本海岸，他们的捕鲸船经常出没于日本近海。

1853年佩里叩关以前，西方各国曾一再试图说服日本开国。1853年，美国派遣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统率美国1/4的海军，强迫日本人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日本的港口。日本人在优势的军事力量面前被迫屈服。佩里舰队装备着可以摧毁江户城的现代大炮，可以通过封锁江户湾轻而易举地切断江户的主要粮食来源。美国在1854年签订的条约中只获得有限的成功，但根据条约得以居住在日本的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利用英国海军对华作战的时机，说服幕府政府就范，终于设法在1858年缔结了一项全面的通商条约。79 在这两个事件中，欧洲大国都如法炮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通过这些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在中国形成的全部不平等条约

体系被运用到日本。外国商人在江户附近的横滨新港以及根据条约开放的港口站稳了脚跟，他们受到欧洲军事实力以及由本国法官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裁判的治外法权的保护。条约对日本关税的限制使日本整个经济向西方的机器产品开放。正如其他被征服的亚洲国家一样，日本只有纯粹的前工业化经济以及陈旧的藩国自治封建制度，它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面前门户洞开，毫无抵御能力。

贸易的发展比西方人所期待的要慢得多。德川幕府竭其所能，设置重重障碍，而平民百姓也不乐意接受陌生的外国货。欧洲丝绸业的凋敝造成了对日本生丝的巨大需求，这有助于日本保持贸易平衡。但是，国门的突然开放对国内的市场和货币体系具有破坏作用，其政治影响更为深远。在理论上，将军的军事独裁存在的前提是充当天皇和国家的军事保护者，而事实证明他不能完成这个使命。因此，幕府制度受到一切不满现状以及仇恨德川氏的最高领主权的人的公开攻击，正如1600年以来有些“外样”大名屡受攻击一样。

江户幕府面对佩里的要求，采取了向大名咨询这一史无前例的措施，目的在于寻求全国对其政策的广泛支持。各藩国的答复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这次破例的行动以及全国性的危机使批评的大门敞开。后来，在被迫签订1858年商务条约时，江户幕府再次向各大名进行咨询，并请求天皇批准条约，但都以失败告终。

民众群情激昂，反对开国。人们日益认识到，为了对付外国的威胁，全民族必须更加有效地团结在天皇的周围，以天皇作为合法的统一象征。温和派鼓吹“公武合体”①，即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

① “公”，公家，指皇室；“武”武家，指幕府。——译者

携手联合；激进分子则倡导重振天皇制以代替德川幕府。他们的口号是“尊王”和“攘夷”，后来演变成简洁的四字格言“尊王攘夷”。年轻的草莽志士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思想鼓舞下，脱离藩国，摇身一变而成为浪人，即没有领主的武士，暗杀幕府官员，有时甚至袭击西方外交官和商人。

有些日本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防御西方、保护日本、在政治上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唯一方法是采纳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经济技术，从而在不同的意义上达到“攘夷”的目的。九州南部的萨摩和本州西端的长州是两个特大的“外样”大名的藩国，它们的领导人慑于西方的海军力量而信服了这种观点。萨摩武士在横滨附近杀死一名英国人后，1863年英国舰队摧毁了萨摩首府鹿儿岛。同样，长州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船只后，1864年西方联合舰队将长州的炮台夷为平地。

1853年以来发生的各种事件，动摇了德川体制的基础。整个旧体制开始分崩离析。一切政策都成为全日本的武士公开议论的问题。一些强藩为了获取对京都朝廷的影响，彼此相争，甚至与江户相争。长州藩还公开反抗江户幕府的权威。1864年，为惩罚长州而进行的军事远征只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方案，1866年的第二次远征则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最后，萨摩、长州以及其他一些“外样”和“谱代”结成同盟，并取得对朝廷的控制。1868年1月3日，以天皇的名义宣布恢复天皇的直接统治。幕府的军队和少数佐幕藩国半心半意地进行了抵抗，但所谓“皇军”占领了江户，结束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氏统治。

*　　*　　*

“天皇”军队的领导表面上是皇族亲王、朝廷公卿和一些封建领主，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年轻有为的改革集团手中，他们主要是中下级武士，大都来自萨摩和长州。这些人认

识到，虽然“攘夷”的口号有助于他们夺取政权，但推行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对日本将是灾难性的。因此，他们反过来立即表示承认德川幕府与西方签订的条约，以当时的西方为榜样，提出“富国强兵”的新口号。通过研究“兰学”而掌握了西方技术知识的人在这项事业中起了促进作用。随着国家对西方人开放，“夷狄”也越来越多地被日本人延用。

然而，新领袖们试图用效率更高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代替旧的封建制度，推行日本的技术现代化，使它免遭势力强大而掠夺成性的西方国家的侵犯，这一任务异常艰巨。他们所继承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濒临财政破产的将军领地。这个国家长期被划分成自治性的封建单位，仍然处于前工业化的经济状态之中。

虽然近1000年来帝国的统一始终有名无实，但新政府的一项主要法宝是他们控制并充分利用了年仅15岁的天皇。1869年天皇迁都江户，这个将军的大城堡也相应地更名为东京，即东部的首都；每一件事都是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后来以“明治维新”闻名的整个伟大的变革，就是根据明治天皇的年号命名的。明治时代开始于1868年，结束于天皇逝世的1912年。“明治”还成为这位天皇的谥号。（日本至今仍然使用天皇年号。从1868年开始，“年号”的时间相当于天皇在位的年限。例如，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即昭和20年。昭和是天皇裕仁的年号。）

用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制度代替旧的封建领主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名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角色。早在1869年，新政府就已经说服大名将版籍① 奉还给天皇，并接受担任藩知事的任命。两年之后，新政府废藩置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吏管理的新型的府县轻而易举地取代了面积相当的藩国。封建领主得到大量的政府公债

① 版籍：版，指土地；籍，指户籍即人民。奉还版籍意在加强中央政府对诸藩的控制。——译者

作为补偿，这不仅使他们依然腰缠万贯，而且还使他们从财政上依赖新秩序的成功。

废除旧制度中的阶级差别和武士特权则是一项困难得多的任务。随着藩国的灭亡，武士阶级失去了作为世袭官僚的地位。1873年，征兵制代替了按阶级服兵役的旧制度。1876年，甚至禁止武士佩带作为身分标志的佩刀。武士的俸禄也被大大削减，到1876年全部改成支付数额较小的现金或政府公债。这样，在短短的9年内武士就被剥夺了一切特权。日本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只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就将一个主要由世袭门第决定地位的社会，转变成一个基本上根据个人的教育水平和成就决定地位的社会。

83

与此同时，新政府基本上按照19世纪西方的模式推行现代化。它设立了类似西方政府各部的省，包括因控制财政而最有势力的大藏省、陆军省和海军省(1878年又按照德国模式设置了与之平行的参谋本部)、文部省。文部省实行一项雄心勃勃的普及教育计划，花费大约30年时间才完全付诸实施。现代法庭和司法制度先以法国模式、后按德国模式，历经艰难才建立起来。因为它们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所以直到1899年才臻于完善。为了稳定财政收入，明确土地所有权，1873年，固定的货币租代替了传统的农业收成按比例分成的办法。农民成为直接的纳税者，他们被确定为完全的土地所有者。近现代时期的日本不同于封建时代以后的欧洲，它不存在旧的封建阶级继续领有土地的问题。

明治政府同时还推行经济现代化。它建立现代银行系统，改革货币制度，以圆为货币单位(1圆约等于半美元)。日本还建造灯塔，改善港口设施，架设联结全国的电信网，修建铁路。1872年，东京和横滨之间的铁路竣工。机器缫丝基本上是一项私人投资开发的简单技术革新，它使丝绸生产得到改进。其他产业耗资巨大，需

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盈利。政府自己也建立生产军火武器的战略工业，开发矿山，并且在许多其他产业部门设立模范工厂。明治政府为了防止俄国人对北方岛屿北海道的渗透，推行一项耗资巨大的计划，增加岛上人口，并且基本上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建设地下仓库。

84 明治政府为了实行所有这些改革，需要大量的西方技术知识。它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新技术，并高薪聘请西方专家到日本。在这些方面，日本人进行了精心挑选，在每个领域都采用他们认为最优秀和最合适的特定国家的模式。因为他们要由自己支付外援的费用，所以日本人比近年来许多接受无偿援助的国家更加珍惜并且更好地利用外援。但是即便那时也有一些援助是无偿的。英语是与西方交往必不可少的语言，英语教学的任务大都由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传教士承担起来。

政府和经济的重新构筑不是没有经历过混乱，其间经过多次试验，出现过多次失误，遭受过严重挫折，遇到了不少反对。庞大的武士阶级在维新中失去最多，他们的反对最有威胁。武士发动了多起叛乱，1877年萨摩的大叛乱达到了顶点。根据《征兵令》招募的新式军队克服重重困难，才将叛乱镇压下去。1877年东京的胜利表明，新政府已经战胜了国内的军事挑战而巩固下来。

然而，与此同时，新政府的财政正在向崩溃的方向发展。它进行了许多耗资巨大的事业，用俸禄赎买武士，后来又镇压武士的叛乱，因此到19世纪70年代末终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881年，政府不得不开始实行一项紧缩财政支出的计划，包括出售官营模范工厂、矿山以及北海道的企业。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保证能够成功地经营这些企业，政府就不问价格如何，把企业转让给他。

这些断然措施使日本恢复了财政稳定。大概与此同时，新产业也开始盈利了。19世纪80年代，棉纺织业率先取得成功，并在10

年后打入出口市场，开始与西方的产品竞争。初创时摇摇欲坠的新政府，仅在20年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国内的军事和财政稳定，开始孜孜不倦地争取在军事和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

*　　　*　　　*

概言之，所谓“明治维新”，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发展。实际上许多学者简单地认为明治维新是所谓历史规律的表现。而根据历史规律，日本的“绝对主义”倾向或“资产阶级革命”，是按照近代欧洲同样的顺序自动到来的。但是，把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历史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同期历史作了比较，就可看出日本的这段历史确实不同凡响。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对优越的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的挑战作出如此迅速而成功的反应。例如，中国王朝的崩溃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建成一个统一稳定的新型政治体制，而且至今仍基本上是一个前工业化社会。亚洲其他国家大都屈服于殖民统治，直到1904—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才受到鼓舞并产生了民族觉醒；它们到20世纪中叶才重新获得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摧毁了西方帝国主义。但是，大部分国家至今仍只是部分地实现了经济上的工业化和制度上的现代化。

日本比较迅速地取得成功，主要不能归结于西方冲击的性质或日本国土较小之类的外部因素，因为其他有类似经历、国土面积差不多的国家作出的反应很不相同。日本成功的原因反过来应到其内在特性方面去找，如日本人是高度单一的民族，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向外国学习的可能性是他们与众不同的一个优点。甚至德川时代末期的社会紧张状态也有利于这个国家进行伟大的变革。还应记住，虽然日本的经济处于前工业化时代，政治模式是封建性的，但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却高度复杂和非常成熟。这个国家官僚统治的廉洁程度和效率都足以与西方

国家相媲美。日本的识字率也与西方先进国家不相上下，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分别为45%和15%左右。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本人具备接受整个伟大变革的思想基础，他们不是采用刚刚学来的外国观念，如民主或后来的共产主义，而是运用日本自己古代的天皇制实现伟大的变革。利用本国的思想无疑使这场激烈的变革变得平稳，并且减轻了变革造成的痛苦。

没有人能够断言到底是哪些特性的结合造成了19世纪日本与所有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悬殊差别，但毋庸置疑，日本捷足先登实现了现代化，从而取得了优势。原因之一是，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技术差距不像20世纪那么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尚无先例可循，人们普遍怀疑任何非西方国家达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没有那种不切实际地期待一瞬间实现工业化、一夜间达到民主化的妄想，从而使它有更多的机会进行重实效的实验。日本在19世纪末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领先于其他非西方国家，使得这种差距在此后几十年中进一步扩大；随着时间的发展，日本最后看来更像是立于西方世界大国之林，而不是与亚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伍。

86

87

第八章 立宪制度

到了19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渡过了新秩序诞生的阵痛。这时年届中年的领袖们渴望巩固过去20年的成果，将随机应变的措施转变成永恒不变的制度。他们生于德川时代的和平稳定环境，因此也渴望重建一个众所周知且又众望所归的不变秩序。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影响下，他们决定将这种制度体现在一部宪法中。

一个更为令人吃惊的决定是，新型的立宪制度将包括一个以

西方为模式的民选议会。过去，日本总是将民众的政治活动视为颠覆行为。然而，西方的经验表明，民选议会将给予政府广泛的群众支持，或者作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巧妙的安全阀以支持政府。如果日本要摆脱列强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赢得西方的尊敬，议会不仅有所裨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设立议会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扩大政府的基础。在旧制度下，数量可观的武士参与幕府和藩国的行政。但在新制度下，许多旧的领袖人物被政府排挤在外，他们正在寻找参政机会。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早期领袖之一。他来自四国的土佐，1873年与同僚闹翻后回到土佐，将武士出身的追随者组成一个政党。城市商人和纳税农民很快也加入该党。这个集团吸取法国的自由思想，导致后来所谓的“自由民权运动”①。第二个得到勃兴的企业界的大力支持的受欢迎的党是大隈重信创建的，他也是政府领袖，由于主张立即采用英国式议会制度，1881年被同僚排挤出政府。这两个政党②是日本政治生活中经久不衰的派系的起源，直到今天仍然可见一斑，战后的执政党自民党就是由其演变而成的。

88

1881年大隈被逐出政府时，政府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敕谕，许诺在1890年以前实施新宪法。长州藩武士出身的伊藤博文率先仔细研究了欧洲的立宪制度，尤其是德国保守的宪政制度。他还谨慎地对设想中的新制度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试验。明治政府经过极其周密的准备后，最终在1889年颁布了新宪法。

宪法的核心自然是天皇及其权威，因为推翻德川幕府的根据是恢复天皇理论上的直接统治。但是，人们实际上并不希望天皇

① 自由民权运动：1870年到1887年间在日本展开的反对藩阀政治，鼓吹扩大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要求“开设国会”、制定宪法、进行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译者

② 前者为自由党，后者为改进党。——译者

君临天下，而只是希望他使大臣的决策生效。因此，大臣的任命权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方面；不过这一点起初并不为人注意，因为从1868年以来就控制着政府的那一集团的一些成员继续以天皇的名义行使着这项职权，虽然宪法中并未提到他们。他们的人数虽然因为年老病死而日渐减少，但其威望却由于他们长期处于权力中枢而大大提高。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精选的集团实际上是长州和萨摩的寡头政治集团。这些人后来称为“元老”。

在天皇和寡头政治集团之下，以首相（总理大臣）为首的政府各省大臣聚集在西方式的内阁之中。早期的内阁基本上由少数元老轮流执政，外人很少问津。内阁之下，按照当时最先进的德国模式，建立了一套完全现代的文官制度。起初，1877年创办的国立东京大学的毕业生自动具有担任高级文官职务的资格，但通过考试录取文官的制度很快就形成了。在这个制度下，日本建立了一支由精英人物组成的、高度独立而又效率极高的文职官僚机构。

宪法的不少条款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力，但每一项都受到“在法律的范围内”这样的词句的限制，实际上大大减少了向人民提供的保护。司法系统虽高度集中，但它享有令人羡慕的独立性，一丝不苟地依法裁判。

89

最富于革命性的宪政改革是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经选举产生的两院制国会。贵族院模仿英国的上院，几乎完全通过世袭或敕命产生。它的成员要具备贵族的资格，由1884年被赐予爵位的旧的朝廷公卿、封建领主和新领导集团的成员构成。众议院由纳税15日元以上的男性纳税人选举产生。选民经过严格挑选，还不到总人口的1%。国家预算和任何永久性成文法都需经两院多数通过才能生效。

这是一种非常受限制的民众政府，经常被描述成民主的大倒退或对民主的背叛。但是，日本人无意建立完整意义的民主制度；

当时西方的有识之士就认为，他们甚至可能沿着只适合于西方人的道路前进得太快——正如有位评论家所指出的，未学会走路就想跑。鉴于人民缺乏选举的经验和议会制度的知识，更为民主的制度能否在1890年运转自如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此，虽然日本的国会有种种局限性，但它是西方世界以外第一个试验成功的国会制度，虽然初创时摇摇欲坠，但它维持下来了，并用事实证明自己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获得非凡的发展。

* * *

1894年日本引进新的立宪制度后不久，英国为日本现代化所打动，同意在1899年放弃治外法权，其他国家也先后步其后尘。几年之后，日本又恢复了完全的关税自治权。他们还连续取得了两场战争的辉煌胜利，这表明，在新的经济力量和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他们的在军事上保障自己不受西方国家威胁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

第一场战争是1894年至1895年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与中国进行的战争①。日本在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邻近的庞然大国，这使世界大吃一惊。日本清除了在朝鲜的中国势力，吞并了中国的台湾岛，从此开始仿效西方列强建设自己的帝国。它还取得中国东北的南端，但俄国对这块战略要地垂涎三尺，联合德国和法国强迫日本吐出这个半岛。强权政治的教训以及3年后俄国人侵占这个地区的行径，使日本人义愤填膺。 90

1902年，日本和英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日本支持英国对俄国的竞争，英国则向日本人保证其他欧洲大国不会再联合反对日本。这是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个平等的同盟。这个协定成为不久以后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而进行的1904—

① 即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译者

1905年日俄战争的帷幕。出乎世界意料之外的是，日本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获得了辽东半岛、南满铁路以及库页岛南半部，并完全控制了朝鲜。1910年，日本悄悄地吞并了这个国家。

日本一跃而成为主要的殖民大国之一。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继续推进殖民进程。欧洲国家在地球的另一端卷入战火，这使日本成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大国。它趁机于1915年强迫中国接受所谓“二十一条”，从中国攫取新的权益。它还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并以托管的形式控制了德属北太平洋群岛。日本以五大战胜国之一出席了凡尔赛和会，成为加入西方大国俱乐部的第一个非西方国家。

* * *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虽然1889年宪法的目的是要将一个永恒不变的制度具体化，但历史表明，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不过是构成日本现代生活特征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第一步。1889 年，工业化才刚刚起步，但以后每 10 年工业化就迈出稳健的一步。领导地位由根据阶级出身向根据教育程度和考试成绩的转变刚刚起步。6 年制普及教育在1907年才完全实现。大学教育迅速扩展。由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构成的白领中产阶级开始崭露头角。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影响日益扩大。日本的城市生活日益接近西方的城市生活。

宪法的制定者未曾预料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甚至看错了现实的情况。为数不多的选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参政意识比所估计的要高。政府为了筹备国会而进行了各种地方议会选举的试验。反政府的政治家从中取得了竞选经验，结果，他们控制了1890年的第一次大选。在此后的历次选举中，他们都获得优势。即使在1892年的第二次大选中，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企图通过野蛮的警察镇压和行贿收买的办法赢得多数，他们仍然获得了胜利。国会不

仅根本没有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论坛和为政府歌功颂德的舞台，反而变成一个弗兰肯斯坦①式的怪物，攻击国会的缔造者不过是萨摩人和长州人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国会的政治权力比所想象的更多。根据德国学者的建议，伊藤博文在宪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规定国会如未能通过预算，那么上年的预算继续有效；但是这张理想的王牌根本无济于事。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上年的预算往往入不敷出。国会政治家利用对预算规模的控制，想方设法从寡头政治集团手里攫取一些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而不愿接受宪法制定者关于内阁是"超然的"并在政治之上的原始观念。

国会设立后的最初四年是它与政府公开斗争的时期，这场斗争只是由于对华战争导致爱国主义的狂热才最终得以缓和。几年后，国会和政府达成了某种妥协，板垣退助和大限重信这两位前政治寡头集团的成员、如今的政党领袖以在国会中支持政府为代价进入内阁。1900年，伊藤博文及其官僚追随者与板垣派的政治家联合，组成一个名为政友会的新政党。这使政党与政府的妥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后12年，政友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执政党。它以保证内阁得到国会的多数支持为筹码，为政党政治家谋得一些内阁席位和其他肥缺，并使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其观点。

到这个时期，原来的领袖已经年老体衰，并厌倦了出乎意料的议会政治骚乱。1901年，伊藤博文第四次辞去首相职位，此后除了曾被排挤的大限重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寡头政治集团的成员担任过首相这个最高职务。他们的官僚追随者取而代之，出任内阁首相和其他大臣职务。从1901年到1913年，西园寺公望和桂太郎轮流执政。西园寺公望出身于旧的宫廷贵族，留学法国时形成了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是伊藤博文在官僚机构中的门徒。桂太郎 92

①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小说中的生理学研究者，他创造了一个怪物，结果自己被怪物杀死。——译者

是长州武士出身的将军，为山县有朋的学生。山县有朋是长州的一位旧武士，他是陆军的主要缔造者，在寡头政治生活中是伊藤博文的主要对手。

1900年到1912年是政治生活相对平静的时期，但1912年到1913年冬天的一场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平静。陆军因不满内阁拒绝陆军的扩张计划赌气从西园寺内阁中撤回军部大臣，从而掀起了这场政治风暴。这个状况暴露了立宪制度的另一个含混不清之处。山县有朋认为，为了保证不让在他看来贪污腐化而又不忠诚的政客削弱武装力量，陆军和海军在理论上应由天皇直接统率，不受文职政府控制。但是，随着政治寡头年老体衰和人数减少，他们以天皇名义控制政府的军事和文职部门的力量也衰落了，这为军部向内阁的领导权挑战创造了条件。

为了达成妥协，桂太郎将军再次出任首相。但是，国会中的政友会议员拒不接受他，甚至连天皇要求由桂太郎担任首相也无济于事。桂太郎煞费苦心想组织一个新政党，但以失败告终。新闻报纸和公众舆论鼓吹建立"真正的立宪政府"，他们期待的是对国会大多数负责的内阁，而不是原来的"超然"内阁。结果，一位中立的海军将军①被任命为首相，政友会在内阁中的席位和权力都得到实质性的增长。

这场政治事件发生在新天皇大正天皇刚刚登基并采用"大正"年号的时候，因而称为"大正政变"。这是席卷日本的一系列变革的信号。政党对政变以后历届内阁的控制程度往往比政变前要强。原来由桂太郎创建的政党逐渐发展成国会中的第二大权力竞争者，并在1914年至1916年的大隈内阁时期充当了"执政党"。1909年伊藤博文被一个朝鲜人②刺杀后，山县有朋成为天皇特权的主要

① 即山本权兵卫(1852—1933)，海军元帅，1913—1914任首相。——译者

② 指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译者

行使者。1918年，他接受政友会党魁原敬为首相。原敬是一个职业政党政治家。虽然他出身于高级武士家庭，但由于来自日本北部，因此对于萨摩和长州控制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外来者，他不得不通过议会政治，打开通向权力的道路。

1921年，原敬被一个神经错乱的青年刺杀身死。从1922年到1924年，内阁在短时期内由非政党人士①领导。然而，到了1924年，退休的外务省官僚、民政党总裁加藤高明被任命为首相。此后8年，政友会总裁和1927年重新命名为民政党的新政党的总裁轮流担任首相。这样，从1890年以来，国会的权力持续稳定增长，最终取得了对文职政府的领导权，用公开的政党内阁代替了“超然”内阁。

随着国会权力的扩大，选民人数也增多了。1900年和1919年两次大幅度降低选举资格规定的纳税额，最后在1925年，所有的成年男性终于都取得了选举权。日本似乎日益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1913年到1932年这段时期一般称为“大正民主”时期。

在这些政治变革的背后是经济的巨大增长以及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欧洲列强日益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这使日本获得亚洲市场而大大地繁荣起来。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胜利也将一股西方的自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新浪潮带到了日本，这促成成年男性在1925年取得选举权，也造成城市出现日本式的放荡少女和爵士乐时代。俄国革命胜利的结果之一是少数知识分子信仰激进思想，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劳工运动和农民骚动。财界通过给予政党财政上的支持扩大其影响，从而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地为新日本摇旗呐喊，指手划脚。

为了适应国会及其财界支持者的领导作用，日本的外交政策

---

① 他们分别是高桥是清（官僚）、加藤友三郎（海军元帅）、山本权兵卫（海军元帅）和清浦奎吾（官僚）。——译者

也发生了转变，从早期倾向军事的政策转变为更加与商业利益协调一致的政策。明治时代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是根据战略目的进行的，而新的外交政策注意更多的是日本日益增长的工业对国外原材料和市场的需求。1921年，原敬政府接受美国邀请，参加限制海军扩张和稳定远东局势的华盛顿会议。日本接受关于它在[94]主力舰方面与美国和英国维持3∶5∶5的比例的协议，美国和英国则保证不在夏威夷和新加坡以外的地区建设军事基地。日本还同意将它获得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并从西伯利亚撤回远征军，这些军队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和一些美国、英国军队一起被派往那里的，目的在于维持对德国作战的东线。1924年日本裁减常备军，并且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这进一步说明政党政府倾向于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贸易，而不是依靠军事扩张来寻求日本的安全保障。

[95]

第九章　军国主义的逆流

20世纪20年代，日本似乎逐渐接近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但是，在表层之下隐藏着严峻的问题。首先，以英国为模式的日本议会制有一些明显的缺陷。首相不是由议会的多数选举产生，而是由少数行使天皇特权的人遴选，任命之后才举行选举，他们一般能够得到议会多数的同意。推荐首相的“元老”是旧寡头政治集团的遗老，1922年以前主要是山县有朋，山县去世后则是宫廷贵族出身的被称为“最后的元老”的西园寺公望。换言之，国会控制首相和内阁不是既定的立宪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方便措施。

立宪制度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陷是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文

职部门之间的分裂。这在“大正政变”中已经暴露出来。陆相和海相仍是不受政党纪律约束的军人。当然，国会逐渐确立对军部的控制，因为它不仅决定民用预算，也表决军事预算。野心勃勃的军人和文职官僚一样，为了攫取最高政治权力，有时在退役后加入政党，如田中义一① 将军在1927年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担任了首相。但是，武装力量在理论上和实际的国内活动方面完全处于文官的控制之外。

日本经济的基础结构也非常脆弱。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产业的表面繁荣，但是，战后重新适应与欧洲产业竞争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以外，20世纪2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是近现代时期最慢的。全世界经济萧条，国际贸易停滞不前。日本农村由于大米和生丝两种最主要的农产品价格猛跌而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大米是因为受到帝国殖民地台湾和朝鲜的竞争，生丝是由于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后对美国的生丝贸易实际上完全消失以及此后尼龙和其他替代性纤维制品的崛起。耕种着全国45%土地的佃农处境特别困难。在日本的许多地区，贫困农民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有些人为了避免挨饿甚至卖女为娼。

96

即使在日本的城市也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的生产率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新兴工业拥有现代技术，而包括农业在内的旧产业基本上还未实现机械化。日本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双重结构”，这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而在日本，由于工业化速度较快，这种现象显得尤其引人注目。日本领导人还不适应工业化时代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及时通过补救性的社会立法。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另一个弱点，是议会制赖以存在的社会

① 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政治家，陆军大将。1927—1929年任日本首相时期出兵中国山东，召开旨在侵略中国的东方会议，提出《田中奏折》。——译者

和政治基础不稳固。经济的“双重结构”是与整个社会的双重结构共存的。城市的现代化比农村快得多。农村落在后面，成为旧观念和旧生活方式的大本营。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达到了更加开阔的知识水平，他们的思想与全世界的思潮齐头并进；但是，更多的人只受到6年的义务教育，灌输给他们的不过是严格的忠诚和守法思想。一些日本人如饥似渴地接受一切新事物，而另一些人却恋恋不舍地沉湎于过去。

对政党政府的经济成果或其他政策及其支持者财界不满的人都怀念过去的领袖，他们虽然比较贵族化但据说较少谋取私利。大量的贪污腐化和损公肥私构成了日本议会制下政治生活的特征。而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的整个竞争性性格又不符合许多日本人的口味，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那种古老的理想，即通过协商作出和谐的决定，由具有献身精神的忠心耿耿的国家官吏予以实行。97 资本主义商人对政府的影响似乎特别具有腐蚀作用，企业巨头日益成为众矢之的，被贬称为“财阀”，即“财政金融集团”。在有些人看来，政党政府倾向于以贸易为中心的和平外交政策背叛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利益，是为了产业巨头的私利。

具有传统思想的日本人倾向于把议会制、大企业、个人主义以及城市中出现的自由生活方式看成互有关连的西方的腐化影响的迹象。新的激进左派也抱有这种偏见，但这并没有使保守派消除对他们的特别恐惧和仇恨。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男性取得普选权的1925年，国会通过了镇压性的《治安维持法》，把鼓吹根本变革政治制度和废除私有财产定为犯罪行为。因此，虽然民主在日本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它并不像西方那样具有牢固的制度的框架，在感情上和理智上缺乏广泛的支持。

* * *

如果日本没有遇到所谓的外交政策危机，那么，这种状况是否

会导致立宪制度的崩溃还很难说。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后，国际贸易萎缩，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争取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日本人意识到，他们的新产业已扩张到他们自己的小帝国所无法支撑的地步，岌岌可危。英国、法国和荷兰都拥有巨大的海外殖民地，美国和苏联国土广袤，横跨整个大陆，日本在地理上却只有一块相对狭小的基地。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够理智，受到业已心满意足的西方国家的态度的影响，建立帝国起步太晚，而又过早地罢手。

这种状况一般被描述成人口问题。白种人将西半球和澳大利亚这些人口稀少而又称心如意的地方据为己有，而把日本人拒之门外。20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自治领公开以种族理由禁止日本移民，并且极有效果。1924年，美国甚至通过一项臭名昭著的新移民法①，排除日本移民的政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日本人看来，这种状况不仅使他们受到侮辱性的蔑视，而且在经济上被逼入了死胡同。一些人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在毗邻的亚洲大陆进行军事扩张。

98

中国是明显的目标。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可以轻而易举地攫取殖民地的时代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实际上，新成立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企图收回对中国东北的某些控制权，而东北在经济上已被牢牢地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中国蓬勃高涨的民族主义清楚地表明，任何进一步瓜分中国的时代都正在消失。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现在还不瓜分，就永远也干不成了。

日本的武装力量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使它能够将这种危机感转变成外交政策和政治结构的实际变革。早在1928年，日本关东军的一些人就暗杀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②，并在全体陆军的庇

① 即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禁止东方移民的《国籍法》，又称《民族出身法》。——译者

② 即奉系军阀张作霖，1928年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译者

护下逃避了文职政府对它的惩罚。1930年，内阁迫使海军接受《伦敦海军协定》，该协定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日本对美国和英国主力舰 3：5：5 的比例扩大到重型巡洋舰。这几乎引起海军的公开反抗。1931年 9 月18日，在中国东北的一些陆军军官在其驻东北和东京的上级的默许下，在东北首府沈阳附近的铁路沿线制造了一起事件，为日本军队在此后几个月内侵占整个东北提供了借口，并于翌年 2 月建立傀儡“满洲国”。文职政府因害怕激起军事政变而不能控制局势，被迫接受这些突如其来的、回到建设殖民帝国老路上去的转变，并且企图在全世界面前为其辩解开脱。它还发现自己受到甚嚣尘上的民众爱国狂热的冲击。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径时，日本人索性一走了之，从而决定了国联的命运。

外交政策的转变和国内情绪的变化很快导致政党内阁寿终正寝。一些极右翼军官和民间组织一直煽动举行军事政变。1930年强制批准《伦敦海军协定》的那位首相①受到一个狂热分子的刺杀，不久身死。1932年，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被刺杀②。同年 5 月，首相③被一群青年海军军官杀害。西园寺公望选择了一位中立的海军元帅④担任首相。1934年，一位类似的人物⑤取而代之。政党成员继续担任内阁大臣，而且，政党还赢得了1932年、1936 年和 1937 年 3 次大选的胜利。在1936年大选中，民政党提出“要议会还是要法西斯”的口号，取得遥遥领先的票数。甚至连新左派的选票也迅速增加了。但是，国会对政府的控制每况愈下，军部当局实际上主

---

① 指1929—1931年任首相的滨口雄幸。——译者

② 指民政党核心人物、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被刺杀事件。——译者

③ 指1931—1932年任首相的犬养毅。——译者

④ 即斋藤实，他于1932—1934年任首相。——译者

⑤ 即冈田启介，1934—1936年任首相。——译者

宰着外交政策。当时的“举国一致”内阁其实已经倒退到了立宪制度初期的“超然”内阁。

占领中国东北引起的国民的狂热极大地加强了军部领导人的力量，而右翼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军官施加的压力，则给予他们随心所欲地改变国家政策的借口。极右翼分子常常支持构成士兵主要来源的贫困农民，痛斥富裕商人和声势显赫的政客等特权阶级。他们以刺杀天皇周围的那些“邪恶领导人”为己任，为军部夺取政权和含混不清的“昭和维新”(以 1926 年登基的新天皇的年号命名)扫清了道路。1936年 2 月26日，青年军官发动了一场几乎取得成功的军事政变。他们杀害了一些政府领导人，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的一部分。陆海军司令部几经犹豫后镇压了政变，并处死了政变领导人。陆军中比较温和的派系重新对陆军军官实行更严格的控制，结束了几年来日益严重的高级军官的派系活动。1936 年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国会权力再次衰落。1937年，一位陆军将军[①]担任首相，他完全取消了政党参加内阁的做法。

* * *

与此同时，陆军已经逐步将在中国的控制范围扩张到内蒙古和华北一带。1937年 7 月 7 日晚，日本军队和中国军队在北平(今北京)附近爆发一场意外的战斗[②]。蒋介石政府要求全面解决日本的蚕食性侵略，而日本军部则以厉兵秣马作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的军事机器几乎取得节节胜利，推进到华北和华中。为了摧毁或扼杀中国政府，它还占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但是，中国政府撤到内地坚持抗战。中国的游击战和日益拖长的交通线开始使日本人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军队陷入了后来所谓的亚洲民族主义的泥潭。 100

① 即林铣十郎(1876—1943)，他于1937年 1 — 6 月任日本首相。——译者

② 即“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动。——译者

在日本，全面对华战争加强了爱国主义的狂热，许多在1931年初见端倪的倾向变得显而易见了。军部日益操纵政府，并将其代理人塞进各种新设的文职部门。政府为了加强战争的经济基础，扩大了对产业的控制。国会权力继续衰落，到1940年，政府强迫所有的政党解散，加入“大政翼赞会”，这是一个类似纳粹或法西斯政党的机构庞大而指导思想混乱的全民性政治组织。通过教育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向人民灌输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狭隘和有害，异端思想也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压制，这种压制往往更多地来自邻里的积极分子，而不是政府或警察。1935年，东京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①的著作遭到禁止，他本人被驱逐出贵族院，原因在于他的曾经为人们所接受的“天皇机关说”如今却被视为欺君犯上的异端邪说。这个事件是自由思想的转折点。

人们经常拿日本的经历与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当然，两者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与意大利和德国不同，日本不存在独裁者。而且，日本的整个体制也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定义的群众运动的产物，而是由下述因素造成的，即含混不清的情绪转变，日本社会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均衡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所有这些都是在1889年所确立的立宪制度的基本框架的范围内发生的。既没有革命和成功的政变，也没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30年代后期军部主宰的政府和20年代国会支配的政府一样，完全合乎宪法，尽管两者都不是宪法缔造者所设想的那种体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时代潮流的人为数不多，他们往往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打入监狱。不少这样做的人——大多是共产主义者——被奉劝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大多数

① 美浓部达吉(1873—1948)：日本法学专家，曾提出与“天皇主权说”相对立的“天皇机关说”，认为真正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天皇仅仅是受权执行国家行政职责的最高机关，应服从国家的法律。——译者

情况下,反对者因受到恐吓而陷于沉默,无可奈何地跟着新舆论走。

中日战争演变成了持久战。日本人终于发现,除了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最后把它变成一场灾难性的冲突以外,他们别无其他办法可以从中国脱身。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后来苏联的卷入使日本摆脱了欧洲列强的压力,但美国对日本在华行径的反对加强了。美国采取说教者的姿态,不承认日本的侵略成果,但除口诛笔伐外,不愿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希特勒企图建立欧洲霸权的危险日益增加,这使人们对日本人企图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威胁有了新的认识。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的协定使美国人进一步从思想上将这个双重威胁与美国人对更为开放的世界秩序的期待联系起来,感到出现了主要由纳粹和日本人支配世界的鬼影。

日本为了加强对中国南部的控制,于1940年夏在法国沦陷后占领越南北部,美国则报之以经济制裁。日本为了获得有可能实行的南进的基地,于翌年夏季占领越南南部。美国则进一步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日本人正在进行着对华战争,又要迎击美国可能发动的进攻,但他们必不可少的石油供应却日益减少,面对这种前景,他们被迫在下列三条道路中迅速作出抉择:或者从中国撤退,或者与美国达成妥协,或者发动战争,从当时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攫取石油。日本政府不愿意走第一条道路,也不可能走第二条道路,因此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其目的是使美国海军在日本南进时无所作为。在发动战争前,军部巩固了它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陆相东条英机将军出任首相,从而将文职政府完全置于军部的控制之下。

日本人知道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比日本强大得多,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迅速进攻并占领整个西太平洋,特别是德国同时在

101

欧洲取得胜利的话，美国人就会发现反败为胜的道路太遥远，太艰苦，不值得去追求。在最初几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南亚全部以及从印度边境到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广大地区。但是，他们选定在向华盛顿递交战表的同时"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人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反应。美国建立了日本无力建成的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历经艰难，缓慢地由太平洋的西端打到了东端。与此同时，美国的潜艇和空投水雷击沉了日本的大部分商船，使处于遥远的征服地的日本军队失去活动能力，并切断了日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运输线。到1944年11月，驻扎在日本以南岛屿上的美国空军已经能直飞日本列岛投掷燃烧弹，有系统地摧毁那些极易燃烧的日本城市，迫使劳动力离开已经摇摇欲坠的厂房。这对日本产业是双重打击，日本的军事力量因此开始动摇了。

尽管形势已毫无指望，日本的社会秩序依然非常稳固，军部继续维持其不投降的光荣传统。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几乎将广岛和长崎完全炸平。1945年8月8日，苏联为了进入杀死和处置日本这个猎物的现场而迫不及待地进攻中国东北。直到这时，走投无路的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屈服于不可避免的结局。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7月26日美国在所谓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明确而严厉的条件"无条件"投降。日本用它的一切为赌注去冒险，结果失去了一切。80年来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都化为乌有。在日本土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了外国征服者的脚步声。

第十章　占领时期的改革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给它带来了巨大而突然的变

化，这种变化只有明治维新才能与之相比。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惨痛的经历。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工业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农业也因为长期缺少新工具、充足的肥料和劳动力而减产1/3左右。除京都外，日本所有的大城市以及大部分中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毁于战火，城市人口流散到全国各地。大约668,000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受到重创的经济，由于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切断和外国不稳定的统治所造成的混乱，经济恢复得极其缓慢，比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慢得多。经过整整10年，人均产值才恢复到30年代中期的水平。

日本人民受到的心理创伤更为严重。他们已经忍受了15年日益增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在全面战争的状态下生活了8年。生活日渐艰难，首先是代用品代替了普通纺织品，后来是所有的消费品慢慢地消失，食品短缺，最后是城市住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城市居民被迫为生存而到黑市上去寻找食品，经历了道德的沦丧。原来谨小慎微、遵纪守法的民族变得习惯在小事上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领袖们曾经指望依靠日本人超人的意志力赢得胜利，人民也尽忠报国直到精疲力竭。被烧光的不仅是城市，还有人民的心。

人们对战争、对把民族拖入战争的领袖们、甚至对整个过去都产生强烈的反感。他们并不感到内疚，而是觉得自己被出卖了。然而，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他们的军队在亚洲不仅根本没有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相反，普遍地受到憎恨。过去，他们把军队视为大公无私的爱国者和天皇的仆从而倍加尊敬。如今，军队变成人们泄愤和藐视的对象。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大多数日本人殚精竭虑地为生存而挣扎，但是，在目前的考虑背后是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避免悲剧重演的决心。人们需要某些新的、比遭受苦难的旧日本更好的东西。他们虽然迷惘，但仍以未曾有过的方式面对变革。

104

美国直到1952年春天才结束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日本人的这种姿态使美国军事占领当局成为日本变革的强有力的设计者。它在决心根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关于战后日本的构想。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将军统率美国军队进入日本，并带来了指导彻底变革的广泛政策。麦克阿瑟是盟军最高司令官，即SCAP，他既代表美国，还代表获胜的盟军各国。SCAP后来既指麦克阿瑟本人，也指盟军最高司令部。

盟国的联合军事占领有名无实。击败日本几乎完全是美国人的功劳。虽然英国曾派来一支澳大利亚分队在麦克阿瑟的麾下服务，但中国人因忙于内战而未派出军队，苏联则在分区占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不愿将其军队置于美国司令官的指挥之下。1946年初，所有战胜国在华盛顿成立远东委员会[①]，以便制定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在东京还设立四大国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负责监督对日占领政策的执行。但是，美国不允许这两个机构拥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这样，占领日本几乎完全成为美国人的独家表演。日本人也正是这样看待占领的。

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极为任性、充满活力而又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只接受华盛顿的一般性指导，对盟国的意见概不理睬。他那种救世主般的思想和言辞感染了正在绝望中寻求鼓舞人心的指南的日本人。出于日本人意料的是，他们发现美国军队基本上是105 通情达理、乐善好施的，而不是志在复仇。由于美国已经通过击败日本证明了其明显的优越性，所以幻想破灭而又灰心丧气的日本人并不像战败国人民普遍表现出的那样对占领军及其首脑充满愠怒和怨恨，而是把美国视为奔向美好新时代的指路人。

---

① 远东委员会：盟国决定对日占领政策的机构。1946年2月设于华盛顿，有中、美、苏、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1949年增加新独立的缅甸和巴基斯坦。1952年解散。——译者

美国人也发现日本人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纪律严明、驯良温顺的民族，而不像他们根据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军队作战的经验所推测的那样，是一个死硬狂热的民族，他们急于在改革和重建他们的国家中予以合作。即使那些圆滑老练的领导人也认识到，日本已经彻底失败，如果要恢复独立，就必须服从美国的意志，因此采取令人惊奇的合作态度。美国人那种好为人师的自信和乐善好施的保护人气质，与日本人的积极合作和忠于领袖的旧习惯相得益彰。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国家被另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国家实行军事占领，并不像大部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相反，从整体上说，占领取得了完全成功。

* * *

美国军事占领首要和最基本的目标是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因为当时日本的军事扩张被视为东亚压倒一切的问题。盟国军队充斥日本各地。日本的所有战利品都被剥夺了。实际上，日本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海外殖民地，甚至连其他国家并不拥有主权的领土也被剥夺了。北海道以北的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美国自己占领冲绳。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各地的军队和平民被集中起来，有650多万人被遣返日本。接着，陆海军全部复员，舰艇和武器都被销毁。犯有暴行的军人受到惩罚，包括东条英机和一位文职前首相①在内的7人以私下策划、发动战争的含混理由被判处死刑。

战后，和平主义的浪潮蓬勃兴起。麦克阿瑟热衷于把日本改造成他所谓的亚洲的瑞士。因此，日本领导人和美国占领当局都愉快地同意在新宪法中以非常具体的词句制定一项条款，规定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保留任何战争潜力。然而，在1951年和平条约最后缔结时，美国却又认为在和约中不涉及对日本的任何军

106

① 指1936—1937年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广田弘毅。——译者

事限制是比较现实的。在经济方面，所有超过一个完全的非军事化国家所需要的剩余工业生产能力都被宣布用于赔偿日本曾经掠夺过的国家，然而，这项计划收效不大，原因有三：各国对于如何分配这些工业设备意见不一；受到战争重创的日本也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撤走并安装在其他地区；日本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国民需要，没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战后初年的日本只是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才得以生存下来的。

如果军事占领只以非军事化的计划而告终，那么它与历史上对战争的惩罚性处理方式也就没有多大不同了。但是，这次占领决非如此。美国人认为，非军事化只能暂时治疗日本军国主义病症，唯有政治民主化才能造就一个未来不大可能走向战争的日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取缔了所有极端国家主义团体，废除了所有的镇压性法律，释放了政治犯(其中主要是共产主义者)，禁止一切旧的陆海军军官以及政府和企业界乃至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担任任何重要职务。然而，民主化政策的最重要方面是通过一部新宪法以及辅助性立法。

由于日本政府太慌乱或太勉强，不能提出一项令麦克阿瑟满意的宪法改革，因此，麦克阿瑟命令自己的参谋部于1946年2月草拟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经过细微的修正，由日本政府以1889年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公布，并于1947年5月3日起生效。因为新宪法是由美国人拟定的，所以其适应性和持久性自然受到怀疑。但是，美国的起草者很明智，他们不是按照美国的政治体制创造一部新宪法，而是完善日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模型的英国式议会政府。这样一来，新宪法就与日本人的政治经历相适应，得到绝大部分日本人的热烈拥护。

新宪法的核心是修正旧宪法的模糊之处和弱点。它明确规定天皇是没有权力的国家统一的象征；实际上，天皇长期以来就是象

征性的。它赋予国会最高政治权力，消除所有权力竞争的根源，或者使其明确地隶属于国会。通过由众议院选举首相的措施，使内阁对国会负责。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取代了贵族院。但是，除妇女获得选举权以外，国会的运行机制和选举制度与20年代后期的情况基本相同。

107

宪法还包括大大增加的一系列民众权力，其中既有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一切，也有许多最近才提出来的，如男女平等、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权、人人都有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等。司法系统是独立的，而且规定了尽量不受行政干涉的制度。新设立的最高裁判所拥有审查法律是否合宪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极大地增加了，都道府县知事由选举产生，就像市长早就是选举产生的一样。

* * *

占领当局并没有停留在政治改革上。为了创造比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助于成功地推行民主制度的条件，美国占领当局还大胆地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令人惊奇的是，美国当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背后的真正恶魔是工业财富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在财阀手中，据说这势必需要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虽然战前的日本历史难于证明这种理论，但这却促使麦克阿瑟及其参谋部表现出令人惊诧的社会主义热情。在别人的国家进行革命性的改革无疑是比较容易和有趣的。

战争的破坏是一支巨大的经济杠杆，因为它几乎把每个人都搞穷了；占领当局还通过征收一种资本税而没收了大部分的剩余私有财产。它解散大型的财阀公司，剥夺了财阀家族的财产，并且开始拆散组成这些大公司的工业和商业单位。但是，到这个时候，出于社会和政治原因而进一步施行外科手术来改进日本经济反而会扼杀它，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占领当局停止了这项计

划，将重点转向复兴日本的工业。

高地租率困扰着日本，从19世纪末以来，土地的租佃率始终占45%左右。日本出现过许多降低租佃率的想法；如今，美国这一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参与，使异常激进而有效的土地改革成为可能。完全禁止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农村中的土地所有者只能拥有比自己耕种的田地稍多一点的小块田地。田地以极其宽松的条件转让给原来的佃农——是按照战前的价格转让的，实际上形同没收——土地的租佃率降为仅为10%左右。

占领当局还为城市劳工实施开明的法律，鼓励组织工会，作为劳资力量的平衡器。从20年代幸存下来的劳工领袖很快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新型劳工组织，最后达到1200万人以上。然而，出乎美国当局意料之外的是，日本的工会显然变得比美国的工会更为激进。战后初年，日本经济濒临破产，工会不可能取得争取工资斗争的胜利，因此企图接管工厂，由他们自己经营。此外，由于日本的大量工人，如铁路工人和教师是政府雇员，他们的工资是由政府而不是由资方决定的。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似乎比工资谈判更有意义。

占领当局的改革扩展到许多其他领域。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在法律上享有完全平等地位。家族主支对分支以及家长对成年子女的权威都已不复存在。义务教育延长到9年，并且努力使教育更多地训练思考能力，而不是培养死记硬背。6年制小学以上的学校体制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最后这项死板的变革引起极大的混乱和不满，但由于它已经扎下了根，因此甚至在美军离开以后也无法改变了。

因而，占领当局的某些改革并不是非常成功和倍受赞赏的，但总的来说，改革受到欢迎，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战后日本的巨大变化基本上不应该被视为外国干涉的结果。无

论如何，整个战争历程——建立帝国野心的失败及其引起的国家的崩溃——促使日本按照占领时期选择的方向前进。日本经济要想生存，除了依靠和平的国际贸易之外，别无选择。虽然议会民主制有种种不足之处，但它肯定是灾难性的极权统治的替代品。 109
15年来，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抑制社会变革，并将它引向歧途。只要扫除这些障碍，社会变革就会不可避免地席卷日本。占领时期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沿着日本内在力量所推进的相同方向前进的缘故。外国军事占领当局的强有力的领导也许将这些力量汇聚到比较窄小的渠道，使它比一般情况下流得更快。但是从根本上说，占领只是为战后日本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不是决定了战后日本的发展。

* * *

一个世纪以前，日本人表现出伟大的社会纪律性，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和孤立状态到中央集权统治和国际交流的根本性转变；现在，他们以同样伟大的社会纪律性，经受住了悲惨的战争和军事占领。美国缺少通晓日本语而又训练有素的人来直接统治日本，只能通过日本政府行使他们的权威。起初，他们在日本为革命大开方便之门，差不多希望爆发一场革命，但革命从未发生过。虽然日本的局势出现过动荡，但法律和秩序并未崩溃。不管在什么时候，当较为激进的人企图发动暴动时，大部分日本人都会退避三舍。政府官员继续尽量好地履行具体的职责。教师继续执教，学生继续读书。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适应新环境。虽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过去几个世纪一样，日本社会依然按秩序井然地延续着。

20世纪前几十年出现的变革主流，在战后几乎又重新出现了，军事独裁、战争与失败、军事占领，这一切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这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明显。各个旧的党派

在1945年秋重新组成，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选举趋向几乎原样不动地重新出现。战前的两个传统政党复兴，并由于面临左派选票日益增加的竞争而在1955年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它的双重渊源。自民党的成员是战前的自由主义者，但在战后的形势下却被视为保守主义者。左派政党也有其战前前身，从左到右分别为共产党、社会党和民社党。直到60年代才出现了唯一一个没有战前关系的大的战后政党，这就是公明党，有时译成公明政治党。公明党起初是作为一个新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政治外围组织而出现的。公明党和三个左派政党分散了反对派的选票，使自民党自成立以来得以一直执掌政权。

110

战后初年是政治以及社会和经济极其动荡的时期。有组织的劳工企图控制产业和直接的政治权力。在麦克阿瑟的容忍下，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煽动尽快建立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城市白领阶层在军国主义的镇压下受苦最多，他们极其怀疑保守的执政党的意图。政治上的高谈阔论常常包含全面的对抗意识，而不是理性的辩论。这种对抗精神不只限于选举和议会政治生活，还蔓延到大街小巷。人们成群结队地举着通常写有“坚决反对”某事或其他的标语煽动性的旗帜游行示威，构成这个过程中最屡见不鲜的场面。每个人都欢呼民主，但“demo”这个战后无处不在的政治术语已经不是“democracy”(民主)，而是“demonstration”(示威)的缩写了。

占领军与日本人之间早期的蜜月般的关系逐渐淡化变质。保守派日益厌烦美国人的干涉，因为美国人常常不了解细节就指手划脚，给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左派对它也不抱幻想了，因为从1947年到1949年占领政策的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向经济恢复。这种转变是自然的，因为美国原来的改革计划已经行将完成，而日本经济的持续虚弱则日益被视为日本成功的主要威胁。但是，美国对

日本以外的世界的认识的变化也影响了这一政策的转变。冷战方兴未艾，中国正在“丧失”给共产主义。日本不仅不再是东亚和平的唯一威胁，而且是民主的基地和美国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

左派对占领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首先是工会企图夺取政治权力，计划在1947年2月1日举行全国性总罢工。但是，麦克阿瑟害怕这会造成对经济和他所进行的改革计划的破坏而禁止了罢工。其次是1949年秋天，占领当局坚持要日本政府和 111 企业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保守党以此为借口大肆解雇惹事生事的左派分子，这就是所谓的“赤色整肃”。最后是1950年6月25日，共产主义的北朝鲜与南朝鲜打仗，美国军队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作出反应。日本左派分子得出结论，占领当局，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在政策上已经作出180度的转变，从保护者变成了敌人。

从此，日本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相当大程度上集中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态只是下列事实的反映，即日本极其严重地依赖国外原料和市场，它的命运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对外关系，而不是国内事态。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自始至终的军事占领，而且日本的军事安全保障和30％的对外贸易又继续依赖美国，因此，在日本人眼中，美国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突出作用被夸大了。左派人士认为，严重依赖美国将使日本与资本主义联结在一起，从而妨碍社会主义取得成功。他们认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会把日本卷入冷战，从而导致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美国军事基地和军队的存在还造成无休止的摩擦，而反对党可以从中渔利，谋求政治好处。

由于苏联坚决不接受美国人认为必要的条约，通过和平条约结束军事占领的时间比美国所预想的拖得更长。但是，美国最后还是在没有苏联签字和中国参加的情况下，缔结了一项“片面的和

平条约"①。与此同时，还签订一项双边安全保障条约②，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则承担防御日本列岛的义务。这两项条约于1951年9月签订，并于翌年3月生效。

112

第十一章 占领结束后的日本

占领结束以来的日本历史，简单地叙述一下即可，因为本书的其他部分基本上都涉及这个时期。占领结束初期的一个主要的政治争论课题是保守派希望修改宪法，以明确天皇的统治权，并且取消对军备的限制；前者基本上是理论问题，后者则比较实际。但是，由于保守派在国会两院中都缺少三分之二的多数，因而在左派的坚决反对下，以失败告终，然而，"不战"条款确实默默地得到了重新解释。日本建立了一支有限的军事力量，1954年命名为自卫队。占领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还对占领时期进行的改革作了某些修正，结束了对战时领导人的整肃，重新加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警察和教育制度。反对党害怕这些做法会成为全面削弱宪法所保障的自由权利的开端，因此掀起了大规模的斗争，反对恢复中央集权化。从此，左派和右派围绕控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时至今日仍未停止。执政党认为控制是提高行政效率所不可缺少的，反对党则害怕控制会为回归战前体制开辟道路。

在这些年间，日本政府重新建立了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1954年起，日本开始对它所掠夺过的大多数国家进行赔偿。1956年，日本与苏联就结束两国敌对状态达成了协议，尽管这不是一个全面的和约，但苏联在联合国

① 即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又称《旧金山媾和条约》。——译者
② 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日美安全条约》。——译者

停止对日本行使否决权，使日本得以成为联合国的一员。日本与最近的邻邦朝鲜和中国的往来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直到1965年，113 日本人以付出大笔金钱为基础，才实现了与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直到1972年中美和解后，日本才与北京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

战后时期最大的政治危机是1960年围绕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进行的。日本自信力的日益增强和国际地位的逐渐提高，使这一问题成为必要。这导致激烈的政治爆炸和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但是，新条约一经批准，骚乱就平息下去了，此后几年也成为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治上最平静的时期。新首相池田勇人采取了一种“低姿态”，不是在坚决反对下强行进行政治决策，而是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日本的经济成功，许诺在10年内将收入增加一倍。114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许多日本人尤其是青年人也富有吸引力，这也使围绕对日美关系产生的政治激情降了些温。

然而，由于美国在1965年以后深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日美关系又出现了紧张局面。大部分日本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立场，认为这会把日本卷入美国的军事冒险。60年代末期，这种态度与再度围绕安全保障条约而出现的日益增多的骚乱结合在一起，因为修改后的条约的第一个10年有效期将于1970年6月结束，届时双方都可以要求修改条约或者终止条约。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1968年前后日本学生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并造成了政治上的动乱；另外，要求把冲绳归还日本的呼声这时也变得很强烈了，这使得对日美关系的攻击具有了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但是，正如1960年一样，日益加剧的外交危机再次消失了。日本继续沿着异常平稳的轨道前进。美国慢慢地从越南撤走军队，安全保障条约也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两国政府都没有提出废除条约或修改条约的问题，条约自然继续有效。1969年11月，美国宣布将冲绳归还日本，并于1972年5月付诸实施。日本以前所未

有的平稳姿态跨入了70年代。

*　　*　　*

军事占领结束以后，在日本的政治进程相对稳定的背后，是所谓的“经济奇迹”，这使日本在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给日本人带来了他们过去从未梦想到的个人富裕。经济恢复从50年代初期开始明朗化，1949年，占领当局实行的严厉的紧缩政策为此奠定了良好的财政基础，美国为朝鲜战争进行的海外采购也起了强大的刺激作用。日本经济一旦得以恢复，就开始以加速度的步伐发展，到50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他们幽默而诙谐地谈论着“神武景气”，意为这是从神话中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建国以来日本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

115

到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飞跃发展，此后十几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按不变价格计算），这是其他主要国家从未达到过的记录。池田勇人在1960年所说的10年内收入增加一倍，已证明估计得太低；日本经济实际上每隔7年就增加一倍。到60年代，日本人已经感到异常富足了。消费主义情绪弥漫全国。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高级照相机、立体音响设备、冰箱冷柜、洗衣机、空调器，乃至小轿车等几乎都成为每个人可望而又可及的财产。日本人沐浴在他们久违多年的国家自豪感中，兴致勃勃地看着世界其他地区的惊奇态度。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的大阪国际博览会上，他们沾沾自喜地向外国人炫耀他们的国家。他们谈到有了大量闲暇时间，可以尽情地打高尔夫球、滑雪、玩保龄球，并在外汇管制放松后，纷纷到国外旅游。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西欧，达到美国的2/3以上。

战后初期的出生高峰过后，人口的增长十分缓慢，这有助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50年代和60年代，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到1%多一点，因此就可以保证到2000年人口稳定在1.35亿左

右。社会各方面都提倡控制生育——这方面没有宗教禁忌——宽松的《堕胎法》根本没有实行，造成了出生率的下降。但是，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日本出生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日本社会的飞速城市化。典型的城市家庭一般只有两个孩子，这个数目往往是狭小的城市公寓所能容纳的限度，而且一般家庭也只能负担两个子女的长年教育支出。然而，农村的出生率下降甚至更大，因为许多育龄人口离开农村涌入城市。但是，不管原因何在，30年代觉得自己面临人口危机的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把人口问题当作一回事。因为，每年增加的力量人口只占用了增长快得多的经济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日本的工业成功也使日本的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船舶、钢铁、汽车以及其他各种电器和工业品涌入世界各地。早在60年代末，日本差不多已经成为东亚和西太平洋每个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至少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它开始汇集了巨额的贸易余额。仅就对美国一国的贸易而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是微量入超，但仅仅过了10年就暴长到500亿美元的出超。自然，日本开始大量向海外，尤其是美国、西欧和东亚投资。到80年代，它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116

在世界上日本的制造品质优价廉，这种普遍性认识有助于解释日本奇迹般的经济飞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还保持着战前劣质次等品生产国的名声，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认为日本的制造品，尤其是在高技术领域，总的说来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质优、可靠和便宜。“日本制造”的含义发生了异乎寻常的转变，这促使人们对日本兴趣盎然，尤其是在美国。世界对日本也产生了更大的期待。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日本的援助是极其重要的。日本参加国际组织成了众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的繁荣缓和了内部冲突，政治争

论的火药味也减少了。虽然旧的对抗性言辞和风格仍然继续存在，但是除了共产党以外，反对党都开始认可日本与美国的防务关系（以前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点），甚至日美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也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农村的日本人对现状完全满意，这是不言而喻的。私营企业中的蓝领工人为了经济利益，逐渐转向采取集体谈判的方式，而把直接的政治行动留给白领阶级和政府雇员。左派每年举行的五一节大游行已经变成和风细雨般的民间节日活动。虽然经济的"双重结构"中的某些差异仍然存在，但普遍的繁荣和日益紧缺的劳动力市场无疑已经使之得到缓和。此外，农村的富裕和信息的传播，尤其是电视的爆炸性发展，已经使战前现代化城市与停滞不前的老式农村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距基本上消失。如果没有经济的辉煌发展，战后日本在政治上也许不会如此稳定，民主制度也不可能会这么成功。

117 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相应的比较难于衡量的社会和文化成就。不管政治辩论如何激烈，人们已经普遍感到日本是一个幸福的社会——"明朗"（akarui，明るい）是日本人喜欢用的词。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得到很好的遵守。虽然城市人口极大增加，但犯罪率却一直很低，实际上还不到任何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一半，同时没有严重的吸毒问题。到 80 年代，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了。与此同时，日本的教育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或许提供了关于社会兴旺的最好的统计根据。中途辍学的情况实际上闻所未闻。在年龄集团中，完成12年教育而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比例已经上升到94%，其中大约30%的人继续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这些比例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高得多。

日本在文化上也是一派兴旺景象。文学艺术和音乐等领域都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的文化思潮在所有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日本也加入了世界性的文化

潮流。例如，日本的传统音乐表现出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魅力，而西式音乐的日本演奏家和指挥家也赢得世界的喝彩，东京就有6支名副其实的职业交响乐队。日本的电影也获得国际声誉。传统色彩较浓的作家之一川端康成① 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七八十年代，增长率和变化都减慢下来，但这加强了稳定感和普遍的幸福感。在漫长而艰苦地追赶西方的过程中，这个国家不仅已取得成功，而且在许多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导人，或至少是领导人之一。日本人出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信感，有时沾沾自喜，甚至几乎达到飞扬跋扈的地步，这并不足为奇。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国内的政治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国家变得更加秩序井然和运转平稳，也是自然的。

* * *

然而，日本的成功也造成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在战后轻率的工业化进程中，日本人破坏了他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城市化地区的过度拥挤和严重污染。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人们都已经日益认识到这些问题，日本人却在突然间发现他们面临着也许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和过度拥挤的问题。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工业增长的政策，长期被捧为金科玉律，要改弦易辙，谈何容易。不过，他们确实在尽快设法减轻污染。从1978年开始，他们以一系列的界标立法措施为基础，通过了严格的法律，到80年代，就大大改善了情况。但是，拥挤仍然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 118

日本人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令人震惊的成功，这也使他们更为明显地依赖外部世界。虽然他们具有新的骄傲和自信，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面前，他们却感到自己甚至更加无能为力。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突然在1971年7月和中国达成和解以前，他们

① 川端康成(1899—1972)，日本著名小说家，著有《伊豆的舞女》、《雪国》等。——译者

甚至不敢与北京建立正式的联系。虽然美国人信誓旦旦，向日本保证要让他们消息灵通，但是，尼克松不仅事先没有同日本人协商，甚至也没有通知他们，从而导致了所谓尼克松“冲击”。1973年夏天，华盛顿因担心大豆短缺而不管大豆对日本的饮食是何等的重要，突然禁止大豆出口，这种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尼克松冲击”。1973年秋天，主要由伊朗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将原油价格提高了3倍，使日本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日本受到的打击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要重，因为日本全部能源的60%依赖进口的石油。日本被抛入困境，暴涨的石油价格一时造成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从长远的观点看，日本和其他国家最终都渡过了危机，但日本经济极易受到外部力量冲击的脆弱性这个教训却一直铭刻在日本人的脑海里。最令日本人不安的事实是，尽管日本财力充足，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对于最危险的国际局势——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依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

日本取得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另一个令人厌烦的结果是，其他国家对日本产生更大的期待。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东亚邻邦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开放市场，并提供慷慨的援助。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对东南亚进行友好访问，但在印度尼西亚迎接他的却是普遍的骚乱。这使呆在国内的日本人第一次意识到了这种感情之强烈程度。

119 西方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开始坚决主张日本用经济互惠代替严格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曾使日本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并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当一个国家还很虚弱并试图恢复经济时，这种保护性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富裕而强大的经济大国来说，这就不合情理了。有些欧洲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公开敌视日本，美国也日益强烈地要求日本消除贸易壁垒。许多失业的美国工

人严厉谴责日本人窃取了他们的工作，贸易摩擦成为日美关系的一个主要课题。

日本人则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形势。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地理基地上，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受到更多的外部力量的威胁，因此需要实行更加严格的经济控制并建立更加强大的经济基础。他们正确地指出，他们已经将关税壁垒减少到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同或更低的水平，并且由于发达国家对高技术出口实行威胁性的限制和新兴工业化邻邦要求日本扩大低技术产品进口，面临着被置于死地的危险。美国人指责说，日本继续通过较为隐蔽的小规模行政指导这种非关税壁垒以及形成已久的排外性商业习惯，实行早期的保护性政策。日本人对此提出反驳，认为问题主要在于美国的工业效率低，以及美国人没有掌握日本语和日本的商业习惯；日本人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普遍感到美国产品比日本产品低劣，这也是原因之一。日本除了在技术上先行一步并更多地依赖不需要大量原材料和能源的“后工业化”的知识型产品以外，别无出路。但是，日美间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给这两个世界贸易的主导国家间的关系注入了侵蚀性的新因素。即使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重新考虑他们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的时候了。

战后最初几十年，自信的美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虚弱而依赖性的日本才是一个安全的伙伴。日本虽然有些勉强，但也温顺地接受了美国的保护和慈善性的支持。但是，美国人现在则认为日本人在对美经济关系中“不公平”，他们在国防方面由美国出资“免费乘车”；日本人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美国在越南失败和经济动摇之后，日益丧失曾被称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领导权。他们感到，不能再把美国当作一位强大的保护者来信赖。西欧人因日本的经济成功而表现出直截了当的敌意。欠发达国家则提出不近

120

情理的援助要求。日本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并维持它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显然应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加活跃的角色。

日本人小心谨慎而且有些勉强地迈步前进，以够得上他们的新地位。早在1966年，他们在成立亚洲开发银行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自动限制某些产品的出口，并从1971年起开始通过日元升值减轻对其贸易伙伴的压力，到80年代中期，日元对美元由原来36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一倍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有显著的增长。从1975年开始，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后来加上加拿大——的首相（总理）或总统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然而，我们的历史叙述到这个阶段，已经因为过于接近现状而难于作出清晰的描述了。现在该是转向更加广泛而有分析性地考察日本人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了。

第三编　社会

第十二章　多样性与变化

前面对日本的历史遗产所作的简要叙述表明，日本社会是一个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这足以纠正外部世界在解释和描述日本人时所形成的某些肤浅的成见。也许由于日本人的孤立状态和强烈的与众不同意识，特别使其他人用带有成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有些人把日本人看作是彻头彻尾的唯美主义者，是《源氏物语》中文雅而敏感的朝臣贵妇的后裔，中世纪禅宗艺术家或者19世纪末期强烈地吸引着拉夫卡迪奥·赫恩① 的高雅的人的子孙。另一些人则把他们视为德川时代那种刚愎自大、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武士的现代翻版。日本的东亚邻国普遍认为，日本人基本上是军国主义者，封建时代军事领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和现代时期日本军队进行野蛮的征服就表现出这一点。最近出现的一种成见虽然在内容上把日本人与“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但在一味强调狂热方面与前者不相上下，把日本人视为一种具有无与伦比的组织效率、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牺牲他人的一切、冷酷绝情的“经济动物”。

我们对日本历史的概述应该可以表明，日本人和其他民族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众多变化，而且比许多民族变化更大。他

① 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日本名小泉八云。著名作家、语言学家。原籍希腊，1890年定居日本，著有《日本面面观》、《心》等。——译者

们对于变化着的外部局势的反应极其敏锐。当然，日本人具有文化上的延续性，保持了某些特性，但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差不多。封建社会的武士、德川时代的官僚和战前的军国主义者的模式对当代日本人的影响，不会比维金人① 传统和近代初期的军事征服者对瑞典人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比不上前近代时期的政治分裂和不久以前的纳粹经历对德国人的影响，与清教徒的遗产和孤立主义传统对美国人的影响也差不多。战后的日本与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根本区别，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与 19 世纪 80 年代、19 世纪末叶与初期以及历史上各个时期之间都有巨大差异一样。

126

尽管我们对历史的叙述极其简洁，但它足以表明，日本社会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简单社会，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虽然12200万日本人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个民族，但由于属于不同的年龄层，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也有千差万别。一个 10 至 20 岁的青年与一个 80 至 90 岁的老人，一个临时工和一位公司经理，一个银行职员和一位艺术家，他们相互间在生活观念上表现出的多样性，与任何西方国家存在的同类情况都不相上下。一般说来，关于日本人的认识要么与许多事实不符，要么与某些事实相矛盾。

尽管这种多样化和神速变化遍及日本各地，但是，外国观察家总是试图找到可以阐释日本的过去与现代的所有事物的某一特征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征。日本人在他们的自我意识中，也不断地进行着同样的努力。日本人和外国人一样，也感到日本人具有“独特性”，也许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们去寻找关于这种独特性的某种简明的解释。

过去，日本人常常引用天皇万世一系来解释日本的一切，虽

① 维金人(Viking)，8 —10 世纪时劫掠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民族。——译者

然历史的概述已经表明，日本历史的大部分发展与天皇没有什么关系。有些学者通过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把德川时代的武士伦理作为打开现代日本的钥匙，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所谓纵向社会的等级集团和人际关系中的依赖意识，视之为日本社会的核心因素。这些单向思维式的阐释的确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歪曲了当代日本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社会。

快速的变化使人们格外难于作出精辟的分析。前10年的牢固观念，在10年后就开始崩溃，再过10年几乎会荡然无存。20世纪30年代日本突出的生活特征可能与20年代泾渭分明，与50年代和80年代更有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接受教育的日本人与他们的战前父辈相比，几乎是一种新类型的人。战前的一代总是抱怨年轻的一代丧失了旧美德。变化已逐渐出现缓和的迹象。但是，未来的日本人又将如何？对此谁也无法断言。考虑一下美国人从内战以来每隔10年生活和观念所发生的变化有多大，人们就能想象到日本人在同样的时期内发生的变化该有多大。因为他们经历了更大更突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创伤更大的国内条件的转变。

分析日本社会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观察基础不稳定。任何像本书这样的研究势必是比较性的，因为人们思想中如果没有用以判断的某些标准，就不能对日本的任何事物作出任何评论。但是，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两个美国人的观点或标准会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将西方人也包括在内，那么差异就会更大。而且，在美国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标准也是千变万化的。19世纪时日本人对西方人袒露身体公开表示反感，现在西方人可能认为日本人在这类问题上有些假正经。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是战争贩子，美国人是爱好和平的人。但时过境迁，美国人

126

和日本人的形象几乎发生了逆转。

现代技术易于在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造成很大的趋同现象。毫无疑问，日本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美国和西欧相同的方向前进的。在日本，个人之间的差别几乎与西方国家一样大。从勇敢坚毅到胆小如鼠，从雄心勃勃到颓废消沉，形形色色的人应有尽有。

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不失为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民族，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标准与西方流行的规范迥然不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些标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并且很可能继续保持下去。一个半世纪以前，托克维尔①为了向欧洲人介绍当时的美国人所作的判断，有些至今依然是适用的。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我们不能指望对一个变化更加迅速的民族也作出同样的判断，但是，在描述当代日本社会的真相时，我们也许能够揭示出某些密切相关的不变特征。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日本社会过于复杂，变化过于迅速，难于把它纳入一个一成不变、整齐划一的模式。尽管这些因素都存在于一个相对平稳地运行的整体中，有些特性与社会水乳交融，有些特征则并非如此。我首先将分析一些相互间最能相容的因素。

128

第十三章　集体

分析日本社会的一个比较恰当的出发点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类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一个人出生后，毕生的大部分时

①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社会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等。——译者

间是在集体中度过的。不同的社会在比较强调个人或者重视集体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一般地说，日本人与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以牺牲个人为代价强调集体的倾向。

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喜欢集体行为，至少把自己看作是按照集体方式行动的。大多数日本人心甘情愿地在衣着举止、生活方式乃至思想意识上顺应集体的准则，西方人则至少在表面上炫耀独立性和个性。保全"面子"是一个源于中国并在日本得以盛行的观念，在日本人心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在集体其他成员面前的"面子"。

日本和西方间的这种差别在部分上是神话，而不是事实。我们把在上帝、法律和社会面前的独立个人的观念高度理想化了，以致把自己看作比事实证明的远为自由而孤立的个体。日本人的普遍观念使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在日本，派系是极其重要的，但是日本人对此的强调往往达到不切实际的地步，试图用诸如个人的政治派别、家族关系、大学出身（"学派"）以及门生故旧和裙带关系解释日本的一切。他们喜欢坚持这样的意见，即至关重要的不是个人的才能，而是他的关系（kone，即英语 connection 的日文缩写）。然而，日本与西方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像人们从美国《孤胆骑警》的传奇或无私地献身于集体的日本人的传统理想联想到的那么大。 129

在日本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在这方面，日本和西方还出现了趋同的迹象。与早期相比，西方现代技术显然创造了一些条件，使个人可以从家庭和其他集体中赢得更大程度的经济独立和其他形式的独立。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日益走向极端。因此，当代城市生活的孤独和反常现象使西方人踯躅不前，并促使他们重新探索更加密切的集体关系。在日本，现代技术的影响没有达到这么深刻的程度，但日本人也已经

象西方人一样，受到同样普遍性的影响。他们降低了集体的重要性，开始重视个人了。

在日本人刚接触到西方先进技术的时候，他们聊以自慰的思想是在接受"西洋科学"的同时，保持"东洋道德"。中国人和其他亚洲民族也有非常相似的想法。但是，日本人很快认识到技术、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间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福泽谕吉[①]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是普及西方知识的领导者之一，他强调指出，重视个人独立是西方成功的奥秘。这个时期影响极其深远的两部著作是塞缪尔·斯迈尔斯[②]的《西国立志篇》(即《自助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③]的《自由之理》(即《自由论》)。

明治时代的领导人意识到有必要更多地强调个体，就迅速废除了严格的等级障碍和整个封建制度，使每个公民成为纳税人，既有权利接受普及教育，又有义务承担兵役。个人权利写进了1889年宪法，虽然这些权利受到了法律条款的严格限制。像在西方一样，日本的工业化也造成了更大程度的个人经济自由。1947年宪法规定了许多定义明确而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法庭予以了严格实施。因此，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日本的集体和个人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与西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 * *

过去这些差别明显地体现在家族中，尽管如今情况已不再如此。近代以前的日本家族称为"家"(ie)，可以包括嫡系家族及其

130

①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启蒙思想家，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译者

② 斯迈尔斯(Samuel Smilis，1812—1904)：英国作家，著有《品格论》、《自助论》等。——译者

③ 穆勒(J. Stuart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人类精神现象之分析》等。——译者

控制下的旁系家族以至根本没有关系的家族。父系家长或家族会议对家族成员拥有绝对权威。这种家族在封建武士阶级的名门望族、富商巨贾和某些农村集体中尤为普遍。

这种家族制度的残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时期，但在战争时期和新宪法实施之后基本上消失了。无论如何，甚至在近代以前，大部分人也赞成采取比较简单的家庭模式。这就是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更恰当地说，是一种变异的父系血缘家庭，其中一个儿子（通常是长子）及其配偶和父母共同生活，继承农场或企业，并逐渐从父辈那里接管家业。老人则退居二线，但依然住在原来的家里。

现代日本的家庭在结构上与美国的核心家庭大同小异，尽管残留着浓厚的父系家族制度的色彩。日本人从不重视祖先崇拜，这种习俗在中国社会比在日本社会普遍。但是，在佛教寺院的龛架上可能保存着几位近祖的牌位，并且世代相传（通常传给长子），以象征家族的延续。其他子女则组建独立的家庭。告老隐退的父母不管有无农场或企业传给后人，都可以和继承祖先牌位的孩子共同生活。那些有条件的家庭可能为他们提供一间毗邻的独屋或一侧厢房。这种状况不仅是旧习惯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日本的退休金和社会福利保障不完善，所以退休的人依靠子女供养的程度比西方更高。然而，狭小的城市公寓也可能将祖父母拒之门外，这使儿媳感到宽慰，以此为借口不为老人提供住宿的情况有增无减。虽然城市的拥挤程度日益严重，但大约 3/4 的退休老人仍然与子女居住在一起。老年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渐渐上升，现在大约有1/10 的人口年龄超过 65岁。为老年人提供独立的居室和老年之家，开始成为日本社会的突出问题。

当代日本的核心家庭所受的破坏程度比美国的核心家庭轻，家长的权威比较大，家庭关系总体上说也比较密切。但是，这些并

131

不是结构上的差别。在核心家庭之外，亲戚关系，如叔伯、姑婶、堂兄弟、表姐妹等也象美国一样，有了变化，并且模糊不清。日本的核心家庭与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的美国核心家庭大体相同，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类型上的。两国的发展趋势相同，都朝着家庭单位更小和亲戚关系更淡薄这个方向发展。

日本与西方的差别在超家族团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即使在近代以前，这种团体也经常凌驾于家族之上，虽然有时家族的名称用以描述这些团体间的关系。比如，统治者或领主是其臣民之“父”。甚至到了今天，在帮会行话中，老板还被称为“亲分”(oyabun，头头，师父)，即“义父”，其随从则被称作“子分”(kobun，徒弟)，即“义子”。在日常用语中，“内”(uchi)(原意为“里面”，引申为“房子”或“家庭”)也普遍用于说明某人所属的公司。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在近代以前，主要的团体在本质上也不是血缘家族集团，而是这样的集团，比如为了分配稻田水源、处理税收和在其他行政管理事务上进行协作的农业村落，或是更高一级的封建社会中的牢固的领主—家臣集团。在现代日本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团体更多地是仿效这种单位的而不是家族而成。

132

今天，原来以户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组织的村落集体仍然很强大，虽然从整体上看它只是社会的一个比较小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日本乡村，这些村落群体与为了提高效率而将一些自然村联合而成的强大的农业合作组织、或者政治上的行政村这些更大的单位相比，也已黯然失色。“村”(mura)用以称谓比较大的人为单位，原来的自然村已经非正式地降格为“部落”(buraku)，即“小村庄”。

133

对于非乡村居民的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城镇中的“邻组”无足轻重。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时期，“邻组”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手段得到政府的扶持时才显赫一时。但是，

在市民的生活中，其他各种团体相当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人们在其中工作的公司。

在日本，工作不仅是取得薪金的契约性安排，而且还意味着人们在更大团体中的身分，换言之，就是使人们得到作为大型的重要组织的一分子的满足感。经理和工人都是终身雇佣的，他们一直服务到正常的退休年龄。这给予他们一种安全感，使他们以公司为荣，忠于公司。西方人普遍认为，职工是大机器中的一个无足轻重、可以替换的零件。但在日本几乎不存在这种感情。日本的经理和个人并不觉得丧失了个性，而是以自己的公司为荣，在著名的大公司工作更是如此。他们热情洋溢地诵唱公司之歌，引以为荣地佩带公司徽章。

美国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拥有某种特长的个人，如推销员、会计师、卡车司机或者管道装配工，他们随时待价而沽。日本人则不管自己的具体工作是什么，都更乐意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公司的一个永久性成员，如三井商事或三菱重工的职员。同样的精神也体现在其他团体如政府各部门中。正如我们后面还会看到的，这种职工与工作团体融为一体的精神，对日本企业和经济的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的企业中还充满了其他类型的团体，从街头巷尾的小店主的组织到全国性的大银行或钢铁企业协会。这类团体在日本比在美国普遍，并且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它们自下而上地组成金字塔式的、广泛而有效的全国性组织，其顶点是中小企业组成的日本商工会议所和大企业组成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即著名的“经团联”。医生、牙医和其他专业团体也按照同类方式紧密地组织起来；农业组合和工会联盟也采用这种模式。总之，日本人几乎是十全十美的“组织人”。

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是个人获得团体身分的另一个重要场 134

所。美国人也眷恋母校，但学生时代形成的关系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要重要得多，大学出身常常能够决定一个人受雇于什么样的企业。重点大学有一种排他性地从本校毕业生中选拔职员的观念，实际做法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就读于不止一所上大学的学生极其罕见。日本人一生都以自己就读的大学作为身分背景，别人也是这么看待他们的。相形之下，即便美国的“常青藤联盟”①的大学毕业生也黯然无光。

其他各种类型的团体充斥日本社会。与美国的相应团体相比，它们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更富于个性。日本有众多的妇女组织，并且自下而上地组成金字塔式的地方和全国性的团体。青年团体也很重要。日本的教师家长联谊会（在日本和美国均称为PTA）比美国的同类组织影响更大，组织也更出色，尤其是在日本农村。日本还有不胜枚举的爱好者团体，从柔道和别的武术项目到优雅的插花和茶道，各类团体应有尽有，组织严密。这类团体在其成员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美国社会中，要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很难的。日本的扶轮社②规模庞大，超过了除美国和英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组织，并且从主要是小城镇的组织，发展成把大都市中心的工业巨头包括在内。

自然，大团体常常划分成小团体。在工厂企业中，车间和科室既是工作的小单位，也是重要的社会小团体。在农村、企业公司和官僚机构中，同龄人有一种特殊的团结意识。政党和官僚通常分成针锋相对、你争我夺的派系。大学生生活以各种“圈子”和按兴趣结成的团体为中心，既有形形色色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如摄影

① 常青藤联盟：指美国东部八所历史最悠久的名牌大学的组织，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宾州、康奈尔等。——译者

② 扶轮社：又译“扶轮国际”，是一个国际性的企业界人士的服务性组织，始创于1905年。——译者

这样的业余爱好和学术性较强的组织，比如英语俱乐部，也有政治活动组织。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们所选择加入的团体中建立起他们的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常常组成阵线分明的排他性的俱乐部式的小团体，拥有各自的出版物，彼此很少交流。

135

处于社会边缘的那些人没有资格加入上述各种团体，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新宗教往往填补了这一空缺。正如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考察的，总的来说，宗教在日本的集体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没有美国人估计的那么大。然而，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间，一些组织严密的新宗教崛起了。这些新宗教或许是对快速变化时代动荡不安状态的一种反应，它们无疑给那些否则就没有集体归属的人一种集体身分感。在战后的日本，这类新宗教的典型是创价学会，它拥有大约 600 万成员，其中许多人是小企业的临时工或者没有过硬资格加入工作团体和其他组织良好的集团的人。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创价学会不是由大的信徒团，而是由聚集在一起的小团体构成的。

* * *

集体意识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普遍影响。日本人喜欢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如学校或公司的田径赛或者团体旅行。男女大学生常常结伴同行，一起远足、滑雪或进行其他活动。因此，一对一的聚会相对减少了。下班后男性习惯在回家的路上成群地到酒吧喝点酒，轻松轻松。日本聚会的特色是集体共饮和集体娱乐，而不是像西方宴会和鸡尾酒会上，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式的私下谈话。日本人的集体行为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们所酷爱的观光旅行中。集体超越个人，由学校的班级、工作的同事以及乡村组织或妇女团体组成，每个团体由一个扛着小旗的向导或女导游带队。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兴旺发达，日本观光团成为海外举目可见的景观。

实际上，由于近年来许多日本农业协会的观光团到东南亚旅游，据说当地商人见到所有过往的日本旅游者都大声叫喊“農協様(Nokyosan)”，即“农协先生”。

有人认为，日本人具有酷爱成群结队的天性。成群结队是世界上举目可见的普遍现象，从外表观察一个社会时尤为突出。但是，成群结队的现象在日本确实比在其他许多地方更引人注目。日本人向来对时尚和风格非常敏感。战后的日本人不断用“booms”(景气)和“moods”(心境)这样的英文流行单词来描述他们自己。[136] 有一个刻薄的评论家把日本人比作一群小鱼，他们秩序井然地沿着一个方向游进，直到有块石头掉入水中打乱了这支队伍，使之突然间调头向反方向游动，但队伍依然是秩序井然的。

强调集体的意识影响了日本社会全部人际关系的风格。一名团体选手显然比一个独唱明星更受欣赏，集体精神比个人雄心更受欢迎。美国人想方设法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首创性，日本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正如日本古谚语所说，树大招风，人高惹祸。在美国人看来不过是粗犷、刚强但仍不失为正常的个性，在日本人眼中却成了神经质。倍受称颂的美德是互相协作、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而不是个人奋斗、刚强不屈、固执己见。

日本人认为最重要的美德是和谐。他们不是通过精辟分析对立观点、作出明确的决定(不管是个人作出的，还是大多数赞同的)达到一致，而是想方设法通过微妙的、近乎直觉的相互了解过程来取得和谐。他们认为，决策不能留给个人去作出，而要通过协商或委员会的工作来决定。一致是目标，开会的意义在于达成一个皆大欢喜的普遍性协定。不管颁布者的权威如何，个人的命令都会招致不满，甚至连接近多数投票通过的决策也会使日本人感到不快。

为了使他们的团体制度成功地运转，日本人认为应该明智地避免公开对抗。他们并不明确地划分各种立场，也不分析和澄清

其差别。相反，每个讨论会的参加者都谨小慎微，在他看出别人将出现的反应以前绝不亮出自己的观点。很多观点是用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方式提出来的，因此任何尖锐的冲突尚未出现就已得到避免了。日语中甚至有"腹艺"(Haragei)一词用以描述这种心灵的交融，或者至少是心照不宣的无语言的交流。他们绝对不相信语言技巧，认为由于人们常常言不由衷，语言只能说明表面现象，而无法表达需要通过推心置腹和非语言手段沟通的内心感情。

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单一性的社会，这种非语言交流形式是比较容易发展的。但在南亚和西亚国家以及西方世界，非语言交流就寸步难行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化有着高度的多样性，所以 137 语言技巧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受到高度重视。对于美国人来说，日本人的谈判方式使人不得要领，甚至令人恼火；与此相反，对于日本人来说，美国人的谈判方式则是生硬的，咄咄逼人的。一位美国商人为了使买卖成交，可能会开门见山地将情况和盘托出，日本人则对这种开诚布公的开场白感到吃惊，进而怀疑美国人实际上是别有用心。美国人反过来则感到日本人谨小慎微、拐弯抹角，不仅没有坦诚相见，而且还有些虚伪狡诈。

为了避免冲突并维护集体的团结，日本人广泛运用中间调停的办法。在遇到敏感问题时，调停人先摸清双方的观点，找到症结所在，然后加以解决或中止谈判，以便避免公开对抗或造成任何一方丢面子的危险。在婚姻中媒人尤其普遍，这避免了其他地方结 138 婚过程中屡见不鲜的伤害荣誉和感情的尴尬局面。

日本人逐步养成的集体技巧和品德，塑造了一种至少表面上是平和、和蔼、宽容和温顺的性格。即使内心极不愿意，他们也不直截了当地说"不"，这使他国人觉得他们有点虚伪造作。然而，在他们看来，西方人那种坦率和外露的性格有些粗鲁，令人难于捉摸，并且显得不成熟。在西方，人们认为不可捉摸是因为一个人的

性格有趣活泼，但在日本，这种性格却是众口皆非的。他们的社会的确是在比较稳固的轨道上运行着的，至少在表面上是比较平静而安定的。除了工人游行和政治示威以外，大吵大闹是极其罕见的（欢乐的团体活动除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怒喝的婆娘、大声嚷嚷的青年、骂街的泼妇并不少见，但这种人在日本寥寥无几。

日本人非常反对感情流露，不管是愤怒还是欢乐，虽然像其他规则一样，这一条也有例外，他们能够容忍在酩酊大醉时肆无忌惮地流露感情。实际上，日本人是一个感情深沉的民族，他们尽可能地严密隐藏自己的感情。无论喜怒哀乐，他们都尽量对人笑脸相迎。在公共场合，除非对小孩，他们不用拥抱依偎来表达钟爱之情。"接吻"传统上被看成与性行为有关，除了此种情况，他们甚至不用接吻来表达感情，因此，接吻在日本是极其罕见的。在一个甚至连母亲也不亲吻成年女儿的国度里，西方和中东那种礼仪化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的拥抱和接吻，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所有这些特性是否确实都是由于他们的集团倾向造成的，还难于下定论。也许这些特性和强烈的集体意识一样，基本上是长期以来稠密的人口生活在狭小的空间的产物。这更可能是由于生存空间狭窄并且相对简陋，因为如果人们想要将生存空间维持在可以忍受的水平，就需要自制并考虑到别人。在这种环境中发展相互协作和避免冲突的技巧势必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减少个人的幻想和特性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不管渊源如何，日本人无疑比139大部分西方人更富于集体倾向性，他们在相互协作的集体生活中已经形成高超的技巧。

集体成员的身分使日本人受益匪浅，这也应是没有多少疑问的。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显然已经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个性。而且，在不习惯于他们平静的人际关系和一模一样的黑头发褐眼珠的人看来，他们仿佛是千篇一律、整

齐划一的机器人似的。但是，正如我们还要看到的，他们拥有其他保持个性的办法，并通过收敛锋芒、含而不露，专心致志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许多事业。

日本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了公开冲突和诉讼所造成的许多损失和无谓的摩擦，而这些是美国人所热衷的。他们还建立了对于小团体和整个国家都是非常珍贵的团结。日本企业的成功极为依赖这种团结，而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19世纪中叶，日本面临着占压倒优势的西方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这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出于个人目的而与外国人合作，去反对日本民族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日本曾经经历过的危机和灾难，但它们的领导人却以牺牲国民的利益为代价，在国外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样干过。无论是合法获得的，还是非法掠取的利润，都没有被隐藏到国外安全的地方，也没有被挥霍在摆阔气的浪费中。这些金钱被重新投资于日本或其他地区的有益的民族事业中。事实证明，日本人强烈的集体意识既使个人欢欣鼓舞，又加强了所有的团体，包括整个国家。

第十四章　相对主义

14

在一个自视为由独立平等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中，任何组织原则必然都是普遍性的，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是非标准，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法律上的，都必须是明确不变的，而不管个人的地位如何。西方人的确是这样看待自己的。这可以追溯到基督教重视个人灵魂的思想，虽然长期以来，例如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普遍适用的原则有名无实，屡遭破坏而未能实行。在一个人们首先把

自己视为集体中的一员的社会中，集体内部以及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凌驾于普遍性原则之上，这是理所当然的。换言之，伦理标准更多地是相对的和可变的，而不是普遍性的。

集体取向往往压抑个人的自我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遍性原则、集体取向、个人的自我表达，这三者是所有社会共有的。但是，日本人不同于其他现代民族，他们更公开地承认三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并且比大多数民族更鲜明地服从集体团结的方向。他们承认需要承认普遍性原则，称之为“建前”(Tatemae)，但同时也认可“本音”(Honne)，即个人的内心动机。他们并没有用明确的词汇将普遍性原则与适应特定团体的关系和行为截然分开，但他们能够理解其间的区别。因为他们处在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所以更容易适应这种状态，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比较少。西方人则企图将普遍性原则与集体意识需要和个人私利揉合成一个理性的整体，因此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比较多。

141 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这种差别不能截然划分及过分强调，因为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类型上的不同。在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宗教佛教强调根据普遍性原则普渡众生，其方式与西方的基督教非常相似。此外，在近现代时期，日本与西方一样日益重视个人及其权利，根据普遍性原则看待事物的倾向也在不断加强。但是，日本与西方之间无疑仍然存在着深刻的根本性差别，日本人比较重视特殊关系和相对性的判断。不仅直到19世纪的整个封建社会组织强烈地存在着这种倾向，而且中国的思想影响也有这种倾向。

中国人清楚地认识到普遍性原则，但将其与强烈的特殊性观念揉合在一起。中国的五伦原则全部是特定的关系，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准则。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最强调的美德是忠、孝、仁或爱。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仁爱并不是

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是根据特定关系的性格分成等级的。中国没有爱邻如己的思想，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陌生人，被认为是极不成体统的。伦理道德是宇宙中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而宇宙的中心是具有各种特殊关系的人类社会本身。在个人与全然不同而又能对一切人运用明确不变法则的全能的上帝之间，没有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

饶有趣味的是，东亚人和西方人一样运用一种基本上是二元论的观点看世界，但他们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别。在西方，区分是在善与恶之间，两者自始至终进行着生死搏斗。在东亚，阴与阳的划分表现在昼夜、男女、明暗，即相互交替和互为平衡的互补性力量之间，没有严格的善恶之分，倒不如说是一种和谐感和力量的均衡。

在当代日本社会仍然弥漫着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日本封建社会的特殊气息。但是，这只是残迹，而不是与西方严格的法律标准和普遍性伦理原则相对立的严密的思想体系。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许多日本人也具有基本上按照普遍性原则定义的、并且非常明确的是非观念。他们的法律准则与美国的一样，也是普遍性的。1973年，法庭推翻了杀父者要比其他杀人犯受到更重判决的观念——这是一个与重孝思想一致的旧观念——强调要根据具体情况量刑定罪。日本人尊重他们现行宪法中所规定的个人权利，仿佛西方人遵守"十诫"一样。但是，日本整个社会的运行格调和给人的感觉，常常与我们的社会大不相同。

142

有些观察家认为，日本的特点在于它的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不是西方式的"罪感文化"，即日本人认为，受到社会裁判的耻辱是一种比在上帝面前"有罪"更强大的制约力量。这种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不能将其推向极端。在一般人的情感中，"耻"和"罪"很容易混淆起来。例如，许多西方人不太害怕犯罪行为本身，

但担心被邻里发现或受法律惩罚。日本人则因为害怕辜负众望而在家庭和社会面前蒙受耻辱，从而形成了一种有罪的心理。“耻”和“罪”的最终效果并无截然不同之处。总的来说，日本人比西方人较少用抽象的伦理道德原则进行思考，他们更多地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进行思维。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懦弱，甚至缺乏原则性。而在日本人眼中，西方人粗暴、刚愎自用，没有人情味。

* * *

日本人与西方人的这种差别也许不是正规教育的结果。因为在日本和在西方一样，教育也是关于善恶、是非的说教。这种差别更多地可能是不同的儿童培养方法造成的。我们知道，日本人的家庭在结构上与美国人的家庭极其相似，但其内部关系却大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的心理学家提出一系列推测，认为严厉的如厕训练①塑造了当时人们所看到的日本人的个性。不幸的是这些理论与如厕训练的事实相矛盾，并且是一种对日本人性格的极端的偏见。但是，儿童培养的其他做法确实意义深远。

日本的婴儿和幼儿颇受娇宠。他们几乎与母亲形影不离，而且实际上从未孤单过。这与美国人抚养儿童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总是严格安排儿童的起居和饮食。婴儿一出生就自己独睡，并且生活在与父母分开的单独房间里。美国人有时还把儿童交给不相识的育婴人照料，父母至多只是偶尔逗逗孩子，但极少抱孩子。日本婴儿的哺乳期相当长，喂养也随心所欲，并且经常得到母亲的爱抚。母亲出门时经常将婴儿背在背上，这在过去几乎是普遍的作法。孩子一直到相当大了，还经常与父母同睡。即使长大成人，日本人也总是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而不是分开到个人的

144

① 如厕训练：控制儿童大、小便习惯的训练。——译者

独屋去睡。日本人不是通过一般化的训斥和惩罚训导儿童，而是通过亲切的关怀和父母的榜样教育儿童。总之，日本的儿童被视为婴儿，而不是被当作将来要成为小大人的小孩看待。这种教育法的结果就是出现在西方不常见的对人尤其是母亲某种程度的依赖，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习惯于沐浴在其他人的爱抚中的儿童和成年人。在日语中，这种心态被称作"甘え(amae)"，它是动词"甘える(amaeru)"的名词形式。这个词与表示"甜"的日文词"甘"词根相同，意为"撒娇"。起初是在生理和心理上依赖母亲以求得欢悦，后来演变成在心理上依赖集体的温暖和赞许以获得满足。儿童期待得到母亲的娇宠，但也接受母亲的权威。这种态度后来演变成为一方面认可周围社会环境的权威，一方面又需要和依赖广泛的社会赞许。按照这种方式，日本儿童很容易从孩提时代的随心所欲过渡到长大成人后接受家长和学校的严格管制，进而默许所属团体和整个社会的约束。对于儿童来说，父母的反对加上"人们会笑话你"这样的告诫，会成为一种威慑性的压力。以后，集体的规章也具有同等效力。在传统的农村里，"村八分"[1](mura hachibun，意为断绝往来)是最严厉的制裁。在古代，从朝廷流放到边远的海岛和地区是最可怕的惩罚。

"甘え"很容易与起源于中国哲学而在日本封建社会中称为"恩"(on)的概念混淆起来。实际上，"恩"意味着统治者、封建领主和家长赐予的仁爱或恩惠，但在大多数场合已被反过来使用，表示受"恩"者对赐"恩"者的无限感激和义务。日本传统伦理道德的正式诠释正是这样强调"恩"的。近代以前时期的"恩"和近现代时期的"甘え"(amae)构成了日本人重视集体甚于个人、接受合法

145

[1] 村八分：江户时代以后农村风俗之一。全体村民与违背村规民约的人断绝除安葬死人外的一切来往，以示制裁。——译者

的权威、强调特殊性关系而不是普遍性关系的思想基础。

* * *

日本人思想中普遍的相对主义表现在现代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日本的教育也是说教式的，但日本人的有罪感肯定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是非界线也不像西方人那样明确。充满罪恶的生活天地显然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事物只要不以其他方式造成危害就为人们所容许。举足轻重的观念是节制，而不是禁止。类似"十诫"的清规戒律也不存在。日本人一直容许同性恋，这种行为在中世纪的封建武士和佛教僧侣中是相当公开的。虽然日本人生性多疑，并且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兴趣盎然，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那种强烈地将性与罪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性有多大的合理性。

除了一些思想渊源于19世纪的清教徒的基督教徒以外，日本没有人反对饮酒乃至酗酒，只要他们不越轨。由于这种宽容的态度，日本人很喜欢喝酒，但喝不上几杯就醉了。日本人一喝酒就上脸，这是由于体格上的原因造成的——据说是缺少一种酶，也许是食物中的脂肪含量少——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非常容忍醉酒的事实。人们视醉汉如儿童，除酒醉后不许开车外，几乎容忍他的一切行为。意味深长的是，酒精中毒在日本一直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激烈而绝对的言辞充斥当代日本的政治生活，但是，总的来说，日本人在判断事物时往往还是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在西方人感到义愤填膺，觉得需要口诛笔伐或予以惩处的场合，日本人可能更多地强调客观，对歹徒表示怜悯。20世纪30年代初期刺杀政治领导人的青年军官以及60年代捣毁校园的激进大学生，都得到大部分公众的原谅，原因是他们年轻，动机"单纯"。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日本的法律也是比较宽大的。在封建制度产生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甚至没有死刑。这在那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值得

注意的现象。现在，人们想方设法通过妥协和调解解决纠纷，而不是作出对单方面有利的黑白分明的法律裁决。在法律判决中，法庭认为被告的悔过态度和原始犯罪动机一样重要，只要老实认罪就能得到异常宽大的判决。

重视特殊关系而不是普遍性原则，自然造成许多特殊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产生一些明确的道德准则。伦理道德与彬彬有礼和举止优雅融为一体，"浑金璞玉"并不为人们所尊敬。相反，精英人物应该能够八面玲珑、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关系，以此表现他的价值。必须谨慎遵守的规则成千上万，不胜枚举。日本人即使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彬彬有礼的人，也是最谨小慎微的人。

在近代以前，行为规则尤其多样而复杂，各个阶层及其下属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有详尽的规定，并且必须严格恪守。在当代的大众社会，各种规则已经大大地简单化和一般化了。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除最亲密的关系外，日本人在各种关系中仍然极其拘泥礼节，甚至在日本的家庭成员之间也要遵守在美国人看来极不自然的礼节。深鞠躬是最常见的一种礼节，鞠躬的深度和时间的长短是根据相应的地位和双方的关系划分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日本人这种彬彬有礼的最令人发笑的外在表现。在许多场合比如正式拜访，一生重要的日子，新年和中元节等，都要送礼，这已经成为一种精心编制的繁缛复杂、极其琐碎的应酬艺术。日语中有没完没了的敬语，人们在各种场合必须小心而恰到好处地使用敬语。谦让语用于自己或属于自己的一方，郑重语和尊敬语用于地位较高的人或关系较远的人。在日语中，各个层次的敬语常常造成人称代词的省略 这给那些学说日语的外国人带来很大的混乱和麻烦。然而，老一辈日本人还总是不断地抱怨青年人正在失去他们的语言技巧。

重视繁缛的行为规范的结果之一是日本人往往感到顾虑不

安。他们总是担心自己会因干不好某件事情而遭到别人的批评和讥笑。日本人在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时尤其如此，因为外国人的许多习俗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每个人似乎总是为别人怎样看待自己而忧心忡忡。他们在许多私人交往中常常羞愧难当，甚至达到痛苦的程度，并且受到"遠慮"(enryo)即"克制"、"压抑"的束缚。最常见的礼貌用语是Goenryonaku(御遠慮なく)"请别客气"，但效果甚微。当然，这种顾虑不安使日本人在与其他人接触时总是惴惴不安，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年轻女性在说话时总是咯咯笑声，而男人则发出一种外国人有时形容为"嘘"的嘶嘶的声音。许多日本人，至少是老一辈日本人，只有在与亲朋好友来往时才悠闲自然，因此，他们对熟悉的团体倍感亲切。

由于上述各种原因，日本人轻易不结交新朋友。在他们看来，形同路人比成为朋友更轻松自在。总的来说，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随便交往，在初次见面时总是拘泥礼节和形式。交谈时长时间的沉默令人感到窒息，至少对于西方的参加者来说是这样的。日本人对语言交流的价值评价不高，他们对于沉默几乎已经习以为常而不以为意了。他们轻易不交结朋友，但一旦成为朋友，友谊就很牢固地保持下去，这令社交随便的西方人惊诧不已。日本人一般在已形成的圈子里进行交流，毫不含糊地将其他一切人划入"外人"的范畴。这无疑削弱了日本人的公共精神，并使他们较少随便卷入其他事务。这种倾向在西方的城市社会也日益增长，但在日本社会中似乎更为强烈。

重视特殊关系甚于抽象原则的伦理道德体系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容易失去明确的指导。在面对新事物的时候，日本人比自命不凡地相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更无所适从和手足无措。对于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即使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领域不能将相对的传统伦理

道德成功地应用于现代条件。例如，上下火车时，平日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的日本人你推我挤，成了争先恐后、你推我攘的野蛮人。

在战争时期，任何国家的士兵都会发现难于将和平时代的伦理道德应用于新环境，他们可能以一种在国内不会得到宽容的方式在国外行事。对于重视特殊性的日本人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尤其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队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无疑与日本人生活中的文雅色彩和井然秩序有天壤之别。当然，俘虏问题则当别论，它的处理还受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日本士兵被深深地灌输了投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耻辱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对俘虏的蔑视和虐待不过是自己成为俘虏时将会遭到的命运而已。在特殊环境中丧失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他们只根据不足为凭的谣言就成批地屠杀朝鲜人。日本人发生丧失伦理准则的事件的可能性比西方民族更大。另一方面，像原则性较强的德国人灭绝性地屠杀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这种精心策划的暴行，在日本发生的可能性要比西方小。但是，这种划分法不能划得太明确。17世纪的日本人惨无人道地灭绝日本的基督教徒，而美国人在过去曾杀尽整个印第安部落，不久以前还在越南整村整村地杀人。 148

第十五章　等级制度 149

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虽然不是全部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日本人非常重视等级制度。在美国，个人的权限很明确，在日本人看来几乎达到独裁的地步，但尽管如此，美国人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或至少有佯装平等的思想——“直呼我的名字吧！”日本由于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同时又是一个重视特殊关系的

社会，所以日本人认为不同的等级和地位是天经地义、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他们个人之间及其所属团体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构筑在等级差别观念的基础上的。

有些集团的确是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的，如企业公司或政府机关中同龄男人组成的团体，或者妇女中的老校友结成的团体。但是，大部分团体显然是按照传统的家族模式，由领导人和追随者构成的。即使在等级秩序不明确的领域，如教师和学生、公司总裁和普通职员之间也常常通过官员选举和论资排辈形成等级结构。

日本人重视等级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悠久的权力世袭制度和贵族统治。阶级划分、权力世袭和贵族特权构成了所有近代以前日本历史的特征。天皇万世一系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公元 5 世纪起，天皇就一直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且，直到不久以前他至少在理论上还是一切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7 世纪和 8 世纪，150 日本人借鉴了中国的官僚政治制度，但没有接受中国的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做法，而是沿用固有的根据门第出身决定一切等级和职位的观念。因此，整个封建社会自始至终依赖世袭的权力。到了德川时代，武士阶级和其他阶级间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武士又划分成许多等级，基本上根据各自的资格任命职务。在武士阶级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因为按照世袭资格可以担任高官要职的人太多，所以采取择优录用的方法，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高级职务。后来这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凡是担任比其出身资格更重要职务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都给予额外的薪金，甚至可以不断晋升。但是，总的来说，德川时代两个半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最彻底的世袭制度。

即使封建时代的艺术也要符合世袭制的模式。所有艺术技巧都被视为祖传的秘密财产，只能父子相传。绘画流派和戏剧流派也是按照这种世袭原则组织起来的，尽管亲如父子的师徒关系和

开明的继承制度实际上意味着艺术技巧经常传授给才华横溢的弟子。令人惊奇的是，在传统艺术中世袭的权威仍然根深蒂固。例如，茶道和花道是按照严格的家族模式组成组织严密的流派的，其最高权威仍然是世袭的。

由于日本不久以前还存在这种强烈的阶级划分和权力世袭的背景，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仍然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区分。实际上，外国人经常将日本人继续强调等级制度理解为阶级制度的组成部分，但这是大错特错的看法。日本人认为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身分地位举足轻重。但是，阶级意识和实际的阶级差别极其淡薄而微弱。在许多基本方面，当代日本社会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实际上比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还要平等。

德川时代末期，人们对这种僵化的世袭制度已经相当不满了，但直到明治时代才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而真正地与这种模式决裂，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废除了武士阶级内部以及武士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法律差别。人口普查记录中的武士栏目已经变成只有历史意义的分类了。经历了19世纪巨大变革的武士，在观念和荣誉上 151 仍然保持着与其他日本人的差别，而且日本社会的大部分上层人物仍然来自由旧武士阶级组成的6％的人口。据估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层人物有一半出身于武士，甚至到60年代还有1/5的精英是武士出身。但是，在明治时代大部分武士因未能成功地经受经济转变而沦为平民。他们也许比西方的封建阶级消失得更快，因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武士已失去了他们对耕地的直接控制权。与西方不同，日本进入近现代时期时没有保留封建地产，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农民就成为土地的完全的无可争议的所有者。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武士与平民的差别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最后武士阶级完全消失了。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武士或非

武士出身之间的差别已经无关紧要了。有些家族偶尔也会提及他们的高贵的祖先，但并不像所谓“五月花号”[①]的乘客或南北战争以前的南部种植园主的后裔那样总是以祖先为荣。日本青年对这类事情兴趣索然，英国青年却很关心他们血管中流着的到底是克尔特人、撒克逊人、丹麦人，还是诺曼人的血。

近现代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个阶级差别是华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1884年，旧的京都朝廷公卿、德川时代的封建领主和一些新兴领导人组成了现代化的贵族，其目的在于出任国会贵族院议员。60年来这部分贵族得到很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迫于战争的压力，它才采取比较平等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当局指令废除华族，这个贵族集团几乎毫无抵抗就寿终正寝了。战后，甚至皇族的各个分支也变成了平民。老一辈人，尤其是那些具有历史观念的人，可能仍然关心贵族的门第出身。封建领主的后裔也发现，在祖先曾经统治过的故里，他的名字就是竞选的一项重要法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当代日本的所有旧贵族与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旧贵族不同，他们只被称作“先生”或“夫人”——除在一些外国人之中外，大部分日本人对旧贵族毫无兴趣，以为不屑一提。

162 即使没有旧贵族和法定的阶级界线，阶级差别也能够存在。但是相对来说，任何类型的阶级差别意识在日本都比较淡薄。实际上，日本人强调的集体思想是与阶级意识对立的。日本的团体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同，一般不是由相同地位和职业的人组成的。如上所述，两个重要的例外是“部落民”和不久以前出现的朝鲜人移民，但是，这些人只占日本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此外，团体组织通过强调打乱等级和削弱与由同样职业和地位的人组成的团体的联

① “五月花号”：1620年9月英国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清教徒）驶往北美的第一艘船，于当年11月抵达北美。——译者

系，淡化了西方人所了解的阶级感情。

日本人常常不愿意确定自己的阶级归属。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时，大约90％的人会含糊其辞地选择中产阶级，其中大部分人会说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阶级意识淡薄是现实的反映。在日本，中间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美国大体相同，但两头的情况大相径庭。因为日本的上层富商大贾比美国少得多，下层社会的集团也比美国小得多。最近的一项研究将日本与瑞典、澳大利亚并列为世界上3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工业化民主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人进行的改革耗尽了大部分财富。与美国的同行相比，日本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一般收入不高，持有的公司股票权也比较少。意外的利润，尤其是不动产价值飞涨而产生的利润，创造了一些新财富。但是，在日本苛刻的累进所得税和极高的遗产继承税，使财富的积累和转移受到的限制比在美国多。在等级制度的另一端，高度的单一性文化和相对狭小而整齐划一的地理环境意味着，日本不存在美国那种由下层社会的人所构成的大量种族和地区性团体。部落民和朝鲜人造成了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人沦为无业游民和罪犯。但是，其中大部分是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寡妇及其子女，而且他们也决不是注定要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的。因此，没有必要将其划分成阶级。

日本人相对来说没有阶级差别的另一个标志是没有语言上的阶级差别。语言的地区差别并不难区别出来，尤其是在受到教育较少的人中。根据所受教育的程度，人们的用词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别，但是日本没有英国普遍存在的、甚至在美国有些地方也能听到的带有阶级色彩的口音。 153

1868年时，日本社会远远落后于英国，存在着显著的阶级界线和强烈的权力世袭。但是，日本人只用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就扫荡了这些落后性而遥遥领先于英国。这的确是一项令人惊异的

成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应归因于日本社会的特殊的集团归属意识，但更中肯的解释只能是，这是因为教育而自觉产生的结果。日本人吸取了西方的普及教育思想，至少在理论上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并利用这种制度选择各种人才，担任相应的社会职务。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社会的移动性持续稳定增加，到今天，日本社会的移动性至少已达到与美国或任何西欧国家的同等水平。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更详细地探讨教育的作用，在这里仅指出，由世袭出身到由教育程度决定等级地位的转变，实际上已经完成。日本人在社会上取得各种职位和各自的地位，他们基本上不是靠继承或者阶级和家族背景，而是靠正规的教育成就。大部分显赫的职位要通过严格而平等的资格考试才能获得。

在日本也存在某些旧制度的残迹，但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地区甚至包括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的现象。如果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子女往往因环境和家庭传统的熏陶而在整个学习和考试过程中拥有优势。家庭小企业和家庭农场一般经过继承留传下去。即使大企业，如果是由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刚创立的，也可能移交给子女。松下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以“全声牌”和其他商标（国内使用的商标 National 可能不太合适）生产出口产品，总裁职位传给了一位过门女婿。但是，根据过去同类公司的经验判断，继承性转移不会超过一两代人。医生的儿子往往继承父业，有些艺术活动也仍然沿用世袭原则，一些特殊的个人流派和新宗教也是如此，但仅此而已。在日本，可继承的财产比在美国少得多，因此继承权在日本社会不像在美国社会那样举足轻重，与一些西欧国家相比，就更微不足道了。

* * *

然而，在日本社会中，等级制度仍然是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它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形态和特色。日本社会分成无数的团体，每个

团体又构成许多不同的地位层次。这种纵向式的等级制度在许多机构（如政府官僚机关和企业公司）中是很自然的，但也体现在其他团体中。虽然“村”（现在的“部落”）是由户组成的比较平等的团体，但在早期也有明显的等级，从世代担任村长的农户直到租佃农民。许多现代团体，如农业协同组合或妇女协会，在领导人之下都是相互平等的普通成员，但由于存在着严格的论资排辈，也形成一种等级结构。

在政府官僚机构和大型企业公司中，按年龄结成的团体加强了身分等级制度。因为同一时期加入群体的人组成了一个“阶层”，他们在大部分的事业生涯中同步加薪晋级。人们可以进入各个层次的企业公司或政府机关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是各种职业都存在着一种同步加薪晋级的年龄阶梯。例如，工厂的工人处于较低的工资和地位层次，经理人员则是由受到高等教育并通过竞争性录用考试的合格者担任的，因此位于较高的层次，并有可能一直上升到老板的职位。但是，在每个层次中地位和工资主要是由年龄和工龄决定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根据等级确定人际关系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对于美国人来说，不管年龄和地位如何，都试图做到一视同仁是合乎情理的一样。在实际生活中，日本人的做法也许比美国人要自然得多。老年人和地位较高的人走在前头，其他人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在一切正式场合，人们都按照明确的顺序先后就坐。在日本式的住房里，尊位与大门相对，处于挂字画壁龛的前面，因此门口总是坐满了人。他们或出于疑惑，或出于谦逊，而坚持坐在最谦卑的地方。人们称地位较高而又有学问的人为“先生”（sensei），这是对教师的一般用词。在同龄男性密友和年轻人间互称“君”（kimi） 155
代替“さん（san）”和更正式的“様”（sama）。“さん”和“様”相当于英语的“Mr.（先生）”、“Mrs.（夫人）”和“Miss（小姐）”，可用于其他

一切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已婚还是未婚（日本人从不相互称呼名字，除非是对儿童、家庭的晚辈或自幼相识的密友）。

实际上，最普遍的称呼方式是按照各人的具体职务。在家庭里，除了美国人熟悉的“爸爸”和“奶奶”等以外，还有“姐姐”、“哥哥”等。此外，对关系密切的长者称“叔叔”、“阿姨”，如果年龄相称，也可称“爷爷”、“奶奶”。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往往按其身份直接称呼，如“太太”、“校长先生”、“局长先生”和“社长先生”。除军衔外，与美国相同的用法只有“总统先生”或“大使先生”等少数词，但人们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些词。

美国的长者喜爱装得年轻，公司总裁喜欢与普通职员打成一片。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总想做到行为举止与身分地位相符。从前，不可改变的世袭地位与个人一生的实际地位密切相关。但现在这种观念意味着根据年龄的增加和职务的晋升决定个人的地位。个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地位，其他人则根据他的地位来看待他。一个人如不根据自己的地位行事就会被认为不成体统。任何一方忽视或打破地位次序都会使人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外国人如果企图超越地位界线以示平等，会使日本人感到困窘，尽管他们可以原谅外国人的这种无知。

等级制度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性是日本人经常交换名片的原因之一。用汉字书写的姓名读起来确实相当困难，一张印刷清楚并附有读音的名片有助于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名片上还有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对于将来的联系也不无裨益。但是，交换名片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确一个人的具体职务和所属团体，如富士银行常务董事、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这也有助于确定人际关系的性质以及所应表示的礼貌和尊敬的程度。

156

这种等级制度结构保留着近代以前的社会的某些色彩。人们期待着各等级结构的首脑人物对其下属表现出慈父般的风范，无

微不至地关心他们的个人生活，而这在西方人看来则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例如，政府机关和企业公司的上司常被邀请担任婚姻介绍人。为了报答上级的慈爱，部属要对上级表示尊敬和忠诚。这是旧观念的一种折射反映。上级赐"恩"即仁爱，下级报以"義理"即忠诚和责任。

157

团体内部的等级制度模式是与团体之间的等级制度并行不悖的。日本人喜欢用等级观念进行思维。几乎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但非正式的大学名次排列；毫无疑问，东京大学独占鰲头，京都大学位居第二，然后由上而下地排列下去，直到许多不出名的私立大学，再后面是短期大学。在人们的心目中，企业公司也有相同的名次排列模式，声名显赫的大公司名列前茅，那些小而弱的企业名落榜末。评论一个国家是头等大国还是三等国或五等国，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过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比喻，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却是精确而意味深远的。

* * *

对于西方人来说，严格的等级制度意味着稳定的、近乎独裁的权威，日本的情况却不然。其实，在日本重视等级制度的某些方面纯粹是象征性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天皇的地位。天皇位居日本国家等级制度的顶端，但他只是国家的象征。另一个例子是，日本人为了体面，在组织任何活动时都十分重视知名人士组成的名誉委员会。在这些最高委员会之下是由地位较低、但更活跃的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这种形式在美国也很普遍，但在日本更为流行。等级制度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另一个标志是，任何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不管他的实际作用和权威如何，对他所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一切负有一种责任感。如果发生重大事故，他通常要引咎辞职，即使在西方人看来他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与事件无关。在从前，他对事件作出的反应可能是自杀。

即使对于实际的而不是象征性的领导作用，日本人与美国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日本人所希望的领导人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人，而不是趾高气昂、飞扬跋扈的家伙。领导者的优秀品质表现在他为人热情、受到信任和爱戴，而不在于他目光敏锐、决策果断。美国人理想中的有能力的领导人，在日本可能会招致怀疑和不满。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一致才是规范的领导方式。主管首长通常像是委员会的主席。部属是团体的终身成员，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将来都有可能爬到更高的职务和地位。他们希望参与决策，而不是只接受上级的指令。他们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幕僚和门徒，而不只是走卒。在探讨日本的企业和政府官僚机构时，我将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日本非常重视等级制度，但又相当广泛地实行权力和决策权的分享，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令人惊异的矛盾现象。

最后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的等级制度很少像西方那样因地位差别而导致紧张状况和不满情绪。由于种种原因，这并不令人奇怪。例如，那些职高位尊的人仅仅被看作是在年龄阶梯上捷足先登的年纪较大者，而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爬上高位的。总有一天自己也会飞黄腾达。或者，他们的地位之所以比自己高是因为他们在学习和考试中出类拔萃。而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中，学业的差异更可能被认为是个人能力差别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在日本，领导者一方的权威不是独裁性的，而且又存在着广泛的协商和决策权的分享，因此部属的地位不像在西方那样令人讨厌。集体的密切团结、上级留恋不舍的慈父般关怀、部属的个人忠诚，这些给予人们一种超越地位界线的温馨的亲切感。总之，集体归属感和自我实现感使人们乐于克职尽守，而不管其地位如何。犯上情绪和派系斗争并非不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军官问题几乎导致公开的叛乱，今天人们也抱怨老年人妨碍青

年的升迁。然而，日本人传统的等级制度意识非常和谐地适应了这个基本上平等的现代社会，因此，它仍然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起着有效作用的特点。

第十六章 个人

159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日本社会的集体倾向、相对性伦理和等级结构，否则会使人认为日本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顺从的机器人式的民族，这个民族只知道逆来顺受、遵纪守法、循规蹈矩。这是过去流行于西方的观念。日本的全部历史恰恰与此相矛盾。日本人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能适应快速的有目的变化的民族。他们的艺术表明他们既非常敏感，又富于创造性。他们的文学说明他们是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体。日本人的形象还有另一个侧面，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日本人更多地将个性从属于群体，或至少认为理应如此，但他们以其他方式保持着非常强烈的个性。他们热衷于感情上的自我表现，尽管他们比西方人更善于抑制感情。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至少与西方人一样，有许多个人的抱负和雄心。

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日本，自然也存在着个人的自我表现与社会的一致性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日本社会模式的强烈的一致性和严格性导致普遍的不满情绪，有时甚至造成公开的反抗，在青年人中尤其如此。在日本发动社会暴动，比在组织松散的社会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其结果也可能更为强烈。例如，20世纪30年代青年军官的政治谋杀，60年代末爆炸性的学生运动，70年代赤军派和其他恐怖主义青年帮派的暴行等。当然，必须注意到，即使社会的反叛者也往往是组织严密的小团体的成员，而不是孤立的

行动者或行为古怪的个人。

160 除了公开反叛以外，还有普遍的动荡不安。青年人组成摩托车帮，横冲直撞，发泄不满。还有一些青年，主要是青年女性，组织跳舞群体，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在刺耳的电声音乐伴奏下表演他们的独特舞蹈，以显示自己不墨守成规。星期日下午，东京明治神宫入口外的公园成为这些离经叛道青年乐于光顾的场所。80年代，青少年中违法乱纪的人剧增，由此导致对坏学生进行的身体侵扰，针对教师的暴力行为也时有发生。虽然这些行为与美国校园中的违法行为相比既不激烈，也不频繁，但已深深地震动了成年人。日本青年一般都在寻找摆脱严格的日本社会模式的途径，他们总是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至少应该出国一次，到外部世界呼吸梦想中的更加新鲜的空气。他们直率地对组织严密的教育体制和雇佣制度强加在他们生活中的清规戒律表示不满。实际上，民意调查经常表明，在公开对社会运行方式表示不满方面，日本青年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前面。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只是对常规的集体性反抗，而这种反抗又是与他们对社会大多数方面的心满意足自相矛盾的。

然而，普遍的不满情绪和对变革的执著追求确实构成了当代日本青年的特征，这使老一辈担心青年一代将丧失他们的日本性。这种状况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正如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代沟使不同辈份的人之间的真正交流变得非常困难，不过在日本，表面的社会和谐气氛和对重大事件保持谨慎沉默的观念掩盖了这种状况。大学生在与其同志去捣毁校园前，可以若无其事、心平气和地与父母共进早餐。

虽然人们追求个人的自我表现和摆脱社会约束，但“个人主义”一词在日本始终遭到唾弃。对于日本人来说，“个人主义”意味

着自私自利，而不是个人责任。因此，他们常常避免使用“个人主义”这个词，而采用其他说法。大学生曾经使用“主体性”一词，其含意是在生活中人是积极的主体，而不是消极的客体。另一个流行词是“我家主义”(my-home-ism，意为小家庭主义)，它表达了日本青年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摆脱家族或团体的压力、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心情。当然，在地价如此昂贵的地方，要拥有自己的家谈何容易。 161

尽管日本青年想方设法打破一致性，但在西方人看来，即使颇为自由而爱冲动的当代日本青年，也还是令人惊奇的和谐的遵奉者。美国的激进大学生，后来摇身一变而成为西服革履的公司经理，这种情况在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日本的成年男人流行白衬衫和蓝西服而已。大多数日本人从随心所欲的童年，经过离经叛道的青年，心平气和地跨入循规蹈矩的成年。然而，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保留个性，而且有些人总是拒绝社会的准则，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方式。

* * *

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的不协调者也许包括娱乐世界的每个人，特别是所谓的“水商賣”(mizushobai)①。这个离奇古怪的词指依靠出卖色相、从事各种危险职业的女人，包括卖弄风情的温柔的酒吧女郎以及官方禁止的各种娼妓。有些娱乐区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人的酒吧，包括小型迪斯科舞厅、夜总会和卡拉OK的音乐厅等。比较公开的性行为场所是“情人旅馆”(人们可以成双成对地租一间小屋度过几小时)和所谓“土耳其澡堂子”(由于土耳其的反对，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词了)，类似的场所几乎到处可见。

犯罪集团是另一个不协调者的团体，他们往往组成势力强大

① “水商賣”：招待客人的营业，如酒吧、夜总会、色情场所等。——译者

的帮派，称为地痞（やくざ，yakuza）。地痞① 与“水商賣”有密切的秘密关系，前者以保护为名，对后者进行敲诈，并且从事非法的赌博和高利贷活动。地痞自命为封建时代的同类集团的传奇性后人，并且在服装和举止上模仿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暴徒形象。装腔作势、华而不实的形象已成为电影与电视表演中的一种类型，但地痞实际上与“黑手党”和美国的暴徒大不相同。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武器控制，民间持有的武器寥寥无几，犯罪率也比大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低，而且，地痞在警察执勤时还经常与警察合作。

有一个时期，称为“黑幕”（kuromaku）的政治牵线人通常以地痞帮派为基础，确立他们的影响。这些牵线人（基本上是战前的幸存者）企图通过他们的各种关系、来路不明的金钱、以至地痞心腹暗中的暴力威胁，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但是，这种情况比一般想象的要少。他们对官僚鞭长莫及；政客虽然需要金钱，但依靠的是公众的选票，而公众对这类人深恶痛绝。这类牵线人的存在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但它已经日益褪色，并且将很快消声匿迹。

162

此外，还有一类社会不协调者，他们是居住在城镇破旧地区的人以及贫民窟（最著名的是东京的山谷）的居民。他们是因生活不幸和个人缺陷而不能达到正常生活水平的人。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赤贫。他们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够在社会中找到受人尊敬的位置。但日本不像美国那样存在庞大的萧条城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社会上的不协调者团体都是封建时代受到更严厉束缚的同类集团的残余，因此他们也许反映了日本人标准生活的另一个自然侧面。虽然与其他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同类集团相比，他们人数不

---

① 地痞，日文やくざ，意为黑社会人物，即无赖、地痞、流氓等。——译者

多，影响也不大，但是，近年来他们得到了广泛注意，尤其是得到了西方人的格外关注。这大概是因为西方人惊诧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和大部分日本人的心满意足以及外国人对“日本奇迹”的喝彩，为了使这些成就逊色些而被日本人生活中的灰暗面所吸引吧。

* * *

的确，大多数日本人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但是，即使在这个牢固的外壳之下，他们也绝不只是蚂蚁式的人种。他们顽强地磨练着自己的个性，虽然是按照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许多日本人将自己融进大自然的美与变化中，从而摆脱社会而充实自我。对于他们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挚爱自然。

近几年来，人口的重压和经济的畸形发展，使日本人成为大自然的最恶劣的破坏者之一。但他们仍然热爱自然，尽管这种爱只能以缩微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人喜欢远足和健步旅行、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宽阔的私人庭院和旷野山林。但是，他们精心设计和建成的微型风光庭院却是整个壮观的大自然的缩影。他们喜好描绘自然景色，酷爱盆栽。有些妇女用彩色陶土和砂石，精心堆成盆景和盆石，而更多的女性则热衷于花道。插花是用几枝精心修剪的花枝，巧妙地插配而成，与西方流行的大束花朵形成鲜明的对照。近几年来，这种崇尚小巧风格的艺术，如园艺和花道，对西方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163

整个文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自我表现的天地，在这个领域里至少可以代替别人进行充分的自我表现。本世纪初，文学得到强有力的复苏，寻求自我构成了其特征。许多文学作品关心在西方文化浪潮冲击下保存日本人特性的问题，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寻求个性则是日本文学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日本作者偏爱日本人所谓的“私小说”。在这种小说中，作者对处于大体上对立环境中的个人情感进行极其坦率的反省式的描述。这类作品

往往从局限性较大的个人角度观察社会，因而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社会本身的支离破碎的不全面的图像。但是，它们揭露了变幻莫测、难于捉摸的个人精神生活，而这正是日本读者的兴趣所在。同样的兴趣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作品在日本倍受欢迎。尽管日本人和俄国人的个性和社会很不一样，但俄国人对个人感情与压抑性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对追求自我表现的描述，显然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的心弦。

能成为著名作家的人毕竟不多，但是，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各种创作形式中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方法。他们或者写日记，或者作诗填词。31 个音节的古典短歌和 17 个音节的现代俳句都是非常严格的律诗。这些诗歌形式甚至还要受无数传统的诗词格律的限制。但是，许多日本人仍然从这些诗歌形式中找到了满意的自我表现的方法。诗歌刊物和研究团体很多。每年都要选定主题举行一次全国性的短歌比赛。获胜的短歌在天皇面前吟诵，届时天皇本人也赋诗一首，以示祝贺。

千百万日本人还从传统的舞蹈、音乐和其他艺术形式中寻求 165 自我表现的方法。各种形式的舞蹈都与近代以前的戏剧和艺妓舞蹈有关。这些舞蹈是许多组织良好的训练学校的重点学习科目。每一种舞蹈都有一群热情洋溢、兴趣盎然的爱好者。各种传统音乐也是如此。更多的人会弹奏西洋乐器和西方音乐。铃木小提琴演奏法① 举世闻名，它主张对儿童从两三岁起就集体教授小提琴的演奏法。所有的传统绘画和制瓷技术都有相应的学校传播技术、培养人材。各种西方的艺术形式和传统的茶道、花道等也是如此。在传统上，柔道、空手道以及其他武术也是培养个人技巧的部分。

---

① 亦称铃木技术。指日本现代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铃木镇一首创的幼儿教育法。——译者

每一所训练学校都将参加者组成一个内集团。但是，重要的是现代大部分日本人都有自己的文学、艺术或表演技巧。这不仅是感情上自我表现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自我意识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在美国，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能看到类似日本历史悠久的大规模群众艺术活动的端倪，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人们在过度拥挤而压抑的社会环境中需要自我表现和自我意识的产物。

我们往往瞧不起这类活动，认为这是业余爱好而不以为然。但是，日本人却高度重视这些活动，称之为"趣味"。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有助于陶冶情操，而且，这类活动的重要性一般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增加。日本人以在聚会上表现自己的特长为乐，例如，用"能"乐的形式演唱等。实际上，每个日本人在聚会上轮流表演，而外国参加者则因没有适当的技巧而困窘不堪，只好唱一首已忘掉大半歌词的校园歌曲蒙混过关。在日本，执着追求"趣味"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自尊表现。我记得，在许多场合我不得不狼狈地向与会者解释我没有业余爱好，因为工作就是我的"趣味"。我觉得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生活不健全的人。

日本人珍惜并夸耀自己的"趣味"，即使这种"趣味"仅仅是处于那种地位的人所应有的传统。大企业家认为，作为一个大企业家必须迷恋高尔夫球，并且对让球条件斤斤计较。有一种体育运动色彩较重的"趣味"，是在周末的一天半到距离很远的雪坡上连续滑雪8个小时，以显示不可思议的耐力。这一切在美国人的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些可能也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与美国相比，个人技巧和"趣味"在日本可能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更大的方面。

* * *

166

考察日本人培养个人特长的办法，也能揭示他们是怎样培养自己的个性的。各种技巧尤其是传统技巧，不是通过分析和讲解，

而是通过师徒个人间的示范和模仿的方式传授的。师徒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它符合日本人的整个群体倾向性；但是，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学习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性的。每一个人都应学会、消化一门技巧，直到真正掌握。他不需要从理性上去掌握，只要做到心领神会就行。这使我们联想到原始佛教的观念：人通过觉悟而丧失自我，与宇宙浑成一体。然而，重要的一点是，掌握一门技巧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自制和自律的行为。箭术教练强调控制欲念，即控制感情比眼光敏锐、手法灵巧更重要。掌握一门技巧更多地被看作是培养一个人内在的自我精神，而不是锻炼其外部肌肉。这是一个不仅得到社会赞许、而且颇受鼓励的个人自我发展的重要领域。

当我们的考察从传统艺术进一步转向生活艺术时，我们看到，这种方法同样有用。从理论上说，日本人具有协作精神、相对主义理念和集体倾向，但不是被社会的清规戒律磨掉个性棱角的平庸之辈，而是内心的自制力极强、能支配自己的理性并且具有反社会天性的人。他们不是意志薄弱、唯命是从的人，而是自律自强的人。与西方流行的观念相反，对于日本人来说，顺从社会并不是软弱的象征，而是值得自豪的、千锤百炼的内在力量的体现。

没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重视自律。严格的肉体上的苦行训练，如冬天的冷水浴，在过去和现在都相当盛行。这不是出于西方或印度的那种神秘色彩，而是为了磨练毅力。中世纪以来，坐禅一直很流行，但其动机通常不是原始的超凡出俗的悟道，而是为了培养自制自律的精神。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来有些西方

168 青年也为坐禅所吸引，他们也在不自觉地寻找一种自我控制的新方式。

日本人热衷于自律和磨练毅力。他们认为这是恰当地完成人生职责所不可缺少的。他们追求心平气和的境界，毫无私念地将

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方案融合到迅速有效的行动中去。他们反复的说教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把服从社会和完成个人在世界上的作用看作自然而然的事情，认为这是很难学到的一件本领。从前，他们为了报答父母、封建领主或天皇的"恩"承受了沉重的负担。今天，他们仍然明确地认为达到社会的严格要求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许多日本人看来负担过重，他们既要承担对家庭和群体的责任，又要对整个社会尽义务。这种称为"义务"(gimu)的沉重的责任感已经在青年中造成潜在的不满。但是，这种责任感显然是从近代以前时期延袭下来的。当时，这种职责称为"義理"(giri)。義理有成百上千种表现形式。个人感情即"人情"超越"義理"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人情"是本能的、自发的，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或灾难。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一个流行的主题即是，以非法的爱情为中心表现"人情"与家庭责任和更广泛的社会义务之间的冲突。冲突的解决往往是不幸的情侣双双自杀，至少在文学作品中是这样描写的。

* * *

这里应该谈谈自杀在日本的作用，原因很简单，自杀作为日本社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在日本人和其他人的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传统的自杀方式"剖腹"是武士道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自杀也被看作是摆脱绝境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甚至值得称道的方法，虽然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日本的自杀率并不比西方高。在戏剧和电影中，"剖腹"仍然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主题，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军人)纷纷自杀，即使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自杀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除此以外，最后一桩举世闻名的名副其实的"剖腹"事件是1912年明治天

169 皇驾崩时日俄战争的英雄乃木希典将军及其夫人切腹殉死。1970年，著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轰动一时的"剖腹"更像一出矫揉造作的闹剧，而不是一种出于责任感的行动或正当的政治抗议。这出闹剧虽然令人毛骨悚然，但日本公众对之迷惑不解，甚至嗤之以鼻。虽然在文学作品中许多著名人物以更无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这仅是日本现代文学反省性格的一个脚注，而不是日本社会自杀成风的标志。

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许多自杀事件的原因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同，方式也大体类似。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女性的自杀率与东亚其他国家一样接近男性，这也许反映东亚女性受到更沉重的社会压力。学生的自杀率比较高，这可能反映教育制度对学生的巨大压力。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统计数字已日渐接近日本。更重要的是，现代时期的自杀率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紧张形势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发生大幅度波动的。当代日本的自杀率接近美国，低于一些西欧国家。然而，自杀事件仍把日本人弄得神魂颠倒，并且在新闻报纸和文学作品中大肆渲染，就像美国人被谋杀事件所吸引一样。

* * *

让我们回到自律和抱负这个主题上来吧。必须承认，在一个社会中，反复不断的说教并不一定能造成普遍的社会特性，实际上这种说教有时仿佛镜子中的形象那样，与本来的面目相距甚远。但是，就日本人的情况而言，两者看来是密不可分的。总的来说，日本人确实明显地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小野田中尉孤身一人在菲律宾的一个丛林小岛上与美国战斗达25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最高统帅部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人民坚强的意志力量战胜在自然资源方面占有优势的美国（这是众所周知的）绰绰有余。日本人确信，只要有充分的毅力并

努力奋斗，任何障碍都可以克服。老一辈日本人常常感到，在这个更加富裕、更加舒适的时代，这些特征正在逐渐消失。这个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总的来说，在羞答腼腆和协作精神的表象下面，日本人的确仍然保持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坚强性格。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重视勤奋工作、个人奋斗和经济成就，这些在西方被自豪地描述为"新教伦理"的东西更明显地体现在日本人身上，尽管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基督教，更没有新教。其实，这些特征是所有东亚民族，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还有日本人共有的显著特征，他们从古代中国及其儒教思想获得了他们的深层文化。这种对待工作的道德观念无疑与这些民族共有的教育宗旨以及大部分地区的寒冷气候有关，而日本人的集体倾向则又加强了这种观念。一个优秀的集体协作者同时又是一个出色的工作者。在集体工作中，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一定是非常愉快的，即使到了近现代时期，工匠引以为荣的个体创作被机械生产代替后也是如此。日本人普遍认为"勤勉性"是他们最突出的美德之一。每一个日本人都投身于他所工作的群体，并热情地甚至兴高采烈地参加其活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日本人工作道德消失的程度仍然远远低于自诩拥有新教遗产的国家。

170

一个由自制自律而意志坚强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会产生一种动力，这可以解释日本人所表现的奋斗精神和雄心壮志。在和谐一致的表象下常常蕴藏着巨大的动力。近代以前时期日本人极其重视荣誉和面子，这种观念至今仍萦绕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明治时代的一句格言是"出世"，意思是要有雄心壮志，取得个人成功。1876年，马萨诸塞农学院（后来的马萨诸塞大学）院长威廉S.克拉克[1]在日本短暂的逗留期间创建了一所农业学校（即后来的北海

[1] 美国科学家、教育家（1826—1886），1876年曾应聘到日本。——译者

道大学)。许多人仍然记得他对学生的临别赠言:“孩子们,要有雄心壮志。”依赖母亲的儿童会身不由己地受到母亲对他的期望的促进,人们从日本母亲的语言中听到了传统的“犹太人母亲”的口吻。

总之,当代日本人像任何西方人一样,受到个人抱负和自我奋斗的刺激。在一个集体倾向性的社会中看到这个特性,可能会使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但是,日本人实际上是野心勃勃的,甚至常常达到非常不切实际的程度。这类特性很难衡量,但是美籍日本人的经历提供了一些可供比较的材料。虽然日裔美国人受到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妨碍,并且长期遭到严厉的偏见和歧视,但他们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就脱颖而出,在美国的所有民族集团中,包括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和犹太人,他们在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这一切可以用上述日本人保留下来的特性加以说明。

171

如果说日本人的特性与西方的新教伦理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么这也许在于下列事实,即新教伦理产生于仍然处于近期封建状况下划分成阶级和等级的西方,而德川时代的日本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西方,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获得封建政治权力,因此把取得经济成就本身当作奋斗的目标。在日本,商人和农民也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而形成了一种学说,把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是可以与武士阶级的政治贡献相媲美的为社会服务的手段。这种观念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农民和商人在明治时代轻而易举地摇身一变而成为各类领导人,武士也能从容不迫地把经营企业当成值得为之奋斗的正当事业。在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各个职能阶级之间障碍较少,这意味着经济上的成功往往导致企图攫取政治权力,因此他们不把经济成就本身作为目的。如果这个分析不错的话,那么,形成这种新教伦理的决定因素是从封建社会遗

留下来的阶级划分，而不是新教。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集体社会中，日本人的个人抱负和自我奋斗并不是异常现象，反而是这个集团社会中的一种古老而基本的组成部分。

* * *

西方人往往看不到日本人个人及其社会的精髓，而对其融合固有事物与外来事物的能力表示惊异，从而怀疑日本人是一个难于捉摸的民族，患有东西方的精神分裂症。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怀有同样的疑惑。过去，日本人无疑有过许多这种二分法，但在当今日本人看来，已经不这么做了，尽管在观察者的心目中当代日本人仍然还有这种截然的划分法。在任何迅速变化的社会，旧传统与新技术、新条件造成的新特征之间存在着奇特的、有时甚至不协调的差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日本比其他所有国家走得更快、更远。因此特别明显地出现了这种差异。但是，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经历不是类型上的差别，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172

日本人并没有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实现了西方化。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但信奉耶稣的日本人还不到人口的2%。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方面，其中大部分在西方也是刚刚发明的现代技术的产物，如铁路、工厂、普及教育、报纸、电视和大众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正如在西方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在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产生了类似的差别和制约因素。

西方的铁路比日本早40年，电视早几年。但这并未使这些现代生活的特色只属于西方，而不属于日本。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样也拥有这一切。在西方，东亚的茶、中东的咖啡、非洲的音乐以及日本的和服式长袍、寿司饮食、空手道、插花艺术等的传入并没有造成心灵创伤或精神分裂症。那么，西方的饮食、服装或音乐为什么会对日本人造成这种效果呢？今天，勃拉姆斯和贝多芬既属于

德国人、美国人，也属于日本人。总是用英语演唱的《祝你生日快乐》和总是用日语演唱的《美好的往日》都是日本民间文化的牢固而自然的组成部分，正如这两支歌是美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样。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莎士比亚、歌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是文学的一部分，并且与《源氏物语》一样广为流传、众所周知。对于日本人来说，历史既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过去年代，也包括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国的伟大王朝。

只有老年妇女和一些富裕女性才经常穿和服。大多数女性只是在良宵佳节或非常重大的场合，如大学毕业典礼才着和服，假如他们有钱的话。在举行传统的神道教婚礼时穿日本式新婚服装与举行民间传统的基督教婚礼（这种风俗在非基督教徒中也很流行）时穿西方白色礼服，日本人并不觉得两者有什么不协调。新郎几乎都穿西式服装，比较富裕的人尤其爱穿燕尾服，这种服装多见于正式场合，称作“晨礼服”。在公共场合几乎没有男人穿传统服装，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基本上也没有穿过。他们认为，穿传统的日本服装就像美国人穿新教徒祖先的服装那样贻笑四方。看来，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只是在无知的西方人心目中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日本人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种感情。当然，有些自我意识强烈的知识分子也许是例外。

174

日本人生活在一个虽然变化迅速，但在他们看来秩序井然、团结紧凑的社会中。他们的单一性和严格恪守行为模式的作风令人刮目相看。尽管变化多端，但他们仍保留着彻底的别具一格的日本色彩。这个社会几乎是单调而千篇一律的，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比西方国家要稳定，尽管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时在时间上比日本更从容，遇到的压力也少。日本社会不存在悬殊的贫富差别。在日本，实际上没有庞大的可继承财产，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也为数不多。社会的重心是称为“领薪水的人”——这词比我们自己的

“白领工人”意思更精确——的庞大阶层。在他们之上只有少数高级经理人员，在他们之下是追求并且通常接近领薪水的人的生活水平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

日本给予人们的表面印象是它具备了一个幸福社会的全部外貌。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这样的评价似乎也是可以的。儿童总是显得精神饱满，神采飞扬；所有的人们看来都神采奕奕、充满信心。男人的退休年龄较低，已婚妇女更是被限制在家中，因此与美国相比，日本城市拥挤的人群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人，给人以一种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印象。年龄问题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日本人显然对自己的个人和民族都非常满意。就在几十年以前他们还总是痛心疾首，缺乏自信，害怕西方人瞧不起他们。但是，近几年来，这种自我怀疑感迅速融化在生活富裕的温暖和国际的喝彩声中了。他们仍然漫无边际地挑剔自己的社会，但是在这种姿态后面人们可以察觉到一种对其成就的深深的自我满足感。他们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的经济成功、技术、秩序井然的社会、民主平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大部分人享有的高水平的生活。作为一个团体，日本人已经取得了完全成功。但是，从他们整体的集体倾向性来说，他们也是自我意识强烈的自豪的个人。

第十七章　妇女

175

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的主要差别之一，也是在西方可能引起义愤的问题之一。日本男人是气焰嚣张的大男子主义者，而女性则似乎羞羞答答地忍受剥削和压迫。她们显然比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妇女的处境要好。但是，她们在就业方面受到苛刻的歧视，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陈腐的儒教观念垂而不死，仍然有其合法性。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丈夫常常冷淡、甚至藐视妻子。妇女与男人相处时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女孩子羞赧地躲在屏风后面抿嘴而笑。就目前情况而言，已婚妇女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性行为方面的双重标准仍然很流行，男人自由放纵，女性则倍受约束。因此，日本的性道德和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美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虽然这两个国家经历着迅速的变化，而且日本的许多变化朝着与西方相同的方向前进。

日本人没有西方人那种认为性关系有罪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性关系和饮食一样自始至终是一种自然现象，理应有其适当的位置。他们认为男女乱伦本身并不比同性恋更成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待性关系的态度是宽容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比当代西方人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把个人的欲望与周围的社会环境协调起来。他们服从那些在西方人看来是极端限制个人感情生活的社会准则。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人既恣情纵欲，又清心寡欲。大部分男人寻欢作乐，女人却坚守贞节。

176 远古日本人不仅崇拜农业生殖神，而且崇拜人类的生殖器。直到不久以前，男性生殖器仍是日本农村普遍崇拜的对象。在古代，宫廷生活中放荡不羁的爱情是文学的重要主题。近现代时期，这种性自由在日本一些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在这些地方，婚前性行为不是什么大问题，结婚往往也不登记，因此在证明新娘有生儿育女的能力以前，婚姻关系不是永久性的。即使到了今天，日本社会一般也很少谴责性行为，只是担心其社会后果而已。

早期日本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存在一种明确的母权制社会结构。神话中的皇族祖先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中国史书告诉我们，公元3世纪时女权统治是普遍现象[1]，而且直到8世纪时还有

[1] 《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记有女王国情形。——译者

女性天皇的统治。在平安时代的宫廷生活中，妇女享有很大的自由，并且主宰文坛。即使在封建时代初期，妇女也可以继承财产，在封建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随后，儒教哲学和漫长的封建制度相结合，限制了女性的自由，使她们完全从属于男人。在舞枪弄剑的时代，女性的战斗力无疑比男人差，这使女性逐渐被排挤出封建结构之外，成为男人的辅助角色。在中国，儒教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男人独裁统治的社会的产物。儒教视妇女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不是恋爱对象或事业伴侣。儒教通常把浪漫的爱情视为弱点，并把性行为当作传宗接代的方式。它是一种清心寡欲的哲学。

在农村，妇女作为农田劳动中男人的伙伴，保持着她们的重要性，因此拥有比较朴实的个人独立。但是在上层社会，到德川时代妇女已经完全变成男人的侍女和玩偶。一个家族可以通过联姻加强与另一个家族的联系，因此对女儿精心调教，使她成为婚姻市场上的一个知书达礼、冰清玉洁的高价商品。媳妇常常受到婆婆的严厉乃至粗暴的管束，被要求献身于夫家的幸福。对她来说，任何户外的社交生活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与家庭之外的任何男人接触还包含着潜在的危险。因为婚姻不是青年人互相爱慕的结果，而是根据家族的需要决定的，在结婚之前他们很可能从未见过面，所以，夫妻之间的爱情是次要的，结婚后既可能产生爱情，也可能没有爱情。

177

在这种制度下，妇女的淫荡或不贞被认为会引起社会的很大混乱，因此受到严厉的防范。然而，男人可以进行广泛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只要这些行为不妨碍他们的家庭责任就行。有钱的男人可以纳妾，情人成群。肯花钱的男人还可以经常光顾乡镇和城市的娱乐场所。在剧院和酒吧，训练有素的职业女性轻声漫语，欢歌笑舞，卖弄风骚，以取悦男人。这种女性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既

有下等娼妓，也有要大献殷勤才能弄到手的名妓。后一种妓女在19世纪称为艺妓。在当代日本，艺妓仍然存在，但为数不多。在西方社会中，向烟花女子调情说爱的事屡见不鲜，而在日本上流社会中，这类现象根本不存在。

封建时代末期日本社会制度的很多特征，在西方也存在过，但这些特征在19世纪中叶的日本得到了充分发展，成为近代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日本也仍存在着从这种制度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和习惯，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约会和求婚的作用比在美国小得多，人们也较少强调夫妻之间的爱情，虽然在今后，夫妻之爱也会像西方婚姻那样流行。包办婚姻仍然是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从20世纪2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坚持要按西方人的方式，通过恋爱寻找伴侣。

今天，日本的婚姻状况非常复杂。大部分女性仍然是在严格的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而日本人又喜欢集体活动，这就意味着在日本男女之间谈情说爱的机会要比西方少得多，结果，在单独交往中少男少女显得更加腼腆。许多人的确建立起发展成婚姻的关系，有些人则认为在选择合适的配偶时家庭的帮助是有益的。尽管青年人并不愿意违背自己的选择去屈服家庭的意愿，但青年男女的 178 初次见面往往是由各自的家庭安排的，只要当事人同意，日后就可能成婚。此外，不管在婚姻中起什么作用，正式的婚姻介绍人在结婚仪式中扮演中心角色。这个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几乎每个想结婚而又没有严重缺陷的人都可以找到伴侣。

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夫妻之间的爱情仍然只可能产生于结婚以后，而不是结婚之前。此外，在日本还有一些外部条件妨碍夫妻之爱像在西方那样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在日本城市，上下班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假期又比较少，虽然普遍实行每周五天半工作

制，但日本人乐意加班加点，此外，社交生活基本上只限于男性，因此日本夫妇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西方的一般夫妻要少。大部分家庭的居住条件并不宽敞，父母还有与子女同室共寝的习惯，这也淡化了夫妻恩爱。最后，近代以前时期忽视夫妻之爱的观念以及粗暴地将女人从属于男人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比较古板的家庭中，这也削弱了夫妻间的温馨关系。 179

双重的道德标准在日本比在某些西方国家流行。今天，许多青年女性与西方的女青年一样有婚前性生活的自由。但是，总的来说，在性行为方面日本女性比日本男性和许多西方女性受到更严格的约束。此外，人们一般认为已婚妇女应比男人更忠诚，她们实际上没有家庭外的社交生活。只有极少数上流社会的女性参加有外宾出席的、拘谨而无乐趣的正式宴会。除此以外，已婚妇女极少与丈夫一起外出赴宴或聚会，或在家中招待外人。当然，他们的住房通常很小，不能举行这类活动。她们的生活圈子只限于丈夫、孩子、一些近亲和学生时代的女友，有时也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活动。

与此同时，她们的丈夫则与工作所在的群体形成较为全面的社交活动，其中可能包括几个年轻的未婚女性。男人在回家途中经常光顾构成所有城市特征的酒吧，在那里，酒吧女郎继承了艺妓传统，与他们打情骂俏，百般挑逗，卖弄风情，甚至发展成暧昧关系。有些酒吧女郎为了寻找比较稳定的生活而成为这些男人的情妇甚至妻子。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了，但现代日本的酒吧与封建时代的娱乐区在精神实质上并无不同。

* * *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变化的。当代日本妇女已不像几十年以前那样受欺凌，她们其实并不像西方人有时看到的那样经常受欺侮。表面现象会将人引入迷途。在公共场合，夫妻之间通常不

会表示恩爱之情，有些男人甚至还粗暴无礼地贬低自己的女人。不久以前，老式的丈夫还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至少这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谈论自己家庭成员时的一种习惯。大部分作妻子的也从未想过在别人面前赞扬自己的丈夫。这些表面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早期制度沿袭下来的。但是，在社会表层下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妇女获得了更大的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夫妻之间应该有炽热爱情的想法也已产生。

180

或许从一些细小而值得注意的例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趋势。我记得非常清楚，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街上，妻子总是抱着孩子、背着包袱，气喘吁吁而毕恭毕敬地跟在丈夫后面，亦步亦趋，丈夫则老爷似地雄赳赳地走在前面。几年后，我看到妻子接近了丈夫，而在今天，夫妻则是并肩同行，抱婴儿背包袱的往往是丈夫。如果家里拥有小汽车，妻子可能与丈夫平等分享。虽然没有作丈夫的愿意屈尊做家务，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丈夫帮助妻子做晚饭。而且，许多妻子旗帜鲜明地表示，她们不能容忍丈夫到酒吧狂欢痛饮，或到处寻花问柳。没有人能够预言这些趋势将发展多快，进展到何种程度，但其方向无疑是走向单一的性标准，或者夫妻双方都恣情纵欲，放荡不羁，或者互相尊敬，相互忠诚。

另一方面，日本妇女的地位其实比日常所看到的更重要。如上所述，日本原来是一个母权制社会，母权制社会因素似乎延续了下来，尽管受到封建制度和儒教伦理赋予的男人至高无上的沉重压力。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母权制的蛛丝马迹；中世纪时期人们希望女性与男人一样意志坚强和果断勇敢，近现代时期人们普遍承认女人的毅力和心理力量比男性更坚强。毋庸置疑，现代日本家庭的核心是母亲而不是父亲，起主导作用的也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实际上，父亲除提供经济来源外，在家庭生活中无足轻重。家庭财政几乎完全由母亲掌管，父亲往往没有发言权，只能得到她

所给的一些零花钱。在子女活动的时间内(起床以后、睡觉之前),父亲一般不在家,因此子女基本上是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督促他们要好好学习的也是母亲。美国连环画《金发女郎》和电视、电影中的家庭喜剧总是描绘一个说话结巴而又怕老婆的父亲形象,这类连环画和电视、电影长期来在日本一直颇受欢迎,因为尽管社会背景大不相同,日本人也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的。

181

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几乎不存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那种主宰一切的父亲。但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另一个方面,即男孩非常依恋和依赖其母亲,则是日本人的一个重要心理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甘え"综合症。丈夫仿佛是妻子的一个成年孩子,他和其他孩子一样,也需要温柔的关怀和溺爱,否则他会从其他女人(如过去的艺妓或现在的酒吧女郎)那里寻求一种特殊的女性温情和谄媚。丈夫容易显示出个性上的弱点而引起家庭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希望妻子始终像"贵妇人"一样性格刚毅,支撑全家。她们基本上也不负丈夫所望。

* * *

妻子也许是家庭的主宰,但在范围更广的社会生活中,妇女基本上还处于从属地位。日本普及了9年制义务教育,94%的学生受到12年的学校教育。女孩和男孩一样受过初等教育,但她们在高教教育中成绩不佳。虽然短期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是女性,但短期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家政学校,仅教授妇女结婚所需要的礼仪技巧。在四年制大学里,女生人数大减。只有几所女子大学,基本上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在男女合校的其他大学里,女生只占学生总数的20%,在名牌大学里只占10%。对于女孩子来说,费用昂贵的四年制大学教育似乎是不值得的,因为人们只希望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度过一生。

日本人结婚通常比美国人晚,他们的婚龄,女性为24岁,男性

为28岁，大约要比美国人晚3年。因此，大部分女性在学校毕业到结婚以前有2—6年的时间。她们在这个时期内加入劳动力市场。文化水平较低的妇女一般成为纺织、电子等轻工行业的劳动力，或充当女招待、女售货员，从事服务性工作。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则当秘书或日本所谓的O.L.(办公室女职员)，但她们也做服务性工作，如为办公室的男人倒水沏茶。因为她们将在几年内结婚，所以这两个女性职工团体被视为临时性的，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工资持续上升的终身雇佣制的阶梯之外。日本妇女比美国妇女结婚晚，结婚后又在很长的时期内负责生儿育女，因此她们只有少数人回到劳动力市场，而且年龄很大。她们很可能又被排除在男性享有特权的终身雇佣制和年资制之外。女性职工平均工资大约只有男性的一半。尽管如此，仍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构成了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虽然大部分从事比较简单的工作。

182

与城市工人不同，农村妇女在农村雇佣体系中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战后的条件甚至使她们比以前更为重要。战争结束以来，大部分农村青年男女从学校毕业后都流入城市，寻找赚钱多的工作。那些留下来继承家庭农场的男青年很难找到新娘，这种新娘短缺状况造成了农妇相对地位的急剧上升。如上所述，现在农村中大部分男人大体都在外地找工作，尽管妇女也常到外地工作，但她们一般比男人干更多的农活。

183

日本的确也有受到教育的事业女性，但她们的人数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要少。她们在教育界和研究领域中很突出，大约构成小学教师队伍的一半；在初中、短期大学、女子大学和科研机关中，数量也相当可观，不过在四年制大学中女教授屈指可数。她们在文学艺术界举足轻重，在新闻界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小企业中，妇女往往居于领导地位，但成为大企业经理人员的女性寥若晨

屋。日本有许多女医生，还有一些女法官，尤其是在家庭法院。①许多妇女担任低级政府雇员，只是到最近才有个别妇女跻身高级官僚精英集团。女议员在日本国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与美国参众两院女议员的比例差不多。但是，1986 年 9 月日本妇女走到了美国姐妹的前面：土井多贺子当选为日本第二大党社会党的委员长，并因此成为首相候选人。然而，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现在更多地表现在普通市民和地方居民的组织中。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参加了诸如“妇人会”等组织，她们通过这些组织以及基本上由母亲控制并有很大影响的家长教师联谊会，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生活。但是，社会上大部分领导角色基本上仍为男人所垄断。

* * *

不言而喻，日本仍然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妇女仅处于次要地位。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她们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巨大改善，并且还将继续改善下去。1947年宪法非常明确地规定男女平等，提高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和社会地位。宪法规定：

> 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不得因……性别……而有所差别。婚姻只应建立在两性的自愿结合基础上，以夫妇平权为根本，必须在互相协力之下予以维持。关于选择配偶、财产权、继承、选择居所、离婚以及婚姻和家族等其他有关事项的法律，必须以个人尊严和两性平等为基础而制定。

184

现在，法律赋予妇女以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平等。例如，根据战前的法律，男人要离婚很容易，而女人则几乎比登天还难。但是，现在妇女占离婚申请者的大多数，其中家庭主妇的离婚率比女性职工还高。即使如此，日本的离婚率也远远低于当代美国，甚至

① 日本法院的一种，负责家庭事件的审判和调解以及保护青少年事件的审判等。——译者

也比半个世纪前的日本低得多。日本的离婚率只有美国的1/18，其原因之一是，对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在工资方面存在着歧视，离婚的妇女很难过上象样的生活。另一个原因也许是，离婚妇女想要再结婚也很困难。

虽然最近几十年来日本妇女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利益，但是妇女仍然受到严格的社会限制和就业歧视。很多西方人对这种状况义愤填膺，他们感到惊讶，为什么日本妇女不觉醒，不起来更激进地反抗经济上的歧视和其他不平等地位。原因之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来日本妇女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她们正忙于消化和吸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经济高涨时期，劳动力短缺，这给予妇女发挥更大经济作用的机会。战争结束以后，由于洗衣机、吸尘器和电炊具（尤其是电饭锅）的使用，实现了家务劳动的机械化，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单调乏味的家务劳动，获得了从事户外工作和其他活动的时间。这些因素加上战后取得的法律权利和彻底的社会变革，使妇女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不断增加的广泛机会。

日本妇女没有更积极大胆地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妇女解放与她们"贵妇人"式的自我形象不协调。她们认识到，她们支配着家庭，并且在心理上往往比男人更坚强。她们也许认为，西方妇女作出受害者的悲壮姿态可能更符合她们传统的"弱女子"形象，对于在实际生活中是"强女子"的日本妇女来说，则是不合适的。

最重要的原因或许与这种观念有关。日本妇女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女人和男人在生理上的差别造成了不利于她们的条件以及不相同的义务。她们热爱自己作为家庭生活的主宰和督促下一代成长的母亲以及家庭缔造者的角色。与她们的西方姐妹一样，许多日本妇女希望既当贤妻良母，又在事业上有所作为。但是，总的

185

来说，她们比西方妇女更重视管理家务，抚养子女，而比较忽视户外活动。正如日本妇女充分认识到的那样，结果是她们当中很多人生活圈子狭小，在子女长大成人后陷入近乎真空的状态。但是，她们似乎与美国妇女一样，在自己献身的生活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她们显然愿意按照目前的缓慢步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登上更高的地位，而不想振臂高呼，要求更大的变革。

第十八章　教育

186

如上所述，日本人划分成纵向的分等的团体的倾向，自然而然地削弱了阶级或职业间的横向联系。当然，整个封建体制内部互相冲突的力量也起了相反的作用，造就了一种一个半世纪以前还是十分鲜明的阶级界线。但是，从那时起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中叶，西方强迫日本开国时，阶级界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开国以后，外部影响汹涌而入，导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整齐划一的全国性教育制度的采用扫除了许多阶级划分，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彻底的平等社会之一。义务教育和以此为基础的严格的考试制度代替门第出身，成为人们职业和地位的决定因素。总之，日本从一个阶级制约的社会变成一个能人统治的社会。新教育制度还造就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高的识字率和优秀的教育水平，从而使日本人能够应付西方先进技术的挑战，并在今天，在许多领域取得世界领导权。总之，现代日本成功的最根本原因是日本的教育制度。

当代日本重视正规教育，起源于东亚文明。中国人很早就强调读书识字的重要性，认为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他们的知识渊博和品德高尚。这些观念后来逐渐制度化，形成一套繁缛的考试取

187 士制度。朝鲜人完全接受了这种制度，日本人虽然没有在他们的社会中实施这种制度，但吸收了强烈的尊重知识的精神。即使在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领袖也是知书达礼的，文学造诣往往很深，与欧洲封建社会不学无术的骑士头领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日本，佛教寺院成为学问的中心，堪与西方的基督教教堂相媲美。

到德川时代后期，在识字率和教育机构方面，日本人已超过中国人和朝鲜人。德川时代的教育基本上是在私塾中进行的。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封建藩国设立了培养武士的藩学校。此外，还有1000多所招收武士子弟和平民的私学校以及成千上万所称为"寺子屋"的乡村学校。其所以称为"寺子屋"，是因为这些学校一般设于当地的佛教寺院。在那里，平民子女，包括女孩子读书写字，学习算术。19世纪中叶，约有45%的男性和15%的女性知书识字，这个比例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不相上下。

因为有重视正规教育的传统，所以明治政府的新领导人很容易认识到教育在获取西方技术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现代学校体系对于日本追赶西方先进大国的必要性。1871年，即新政府建立后的第四年，明治政府就设置了文部省。翌年，文部省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以法国为模式发展普及教育、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整齐划一的学校制度。实现这项计划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日本人缺乏足够的教师、校舍和资金。计划反复修改，实际进展缓慢，然而全国性的教育制度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

这个新教育制度有两点特别重要。其一，这是一个崭新的开端。在新时代，藩学校和寺子屋消声匿迹，私立学校也所剩无几。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与19世纪的西方不同，它已摆脱贵族和宗教对早期教育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教育的世俗化和平等化在总体上已遥遥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其二，日本人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基础教育，从而确立了牢固的民族国家和高等教育的

基础。与此相反，在最近时期，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不切实际地强调徒有其表的高等教育，而在一个文化水平低下的社会中，即使这种教育很优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总是没有用武之地的。这些毕业生迁居西方国家，成为西方世界智力库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祖国在文化上日渐贫困。

实际上，直到大约1907年，日本人才使所有儿童就学。这一年强制推行男女合校的6年制小学教育，实现了完全的免费义务教育。在小学之上形成了一套英才教育制度：男女合校的5年制中学和与此平行的初等技术学校以及更高层次的、只为男生开设的3年制的相当于德国的文科中学和法国的公立中学的高级中学，以及与此平行的高等技术学校；最高是根据学科划分的3年制或4年制大学。高级中学是大学的预科。未来的领袖人物正是在高级中学而不是在大学时期，开始相互认识并形成密切的伙伴关系。

整个制度非常平等，至少对男人来说是这样的。所有完成必要的初等教育并通过必要的升学考试的人都可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教育制度成为国家选拔领导人的主要途径，从20世纪初以来就已经这样实行了。这个制度密切配合了政府领导人所认为的国家需要，培养了大批有文化的士兵、工人和家庭主妇，以及众多的中等技术人才——今天，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尚未充分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和一批从大学脱颖而出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日后在政府和社会中占据高级领导职位。大量的教育机构，包括整个中央教育机关，控制在政府手中。在日本确实也有一些基督教教会学校和佛教学校以及其他私立学校，特别是在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这个层次。在女性教育方面，基督教教会学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些学校仅仅是政府教育制度的补充。

处于教育体系金字塔顶端的是东京大学，它是由德川时代延

续下来的三所幕府学校合并而成的。这三所学校是儒教学校（后189 取消）、医学校和外国知识学校。这些学校几经组合，于 1877 年命名为东京大学，1886年又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起初，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免试担任高级文官职务，后来随着其他大学纷纷创立，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东京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毕业生都需要参加统一考试才能进入高级文职官僚机构。

政府相继创立了几所新的帝国大学：京都帝大（1897 年，京都）、东北帝大（1907年，仙台）、九州帝大（1911年，福冈）、北海道帝大（1918年，札幌）等。1918年一些私立院校也取得大学资格，这样大学毕业生数量大大增加了。历史最悠久、名望最大的私立大学是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的前身是西方知识的伟大普及者福泽谕吉在明治维新前创办的一所私塾。早稻田大学是大隈重信被藩阀统治集团排挤出政府一年后即1882年创建的。其他较大的私立大学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和中央大学等。这些大学都成立于20世纪初，主要教授现代法律。这5所私立大学和其他许多私立大学都在东京。

二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重新改革日本教育制度，使其符合美国的观念，减少英才教育色彩，以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日本大众社会。结构上的变革基本上没有必要，开始时还造成很大混乱，但是美国仍坚持实行。它废除了战前的“6:5:3:3”制（据各级学校的年限命名），代之以美国式的“6:3:3:4”制，即小学 6 年、中学 3 年、高中 3 年、大学 4 年。大学之上是研究生院，与大学平行的有两年制或 3 年制的短期大学。所有高等院校都称大学，而不叫学院，甚至连初级学院也称短期大学。短期大学比较重视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艺术，学生大部分是女性。正规大学重视法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商学、工程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女生平均只占学生总数的1/5左右。

美国人进行的改革延长了义务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实行9年制完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并彻底推行男女合校，取消战前学生可以中途转入技术学校的制度，基本上实行单轨制教育，即只能由低级学校升入高级学校。但也有些例外，如短期大学、1962年开始设立的规模相当小的5年制技术学校，它们相当于高中和短期大学，以及各式各样的附属专科学校。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日本人已成为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所有青少年都读完初中，进入高中的人数也大幅度增加，今天就学率已达94%。其中有将近1/3的高中毕业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这个比例稍低于美国的1/2，但遥遥领先于西欧国家。

190

教育水平不能仅用学制年限来衡量，教育质量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除大学水平外，日本的教育质量一般比美国高。学校每天授课时间比较长，每周上课5天半。一学年只放几次假：7月下旬到8月底短短一个来月的暑假，新年假和4月新学年开始前的春假。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勤恳，专心学习。从一年级起，学校每天还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大约有1/3的学龄前儿童进入幼儿园学习，为未来的教育打基础。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请家庭教师或进私塾，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或辅导。日本人渴望得到一切可能的最优秀的教育。他们根据毕业生升学考试的记录，将学校划分成三流九等，但实际上，日本的学校整齐划一，都非常优秀。美国城市、农村和郊区学校之间普遍存在的质量差别，在日本并不多见。

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是，日本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到很高教育的民族。尽管日本大学的教育质量略逊色于美国，但日本人平均受到的正规教育可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要多。由于存在着语言差别，教育的一般水平是难于衡量的。然而，日本人在各个领域，例如数学和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日本人是世界上受到最优秀教育的民族，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个

结论或许不是无稽之谈。

* * *

191 日本大力兴办教育并不足为奇。这不仅符合重视正规教育的传统观念，而且也是教育在决定个人的社会职业和地位上起着关键作用的必然结果。美国的社会制度比较宽松，自学成才的人比较容易出人头地，大器晚成者也会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比较严格的日本社会中，这种人几乎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当然，在日本也有许多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在事业上大有作为。田中角荣虽然没有任何大学的文凭，但于1972年至1974年间担任首相。然而，各个领域的大部分高层领导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他们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优秀而进入这些大学，并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出类拔萃，因而担任了高官要职。

192 日本人认为个人的学业与生活的成就是休戚相关的。日本家庭节衣缩食省吃俭用，让孩子进幼儿园受教育，或请人进行课外辅导。虽然住房拥挤，但孩子们仍然能有充足的空间做家庭作业。母亲监督他们做作业和完成其他学习任务。人们一般用"教育妈妈"来形容母亲的这种特殊角色。人们有时认为，教育竞争是日本人节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日本人尤其是城里人感到他们供不起太多的孩子上大学。

日本人重视入学考试的准备工作也有助于说明他们对教育的认真程度和教育质量之高，但这也导致一些严重的缺陷。随着孩子日渐临近关键的升学考试，为其创造有利的学习条件成为整个 193 家庭生活的中心。这种考试不仅是升入大学所需，而且在前一阶段进入升学率高的名牌中学也必不可少。应考者受到极大的压力，整个考试过程被比喻为"考试地狱"。

学生一旦被录取入学，日本人就非常巧妙地避免他们之间进行公开的竞争，并且不突出他们的能力差别。实际上，几乎没有学

生有不及格的记录。但是，冷酷无情、胜败在此一举的升学考试本身无疑是最可怕的竞争；早在考试举行以前，它就投下了阴影，使学生在校的大部分时间受到沉重的压力，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学习内容。高中教育大多不是为了真正的学习本身，而仅仅是为了准备大学升学考试。例如，英语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的语法问题，不太注意实际阅读，根本不重视听说训练。高中入学考试给初中教育投下类似的阴影，不过程度要轻些。日本青年自杀率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考试地狱"造成的。另外，毋庸置疑，大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进入大学的安全港后对以前所受到的压力作出的反应。 194

小学和初中教育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认为，日本战前的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的是唯命是从之徒，而非善于思考之民。日本的文字系统极其困难，需要大量死记硬背才能掌握，这也许是日本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个方向的原因。美国的改革者更重视让儿童独立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习事实。他们的改革事业成效如何还很难下结论。但是，当代日本的教育无疑比战前生动，更加强调提倡学生的首创精神。然而，许多日本人感到改革的结果使学生变得难以驾驭，他们常常谴责美国人造成学校纪律松弛以及因生活富裕而引起的日本道德沦落。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日本的学校制度相当刻板而不合时宜。这种评价既可以解释为赞同，也可以解释为批评，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二战结束以来，公共教育的控制权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美国占领当局念念不忘战前的教育制度在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坚持按照美国方式将教育控制权分散，分别赋予由选举产生的县市教育委员会。但是，日本人后来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化，将教育制度置于文部省的控制之下。

县市教育委员会仍然存在，但由县知事或市长任命，而不是由选举产生。虽然教育委员会仍有权选用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但所有教科书均需经文部省审定、批准。

中小学教师大部分是日本教师工会(日教组)的成员。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左派就一直控制着该组织，领导日教组围绕着教育控制权等问题与文部省进行公开斗争。这种状况有导致教育制度政治化的危险。侥幸的是，这对教育质量影响甚微。日教组到底是其领导人所声称的那种普通劳工组织，还是神圣职业同盟的组成部分，其内部就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尽管如此，在当代日本，学问和教师实际上仍然享有历史传统上的特别荣耀，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大部分教师献身于传授学问并以此为荣。尽管问题重重，考试制度还有不健康的影响，但是，日本中小学教育在道德和效率方面仍然是高水平的，这是值得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羡慕的。

* * *

高等教育的问题比较多，但这些问题的社会影响似乎不象入学考试的压力所显示的那么大。实际上，入学考试本身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为决定日本人一生职业的是入学考试，而不是大学的学业。日本学生通常不像许多美国学生那样重视大学的几年生活。由于日本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质量很高，因此没有必要像美国大学教育那样花费大量时间去做补习工作。通过入学考试就意味着进入大学的某个学院(学部)或系，如法学、经济学、人文学、科学、医学、工程学或农学等。因此，学生在大学时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挑选专业，他们的专业已由录取的学院(系)决定了。研究生院不太重要，博士学位也不像在美国那样成为一张必不可少的护身符。大企业和政府机关直接从大学毕业生招聘雇员，被录取者受到进一步的在职培训，或者被派遣到国外留学，或到日本的

研究生院深造，这相当于美国研究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对其他学生来说，研究生院不过是走向学术生涯的准备。大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曾经是非常重要的，但近来与政府或企业直接进行的科研相比，大学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少。

大企业和政府机关招聘人员，一般都要经过考试。大学所学的知识对于这些考试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不言而喻的是，那些18岁时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脱颖而出进入名牌大学的人22～23岁时参加企业和政府的考试也会取得出色成绩。大学名次的金字塔式等级排列在这些考试的结果中几乎可以精确地反映出来。这个事实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才华横溢，而不是因为这些大学的教育质量高。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企业只邀请名牌大学的候选人参加考试。

196

这种状况导致应考者争相投考名牌大学，从而受到极大的压力。人们认为，能否被名牌大学录取，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落榜者往往离开正规学校，到补习学校（称作“私塾”）补习一年，来年再投考，甚至可能第三、第四次投考。这种人被戏称为“浪人”，该词原指封建时代的无主武士。有些私立大学有免试录取附中学生的制度，有时学生也可以用金钱买通路子进入私立大学，但靠金钱充其量只能进入二、三流的大学。

大学名次排列的顺序基本上与战前一样。东京大学名列榜首。其后是以前的“帝国”大学（“帝国”一词战后已取消）和战前的几所国立专科大学，如一桥大学（经济学专科）。再后是两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以及战后各县合并战前高等中学（大学预科）和高等技术学校升格而成的国立大学。再往后是大批私立大学，这些大学按照名望又分成九等，最低层的是短期大学。大学出身与个人职业地位休戚相关的关系正在逐渐削弱，但是，即使在今天，大部分官僚也仍然出自最著名的国立大学，特别

是东京大学。庆应大学被认为是企业经理的摇篮，早稻田大学是政治家和新闻记者的温床。不大出名的私立大学则培养小商人、白领工人等。

私立大学主要依靠学费维持，收费较高。国立大学以及一些 197 县立或市立大学依靠政府拨款维持，收费很少。这意味着到最优秀最有名望的大学学习最省钱，进最次的大学最费钱，这与美国的传统模式恰恰相反。这样，名牌国立大学不仅招徕了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生来自社会各经济阶层。根据一项研究，占人口1/5的最富有的阶层出身的学生所占比例少得惊人，仅为37%，来自占人口1/5最贫穷的阶层的学生所占比例高得惊人，为10%；占人口3/5的中等收入阶层出身的学生占51%，其中上、中、下各阶层差不多各占17%。在一些不大出名的私立大学中，富裕阶层出身的学生的比例则要高得多。

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和不得已而进入普通院校的学生一样，经常觉得大学生活令人失望，因而许多学生态度漠然，或者闹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几年入学考试准备后的一种心理松懈的反应。显而易见的是，大学时代的学业对学生一生的影响并不比入学考试或毕业后政府和企业的录取考试的影响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 4 年是学校制度的压力环境与毕业后办公室的竞争生活间的一段长时期的休整。

大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也是知识缺乏吸引力的一种自然反应。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制度僵化，并顽固地拒绝必要的变革，尤其是国立大学。另一个原因是，大学经费严重不足，因而师生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班级人数过多，学生几乎没有与教授接触的机会。这种情况在私立大学特别严重。

虽然日本拨给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向高等教育提供的经费却少得多，而日本

青年上大学的实际比例比西欧国家高。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日本私立大学负担沉重，有些学校濒临关门的危险。在其他发达国家，所有或大多数学生就学于国立大学或政府资助的大学。即使在美国，这类学生的比例也高达75%。但在日本，由于政府根本没有满足高等教育不断扩大的需要，大约有80%的学生在私立大学学习。这些大学没有足够的基金，也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大量捐款。在正常情况下，对学校或其他慈善事业的捐款在税收方面并没有优惠。总之，日本人没有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的传统。尽管日本私立大学的学费比国立大学高得多，但平均只有美国同类大学的1/4或1/3。有些私立大学财政上能够维持下去的原因是，它们可以从大量名落孙山的报考者身上榨取高额报考费，并且从银行贷款，而债务最后显然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实际上，建立国家的教育信贷制度才是解决教育财政危机的最好办法，此外别无良方。 198

国立大学的主要问题不是经费不足，而是组织僵化。这一方面是19世纪末模仿德国模式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战前为争取学术自由而与压制自由的政府进行激烈斗争的结果。这个斗争留下了一个传统，即顽强地保护各大学及其所属院系的自治权。即使是在大学本科，院系划分也泾渭分明，相互间联系很少。各院系一般又分成若干讲座，每个讲座由一名教授、一名副教授、一名以上的讲师和助教组成。院系和讲座拥有几乎完全的自治权，坚决维护自己的学术领域和经费预算。学生所学课程是严格规定的，很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校长和系主任由相应地位的教授选举产生，但他们的权威微不足道。这一方面是因为文部省拨款要经过机械的预算程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院系和讲座对经费使用的变化拥有实际否决权。因此，进行改革的余地很少，以致于大学在现今仍基本上按照一个世纪前建立的

条件完全不同的模式运行。例如，在美国有许多大学制订了研究日本的计划并设立了教授日本知识的学院，而在日本，即使在东京大学也没有堪与美国相匹敌的研究美国的院系。然而，日本的大学也逐渐出现了倡导改革的运动，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许多试验正在进行。

另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占领当局指令重新改组各级教育制度所造成的。重新改组后的日本大学成为一个旧制高中(大学预科)后两年的普通教育与旧制大学前两年的专科教育相结合的很不自然的混合物。在东京大学，这两部分教育分别在相隔甚远的两个校园内进行，互相隔绝，几乎没有交流。

199

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学生对此感到悲观失望，有时甚至走向公开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些学生学习兴趣索然，而热衷于校外活动，如体育活动、业余爱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他们在大学的前两年尤其如此，此后才静下心来完成学业，准备下一轮公司或政府的考试。

学生自治组织依靠从学费中照例拨给的经费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生组织始终为极左分子所控制，从而形成各种好斗的革命小团体。以前，全国性的学生组织是"全学联"，今天已经分裂成名称具有抽象含义的派别，如"核心派"。学生骚动通常围绕着大学的内部问题，如学费和实验费的增加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但是，学生骚动的高潮经常同国内问题以至国际问题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紧张时期一致，如196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动乱和60年代末的大动荡。在这种时期，全部大学生活陷于瘫痪。1968年至1969年，东京大学的一些院系甚至停课，根本没有录取新生。其他许多大学也陷于长期的动乱之中。

日本人对这些影响高等教育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并且从60年代末的学生骚动以来一直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到目前

为止收效不大。政府已经开始向私立大学提供财政援助，甚至尝试设立一套接近美国大学院系划分和强有力的行政领导的大学内部组织机构。东京附近的筑波大学就是按新模式于1973年建立的，但迄今为止，结果令人失望。也许，更有希望的试验是靠私人赞助、设于日本海海滨城市新潟附近的国际大学。许多大学也着手设立研究国际的新院系。

日本高等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从日本学生的巨大数目也可以很好地看到。日本大约有200万大学生，其中一半左右集中在东京，另一大部分汇集在以京都、大阪和神户(京阪神)为中心的关西地区。尽管大学制度存在缺点，但是，总的来说日本不断地取得成功。乍看起来，这有点使人惊奇，但这可以用高质量的大学以前教育和企业、政府对新雇员的在职培训制度来解释。对于日本来说，大学的好坏显然不像对美国那样不可缺少。 200

* * *

人们经常指责日本人在文化上缺乏创造性，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弱点归结于大学制度不完善，尽管更明显的缺陷是早期教育的死记硬背倾向以及整个社会的一致化性格。没有人能够怀疑日本人具有伟大的艺术创造力，但他们在科学和哲学王国中的确不引人注目。现代日本没有值得世界其他地区刮目相看的思想家，尽管我们应该记得，语言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日本人对基础科学作出的贡献比较小，只有少数人获得诺贝尔奖金。日本在工业上的胜利，基本上是建立在充分借鉴并独创地改造外国技术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自己独立的科学发明。政治思想、哲学和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舶来思想的阐释和综述，而不是原始的创造。有些思想家更多吸收了日本固有的思想灵感，如本世纪前半叶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就受到禅宗思想的强烈影响，但他们并没有给世界其他地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怀疑日本具有文化上的创造性，不无理由。在他们的过去，著名的宗教领袖、伟大的诗人、出色的组织者、不同凡响的思想综合者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伟大的创造性的文化名人。看来，日本人倾向于感觉，而不是理性；擅长微妙敏感的表达，而不是明晰透彻的分析；偏爱实用主义，而不是理论思想；喜欢组织的技能，而不是恢宏的学术观念。他们从未对清晰的语言分析和独创的思维予以重视。他们更相信非语言的理解，认为口头交流、书写技术以及尖锐明确的说理基本上是含混不清的，可能将人引入歧途。除了新闻报纸上直截了当的事实报道外，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艺术上的联想和缠绵的内心感情，而不重视明晰的分析。法国人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坦率直朴和绝对明确的思想使他们感到不快。他们偏爱接近真理的错综复杂和颠扑迷离，而不喜欢难免犯错误的人所描述的简单明了的事实。

所有这一切似乎是与思想和理论在当代日本所具有的力度相冲突的。日本的知识分子往往好谈理论，许多人以坚持理论的热情而出名，而不是凭借从事实中总结出理论或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能力而扬名。模棱两可和概念综合在哲学和政治学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有些日本人之所以信守他们的政治和文化信念，只是因为他们从信仰上而不是在理智上接受了这些理论。当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盲目顽固地坚持产生于与当代日本大相径庭的19世纪的欧洲的思想和观念。日本的学者虔诚地坚持各自的思想流派，很少互相交流和沟通。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热衷于维护他们的"主义"，而孤立于充耳不闻的大众以及企业和政府的实用主义的管理者之外。或许由于他们作为理论家相对软弱，他们被迫严格遵循其所信奉的理论。若非如此，他们也许可以创造一个与社会整体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相反的形象。

日本人相对缺乏文化上的创造性，西方人经常把这看作是日

本人低劣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不过是西方人的文化偏见而已。谁能说从理性获得的真理优于从直觉获得的真理呢？谁又能说通过语言技巧解决争端比通过感情达成合意更可取呢？印度和西方典型的吹毛求疵的分析和宏大的观念架构，显然不比通过心领神会而达到平静的合作和和谐更高明。

然而，与日本的其他特征一样，这些特征似乎也经历着变化。由于现在在文化知识上和技术技巧上都处于世界领先者之列，日本可能不得不在知识上和科学上比以前更富于创造性。对于开始与世界其他地区密切交往、全力以赴地在技术和思想上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来说，模仿和改造是自然的。尽管近代以前时期日本的教育基本上是道德说教和理论性的，近现代时期日本教育的目的则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其中心是学习世界其他先进地区的知识和技术。学术活动基本上也是为了吸收国外的大量信息，并将其与已知材料加以综合。企业比较明智地强调学习和改造已掌握的技术，而不重视新技术的创造。然而，应该注意，日本人的许多改造想象力丰富，堪称是创造性的。还应该指出，处于日本那种地位的其他大多数国家在模仿和改造方面收效甚微，这说明模仿和改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日本可能正在表明他们比人们想象的更富于创造性。

202

擅长实际运用而相对缺乏理论分析和创造，这也是追赶欧洲时期的美国的特征。美国人只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在科学、学术和思想领域占居领先地位。随着日本在一个接一个的领域相继取得“技术之国”的桂冠，它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我们从旧理论对社会科学的束缚出现总的松动和自由探索的新精神出现中看到了这种趋势。更加明显的标志是，在过去几年的研究和开发浪潮中，日本基本上已经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与西方领先国家并驾齐驱。日本人感到他们有必要在科学事业上也率先前进。在二三十年前，日本

还很不重视研究和开发事业，但今天它的研究和开发事业已超过西欧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主要是通过私营公司或研究机构进行这类事业，很少依靠政府官厅或大学。日本把国民生产总值的2—3%用于这类目的，就比例而言与美国不相上下。考虑到美国有很大一部分经费用于在经济和科学上生产性不大的军事研究，就更是如此。

日本人缺乏创造性的观念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总之，不管日本的大学制度如何，总的来说，日本的教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且在塑造整个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203

第十九章 宗教

如果本书论述的是南亚人或中东人，那么在妇女和教育问题之后再来探讨宗教问题，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宗教是探讨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国家的出发点，因为宗教在这些国家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宗教在当代日本只起着不太重要的辅助性作用。我迟到现在才谈这一个问题，就是想强调这一点。17世纪以前，宗教的确在日本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不久以前西方才明显地出现世俗化倾向，而在日本这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到300年前。

日本社会的世俗化是儒教学说影响的产物。在9世纪和15世纪的中国和朝鲜，儒教就已先后发生过同样的效应。东亚人称这种哲学为“儒家学说”(日文写作“儒教”)，西方人则以其创始人孔子(约公元前551—479年)而命名为“孔教”。到公元12世纪，儒教在中国才最后定型。它强调合理的自然秩序，人则是其中和谐的一分子；社会秩序是以严格的伦理准则为基础的，以大一统的国家

为核心，国家则由才德俱备的人进行统治。它崇尚经典，但没有神学，没有僧侣，也很少有宗教仪式。这里没有顶礼膜拜，只提倡正确的思想和正确的生存方式，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忠、孝和恪守相应的社会礼仪和行为规范上。

公元6世纪至9世纪，儒教经典、五伦纲常以及儒教体系的其他许多特征，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第一次洪流传入日本。但是，与佛教相比，儒教显得黯然失色。直到17世纪，中央集权的德川体制才使它变得比以前更加切合日本的实际，从此儒教学说支配思想，儒教观念弥漫社会。到19世纪初，日本人几乎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一样成为彻头彻尾的儒教徒，尽管他们的封建政治制度完全不是儒教的。 204

然而，儒教作为一套系统的哲学未能在19世纪下半叶的巨大变革中生存下来。与西方现代科学的成就相比，儒教的宇宙观非常不精确；其伦理价值观念是与某种社会和政府密切相关的，而这种政府和社会在西方威胁面前不得不被抛弃。明治政府在重组自德川时代承袭下来的教育机构、把它改组为东京大学时，废除了陈腐的儒教学院，全力以赴办好这些学校中的西方科学和医学学科。有些儒教学者不甘消亡，竭力把儒教的陈词滥调灌输到新体制中。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1890年实行宪法时颁布了《教育敕语》。它很少涉及教育，它完全是一篇儒教伦理观念与臣民义务的宣言。因此，尽管儒教作为一种公认的思想体系已经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而寿终正寝，一些儒教观念得以保持下来。

当代日本人显然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的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儒教徒，但儒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仍然浸透着他们的思想。儒教可能比其他任何传统的宗教和哲学影响都大。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以及种族的普遍原则、民主的理想和价值观，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存在着强烈的儒教特性，如相信

政府的道德基础、重视人际关系、强调互相忠诚、笃信教育和勤奋精神等等。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教徒，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是儒教徒。

* * *

在日本，佛教是与基督教最相近的宗教，因为它也关心来世和个人得救。这表明佛教起源于非东亚的印度。在宗教和哲学观念 [205] 上，印度更象近代以前的西方，而不象东亚。历史上的佛陀即"觉者"释迦牟尼，大约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他从印度的基本思想即轮回转世思想出发，加上人生是苦的观念，认为人生的痛苦来自人的欲望，但是，这些欲望可以用佛陀的训诫加以克服，从而使人得到解脱并无痛苦地达到"涅槃"即"空"的境界。随着教义的发展，佛教后来强调笃敬"三宝"，即"佛"、"法"（即体现在浩瀚文献中的佛教教义）、"僧"（宗教团体或寺院组织）。

在东亚各地到处传播的佛教教派为"大乘佛教"，它与斯里兰卡和许多东南亚国家流传下来的"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训示经过超度可以进入"极乐世界"，这个观念比原始佛教的"涅槃"更 [206] 接近西方基督教的天国概念。另外，它不只是重视崇拜历史上的佛陀，而且崇拜佛陀似的神，包括为普度众生而未涅槃成佛的菩萨。

日本的大乘佛教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第一个教派是9世纪出现的"密宗"，重视神秘的宗教教义、仪式和艺术。第二个教派开始出现于一个世纪后，强调信仰得救，特别重视信仰阿弥陀佛即西方极乐世界中"净土"的佛陀和述及佛陀应允普度众生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由于这种原因，十二三世纪时，这个教派演变成净土宗、真宗和日莲宗等新教派，成为当代日本最大的佛教教派。第三个教派重视自助，即通过自我修行和坐禅求得超度。1191年和1227年先后从中国传入的两个"禅宗"佛教即是其体现。禅宗发展了通过入定坐禅和参悟公案而达到顿悟的修行方法。据说，这种

修行方法对修身养性也不无裨益。

佛教是在6世纪时开始传入日本的，如同基督教在北欧那样，它在日本也发挥了传播比较高的文化的媒体作用。后来日本人在建筑、雕塑和绘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美学观念是与佛教密不可分的，这也同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一样。像基督教教堂在西方那样，日本佛教寺院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有时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权力。十五六世纪，甚至连各地的居士团在政治生活中也很活跃。9世纪到16世纪，佛教名副其实地浸透到日本的整个文化、艺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由于16世纪末日本的统一者执行严厉摧毁佛教寺院的政治势力的政策，以致在此后的3个世纪中出现了势不可挡的社会世俗化趋势，因此，上述情况残留不多了。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认为，佛教妨碍缔造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治体制，因而加以无情的攻击，佛教因此威信扫地。在当代日本，佛教基本上已无足轻重。佛教的极乐世界和轮回转世等观念虽仍在民间流传，但把它作为指导原则的人寥若晨星。

207

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和庙宇点缀着日本的景观，但在人们的生活中只能发挥隐约的背景作用。战后的农地改革在经济上对许多乡村寺院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改革剥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有些人仍然到寺院求神拜佛，寺院庭园往往成为附近儿童的嬉戏场所。大多数人的葬礼由佛教僧侣主持，许多死者火化后埋葬在属于寺院的墓地。火化的习惯是从印度学来的，也许因为土地奇缺而为日本人所接受。中元节时许多人回老家过“鬼节”，这是一个佛教色彩浓厚的节日。这一天，有些地方的人将点上灯笼的小船顺流漂下或放置出海，以此纪念亲人的亡灵。德川幕府为了搜查秘密的基督教徒，要求所有人登记为某个佛教寺院的信徒。这个制度使所有日本家庭都隶属于某个佛教教派，虽然

这通常只是表明家族墓地所在的那个寺院所属的教派。

今天，虽然僧侣人数经常少得可怜，大多数佛教寺院和庙宇仍然举行宗教仪式。近现代时期，一些佛教教派呈现出新的文化和宗教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基督教传教运动所作的反应。它们发展了出版事业，创建了学校，甚至还在美国和东南亚进行佛教传教活动。有些现代日本人，如战前的一些军人和企业界人士，始终信仰禅宗，但人数不多，所更关心的往往是修身养性，而不是佛教的顿悟。因而，尽管佛教的痕迹仍在当代日本人的生活中到处存在，但对于许多人来说，无论是在文化生活方面，还是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佛教都不是主旋律，而只是伴音。

* * *

神道教是日本最古老、最与众不同的宗教，但它在都市化的现代日本也已退居幕后。原始神道的核心是崇拜自然万物——太阳、山脉、树木、流水、岩石以及整个生殖过程。作为祖先的图腾，位列被崇拜的诸神之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一个与诸神有关的神话向人们解释了日本列岛缔造的经过，并把皇族起源与天照大神联系在一起，它使人联想到希腊的神话。

在日本，供奉诸神的神社举目可见。祭祀天照大神的重要神社在旧都（京都）地区东部的伊势，面对着从太平洋上升起的太阳。成千上万的小神社供奉着天皇的祖先、神话中地方显赫家族的祖先、谷神以及某些引人注目的自然现象，如大山、美丽的瀑布或者奇石怪木。每座神社都有名为“鸟居”的牌坊作为标志。敬神的方式是捐献供品、击掌祈祷，比较大的神社还举行轻松愉快的节日活动。原始神道仅对死亡和污秽表示憎恶，重视仪式的纯洁性，但缺乏系统的神学理论，甚至连一套伦理观念也没有。

神道教不关心佛教的主导思想即来世问题，而大乘佛教也不是嫉妒其他宗教的排他性宗教，它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适应地方

性信仰，因此，佛教与神道教共存，和好相处。神道教的神社在行政管理上通常与佛教寺院有联系。西方以及南亚和东南亚流行的一个人只能信仰一种宗教的思想在日本从未盛行过。近代以前的日本人往往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同时还常常是不折不扣的儒教徒。

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中，神道显然是从属于佛教的，它被认为代表了佛教的普遍真理和神祇，是它在日本的地道变种。但是，16 世纪后，信仰佛教的热潮衰退了，神道却由于是土生土长，与日本的建国神话和对皇室祖先的崇拜有联系，因而在民族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并且最终在象征性的天皇制下寻求新的统一的日本得到广泛重视。以尊重天皇为中心的神道的复兴，成为导致 1868 年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是彻头彻尾的反佛教主义者，他们断然地将神道与佛教分开，最初甚至企图建立一种以神道为中心的政治体制。虽然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观念与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无法成功地融为一体，但他们毕竟建立了国家支持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神道教神社系统，并且创建了新的国家神社，如供奉第一位近代天皇的美丽的东京明治神宫和祭祀为国捐躯者的东京靖国神社。为了维护日本人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的说法，政府正式声称这种国家主义的“国家神社”是非宗教的爱国主义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因为政府强制人们到神社敬神，并要求全国所有学校供奉天皇和皇后的照片以及《教育敕语》。因此，尽管国家神道至少在形式上的确打上了宗教烙印，但它基本上是一种人为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物，而与神道教的本质观念相去甚远。 2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中，“国家神道”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美国军事占领当局自然视其为排外主义的危险

象征而加以猛烈的攻击，再加上战后人们普遍反对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神道"几乎完全消声匿迹。占领当局还要求政府与宗教间明确划清分界线。历史意义深远的大神社也恢复到了早先的状况，即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结果除最著名的神社外，所有神社都陷入了财政困境。尽管有少数神社得到广泛支持而获得了新的财源，但法律禁止向与宗教有关的机构提供公共基金，这使大多数神社受到沉重打击。此外，这还造成政府只能犹豫不决地向私立大学提供少量资助，因为许多私立大学有基督教、佛教乃至神道教的背景。

随着"国家神道"的消亡，神道教在日本人的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形形色色的神社分布在全国各地，通常位于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地方，虽然带有衰败的迹象。有些信徒造访神社、履行宗教仪式，向神祷告。某个神社如果是历史名胜或风光胜地，络绎不绝的大批观光者就蜂拥而至。近几年来，首相开始参拜靖国神社（祭祀战死者和1978年入社的一些被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作为"甲级"战犯处死的人），引起政界左派人士以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强烈反对。但是，总的来看，日本的靖国神社类似美国的无名战士墓，东京的明治神宫像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孩子们在一生特定的日子，如出生后不久、三岁、五岁、七岁等特殊节日以及每年的男孩节和女孩节，都被带到神社去参拜。神社也是举行婚礼的场所，家庭也常设有置放敬神供品的"神龛"。

今天，所有重要的大神社都在特定的日期举行每年一度的活泼愉快的神社节。这时，传统的神道最活跃。每当这种时候，摆满神社庭院的各种货摊生意兴隆，醉意朦胧的当地青年吵吵嚷嚷地用一个可以移动的神龛抬着社神招摇过市。神社节仍然是日本地方生活尤其是乡村生活的显著特色，尽管有些地方逐渐出现了不协调的历史剧表演，而在都市化地区转变为以军乐队和女鼓手为

特征的世俗化色彩更浓的地区社团节日。

神道教以各种形式继续构成日本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传说也仍然充满了神道色彩。日本人酷爱自然，亲近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源出于神道观念。但是，从传统神道中寻求生活、甚至社会活动和消遣娱乐的真正寄托的现代日本人寥寥无几。

* * *

人们通常把基督教与神道教和佛教并列为日本三大宗教，尽管基督教被视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则不然。1549 年，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最早将基督教传入日本。此后几十年间，基督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其速度之快，超过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基督教信徒接近 50 万，所占人口的比例，比当代日本基督徒的比例还要高。但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幕府的早期将军们认为基督教是日本政治统一的威胁，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许多日本人成为殉教者。到 1638 年基督教实际上已被扑灭，只有极少数基督教徒幸存下来，但后来他们对基督教的信条遗忘大半。

19 世纪时，日本人对基督教依然深恶痛绝，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西方人宗教感情的力量。1873 年，明治政府悄悄放弃了关于基督教的禁令，接着明确制定了完全的宗教宽容政策。但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很慢，直至今日信徒也不到人口的 2%。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差不多各占一半。

明治维新后，有些年轻有为的武士，尤其是那些属于内战中失败一方的武士，接受了主要由美国传教士带来的新教。他们希望从基督教中寻找一种新的伦理原则和人生哲学，以代替受到怀疑的儒教。这些人将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注入日本的教会。事实上，在当时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内村鉴三① 领导下，兴起了一场反

① 内村鉴三(1861—1930)，日本基督教无教会运动创始人，主张只信仰《圣经》，不应从属特定的教派或神学。著有《基督信徒的安慰》等。——译者

对西方新教各教派之分的“无教会”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政府从统治的目的出发，强迫新教各派组成“联合教会”。现在，40%左右的新教徒依然隶属于“日本基督教教团”。

基督教对现代日本社会的影响要比为数不多的教徒人数所显示的大得多。基督教徒基本上是社会地位重要、文化程度高的头面人物，因而具有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另一个因素是，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普遍注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历史及其基本信条的认识，可能比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更清楚。普通日本人熟悉基督教的表面例证是，百货商店热心展出圣诞装饰品，商业大街沿途商店都热情播放圣诞颂歌。

明治时代，基督教在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私立中学、女子大学和一些私立大学具有基督教渊源，虽然基督教在教育中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了。20世纪初，基督教率先开展为社会下层和残疾人服务的工作，新教徒也积极从事社会主义活动。实际上，在整个战前时期，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甚至到战后还是社会党内重要的温和派。但是，基督教影响最大的领域也许是伦理道德。现代日本人逐渐转向普遍的价值观念，他们采用了许多无论在西方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日本人的心灵中都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的伦理观念。基督教对当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即使实际上不比佛教和神道深远，至少也比它们更容易使人感觉到。许多日本人把基督教徒看作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们常常羡慕基督徒有明确而坚定的信仰，虽然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接受基督教神学。

* * *

日本的基督教虽然在文化上影响深远，但在人数上只能算一个小宗教。神道和佛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意义重大的

宗教，不如说是一种风俗习惯。当代日本人（即使不是大多数人）具有强烈的宗教要求，他们不信仰三大宗教而寻求其他信仰。他们信奉那些特别流行于日本乡村和缺乏教育的人中间的民间宗教迷信，以及各种统称为“新宗教”的流行宗教派别。流行的宗教迷信常常是从神道、佛教和中国的民间迷信演化出来的一系列观念的混合物。地方性宗教迷信各式各样，不胜枚举。许多人对吉凶、占卜和算命信以为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宗教产生于日本人的古老传统，即在正规的固有宗教活动外，日本人常常组织特别的朝圣团或进行其他宗教活动的群体。但新宗教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适应日本人的社会需要；随着人们流入城市，他们与乡村宗教团体的联系也中断了，从而陷于一种没有合适的社会归属集体的困境。新宗教与通过确立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获得力量的西方一般宗教要求不同，它符合日本人希望有一个可以寄托的社会环境的典型需求，因此颇受欢迎。

新宗教一般将神道、佛教，有时甚至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等不同信仰高度地调和起来，但大多数新宗教的神学基础是神道，虽然最大的新宗教“创价学会”是支持佛教日莲宗的一个居士团体。新宗教一般强调现世的价值，而不是来世，重视通过信仰或法术获得健康、繁荣、幸福和自我完善。有些新宗教是由自命神灵附体的人，尤其是妇女创建的。其他创造人仅仅是声称他发现了真谛。新宗教的首领一般是世袭的，教会内部分成等级，采用首领与追随者这种日本典型的团体构成形式。这使教会非常易于分裂，在许多教会中信徒很快就改宗了。

官方承认的新宗教数以百计，没有得到正式承认的宗教小群体为数更多。新宗教的全部信徒数以千万计，仅“创价学会”就声称它拥有1600万信徒，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其信徒也有600万人，

这个估计比较切合实际。有些新宗教的历史相当悠久。今天声称拥有200万信徒的天理教是1838年由一位农村妇女[1]创立的。另一些新宗教如"创价学会"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并获得重大发展的。大的新宗教一般拥有堂煌庄严的总部，精心筹办大型节日活动和许多聚会。其中，只有"创价学会"企图直接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因此建立了公明党，但后来公明党至少在理论上完全脱离了"创价学会"。所有新宗教都将教徒组成严密的保护性团体，进行学习和社交活动。这些组织和活动，与其说是为满足成员的精神要求，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

总之，日本的宗教向人们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与众不同的画卷。神道的神社和佛教的寺院到处可见。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与宗教仪式密不可分，如神社节日、神龛佛坛、神道教或基督教婚礼、佛教葬礼和其他宗教仪式。但是，绝大部分日本人——大约70—80%——即使登记自己是一个或几个宗教团体的成员，也不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宗教的信徒。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来源于儒教和基督教，然而，今天所有的人都不属于儒教，基督教徒也不到人口的2%。日本人的宗教习惯主要起源于传统的神道教和佛教，但真正信奉佛教和神道教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活跃的宗教人物信奉名微望低的民间迷信和新宗教。宗教不是当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核心，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十章　大众文化

我们是从日本社会的群体倾向开始考察日本社会的，现在也许应该以对集中体现当代日本人的集团性格的大众文化作出某些

[1] 即中山美伎(1798—1887)，日本天理教创立者。——译者

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考察。日本划分成地方性团体、学校和企业，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在日本，民族差别，阶级或种姓划分，并不像在其他地区那样触及社会的深层。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我们刚考察过的宗教差别也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神道节日、佛教庆典、儒教伦理和基督教婚礼与圣诞佳节，这些活动并不证明人们的宗教信仰，而不过是人们的习惯，人们或者亲自参加，或者从电视上欣赏。实际上，所有日本人共同分享着同样的大众文化。大众社会被视为未来的世界潮流，人们为此或欢呼或悲叹，并认为美国是典型的大众社会。然而，大众社会在当代日本更为引人注目。从一成不变的文字到昙花一现的流行风尚，都说明日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单一民族。

当然，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从最低层次的大众风俗到最高层次的精湛而复杂的艺术。然而，即使这种文化层次的区分，在日本也非常不明显。七、八世纪以来，日本人在建筑、雕刻、绘画、文学、戏剧和实用技术等方面始终保持着极其丰富而优秀的传统。这类较高层次的文化并不局限于少数精英天才，而为日本全体社会大众所拥有。大众文化与此相呼应，也是非常优雅的。在以文化高度发达闻名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普通老百姓很少表现出艺术情趣。然而，在日本，高层次的文化似乎比较全面地融汇于大众文化中。几乎不存在极少数人专有的美好事物和优雅方式。实际上，高得惊人的艺术欣赏力和礼仪一直贯穿到社会的底层。 217

尽管受环境限制，住房拥挤简陋，但大多数日本人想方设法至少在他们的日常世界中创造一些优雅的构想和美丽的群岛的微型模型：小巧的庭院、艺术性的插花、情趣盎然的艺术品、引人注目的丝绸和服装款式以及仅仅为了赏心悦目而布置的食品盒。一般说，日本人在素描和绘画方面表现得令人惊异地灵巧，这也许是他们学习复杂的文字书写法造成的结果吧。在日本，能够作诗填词——

主要是俳句——的人的比例也许比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这类人的情趣为对象的艺术杂志数以百计。世界古典文学作品的日译本可能比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版本都多。优美的音乐，其中大部分是西方音乐，从雄壮的交响乐、管弦乐、大学合唱团的合唱歌曲，到高质量的电声音乐，在这个国家都广泛流行。在日本，高层次的文化确实是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是极其罕见的。

* * *

日本大众文化的单一性可以归于许多原因，但有两个因素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跨入19世纪时日本社会就已经存在的不同寻常的统一性，近现代时期日本政府通过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整齐划一的教育制度塑造统一的公民的决心。因此，日本根本不像美国那样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别和民族多样性。甚至与西欧大国相比，日本也要少得多，虽然日本的人口实际上接近于西欧任何一国人口的两倍，在地理上分布得也要广得多。即使把冲绳除外，日本列岛从东北的北海道伸展到南部的九州的最长的中轴线，按长度计算，几乎是意大利、法国或英国的中轴线的两倍。只有冲绳（它到东京的距离比突尼斯到伦敦还远）在地区方言、民间文化、历史传统和某些现代观念上与日本其他地区存在鲜明的差别。

教育始终是塑造民族同一性的主要工具。人们知道，在战前的日本，全国每一个六年级的学生都要在同一天学习同样的汉字、同样的历史和同样的算术公式。战后的教育不再是千篇一律的了，因为各地教育委员会可以在众多的教科书中自行选用，虽然所有教科书都必须由文部省审查批准。然而，低年级的课程规定严格，因而依然大同小异。即使在高级中学，同样的升学考试准备也造成了许多的共同性。甚至在人满为患而资金不足的高等院校，除划分成一系列的院系外，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所有日本人都

218

受到9年教育，其中有94%的人受到12年教育，但这些教育实际上是千篇一律的。而且，1/3的高中生进入大学，他们受到的高等教育也没有多少多样性。他们带着一致的信息和观念跨入社会，能够与日本相提并论的只有组织严密的严格的小社会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大众传播工具和教育一样也是大众社会的重要缔造者。在日本，电视的作用与在美国相似。全国性的电视网提供的精神食粮大同小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致性。战前，日本农村与城市在价值观观念和思想意识上存在鲜明的差别，正是电视而不是其他手段消除了这个差别。实际上，电视已普及到城市和农村的每个家庭，彩电的数量甚至比居民户数还多。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虽然用英文名称称呼电视机，但却用一个别具一格的缩写词“テレビ”(Terebi)，代替美国的TV和英国的telly。

与美国相比，日本电视网的组织更像英国，但是，电视节目总的来说更像美国。日本有两家半国营的全国性电视台，简称NHK（日本广播协会），它是靠对电视机征收特别税所得到的公共基金维持的。一家政府电视台基本上是教育性的，教授外语和复杂的数学课程等。另一家政府电视台在普遍感兴趣的节目方面与私营电视台进行竞争，播放与私营电视台大同小异的新闻、体育节目、戏剧、喜剧、动画片和知识竞赛等。五家私营电视台覆盖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它们依靠广告费来维持，这与美国的电视台非常相似。总的来说，政府电视台与私营电视台和平相处，互相配合。NHK资金雄厚，节目质量高，迫使商业电视台提高质量以与之竞争。私营电视台的挑战则又迫使NHK以一种政府控制的电视台少见的方式播放生动活泼的节目。日本电视的广泛性、多样性、丰富性及其社会浸透性与美国电视大体相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电视则受到很多限制，节目索然无味，作为精神食粮，无疑显得比较单调。

与电视不同，日本的报纸与美国大相径庭。美国幅员广大，报纸不得不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相对来说规模也比较小；欧洲的报纸政治上泾渭分明；日本的报纸则大多是全国性的，政治上保持中立，因此，与美国和欧洲的报纸相比，日本的报纸是更加名副其实的"大众传播工具"。

日本报纸的总数不到美国的1/10，但按人口平均计算，日本报纸的发行量在世界各大国中是最大的，达到美国的两倍以上。《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是三家最大的全国性报纸，这三家报纸都有内容完全不同的早刊和晚刊。早刊发行量大约是400万到700万份，晚刊发行量也达到早刊的一半以上。大部分是个人订户。每一种报都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印刷，地区差别很小，大约只有100个左右。另两家全国性报纸是《产经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相当于《华尔街日报》），发行量也在100万以上。四家地方性报纸是：《北海道新闻》（札幌）、《东京新闻》（东京）、《中部日本新闻》（名古屋）和《西日本新闻》（福冈），统称"报业集团"，总发行量大约400万份。

日本报纸的版面和内容大同小异，页数比美国报纸少，早刊大约24页，晚刊更少。广告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较小。除分类广告和书刊广告外，其他广告所占的版面不大。重要新闻刊于头版，更详细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社论、来稿、特写、文艺专栏、国内新闻等等，各报几乎都是刊登在相同的版面。倒数第三页称为"三版记事"（因最初的报纸只有四版而得名），通常刊登凶杀、事故和其他人们津津乐道的事，称为"社会新闻"，但从未刊登过美国报纸上的所谓"社交新闻"（society news）。

报纸的消息是由驻在日本和世界各地的记者大军收集的。例如，在驻华盛顿和纽约的外国记者团中，最大的是日本记者团。为数更多的国内报社编辑人员将来自各地的消息汇编成简明的新

闻，并进行仔细的编辑和细致的校对。报刊文章很少署名，这再次表明日本人偏爱团体行为，其最终结果是保证了报纸的高质量。一般说，日本人能够比世界其他任何民族从报纸上得到更全面更翔实的国内外新闻，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其他国家的报纸，在新闻的数量和质量上能超过日本的全国性日报的极其罕见。

日本报纸的一大弱点是它们那种令人恼火的雷同的内容和论述。他们的报纸很少有富于个性的分析文章，也很少有调查性报道。近几年来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篇调查报道是，一家月刊在美国水门事件的刺激下，对洛克希德事件①进行了调查报道。一般说，报纸的标题和社论似乎是互相抄袭的。因此，亿万日本人的思想是用同样的电视和报纸的新闻和观点武装起来的，他们每天去上班都带着同样的事实、兴趣和看法。

日本报纸一致性的一个原因是所谓"新闻俱乐部"的存在。重要的报社、通讯社和报业集团各派一名记者常驻主要的新闻来源，如政党、重要政治家、政府官厅和企业公司等。奉命来到同一新闻来源的记者组成自己的俱乐部，集体行动并得到报道对象的非正式承认。他们通常在同一天一起会见政治家（在某部门的一间屋内），会见时共同提问，并心照不宣地只报道新闻来源和他们相互间同意的一切内容。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互相搔背式的行为方式，只要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双方都有利可图。记者不用担心想象中的竞争者捷足先登，因此也不必挖空心思去抢夺独家新闻，而新闻来源则得到可以信赖的手段向公众发布新闻。没有人会对令人困窘的事情刨根问底，也没有人希望那些缺乏充分的语言技巧并且不能保证恪守上述规则的外国记者加入俱乐部而破坏他们的计划，这一切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样可以避免因新闻记者肆无忌

① 洛克希德事件：1976 年 2 月因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副经理寇奇在美国参议院提出证词而暴露的日本高级官员的受贿案件，该案涉及到田中角荣等人。——译者

221 伸地抢夺新闻而造成的不必要的丑闻和事件。这种制度的最终结果是，所有新闻经过精雕细琢，值得信赖，但却千篇一律，令人厌烦。

所有重要的报纸都声称严守中立，但实际上大多数报纸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日本，报纸最初出现于明治时代，出身于武士而没有成为统治集团成员的人以报纸为喉舌，对政府发出抗议。因此，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报纸的社会作用是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府进行有益的批评，至少战前始终如此。只是在20世纪 30 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它们才成为逆来顺受的政府代言人。战后报纸心满意足地恢复了批评家的角色，尽管现在的政府已经实行民主统治，并且非常重视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基本上是由报纸所左右的。报纸普遍左倾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报纸是由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出版发行的，而大都市对保守派政府的反对最为强烈。〔"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一词，日本语称作"Interi"，使用并不严格，实际上包括所有进入财界、政界和政府机关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日本的大报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并且有意识地竭力保持中立。它们的中立色彩不如电视，电视在政治上比较温和。但是，无论如何，日本的报纸显然不像极权主义社会的报纸那样，成为政府说教的喉舌，也不像美国和西欧的报纸那样，是所有人或居支配地位的政党的工具。日本报纸的所有权对编辑方针的影响很小。编辑方针首先是由编辑部内部派系斗争决定的，其次受到有组织的工会集团压力的影响。

周刊和月刊对全国的影响不如报纸，但更增添了多样性。有一些月刊杂志，即所谓的"综合杂志"，刊登关于各种问题的严肃论文，但发行量最多只有几十万份。日报规模大、质量高，因此不必

再出版《时代》和《新闻周刊》那样的新闻周刊。但是，日本也有五花八门的周刊，其数达几百种之多。其中至少有三家周刊声称发行量超过50万份，50家最大周刊的总发行量大约达到800万份。周刊的新闻往往比月刊和日报更加耸人听闻，有时充满了淫秽色彩，内容当然也更加纷繁复杂了。日本还有种类繁多的专业杂志，如体育、编织等。大部分周刊和月刊杂志并不表示中立，而是相当坦率地迎合某种具体的政治倾向或其他特定的兴趣。 222

近几年来，大众传播工具的一个令人头疼的侧面是漫画读物的巨大增长。漫画占据了各种杂志的大量篇幅，甚至整本杂志和书。过去，人们在火车上、候车室以及凡是可以看书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日本人在读书看报。日本人也许堪称世界上"最爱读书的人"。但是，今天已大不一样了，许多原来的读者如痴如醉地看连环画和莫名其妙的漫画。本来只是儿童对漫画感兴趣，后来大学生也渐渐喜欢上漫画，今天则连稳重的商人和家庭主妇也如饥似渴地着迷于漫画。从各种离奇古怪的冒险传奇，到丰富多采的爱情故事和色情故事，各种漫画应有尽有。难于预料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出版物吸引公众范围的扩大，或电视造成人们注意范围的缩小和情趣的降低？还是因为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压力，造成人们负担过重而对严肃的读物产生反感？或者是大众社会庸俗化的一个迹象？不管怎样，近几年来漫画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对其他杂志和书籍造成了明显有害的影响。 223

* * *

在造成日本大众文化的同一性方面，标准化的教育制度和大众传播工具可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但这些又是以秩序井然、平稳运转的社会为基础的。这个社会在轮廓分明的纵深轨道上运行着。日本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个人的前途更容易预测，也更有可能按既定途径前进。新潮小说，流行风尚和新思潮同时席卷全 224

国，各地的反应大同小异。日本人特别容易受全国性的“ムード”（日语，直接来自英语moods意为“情绪”）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公共运动，如1964年的奥运会和各种博览会。美国人和其他现代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但对日本来说，这些归纳尤其如此。

大量生产的商品潮水般涌入消费者手中。生产商利用电视和报刊向全国做广告，并通过成千上万的零售店推销名牌电子设备和照相机等产品。购买这些商品的人数以百万计。几乎所有家庭都拥有洗衣机和电冰箱，将近2/3的家庭拥有小汽车。农村的小汽车比城市多，因为城市存在停车场不足的问题。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家庭生活中的“三神器”（对皇室的镜、剑、玉三种神器的戏谑性比喻）也不断花样翻新，价值日益升高，到60年代末演变成“三C”，即彩色电视机(colour television)、小汽车(car)和空调器(cooler)。从那时起，人们普遍富裕起来，这个玩笑就落后于时代了。

大型百货商店称作デパド(tepado)。有些大型百货店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有些则建于市郊铁路的终点站。在这些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种类繁多，质量上乘，并附加各种服务项目招徕大量顾客，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例如，百货店顶层设有儿童动物园和游乐场，在高层设有餐厅、影剧院和艺术展览厅，展品质量优秀并且经常变换。在日本，博物馆不多，一般人喜欢到佛教寺院的正殿或这类百货店的展览厅去欣赏著名的艺术品。

日本人是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或者作为观众，或者作为运动员。他们酷爱棒球、排球、体操和其他各种体育活动，几乎进行人类所知的一切竞技活动。他们攀登最高的山峰，单枪匹马横渡最宽的海洋，仅仅是因为山峰和海洋处在那里。尽管土地奇缺，日本人仍然爱打费用昂贵的高尔夫球。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商人

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娱乐。网球爱好者人数更多而且日益增加。赛马、职业棒球赛、大学棒球赛以至全国高中棒球冠军赛常常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职业棒球队由赛场沿线的市郊铁路公司发起组织。球队往往使用英文名称，有的美国人很熟悉，如东京的读卖巨人队；有的则很陌生，如广岛鲤鱼队。相扑是传统的巨人进行角力的方式，它与神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非常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结果更为流行。冬季，滑雪的山坡上人满为患。夏天的周末，东京附近的湘南海滩吸引了百万以上的度假者。夏季，富士山山坡上人群如蚁，络绎不绝，登山已经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在春天和秋天的游览季节，观光的人群，其中大部分是有组织的学生团体以及乡村和小城镇组织的观光团，充斥著名的风景胜地，几乎遮盖以至淹没了这些名胜。设有成千上万的酒吧、咖啡厅和餐厅的商业街和娱乐区总是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日本有几百家地方"银座"商店，也总是灯火辉煌，人群熙熙攘攘。这些商店是以东京商业区银座命名的。银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京最繁华的商业娱乐区，直到近几年才被新宿和六本木等更繁华的夜市所取代。美国的城镇和郊区给日本游客的第一印象经常是大街上行人稀少，仿佛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地方。

日本的大众社会充满着优雅的艺术。日本女子成群结队学习茶道、插花和传统舞蹈，把这些当作是青年女性标准化训练的一部分。数以百计的儿童在一起，按照铃木演奏法拉小提琴。西方音乐，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吸引了大量听众，其中占压倒多数的总是青年人。

然而，日本大众文化的主要特色不是其绝对数字，甚至也不是其一致性，更重要的特征是其巨大的生动性、创造性和多样性。在西方音乐领域，日本的许多交响乐队名列世界前茅，正如日本的音

乐家和指挥家举世闻名一样。日本的建筑师享誉世界。现代画家和版画艺术家也极富于创造性。日本的服装设计师在巴黎和纽约令人刮目相看。今天，所有传统艺术比几十年前更加生机盎然，充满活力。日本的传统陶器造型已成为世界的规范。文学充满了活力。各种各样的人都迸发出艺术创造的火花。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刻意求新。日本也许拥有一个大众社会，但在一致性的表层下蕴藏着无穷的变化和无限的活力。

日本的许多大众文化是美国人非常熟悉的，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人在倡导大众社会方面与日本人并驾齐驱。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已捷足先登了。现代大众社会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每天在东京和大阪铁路终点站间潮涌般来回奔波的数以百万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迈着坚定步伐、秩序井然地奔向目的地的庞大人群，外貌相似，衣着相同。这似乎是等待着我们一切人的机器人一样的未来的景象。然而，如果人们能够透过语言障碍的帷幕而加以更密切的观察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未来的某些模式虽然可能是拥挤的，雷同的，但仍不失为一个生机勃勃而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和人类的未来。

第四编　政府与政治

第二十一章　政治遗产

在人们谈论日本的"奇迹"的时候，他们往往联想到这个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从未梦想过的繁荣和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如上所述，日本的增长是在长期准备的背景和一些根深蒂固的特征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是非常自然的增长。即使非同凡响，用"奇迹"一词形容也未必恰当。但是，不管怎么说，近现代时期日本的另一个侧面却常被人们所忽略。这个侧面甚至更值得我们惊奇和赞叹，那就是，日本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成熟的封建国家转变成一个巩固的模范民主国家。对历史学家来说，这比日本经济上的非凡成就更为惊人，也更值得赞赏。

在日本的政治遗产中，既没有民主的观念，也没有民主的实践经验。亚洲式的乡村民主理想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在乡村一级人们相互间的日常交往和人们经常参与的共同体事务中，几乎到处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平等主义。集体决策是一项原则，日本传统的乡村始终如此，但是乡村中各个家庭的地位和权威是很不相同的。总之，乡村地方自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相去甚远，后者依靠个人的权利和不经常面对面接触的大多数人民之间的代议制度。

在西方，个人权利观念和代议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封建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封建经验重视封建的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性和法律性。在日本，封建义务基本上被认为是道德性的。在

232

封建社会达到顶峰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性和契约性；德川封建时代末期，领主和家臣的关系中有一套明确而高度复杂的制度。但是，日本人始终把理想的封建关系看作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并承认上级的无限权威。在日本没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没有构成《大宪章》① 基础的诸种观念；也没有任何代议制经验。就这些方面而言，人们很难想象有哪种制度比日本向西方开放前的政治形态更不适应民主思想和制度了。

19世纪中叶的日本领导人也从来没有想要缔造一个民主的制度。与20 世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不同，他们并不感到民主是一个吸引人的概念，也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去努力创建一个民主国家。当时看来迫在眉睫的使命是，尽可能迅速建设一个能够对付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威胁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正如他们在奋斗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样，他们终于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因素对他们不无裨益。但是，民主只被当作达到目的手段，而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虽然日本人缺乏民主的经验和认识，但19世纪的日本人确实也从他们的遗产中汲取了许多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些财产的某些特性促进乃至鼓励了以后的民主发展。政治遗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强烈的统一意识。这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沦为殖民地以前往往没有多少政治统一意识。在日本，封建分权无疑妨碍了统一，但是，日本的相对孤立、不同寻常的民族单一性、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政治的传统和视统一国家为文明最高体现的所有中国人或东亚人的理想，这一切构成了日本统一的坚实基础。日本与其他大多数非西

① 《大宪章》，亦称《自由大宪章》，1215年 6 月由英王约翰签署，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权，保障封建领主与教会的特权以及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17世纪时，资产阶级对它作了新的解释，作为要求公民权利、商业自由与法治的法律依据。——译者

方国家的区别是明显的，从历史上看，这些国家或者教派林立，或者有种族和语言的分歧。

日本人和其他东亚民族都有政治统一的传统，但他们与其近邻有四方面的不同。第一是他们自觉地把自己与中国区别开来的自我意识。中国人把其他所有国家都看作自己的属国，朝鲜人接受了这种世界观。但是，日本人虽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空前庞大和声誉，但感到中国的文化影响基本上是异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此得到了加强。这种观念比中国人或朝鲜人的态度更容易适应中、日、朝三个民族都必须适应的西方国际关系观念。 233

第二种不同是，在日本，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理想同地方自治和划分为阶级的封建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的这个差别造成了19世纪时日本的国内紧张状态，分化了日本社会，从而使日本比中国和朝鲜那种历史悠久而坚如磐石的制度更容易变革。这种状况可能造成的一个变革是引进和发展民主观念和实践。

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的第三个特征是，19世纪的日本人能够在国内找到进行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正当理由，而这个变革是西方的威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找到的理由就是"恢复"天皇的统治。"王政复古"可以对消除封建政治、社会分裂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中国人找不到进行重大变革的内部根据，相比之下只有王朝更替，而没有出现体制的变化。因此，他们不得不指望某种外国的思想意识，例如共和主义、民主，最后是共产主义，以此来解释根本的变化。但是，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虽然中国人受到西方挑战的时间比日本人早，但他们发现很难进行根本的改革。1912年① 终于爆发一场

① 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这里可能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译者

共和主义革命时，它也只是成功地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而没有成功地创建一个能够取而代之并行之有效的共和国。民主虽然在理论上颇受推崇，但从未付诸实践。相反，中国先是沦为军阀势力，后又陷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一党独裁。直到1949年，即与西方的第一次战争过去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才最后凭借一种完全外来的思想意识——这一次是共产主义——重新实现统一。

日本人没有经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变化。19世纪的巨大变革被看作是本国古老制度的“恢复”，其他巨大变化都是从属于它的。因此，这些变革是天经地义的，尽管这些变革实际上导致日本社会的全面变化，实现了社会自由和普及教育，从而使代议制和民主观
234
念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并更能吸引人。在日本，民主是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虽然它在20世纪30年代步履艰难。但是，战后民主的强有力的复兴基本上是战前时代、尤其是20年代民主运动的继续，而不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或者从外国借鉴来的怪物。

19世纪的日本人与其近邻的第四个区别是，他们愿意向西方学习，尽管他们的最初目标是驱逐西方、恢复自己的古老制度。这也是日本人与非西方世界其他大多数民族不同的地方。中国人觉得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朝鲜人则只希望向中国学习。但是，日本人不仅知道他们已经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还认识到他们引进了源出于印度的佛教，从16世纪起又引进了葡萄牙的枪炮和其他技术以及“兰学”。当时，“兰学”将西方科学的新因素传入日本。他们对这一切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对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采取了一种比中国人和朝鲜人更加现实的赞赏态度。这样，他们认识到，要达到自卫和帝国复兴的目标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不必后悔的。相反，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顽固地抵制西方的一切新事物。

* * *

日本人从过去的遗产中得到的另一份重要的政治财富，是政府具备伦理道德基础的强烈意识，这是从中国的儒教遗产中派生出来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的行政官员比较诚实，效率很高。当然，日本也有残酷无情、阳奉阴违、平庸无能的政府官吏。给上司送礼是司空见惯的事，今天看来是行贿，而在当时却被视为体制的一部分，通常受到惯例的限制。在体制的范围内，几乎所有官员都诚实坦荡、忠心耿耿、克尽职守，而且效率很高，至少按照近代以前时期的标准来说是如此。例如，一些低级官员负责维持广大的将军私人领地上的秩序，收取地租，他们不计报酬、克尽职守。这使18世纪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统治者钦羡不已。

235

高水平的行政效率原封不动地延续到近现代，这是明治维新的权力转移及其后的体制变革相对平稳的原因所在。尽管当时存在着大规模的动乱，但没有出现法律和秩序的总崩溃，或者旷日持久的税收暴落现象。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已成功地从一个260多个封建自治藩国组成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新型的中央集权国家。

新政府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将官僚化的武士官员改组为中央政府和新型府县的官僚、现代警察部队和现代陆海军军官。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把中央的文职官僚机构分为各部(省)，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简单改革，因为他们在古代就已经借鉴了中国的分部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在德川时代也已经萌生。19世纪末叶，日本人轻而易举地改变了选拔官僚的方法，从德川时代的世袭制和明治初期的裙带关系，转变为机械地采用新型的教育制度和正规的考试制度。这种择优录取的新制度符合德川末期更重视个人才华的要求，而且与中国的考试取士旧观念相一致。因此，官僚的忠诚、效率和诚实精神始终有着很大的连续性。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日本官僚机构一直保持高水平的根本原因。这种值

得信赖的官僚的存在，为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基础。

另一份政治遗产是由集团而非个人进行领导的悠久传统。早在13世纪的镰仓时代，日本就已经存在权力分享的倾向。这体现在设于镰仓的各种会议所、派驻京都的两个所司代（代表处）和与镰仓幕府的北条氏"执权"（摄政）平行的"连署"制。德川时代的分权制更为明显，"大老"和"老中"是两个最高决策群体。下属的大部分行政职务都是由两人或四人集体负责的，他们与最高会议的成员一样轮流主事。

236 明治领导人继承了同一集体领导的总模式。与经历着迅速变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日本从来没有出现过独裁者，也从来没有人企图攫取这种权力。如上所述，后来被非正式地称为"元老"即"老牌政治家"的那些领导人，总是组成一个集体，轮流负责各种行政事务。1885年内阁制设立之后，他们轮流担任首相，当他们陷入困境或厌烦政务时就心甘情愿地退出舞台。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大久保利通在1878年被暗杀以前，伊藤博文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宪法时，都享有某种显赫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基本上也是作为集体的成员发挥作用的，就如运动队的一个选手那样。

权力的分享，后来甚至变得更为广泛。权力分享者数目的扩大，最终导致完全意义上的分权制民主制度的产生。从这种意义上说，民主制度是自然的发展，而不是突然的变化。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明治维新最初的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个人间的权力分享比机构间的权力分享扩大更快。根据1889年宪法，权力均衡在许多集团间稳定地移动：首先是"元老"政治家，后来是其继承者即天皇周围的高级官僚、文职政府的各省（部）机关、军部、国会和相互竞争的政党、大企业和普通大众。起初，元老高高在上，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尽管他们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主宰一切。到

20世纪20年代，国会和政党占据了权力制衡的中心，大企业和普通民众通过政党的影响来增加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份量。20世纪30年代，军部，尤其是陆军在权力制衡中取得了领导地位。1941年日本进攻美国前夕，东条英机掌握了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人享受过的巨大权力。但是，即使东条英机的权力，也只是一个领导集团的权力，而不是一个独裁者的权威。1944年战局恶化时，他顺从地离职了。因此，对独裁权力乃至领袖权威的反感和对群体合作的酷爱，构成了日本政治遗产的特征。这有助于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取得最终胜利打开大门。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另一份遗产是，社会对正规教育的强烈重视和19世纪中叶时比较高的识字率。普及教育是日本社会迫在眉睫而又切合实际的目标。教育反过来又使新日本有可能取得许多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成就，并奠定成功的大众民主制度的发展基础。237 日本与当代许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有明显的差别，这些国家开始现代化时识字率很低，而教育又必须与冷漠甚至敌意的潮流作斗争。

19世纪的日本人还有一份重要遗产，那就是强烈的企业精神，尽管这基本上与经济发展有关，但也具有政治意义。企业精神不是封建社会和大多数前近代社会制度的特征，但到德川时代末期，日本的企业精神已令人刮目相看。武士集中在将军的首都和大名的城堡，乡村摆脱了严密的封建控制，基本上成为自治的实体。国家成为统一的经济单位，也使商业活动得到广阔的天地。17世纪时的城市大商人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到18纪世纪发展到顶峰，但此后进入停滞状况，其后，乡村企业家发展了这一主流。他们加工当地农产品，然后出售到其他地区的市场。在日本开放国际贸易、新政府削除了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障碍之时，大多数农民企业家已作好抓住这个新机会的准备。日本人民的响应同日本政府的努力

一样，也是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原因所在。

在争取大众参与政治的进程中，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和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他们经常作为政府的低级官吏行使自己的职权，在处理自己共同体的事务中享有许多自治权，从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正象在经济领域中响应明治维新的新自由主义那样，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要求在政治决策、特别是在税收事务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日本过去虽然不存在"权利"观念，但农民领导人的自治职能相当于这个权利，他们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权利。武士阶级的许多成员丧失了封建特权，并被排除在新体制的权力结构外，他们自然热衷于重新获得过去的地位，或者通过其他手段取得分享权力的权利。因此，他们进行骚动，偶尔举行叛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世纪70年代，农民也和他们一起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可见，民众权利和政治参与并不仅仅是奇怪的外来思想，而是从日本国内条件中自发形成的观念。虽然使用的术语确实是从西方借来的，但是，异军突起的自由民权运动却是在日本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它最终奠定了日本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

238

因此，虽然最近时期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以心理上缺少连续性为特征，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构成近现代日本政治发展的特色。尽管日本有些时期变化非常迅速，但它的发展基本上是进化，而不是革命，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也表明进一步发生的不管是怎样的变革，都将在日本内部的条件下自然发生。总之，19世纪的日本人虽然缺乏任何民主的背景，但从他们的遗产中汲取了许多直接促进民主发展的品质和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十二章 天皇

239

日本人经常声称：他们的国家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从朦胧的初史时代以来，日本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统治家族。其实，大约从9世纪起，天皇就失去了对国家的实际控制权；1333年后醍醐天皇重振天皇权威的努力失败后，日本人再也没有作出努力将实际统治权归还天皇。然而，人们始终非常尊崇天皇，而且在进入现代以前，没有人向一切合法政治权威最终来自天皇的观念提出过挑战。

如上所述，19世纪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大步骤就是阐明有必要"恢复"天皇统治。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天皇制的兴趣和尊敬有增无减。推翻德川幕府的集团发现"尊王攘夷"是一个有力的战斗口号。后来，控制天皇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因此，"王政复古"使天皇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一切变革都是在他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是，新领导人从来没有想过天皇应该名副其实地进行统治。一千多年来，天皇统而不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1868年时明治天皇终究只是一个年仅15的少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观点和爱好确实有些份量。但是，辅佐他的大臣却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不能只是贯彻"圣意"，还必须代替天皇决定"圣意"。明治天皇之后是大正天皇（1912—1926），他精神失常，很难参与任何决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领导人对天皇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同时又无视天皇的意240愿，将自己的决策强加在天皇身上。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领导人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天皇未来的地位。对于非日本人来说，对天皇的诚惶诚恐和对他的无情摆布是难于理解的。

对天皇的这种奇特的双重态度体现在1889年宪法中。伊藤博

文认为基督教为西方立宪政府提供了潜在的精神力量，他很爽直地想从天皇制中找到它。他感到，日本没有基督教，也没有其他合适的宗教，必须从天皇制中找到日本的精神源泉。在起草宪法时，伊藤博文真诚地认为，日本只有通过尊敬天皇才能找到精神上的统一。这样，1889年宪法就宣布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强调皇室“万世一系”的连续性。宪法赋予天皇以国家主权和政府的所有权力，规定“天皇制定行政各部之官制，……统率陆、海军，……拥有宣战、媾和以及缔约的权力”。天皇的权力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宪法又规定，天皇只能在“帝国议会协助、赞同下行使立法权”，他只“批准法律，并下令公布执行”。“所有法律、敕令、条例……均需一位国务大臣的连署签名”；司法权应“由法院依法行使”，只是要以“天皇的名义”。

1889年宪法关于天皇权力的模棱两可的规定并没有引起误解。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从未固执己见，反对大臣们的决定。据说，昭和初年，当代天皇曾反对过军部的活动，要求对那些导致战争的步骤进行反思。但是，他亲自作出的唯一的政治决定是，在1945年8月他的大臣们对投降问题各不相让时，决定接受同盟国的最后通牒，但这是在他最亲近的顾问敦促下做出的。

明治体制的缔造者卓有成效地将天皇塑造成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们向全民族灌输对天皇的狂热崇敬。“国家神道”支持这种态度，它强调天皇身上萦绕着神圣的光环。普通百姓不得正视天皇。全国所有学校都挂天皇的画像，视同圣像，并且尽可能放置在独立的小神龛中。后来为了避免遭灾被焚，这种神龛往往用钢筋水泥浇筑。从理论上说，所有日本人都是为报答皇恩而活着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心甘情愿地为天皇战死疆场。在其他现代国家中，人们可以看到对国旗的崇拜，但战前日本人对其国家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称得上现代民族主义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

241

明治体制的塑造者想通过天皇崇拜而获得伊藤博文梦寐以求的精神统一，但他们未能如愿以偿。除了20世纪的少数激进分子外，实际上没有人怀疑政府的职责在于履行"圣意"，甚至连国会中的政党议员也如此认为。但是，究竟"圣意"为何物，却莫衷一是。天皇身边的高级官僚认为，只有他们才能恰当地阐述"圣意"。开始，他们还能通过声称天皇支持他们的看法来压制反对派。但是，早在1913年的所谓"大正政变"中，他们就发现议会已不再屈服于这种压力了。政治家认为"圣意"体现在选举时人民的呼声中。军国主义者和极端国家主义者则相信唯有他们才能理解"圣意"。从来没有人想到去问问天皇本人。如上所述，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阐述，在20世纪20年代为大多数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所接受。但是，1935年被宣布为"冒渎圣上"。当时已经掌权的军部反复企图阐明"国体"，即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体制，但结果总是神秘而含混不清。

从根本上说，宪法关于天皇作用的规定是模棱两可的，这也给政府核心造成了一个危险的真空。一切权力源于天皇，天皇却不行使任何权力。宪法也没有明确规定代替天皇行事的重臣的遴选方法。实际上，遴选方法因时而异，从未得到明确界定。这种遴选起初主要根据"元老"的决定，后来变成由处于领导地位的显贵协商决定，其中议会党团作用最大；最后协商决定逐渐为军部势力所左右。天皇"统帅陆海军"被歪曲为军部独立于文职政府之外，军部最后甚至控制了天皇。1889年宪法的特殊的含混不清之处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242

* * *

战后颁布的1947年宪法已澄清了所有这些问题。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拥有主权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根据。"天皇的职能纯粹是象征性的；

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不拥有与政府有关的权利”。为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宪法进一步规定，“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承担责任。”“国家神道”被明令解散。1946年1月，天皇发表了否定天皇神格的《凡人宣言》。这主要是为了取悦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因为天皇的“神格”对他们来说比对大多数日本人意味更为深远。天皇继续主持某些传统的神道仪式，但官方规定这些仪式不具有任何宗教意义。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省降格为直属总理府的宫内厅。皇室经费大大削减，和其他预算一样由国会控制。皇室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皇室成员仅限于天皇的直系亲属及其三个兄弟的直系亲属。今天，甚至连天皇已出嫁的女儿也列为平民。

亲身经历了天皇职能的这一重大变化的是天皇裕仁，这是他签署文件时使用的名字，日本人从不这样称呼他，而是称其为“天皇陛下”或“当今圣上”。裕仁天皇的在位时间比任何一位前辈天皇都长，到1976年他在位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他以一种明显的宽慰心情来适应宪法所规定的新角色。他身着便服，扮演文职政府和人民的象征的角色。这无疑比战前身穿军服、骑着白马检阅远征军要轻松悠闲得多。新角色更适合他的个性。他是一个和蔼腼腆、表里如一的人，一个酷爱家庭生活的模范。他还是一位热心的海洋生物学家。

243 日本人对天皇制这一理论上的巨大变化的反应，比天皇本人的反应还要重要。他们显然轻松而赞同地接受了这个变化，因为这一变化终于使理论和现实得以统一。极少数思想僵化的民族主义者仍然鼓吹恢复旧“国体”，而不管国体终究为何物。战后最初一、二十年中，比较保守的政治家也主张把理论上的主权归还给天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些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上年纪的日本人对天皇依然毕恭毕敬。很多乡下人自愿清扫东京宽

阔的皇宫广场，以表示对天皇的敬意。然而，大部分日本人对天皇只有一种模糊的尊敬和爱戴之情。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天皇抱着十分冷漠的态度。但是，日本也没有出现影响深远的反天皇运动。今天，即使共产党也不号召废除天皇。1959年皇太子与一位商人的娴静女儿结婚，这个商人即使根据战前的标准也是平民。这件婚姻在日本青年人中甚至重新引起了对皇室的兴趣和赞许。年轻的皇太子夫妇在网球场上一见钟情而陷入情网，这个事实富有感染力，充满了浪漫和民主的色彩。 244

总之，战后的天皇制已经非常接近北欧成熟的民主国家建立已久的现代王国模式。皇室完全脱离政治，仅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秩序稳定的标志和连接过去时代的安慰人心的感情纽带。任何利用天皇影响政治的做法都遭到强烈反对。但是，除此之外，天皇制作为一种没有争议的永恒的国家装饰品，似乎已经被普遍接受。对于日本和北欧那些基本上通过渐进而不是革命的手段取得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这种君主政体是一种比较合适的形式。

第二十三章　国会 245

1947年宪法不仅剥夺了天皇的一切政治权力，而且明确规定实际权力属于国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已经发展起来。在制定1889年宪法时，明治朝领导人决定建立一个由部分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目的在于赢得西方的尊敬，巩固普通百姓的支持，并将其作为一个发泄不同意见的无害的安全阀。他们在推行这项大胆的改革以前，进行了选举各种地方机构的试验。首先，1878年进行府县议会选举，接着，1880年和1888年又进行町村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这些地方议会和新型的国会

权力非常有限，并且是由限制极其严格的选举人选举产生的。只有年龄25岁以上、每月纳税15日元以上的成年男性才在国会选举中有选举权。因此，1890年时选民仅占人口的1.26%，加上家属不过6%左右。这个比例与旧武士阶级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但是，拥有选举权的精英集团基本上是由农民土地所有者和商人组成的。

尽管天皇在国会闭会期间可以发布敕令，但所有永久性成文法都需要得到国会的"同意"。预算和税收尤其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政府的许多活动，如外交，并不需要法律认可，因此也不需要国会批准。但是，财政事务被看作是国会的特权，因为金钱归根到底是由人民作为税款交纳的。但是，即使在财政领域，政府也挖空心思逃脱民众的控制。宪法规定：国会如果不通过新预算，"政府则执行前一年的预算"。这张防止国会控制钱袋的所谓王牌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早在1881年就为新宪法认可了。

246

在国会中，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权力也受到贵族院的限制。贵族院是模仿英国的上院而设立的，它拥有与众议院平等的权力。如上所述，政府为了建立贵族院，于1884年设立新的贵族(华族)，包括旧的朝廷贵族、以前的封建大名和一些新领导人。华族的上层却是贵族院议员，较低的三个等级选举一定名额的议员。此外，还有敕选议员，他们大都是学术界人士，以及从各府县纳税最多的人中选举的议员。这样组成的贵族院显然是对下院活动的一种极端保守的制约。

尽管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国会仍然难以驾驭，并成功地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和选民范围。各民众党派凭借1878年以来从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的经验，赢得了从1890年国会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所有全国大选的胜利。即使在1892年臭名昭著的第二次大选中，尽管政府肆无忌惮地诉诸贿赂和警察镇压等手段，政

府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也远远未能达到多数。事实也证明，政府自以为了不起的那张预算王牌并没有什么作用，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往年的预算总是入不敷出。政府每年想使国会通过预算，但都不尽人意，极其困难。因此，有些政府领导人甚至建议废除国会。但是，其他人害怕废除国会等于承认现代化理想的失败，会使日本人在西方人面前丢人现眼，并威胁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因而否决了这个主张。

政府领导人终于和政友会达成妥协。19世纪90年代开始实现试验性的妥协，1900年以后变成长期的妥协。1900年，伊藤博文联合追随自己的官僚和从板垣退助派分出来的政治派别创立了政友会。政府为了报答政友会在国会中的支持，给予政友会对国策的某种发言权和少数内阁职位及其他好处。政府与国会的均衡不断变化。政友会和1913年创建的第二个大反对党民政党逐步得势，并稳步攫取了政权。1918年，一位名副其实的政党领袖原敬被选为首相，主要原因是政友会在国会取得了多数席位。此后14年[247]间，除了1922年至1924年这个短暂的时期以外，所有首相都是政党领袖，他们是由众议院多数党选举产生的。而且，除陆相和海相外，历届内阁基本上都是由政党成员构成的。

与此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日本其他方面的现代化，选举权也逐步扩大。从1900年起实行无记名投票制，纳税资格也降为10日元，因此选民几乎增加了一倍。1919年，纳税资格降为3日元，选民因此又增加一倍以上。当时，1/4的日本家庭有人拥有选举权。最后，1925年完全废除纳税资格，所有成年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

这样，在仅仅35年的时间内，日本的政治体制就从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极权制发展成为民主制，这个民主制接近1867年实行男性公民选举权后的英国议会制。当然，日本议会制度的基础不像英国那样稳固。20世纪30年代恢复军部的控制就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首相也许是下院多数党的领袖，但他当选为首相既不是自动
248 的，也不是由国会任命的，而是由假天皇名义行事的人遴选的。而且，首相和国会从来没有牢固地控制陆军和海军，甚至也无力控制某些官僚机构。然而，应该注意，这种议会制度尽管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染上了英国式议会制度的色彩，但基本上是日本内部事态演变发展的结果。英国的议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形成时期，相比之下，日本议会制度的形成只用了很短的时间。这个制度坚强有力，构成了战后议会统治勃然复兴的基础。

* * *

根据1947年宪法建立的议会民主制，本质上是对20世纪20年代演变而成的制度的澄清和完善。正因为如此，它很容易得到所有日本人的理解，并且卓有成效地运行。主要的改革是明确规定“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并赋予国会选举首相的权力。首相从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众议院和参议院意见不一时，由众议院选举。首相负责选择内阁大臣，并任命其他官员。众议院有权对首相投不信任票，在这种情况下，首相必须辞职，或者解散众议院举行新的大选，以取得多数支持。

战后议会制度的另两个重要变化是选举权的扩大和参议院性质的变化。20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全部由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代替了贵族院。参议院的产生方式与众议院不同，目的在于减少参议员的党派色彩。参议员有252人，任期6年，每隔3年改选一半。152名参议员（1972年冲绳归还日本后由150名增至152名）由47个都道府县选举产生。为了保证每个都道府县在每次选举中至少有一个席位参加竞选，每个县至少要选举两名参议员。人口越多席位越多，例如，东京都拥有8个席位。其余100名参议员由全国选举产生。起初，参议员选举是以个人为基础的，
249 结果许多被称为タレント（源于英语 talent，即“有才能的人”）的

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名作家当选。但在最近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参议员候选人是由政党提名的。

参议院不再像战前那样是众议院的制约因素。由于参议院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因此其构成与众议院大体相同。众议院拥有一切实际权力：它从众议员中选举首相；预算应先提交众议院审议，即使参议院仍在开会而未予批准，众议院的预算案30天后可自动成立；至于其他一切立法，众议院只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可以使参议院的否决失效。参议院唯一的重要权力是宪法修正案需要国会两院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批准才能生效；但直到今天，并没有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1889年的宪法从未做过修正，而1947年的所谓修正实际上已经使它成为一部全新的宪法。

战后的众议院与战前的下院非常相似，基本上是按照20世纪20年代的方式运转的。实际上，众议院根据战前和战后的惯例行事。同以往一样，众议院每四年选举一次，但在四年届满之前，首 250
相往往在对自己及其政党有利的时候解散国会，举行选举。选举制度（详见第25章）仍是1925年议会改革时确立的那种独特模式，甚至众议院的席数仍是1925年确定的466。但是后来随着人口的变化席位逐渐增加，1986年达到512席。

国会一般从一月底才开始认真工作，四月份财政年度开始前将预算审议完毕，这与美国国会的活动周期不同。美国国会总是要到财政年度已经过半的时候才表决预算。国会两院分别选举自己的议长，议长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包括为防止发言过长而阻挠议案通过而限制辩论时间的权力。议长有权任命委员会委员，两院的每一个议员都可以获得一项以上的委任，虽然这些任命实际上是由各党决定的。按照传统，各党可以根据它在国会中的力量，分配到一定数量的委员的任命。参议院各委员会主席也是依据各党在议会中的力量分配的。但是，众议院的所有常设委员会主席

均由多数党议员担任。1977 年后，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中只占微弱多数，它不得不与反对党分享某些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国会两院各自 16 个常设委员会，根据需要还可以就特殊问题设立特别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是决算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前者经常对政府过去的活动争论不休，因而引起大众传播的密切注意。后者则已成为传统的质询中心，即向内阁成员提出关于政府的几乎所有问题。

战后的日本国会设立了一整套委员会制度，从而明显背离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战前日本的国会制度。设立委员会的目的本来是想使日本的议会程序更加接近美国国会的活动方式，但并没有如愿以偿。两种民主制度即总统制和议会制，不能简单地混为一体。根据英国的议会制度，首相及其内阁是议会多数党的产物，因此是对议会负责的执行委员会。这样，立法和行政就不象美国行政那样，作为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达到平衡。结果，大多数法律，251 包括所有重要法令，就不是由国会、而是由官僚代表内阁起草的。法案由内阁提交国会，然后由选举首相的同一国会多数通过。

这样，国会的委员会不像美国那样，对提交的法案进行详细的研究，或者加以斟酌、修改。这些职能由其他机构承担，主要是执政党的委员会，国会的委员会则行使其他职能。反对党利用任何一个委员会和两院全体会议拖延、乃至阻挠立法，以此对多数党施加压力，使其做出妥协。预算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的质询在政治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质询作为国会活动的一个特征，在战前已经发展起来。日本议会的质询堪与英国下院著名的“提问时间”相媲美。反对党议员提出各种旨在诘难政府的问题，而内阁大臣或他们的代表则尽力逃避责问。执政党议员也可能提问题，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内阁大臣能进一步阐明他们希望强调的问题。这两类提问和回答都不会改变委员会或以后国会中的任何一票，其目

标是大众传播和普通百姓，目的在于取得支持并准备下一轮选举。由此看来，美国人出于某种目的而设立的委员会制度已被恰到好处地运用于日本的议会制度，但其作用与原先的设想完全不同。

第二十四章　其他政府机构

252

如上所述，首相（总理大臣）是由国会议员从议员中选举产生，并且总是从众议员中选举产生的。因此，相比之下，日本首相的权力要比美国总统小得多，更像是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往往缺乏那种按照美国方式通过全国选举产生的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战后唯一一位可以看作是独断专行甚至刚愎自用的首相是吉田茂，他从1946年至1954年担任两届首相。然而，他的权力的奥秘在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绝对权威。他任首相7年，有5年处于占领时期。

虽然首相是由众议院选举产生的，但他实际上是由执政党大会选举产生的。从1955年自由民主党（自民党成立以来，它就）一直是执政党。自民党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是国会议员，他们选举的党的总裁当然也被国会的多数党选为首相。由于存在着各种政治偶然性和党的总裁选举规则变化无常，因此首相的任期也有很大变化。岸信介（1957—1960）、池田勇人（1960—1964）和佐藤荣作（1964—1972）的首相任期比较长。佐藤荣作任职7年，实际上是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此后的5位首相平均任期只有两年，有两人在国会中缺少强大的支持。田中角荣（1972—1974）是多年来国会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但因卷入金钱丑闻而被迫辞职。福田赳夫（1976—1978）因违反党的总裁候选人应先参加全国初选竞选的新规则（现已取消），而被在初选中获胜的大平正芳（1978—1980）所

253 取代。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平正芳在任内去世。1982年，中曾根康弘在田中角荣的有力支持下当上首相，并根据目前党的规则任满了两届任期，共4年；随后，因自民党在1986年7月6日的选举中表现突出而得以再任首相1年。

首相选择内阁大臣，其中大多数必须是国会议员。事实上，所有内阁成员都是议员，这同英国的制度一样。仅有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著名企业家藤山爱一郎于1957年出任外务大臣（外相），一年后他才当选为国会议员；从大学教授转为新闻记者的永井道雄于1974年被任命为文部大臣（文相）；前外务省官僚兼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信彦于1977年被任命为负责外贸的特别国务大臣；著名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于1979年出任外务大臣。

内阁大臣中有12人分别担任12个省（部）的首脑，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大藏省、通产省和外务省。其余不担任大臣职务的国务大臣一般担任比较重要的官厅的长官，如相当于首相的秘书长的官房长官、相当于白宫办公厅的总理府总务长官。经济企画厅、防卫厅和科学技术厅的长官也是内阁成员。

大多数内阁成员的任期比首相短，通常只有1年。任期间，他们最多只能对各自的省、厅确立极其一般的政策控制。国会议员出身的政务次官的任期也很短，并且没有什么重要的职能。但是，这些职位有助于担任者树立自己的声望，这是参加未来国会竞选所必需的，因此令人垂涎三尺。

国会议员出身的大臣领导体制软弱无力，使各省、厅得到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各省、厅基本上是由事务次官为首的、组织严密的职业官僚精英集团组成的。人们诙谐地称事务次官为脑袋，大臣或长官是戴在他脑袋上的帽子。这与许多西欧议会制国家的情况十分相似，但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美国，
254 行政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和许多部长助理以及次要官员都是总统

任命的，他们想方设法代表总统实行严格的控制。因此，日本的省、厅一般比美国的部、局拥有更多的个性和政治发言权。主要的例外是，美国国防部比政府其他部门有较强的个性和影响，而日本防卫厅无疑比其他政府机关缺乏个性和影响。由于各省、厅官僚终身在该部门服务，只是偶尔被借调到别的省、厅或地方政府，因此每个省、厅都形成一个坚决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界线分明而牢固的官僚集团。虽然省、厅内各局和各派之间可能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是在与其他省厅甚至执政党的竞争中，各省、厅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只提出该省、厅的政策，并为之而奋斗。

当代日本的官僚机构显然继承了战前官僚机构所确立的高度诚实、效率和威信。高级官僚是日本教育制度造就的精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英集团。他们是经过严格的选择考试程序，从名牌大学特别是东京大学遴选的。他们的地位稳固，业务上精明能干。这些高级文官在与政治家打交道时充满自信。这在美国极其罕见。他们洋溢着活力，因为55岁就退休的早退休制度意味着担任各省、厅高级职务的官僚都是50岁刚出头、至少有20年省、厅工作经验的年富力强者。高级文官虽然声望很高、权力显赫，但工资并不高。

处于官僚机构金字塔底层的是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大批下级工作人员和各种专家，包括公立学校的教授和教师、警察、国营铁路和少数政府专卖行业（如烟草）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经过考试选拔的，大多数则是凭学历和成就谋取职位的。这与其他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情况相似。

战前的官僚总是很骄横，并以恩赐甚至蔑视的态度对待黎民百姓。警察尤其如此，人们对他们既怕又敬；但是，就连铁路官员也身着制服，趾高气昂地招摇过市。这种态度可能是封建时代的遗风，那时武士阶级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和社会公职，“官尊民卑”的思想泛滥于世。 255

然而，战争的失败和战后的崩溃使所有权威威风扫地，人们对权威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荡然无存了。高级官僚确实继续享有巨大声誉，但这是因为他们水平高和掌握着明显的政治权力。下级官吏当然引不起人们的特别敬意，人们实际上常常用恼怒和蔑视的混合感情对待他们。美国人和西方人对那些没事找事的下级官吏也表现出同样的恼怒和蔑视。实际上，日本的小职员往往彬彬有礼，克尽职守，和高级官僚一样继承了优秀的传统。这两个集团都不把自己看作是旧意义上的"官老爷"，而是现代的"公仆"，别人也不这样看他们。

*　　*　　*

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都、道、府、县，其下是市、町、村，最大的那些城市再划分为区。都、道、府、县沿袭了战前的体制，面积也与战前大体相当；从理论上说，它们实际又分成不同的四类，全国有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和京都府）和43县。如统而言之，日本人就只好使用相当啰嗦的词：都道府县。县级以下的地方管辖范围（行政区）是中央政府长期强制推行合并演变而成的。人口在3万以下的地方称村，不到5万的称町，5万以上的称市。所有的村都是由许多称为"部落"的小自然村组成的。所谓的町或小城市通常包括一个以上的市镇和大片郊区及"部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权力很大的内务省任命县知事，控制警察，对所有地方政府实行严密的监督，其方式与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方式一样。在军事占领时期，美国当局决心取消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按照美国方式培植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即使在战前，都道、府、县和市、区、町、村也各有选举产生的议会。市、町、村的长官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战后，这些议会继续存在，权力大大扩张，同时（都道府）县知事和市长现在也经选举产生。（东京在战后只设

256

都知事，无市长)。内务省被废除了，它的职能转归规模较小、权力不大的自治厅(后升格为省)。警察控制权转归地方司法机关，教育控制权基本上也从文部省移交选举产生的地方教育委员会。

然而，总的来说，这种扩大地方自治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式控制的旧制度根深蒂固，而且，这种制度似乎更适合地少人多的日本。然而，即使集权程度更高，它毕竟也像法国和英国那样，是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国家，各市警察分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军事占领结束后，又恢复了中央政府的公安厅，协调警察部队的权力。由于担心不合格的人控制选举产生的地方教育委员会，日本人对这些机构实行委任制，并将大部分监督控制权收归文部省，但地方机构仍然保留许多权力。知事、市长和县市议会的选举成为各地日本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全国政治生活的基础。

扩大地方自治事业的一个致命缺陷是，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以充分的财政基础，使它们能按应有的各项职能行事。地方政府只能从税收中提取所需资金的30%，其他70%不得不指望中央政府从预算中划拨。随着金钱而来的当然是中央的控制。据估计，地方政府五分之四的工作是代表中央政府的省、厅进行的，许多地方政府的要员是从中央省、厅暂时借用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充分控制着地方政府。例如，许多地方法规是按照中央政府提供的模式制定的，各(都道府)县在东京都维持着庞大的办事处，知事和市长有相当多的时间留在首都，以便与中央政府进行协商。近几年来，人们的政治兴趣多多少少已经从对外政策和国民经济 257 增长转移到保护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上来，地方问题的份量相应地上升了，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也提高了；但是，即使是在这些问题上，全国性的政策也仍然优先于地方性的政策。

* * *

当代日本的司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战前的司法制度。战前的司法制度虽然具有时代性的专制倾向，但保持着高效率、公正和独立性。新宪法在司法领域进行的主要改革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最高法院（最高裁判所），并赋予它一切司法权。最高法院任命下级法院的法官，并且有权裁定所有法律是否违宪。最高法院的法官由首相任命，但一经任命，就同下级法院的法官一样，只有经过正式的弹劾程序才能被罢免；最高法院法官的罢免则必须经过公民投票，因为被任命后他们的名单在第一次大选时就已在选票上公布了，以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全民投票。但是，最后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并不那么引人注意，所引起的反对票无足轻重。

法院对立法是否合乎宪法规定进行司法审查是美国人的一项发明，这给纯粹的议会制度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在英国的议会制度下，议会凌驾于一切之上，日本的最高法院通常也不愿意反对国会的政治决议。它不追求美国最高法院那种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施加强大影响的功能，而是恪守狭隘的法律决定，尊重国会多数的表决。

尽管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青年法官组成的下级法院有时会判决某些法律违背宪法，但最高法院往往否决原判。1952年最高法院规定：最高法院不裁决抽象的宪法问题，而只判决具体问题，坚持重要的政治考虑和公共福利至上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当地方法院根据宪法第九条，即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永远放弃“国家的交战权”而对自卫队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否符合宪法提出疑问时，最高法院始终予以否决。这个判决的效果是认可国会有权对表面上无法通融的宪法条款重新进行解释，从而使宪法允许自卫并建立所需要的军事力量和同盟。民意调查表明，普通大众看来大多同意这个重新解释。

然而，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都是宪法所规定的个人权利的忠诚捍卫者。宪法中关于"基本人权"的规定不下30条，并且不像1889年宪法那样，用诸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的词句加以限制。70年代初期，污染（日语作"公害"，含义较广）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这时法院通过了一系列标界决定，确立了公害制造者必须赔偿受害者的损失的原则。最著名的案例是，九州海滨城市水俣的水产品造成水银中毒事件；污染源早在1959年就已查明，但最高法院直到1978年才做出终审判决。

19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法律是建立在欧洲大陆的成文法系统，而不是以英美的习惯法体系之上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法律的自由主义色彩大大增加，大量采用美国法律中司空见惯的宪法保障条款。但是，日本法院没有模仿美国的对抗制①，而是由法官尽力找到事实根据，律师只是作为有关当事人的顾问。战前，有一个时期，使用陪审团与否是可以选择的。但是，由于陪审团的裁决难于预料，采用陪审团的审判往往被认为是承认案件棘手，因此战后毫无遗憾地放弃了陪审团制度。

在刑事诉讼方面，检事（相当于美国作为州利益代表的地区检察官）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不予起诉。与此同时，因为法官的反应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料到，所以检事的定罪率达到99%以上的惊人记录。这种制度中没有认罪求情协议；有见识的日本人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感到惊诧，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司法制度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是认罪求情协议。总的来说，日本法院做出的判决是宽大的。法官将罪犯的悔过态度考虑在内，真诚的悔过被看作是自新的重要第一步。 259

① 对抗制：英美法中的一种诉讼制度，这种制度允许双方当事人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进行辩论，法官只能就辩论范围以第三者的姿态加以决断。——译者

大部分家庭和少年案件由专门的家庭法院处理，但日本人尽可能通过调解、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法庭程序解决民事案件。事实上，日本人不喜欢打官司，他们宁愿接受仲裁和妥协，诉诸法庭是走投无路的办法。因此，他们的制度虽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讨价还价，但这是个人之间而不是个人与法院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方式适合日本人关于个人间和团体间的关系的观念。最近几年，只是在把完全无关的人纠缠在一起的交通事故案件中，诉讼才有显著增加。

敏感的政治案件，如对自卫队违宪的指控、公害造成损失的复杂问题以及涉及游行示威和罢工者的合法政治权利同维持法律和秩序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案件等等，可能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审判和上诉而拖延好几年。但是，总的来说，日本人觉得他们的法院运转得非常有效，很少抱怨法庭犹豫不决、朝令夕改，而这在美国是屡见不鲜的。警察很受尊敬，特种防暴警察训练有素、表现突出，有效地控制了暴力行为。大多数人遵纪守法，赞成实施严厉的法律，以禁止个人拥有枪枝和吸毒。在日本实际上不存在吸毒问题，暴力犯罪率也比美国低得多。除了极权主义国家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世界上没有比日本的街道更安全的地方。总之，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衡量，日本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

在日本，诉讼案件不经常发生，因此律师的作用也比美国律师的作用小得多。按人口平均，日本的律师还不到美国的1/15。律师同法官和检察官一样，都是由国家实行的制度产生的。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有资格参加政府举行的法律考试。政府每年从考生中选拔数百名成绩优秀者，在最高法院指导下由日本法律训练和研究学院进行大约两年的强化培训。合格者可以自由选择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职业。如果担任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可以成为声名显赫的政府官员。如果当律师则可能得到更多的金钱。但是与美国的律

260

师相比，日本律师没有那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大多集中在东京和其他大城市，主要处理涉外经济关系。在美国，有2/3的国会议员当过律师，而在日本，律师出身的国会议员寥寥无几，实际上比医生出身的议员还少。

尽管日本人不喜欢打官司，但他们的法律观念很强。他们习惯于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由强大的官僚机构实行监督，并由繁缛的法律条文和无数官场原则仔细地加以控制。日本的官僚机构以及企业界和政界的许多领导人是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日本人通常谨小慎微地遵守法律条文。但是，日本司法制度的核心人物不是律师，甚至也不是法官，而是基本上受到法律培训的高级官僚和克尽职守的广大小职员。

第二十五章 选举

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选举也是日本政治生活的中心。日本的选举制度有其特色，这些特色既造成一些具体问题，也具有某些明确的优点。知事、市长和一些参议员按照美国方式选举产生。有100名参议员基本上按照欧洲大陆常见的方式，从各党推荐的候选人中选出。但是，最重要的政治机构众议院、参议院的其他议员和许多地方议会是按照日本独特的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根据这种选举制度，全国划分成许多选区，每一个选区选出数名代表，但是，一个投票人只投一票。这种选举制度产生一种松散的比例代表制，既不同于出现席位大变动的英美制度，也不同于有些欧洲大陆国家盛行的派系林立的极端分散的制度。

这种选举制度，与其他许多政府部门一样，也是从战前继承下来的。长期以来，围绕着美国式的一个选区选举一名代表的选区

制（在日本称为小选区制）和大选区制（一个选区可以选举多名代表，如东京多达16名）各自的优点就进行了争论，最后于1925年决定采纳目前的中选区制。根据中选区制，众议院议员从3席至5席选区选举产生，大约半数的参议员从2席至4席选区选举产生。都道府县议会和大城市议会的选举采取同样的制度，但市町村议会选举中候选人则由该地区选出。

262 在关键性的众议院选举中，在5席选区获得将近20%的选票就可以当选一名议员。因此，少数党可以得到一定的代表比例，但大多数派生的小集团则无力问津。在一个选区要改变一个政党的力量，需要20%以上的选票改变投票方向，而不是仅仅通过一个席位的转移。因此，在这种制度下，政党的力量不会发生突如其来的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英美的选举制度下是屡见不鲜的。在英美的选举制度下，在许多获胜者取得全部选票的单席位选区中，只要有几个百分点的变动就会导致政治的大转向。因此，日本国会的构成既比英美的议会稳定，也比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议会牢固。

日本的选举制度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竞选与党纪间维持良性平衡，国会议员和选民间保持密切关系。由于大政党的候选人一般与本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候选人争夺选票（其他政党候选人的选票他们无论如何也是争取不到的），因此他们在当地必须有高度的感召力。他们不能像在英国那样由中央党部分摊一个保险的席位，也不能像在有些欧洲国家那样充当不抛头露面的全国名人。他们必须按照美国方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方居民，或者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或者是当地出生而在城市飞黄腾达的人。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地方政治机器来支持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藐视党纪，这在美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他们要获得更大的当选希望，就必须通过正常途径得到党的批准，这只能由党的中央本部授予，而不是靠独立参加地方初选所能得到的。这种情况促

使国会议员遵守党的纪律，不管他们个人的地方权力基础如何。即使一个特别自信的地方候选人打破常规作为无党派人士当选后，一般也立即回到该党，遵守党的纪律。

然而，这种选举制度也有一个弱点，即给大党带来特别的困难。一个小党在一个选区自然而然地只提出一个候选人，一个大党则指望获得一个以上的席位。然而，如果一个政党在2席选区提出3个候选人，就可能因为选票分散而最后只有一人当选。如果有一个候选人太受欢迎而吸引了过多的选票，党的其他候选人就可能因此落选。如果该党的选票比较均衡地分配，他们就能够全部当选。

263

日本选举制度的更大一个弱点是，缺乏使选区和席位的数目同人口变化自动适应的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466席大体是平均分配的。但是，战后以来农村地区人口外流、都市地区人口激增，城市地区偶尔增加的少数席位不足以改善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1976年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这种制度是不平等的，因此是违反宪法的。但这次判决并没有立即生效。1986年剥夺了农村地区的7个席位，城市地区增加了8个席位，总席位数达512个，城乡不平衡状况稍微有所改善。以前，代表人数过多的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席位之比为5：1，改革后这种不平衡缩小为3：1。在都道府县议会选举中，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席位的不平衡仍保持将近5：1的比例。但是，与美国参议院议员选举中悬殊的70：1的不平衡相比较，这是微不足道的。

* * *

城市地区的代表不足，加上日本政治史的原因，使日本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农村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当代。19世纪80—90年代选举制度刚刚形成时，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选举权的纳税资格限制导致大多数城市居民在1925年以前一直未能

获得选举权，因此农村日本人比他们的城市同胞具有更丰富的选举经验。甚至今天，农村居民的投票率也比城市高。地方选举比全国选举更令人感兴趣，地区问题比全国问题更引人注意，至少在农村地区是如此。但是，日本各地的投票率仍远远高出于美国。

日本选举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与美国非常相似，而与大多数亚欧国家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生活大不相同。这个特征同候选人与其选区的密切关系以及日本整个社会的集体倾向有关。19世纪选举制度刚刚出现时，由领袖和追随者组成的规模不大的团体参加选举，基本构成是农村居民，风格是典型的日本风格。由地方"实权人物"（"有力者"）统率的乡村群体，往往从乡村团结一致的旧观念出发，以分散选票会互相抵销从而削弱地方政治力量为理由，成群结队地投票。这类团体联合起来就能选出地方议会议员，并且形成选举国会众议员的金字塔式的投票团体。

264

政治上强有力的头面人物可以凭借这类团体创建稳固的基地，称作"地盘"，从而使他在历次国会选举中当选。地盘可以传给自己的政治继承人，继承人也许就是他的儿子。支持者希望他为该地区谋取利益作为回报，例如，在建立学校、桥梁、铁路等方面给予照顾。地盘以选区内某一地区为中心，这里的绝大部分选票投给它的宠儿，选区内的其他地区则成为该党其他候选人的地盘。

在城市，从来没有充分有效地确立选举"地盘"制度。即使在农村地区，这个制度也已大为衰落，战后以来尤其如此。即使农业共同体也不再是共同的投票团体。数目庞大的农村居民加入了产业大军，新时代的大众传播工具日益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扩展到穷乡僻壤，农村日本人的政治兴趣和态度更加多样化了。候选人已不能再指望从某个特定的地区取得相对稳定的集体选票，因此不得不将他们的选举网更广泛地撒遍整个选区。正如日本人所指出的，旧的纵向式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得不逐步转成横向式的了。其

结果之一是，大多数政治家建立了规模庞大、成员复杂的支持组织即“后援会”，以便取得整个选区内妇女、青年和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

后援会的活动受到对选举中的财政和选举方式施加的极严限制的影响。这些限制的表面目的是防止行贿受贿和金钱来源各异的候选人间的不公平竞争。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战前由那些仇视民主制度并想使它难于实行的人设计的法令的残存。竞选活动只允许在选举日期（总是星期日）公布前的3—5周内进行，不许挨家挨户拉选票，也不许为拉选票而举行游行示威或请客吃饭。只允许散发有限的传单、广告，发表简短的广播声明，作电视亮相。宣传车是唯一不受限制的竞选工具，但给安宁和平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竞选基金被限制在完全不切实际的范围内，竞选人总是以种种手段大大超过限制金额。

所有这些限制的一个结果是违反竞选规则的小事件层出不穷。实际上整年都非常活跃的后援会被迫作为“文化团体”进行活动，而不是以竞选机构的面貌出现。后援会为各种团体举办“教育性”聚会，议员候选人或其支持者在会上露面，发表“教育性”演讲。政治家忙于笼络人心，争取选民支持。他们在东京的办事处热情接待选民，并亲自回故乡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竭其所能取悦选民，甚至在海外旅行时还飞鸿传书，对选民问寒问暖。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他们的美国同行所熟悉的。 265

这种充满个人色彩的政治关系在较大的城市中难于实行。甚至在大战以前情况就是如此，战后就更不可能了。即使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个人化的政治也在消亡过程中。它无法与现代生活很好地协调起来。随着各组织的竞争日益加强，加上邻里间缺乏了解，后援会再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了。许多人居住在同一个选区，但他们的大部分经济和社会生活可能在另一个选区。从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左派政党就已经更多地通过意识形态而不是个人关系来确立他们的感召力。今天，所有政党都越来越多地通过工会、农协、妇女组织、青年团体和各种压力集团等组织进行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援会的性质逐渐变化，但它仍不失为日本政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个人关系在日本也确实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更为重要。

266

第二十六章　政党

日本的政治制度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是通过政党运转的。尽管近代以前时期的日本人对党派观念深恶痛绝，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它意味着不和甚至倾轧。平民在政治生活中无足轻重，武士阶级绝对忠于领主。然而，到了德川时代末期，对立的官僚派系的存在已经成为幕府和藩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征。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很快接受了群众性的政党的观念，虽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有人强烈地怀疑政党的合法性。

如上所述，1874年板垣退助创建了日本第一个政党，并很快发展成为“自由民权运动”。随后，大隈重信于 1882 年组织了第二个政党。日本传统的两个主要政党源出于此。板垣的党称“自由党”，它控制了初期的国会，并于 1900 年与伊藤博文的官僚追随者联合组成政友会。政友会控制了国会，并于 1918 年推出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政党首相原敬。战后，该党以自由党为名重建。

另一个政党经常变换名称，从1927年起开始改成民政党。1915年民政党首次赢得多数，以后与政友会轮流执政。1924 年产生了该党的第一位首相加藤高明。战后，它以“民主党”(有时称“进步党”)的名称重建。1955 年，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

(简称自民党),"自由民主党"的名称表明了它的双重渊源。

1901年，基督教理想主义者为创建社会党进行了种种努力，但立即遭到当局的镇压。1922年建成的共产党是第一个成功成立的所谓无产阶级政党,但两年后即遭到禁止,警察还不断加强对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1925年后出现了几个短命的社会主义政党，1932年它们在警察允许的范围内联合组成社会大众党。然而,1940年社会大众党和更加保守的政党都被迫解散,加入官方发起的"大政翼赞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和从中国与苏联亡命归来的共产党人重新组建共产党。社会大众党也摇身一变而成为社会党,并分别在1946年和1947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9%和26%的选票,与战前1936年和1937年的5%和10%相比，社会党的势力大大增长。该党内部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一派强调以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另一派强调民主高于社会主义。1951年至1955年间,社会党分裂为左右两派,1960年又再次分裂，中间派退出组成民主社会党(民社党)。很明显，当代日本的政党都渊源于战前，尽管战后初期也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新党。如上所述，现存的没有战前背景的重要政党只有公明党。该党是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在总结了10年的选举经验后于1964年创建的。它是名副其实的战后新党。

战前，重视地方问题而对全国性问题不太关心的农村选举人支配着选举，因此候选人的学识比他所属政党的身分更重要。实际上,大多数地方政治家是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竞选的。今天,在地方政治生活中,这种色彩仍然很浓,虽然正在逐渐消失。在规模越小、乡村色彩越浓的选区,候选人越有可能以无党派人士的身分参加竞选。但在比较大的城市选区，政党身分是必不可少的。知事和市长另当别论。在比较大的城市地区，如果保守的自民党不

能拥有多数，又没有反对党能够单独选举自己的候选人，那么，知事和市长往往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他们是被各政党联合提名为候选人的。

268 自民党以农村为基础、背景复杂，因此组织涣散，思想混乱。但是，总的来说，这种状况与其说是一种不利条件，不如说是一份宝贵财富。左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由于党纲旗帜鲜明而限制了他们的感召力。近几年来，这些政党也迫于形势而背离了原来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社会党严重依赖主要由白领工人和政府雇员组成的比较激进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民社党则更多地依靠比较温和的蓝领工人组成的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但是，共产党、社会党和民社党常常互挖墙角、争夺对方的选票。

虽然日本的选举倾向有着惊人的连续性，但大多数投票人宁愿把自己当作无党派人士。对于他们来说，自民党的多样性和个人色彩比僵化不变的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自民党是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松散联盟，因此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能够从各种类型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在背景复杂、思想混乱方面，自民党同美国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相似，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其他政党。

除了共产党、也许还有公明党，没有哪一个政党拥有与自民党选举力量完全相当的基层党员。作为组织来说，政党基本上是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和职业政治家的俱乐部。因此有人讥笑自民党是有头无脚的怪物。实际上，自民党通过坚决支持该党的地方政治家（尽管有些自认为是无党派人士）而在基层拥有非常强大的基础。

* * *

虽然战争的灾难、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战后的赤贫年代造成了日本社会巨大的动荡不安，但是，日本的选举人令人惊异地保持着

他们始终如一的忠诚。战前支配政局的两个传统政党，战后继续主宰着政坛。按照现代的标准，他们的农村背景使他们带有保守色彩。考虑到各地农村居民一般比较保守，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传统政党在战后勃兴的大城市中成绩欠佳。为了抵销左派政党日益增加的选票，他们被迫于 1955 年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这种从右到左的转变基本上是为了争取选民，如果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那也是附带的。

269

1958年，自民党在其成立后的第一次众议院大选中，赢得59%的选票和 61.5% 的席位。但以后逐渐下降，1976 年它所得选票降为 42%。由于反对派的选票分散，自民党得到的席位比例稍高于选票比例，而且有些无党派人士当选后往往立即加入自民党，因此自民党在国会中保持了绝对多数。自民党不能保持多数时，一些中间派议员集团，一度是1976至 1986 年间是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自由俱乐部”，心照不宣地予以支持，因此自民党仍然保持政权。

1976 年以来自民党的元气有所恢复。在 1986 年的选举中，它赢得 49.4%的选票，在 512 个席位中得到 300 个席位的绝对多数。1980 年和 1986 年，自民党的表演格外出色，这通常被归因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半数席位同时举行的“双重选举”，但原因也许并不在此。自民党大获全胜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即使在城市中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也在不断消失，公众对自民党的政策普遍感到满意。此外，中曾根首相的领袖魅力也是原因之一。他在国内外的电视中比其他政治家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形象。如果后一个因素确有重大影响，那么，这意味着日本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但不一定是人们所希望的特征。过去，首相与其说是人民选择的、不如说是政治家遴选的，现在则可以通过电视“选美”来选拔首相。

从自民党成立以来，社会党一直是第二大党。它在1958年得到33%的选票。人们普遍希望社会党有朝一日能取代自民党，或与自民党轮流执政。但是它有负众望，社会党的支持票慢慢降到1972年的22%，1980年和1986年又分别降为13.6%和17%。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社党造成了社会党的选票的跌落。不过民社党的记录也并不引人注目。1960年它的选票占9%，1986年下降为6.4%。共产党的记录更不稳定，1955年还不到1%，1976年上升为11%，1986年又下降为8.8%。公明党在其1967年以来的短暂历史中；1968年达到最高点11%，但1986年下降为9.4%。

270 如果4个主要反对党联合起来，就足以与自民党分庭抗礼，实际上，从1971年到1983年的历次选举中，他们的选票的总和都超过自民党。但是，共产党与社会党间以及它们与中间政党即民社党和公明党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分歧，因此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

自民党已经执政30多年，因此特别引人注目。自民党的核心是它的国会议员，他们构成党的全国大会的多数代表。他们在全国大会上选举党的总裁，当选总裁理所当然地由自民党的国会多数选举为首相。然而，自民党为了对国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必须对它的党员议员实行严格的纪律。根据美国的经验判断，这似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日本所有的国会议员和美国的国会议员一样，都是依靠他们个人的感召力和后援会或者支持者组织当选的。但是，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非常成功地维持了党纪。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的团体行为技巧。另一个原因是构成自民党的两个传统政党的历史。战前，他们并肩作战，反对反民主势力，争取成立议会政府。战后，他们携手捍卫传统的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企业，反对基本上由马克思主义者构成的、统称为“进步主义政党”的反对派。再一个因素是因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得到党本部的正式

批准和财政支持，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当选。党员当选国会议员后，除非严格遵守党纪，否则就捞不到好处。所谓的好处是被委任为内阁大臣、国务大臣、委员会主席和有影响的党组织的职务，这些好处有助于他再次当选。首相这项最高奖赏当然不是任何一个不能绝对忠于党的人所能获得的。美国整个体制的运行方式与此大不相同，偶尔违背党纲的国会议员屡见不鲜。但在日本，这种人闻所未闻。

1972年佐藤荣作首相的任期结束前，大多数首相是长期担任省、厅官僚的旧官僚。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就是这一类型的最后两位首相。这类人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政府经历，他们从战后以来一直想方设法使政党领袖与职业政治家脱钩。但是从1972年田中角荣起，越来越多的派系领导人和首相在进入政界以前缺乏或者根本没有官场经验，目前的国会议员更是如此。

*　　　*　　　*

虽然自民党非常团结，派系林立却是它的显著特征之一。自民党在任何时候都分成四五个派别，在国会两院各拥有40—100名议员。这些派系是典型的日本式的领袖和追随者团体，核心是特别强有力的议员。他们希望利用派系作为竞选政党总裁和首相的筹码。达到这个目标，一般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派系联合起来，这就造成了党内“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分裂。

国会影响较小的议员出于各种原因也乐于加入派系。这与他们对较小团体活动的嗜好相一致。在党本部获得派系的支持，有助于党员获得数目有限的党的议员候选人提名，而且还可以指望从派系首脑那里取得特别的竞选资金援助。新议员一旦当选，就发现非正式的派系俱乐部是学习国会活动方式的良好教室。另外，派系的支持对他来说也是在国会和党内谋取一官半职所不可缺少的。拒绝参加派系的议员寥寥无几，这种议员通常无所作为，

在众议院中尤其如此。

派系是日本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人们不时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派系，但是派系解散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派系是操纵自民党的极其自然而有用的工具，要抛弃它，不那么简单。有人认为自民党实际上仅仅是一些小政党的联合，派系则是分裂的因素。这一指责大错特错。尽管各派系领导人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但所有派系的成员都坚持包容党内各种态度的观点。对于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主要的压力集团并不是派系，而是由各派系的人组成的专门研究团体。

为了获取高官要职而展开角逐，对有争议的政治决定发生争吵，这些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派系并不是分歧的根源。相反，派系被认为特别适合日本人的协作方式，是在首相人选和有争议的立法问题上达成全党一致的良好途径。下层党员在较小的团体内比在党的全体大会上更容易畅所欲言。派系领导人在本派成员的观点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要比在全党大会上更容易。此外，派系的多样性使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有时派系对选民的感召力比组织严密的政党更大。断言自民党的派系结构是这个政党执政30几年的主要原因所在，可能并不夸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一些时期中，派系仍将继续发挥它现在所起的作用。

272

其他政党的组织结构一般与自民党大同小异，国会议员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党领导人组成全国大会，选举党的首脑，通常称为“委员长”。只有社会党才大得足以拥有派系，但这些派系往往是意识形态上的组合，而不是个人间的分裂。实际上，社会党内部左派理论家和中间派实干家间的分裂，也许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最深的分裂。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全国大会常常走向极端，处于理论家和工会领袖的控制下。但在面临选举现实时，两个党又都摇身一变回到中间立场。工会领袖对社会党和民社党有

重大影响，并构成两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的大部分。共产党和公明党对其国会议员的控制甚至比自民党和其他政党更严格。

任何一个反对党都未表现出取代自民党的前景，只有民社党和公明党可能在相互间、或与自民党结成建设性的联盟。如果自民党丧失其绝对优势，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是民社党或公明党与自民党结成伙伴。

第二十七章 决策过程

273

日本的立法过程与英国和其他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十分相似，而与美国截然不同，因为在美国的总统制下存在着分权观念。在日本，首相及其内阁是国会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而不是与国会分庭抗礼的力量。内阁草拟大多数草案，并提交国会批准。国会审查内阁建议的草案，由委员会和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但很少进行重大的修改。

这种制度意味着，大多数政治决定不是在国会，而是在政党内部作出的。执政党在向国会提交法案前已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因此党的组织应该公正，代表全党，并有一套大体与国会相似的机构。当自民党总裁按惯例在党的大会上当选、或在首相辞职、死亡后接任时，他在就职时必须就几个关键性的党内职务和内阁人选达成协定，同时小心谨慎地作出平衡，使各派得到应得的职位。这些职位由有关派系的首脑或其重要亲信担任。

在自民党的等级阶梯中，重要性仅次于总裁（和首相）的是干事长，他负责监督党务机关，主要是总务会、主要职能是负责指定国会选举的候选人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和政调会。这些机构都是按照派系均衡的原则组成的。

274 法案的起草一般从官僚机构的各部门提出建议开始，并由该部门与政调会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所有自民党的国会议员都可以出席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并畅所欲言。由委员会与官僚共同提出建议性的法案，先提交政调会，再送总务会修订和批准，以后提交内阁。内阁将法案交事务次官会议由官僚进行最后审查，以避免与其他立法冲突或矛盾。法案提交国会表决前，内阁还进行最终审查。经过以上精心准备，大多数法案当然不用修正就由国会的自民党多数批准通过了。遇到棘手问题时，由总务会作出决定，或由派系首脑、党的主要领导人甚至首相本人进行非正式协商，但这种情况很少见。整个立法过程使人联想到日本社会的决策程序：在日本社会中人们追求意见一致，最初的决策总是从低层领导集团开始的。经过这样的程序后，在国会最后表决时，法案得到全体一致的支持，成为正式的法律，这是毫无疑问的。

* * *

虽然执政党是关键的法律制定者，但其他社会因素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确实也有一定作用。如上所述，各种官僚机构负责大多数法案的最初起草工作，他们提出的法案有70%最后得到了批准。相比之下，国会议员提出的法案只有30%得到批准，反对党提出的法案几乎没有一个得到批准。从编制预算的方式可以看到官僚机构的权力。各省、厅编制自己的预算，一般比上年稍高，但基本上按照上年的比例分配下属各部门。大藏省在制定最后的预算草案时，也尽力维持各省、厅间的原有平衡，虽然也需要考虑首相和其他自民党议员当时的意见，以及公众舆论。

275 决策过程中的其他重要力量是外部压力集团。许多政治评论家首先考虑到大企业。在日本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的过程中，大企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恰恰又是自民党的主要经费来源。日本这个国家是由休戚相关的三巨头操纵的：自民党在财

政上处于大企业的控制下，大企业又处于官僚机构的控制和保护下，而官僚机构的运行又必须依赖自民党的立法权力。日本人诙谐地称为“从天而降”的做法强化了这种共生关系。在这种体制中，声名显赫的官僚，有时是前政治家，退休后通常到他们在职时所控制的产业，担任受人尊敬的薪高税低的职务。

战后初期，由于这三个集团主要关心日本的经济成长，因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互相协作互相促进上，三巨头体制的观念在这个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近几年来他们的联盟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不再是自民党和官僚机构唯一关注的首要问题，因此在政策中大企业也不再占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其他利害冲突问题，如公害问题、外务问题，也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过去，大企业在资金上只支持自民党，现在，这种排他色彩也减弱了。尽管这些政党的主要财政收入是从其他来源获得的：社会党、共产党和民社党从工会，公明党从宗教团体创作学会。共产党还从办得非常成功的党报《赤旗报》取得收入。官僚机构取消了对大企业的许多细枝末节的控制。这些变化的一个结果是，大企业越来越摆脱官僚的控制，但也失去对政治的重大影响。今天，大企业仅仅是影响政治决策的许多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日本的政治过程仍可认为带有三边性质。官僚机构提供专门的知识和保证行政上的连续性，执政党最终作出政治决定，普通选民和各种压力集团则对政党的决定和官僚的态度施加影响。

选民大众是最重要的外部压力，因为他们决定着哪个政党控制国会。大企业无疑仍然是最强有力的压力集团，但还有其他许多强大的压力集团，如农民协同组合、日本医学会等专业和企业组织、教师联合会、各种工会同盟、妇女组织和近几年出现的关心各种专门问题的“市民运动”和“地方居民运动”。它们直接对有关的

276

官僚机构、政调会的各委员会以及各种政治党派施加压力，并且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影响国会的最后表决。各大报纸也应被看成形成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政府本身也想吸取公众的知识和见解，并通过各省、厅所属的审议会表达其观点。

反对派的作用也不应该忽视。达成和谐一致的协定是日本人普遍的希望，他们对微弱多数决定重大问题普遍不满，这就使得日本的反对派比其他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影响更大。在其他民主国家，反对党处于少数派地位，其作用往往无足轻重。国会的辩论为他们通过拖延战略甚至罢会阻挠批准不如意的立法提供了最后机会，这种破坏性的战略得到大众传播工具和群众街头游行示威的支持。如果自民党利用长期控制的多数，不经充分讨论就通过有争议的法案，将被认为不民主，从而有可能引起群众游行示威甚至骚动，如同 1960 年发生的那样[1]，这至少会减少自民党在下届选举中的选票。因此，自民党限制向国会一次会议提交有争议的重要法案的数量，认为在一次会期可以解决的法案最多为 3 至 4 个。防卫厅升格为防务省的法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长期以来，自民党一直希望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务省，它当然也拥有足够的表决票，但这项提案年复一年被视为象征性的建议而非实质性的问题束之高阁。自民党为了使一些意义更为深远的法案获得通过而牺牲了这个提案。

围绕着立法问题而引起的尖锐冲突是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生活的特征。但是，从那以后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地减弱了。一个原因是自民党的政治家学会了在提出法案建议时尽量与反对党和有关压力集团进行协商，努力使他们接受法案，因此在国会表决时有将近 2/3 的法案获得一致通过。如果反对派准备对法案作重大

277

① 指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译者

修改，那它更有可能与自民党进行心平气和的事先协商，而不是在国会上进行辩论或投票表决。英国议会也有类似的情况，但英国人非常重视辩论技巧，并喜欢在国会中辩论、甚至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中侃侃而谈。日本人不大重视口才，国会的辩论往往限于令人心烦的提问和含糊其辞的回答。他们主要关心辩论对下届选举产生的后果。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虽然极其复杂，但相当有效，非常适合日本式的人际关系。它灵活、彻底，但不可避免的是比较迟缓。它为反对派提供了行使更多的否决权的机会，因此比其他大多数民主制度产生了更多的妥协。决策的基本过程是在官僚机构、党的机关、反对党以及各种压力集团间的无形交涉和非正式协商中进行的。对于脑中充满民主制度各种表现形式的理想的西方人来说，日本明显可见的决策过程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国会几乎没有令人大开眼界的辩论，反过来倒有不少的分裂活动，街头有一些群众冲突。外国人经常以这些表面现象为中心，贬低日本政治决策过程的质量和效率。但是，与美国四年一度的疯狂的总统竞选和拉票过程中充满尔虞我诈的美国国会相比，日本的制度秩序井然、卓有成效。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它非常平稳地运行着。很明显，日本政府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有效地将选民的意志转化为政治活动。

第二十八章　争端

27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政治的特征一直是以自民党及其前身为一方，与大多数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进步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尖锐分歧。这个分歧是由战前和战时的条件

造成的。当时，自民党的前身虽然是政府中民主因素的代表，但它毕竟是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严重地依赖农村和小城镇。而“进步主义政党”的前身代表城市知识分子和劳工，他们支持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各种根本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战前和战时的全部经历使“进步主义者”及其同情者极端地怀疑一切权威，对政府不太关心普通市民的权力和利益深为不满。他们深信不疑：自民党企图恢复战前的状况。自民党的首相之一岸信介毕竟是东条英机战时内阁的大臣。自民党也害怕“进步主义政党”进行革命性变革，从而扫荡日本的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把国家引入动荡之中。

战后初年，日本政治的这种截然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后来，随着国家日益稳定和繁荣，这种对立才消失。美国人进行的改革所培植的新制度为双方所接受，双方也逐渐认识到对方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起初，他们剑拔弩张，互相敌视。武装冲突和混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占压倒优势的美国军队和麦克阿瑟的独裁权力侥幸地防止了这类事件的发生。当时，的确出现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偶然的暴力事件。反对派也习惯性地反对执政党提出的几乎所有事物，甚至表面问题和技术细节也引起激烈的争议。这使外国观察家迷惑不解。今天，这种尖锐的政治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个以意见一致与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中显得很奇怪。但是，动乱没有出现，最危险的时期平静地度过了。局势日益稳定，长期的政治斗争只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自民党拥有大企业和相对保守的农村选民的支持，而反对党基本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因此也许有人会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争议的主要领域。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理论，在日本从来没有感召力，而且，在最后的无阶级社会中将变得毫无意义。“无产阶级专政”只会使人

不无反感地联想到独裁制度。在经济领域，反对党也从未能对保守党形成明显的挑战。1952年日本恢复独立时，经济已经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反对党不可能干得更有成效而取代保守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采取“我也能够……”的软弱态度。

战后初年，左派曾企图通过工会控制产业，但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制止了他们。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进行过同样的努力。由于保守派完全控制着政府，反对党也没有集中努力去扩大政府对生产手段的控制，而是反过来倾向于围绕着细小问题开展小规模的斗争，通常是反对大公司、支持小企业的权利。在农业方面，美国占领当局进行的改革非常成功，反对派根本不可能鼓吹集体化。他们只好与自民党共同倡导小规模的个体农场。当然，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坚定的核心中也有纯洁的理论信徒，马克思主义对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饶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还因而影响了保守商人的思维形式和言辞。但是，历史证明，在日本要建立一个激进的组织严密的反对党，其理论架构不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反对党的一个法宝，不如说是像缠在信天翁脖子上的标向物，将反对派的注意力引向徒劳无益的方向，并使中间派选民望而生畏。

既然如此，反对党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条和激进的改革(如废除天皇制)，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慢慢地转到中间立场。公明党起初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表明它的反对立场，但今天它在许多问题上已经站到中间偏右的立场。民社党从未动摇过献身民主的理想，但实际上已经变得与自民党内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一些集团难以区别。社会党的一些左派理论家和中间派实干家间一直存在着分歧。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江田三郎曾提出混合型社会制度的“设想”，即英国式的议会制度、苏联式的社会福利、美国式

的富裕繁荣和日本式的和平宪法，但他在1962年党的领袖选举中名落孙山。然而，最近时期社会党确实已经转移到他理想的混合型社会方向。共产党曾一度在外来的战斗理想和国内的温和领袖间摇摆。1949年，当他们宣布摆脱苏联的控制并自称“可爱的”共产党时，他们的选票一下子增加到10%。随后当他们先后接受苏联和中国的指导时，他们的选票急剧下降为1%。只是在他们摆脱了苏联党和中国党的控制而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于1970年宣布支持议会政府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后，他们的选票才恢复到10%；该纲领虽然含混不清，但民主色彩比共产主义更浓。

自民党本身也放弃了某些比较极端的立场，如为了将理论上的主权归还天皇而要求修改宪法。反对党和绝大多数民众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他们坚定不移地捍卫新宪法，正如他们反对复活战前状况的任何企图一样。他们强烈反对对宪法作任何修改，不管这种修改是无关紧要的，还是合乎时宜的，因为他们担心即使微不足道的修改也会给大刀阔斧的修正打开方便之门。自民党内虽然仍有人希望修订美国人赐予的这部文献，但不得不接受民众反对修改这个现实。这样，自民党也转向了中间立场，而宪法不管其起源如何离奇，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整个民主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实基础。

* * *

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势力对基本的经济政策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影响很小，因此反对党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外交政策、社会问题、捍卫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等方面，但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工会的权利和特权问题，一直是引起冲突的领域。如上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军事占领当局曾阻止左派通过工会控制工厂，不断支持比较温和的工人摆脱组织严密的少数派共产党集团的控制。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因为组织涣散而软弱无力，渐渐失去了力量。“总

评”支持社会党，“同盟”支持民社党，许多独立的工会支持共产党，其他联盟和工会则持中立立场。没有任何组织能控制工会全部成员的选票，因为参加工会的工人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宁愿自命为无党派人士，随心所欲地投票。 282

有组织的劳工进行过许多激烈的政治斗争。富于战斗性的教师联合会（日教组）自创建以来，一直围绕着控制教育和教学问题，从教科书的选用到教育是否包括道德训练，与文部省进行斗争。与基本上由政府雇员组成的“总评”的主要争端则涉及公务人员的罢工权问题。然而，不管是涉及到广泛政策问题的罢工，还是只关系到工资的罢工，罢工在政治上总是一把双刃剑。由于罢工而生活不便的公众会反对工会，像1975年晚秋交通工人罢工那样。从整体上看，虽然开始时劳工运动表现出工会的强大力量，但由于工人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对日本体制的运行方式越来越满意，因此他们的热情和重要性都已逐渐下降。

在反对党与自由党的冲突中，学生的作用不如工人重要，而且离题更远。战后最初10年，学生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1960年，全国学生组织“全学联”围绕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批准问题，领导了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但是，从此以后学生分裂成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和各种指导思想模糊的派系组织，如“赤军”、“核心派”等。这些团体以棍棒和工人的安全帽为武装，相互间进行你死我活的混战，有时甚至杀戮民众。

在越南战争、美国核动力潜艇进入日本港口、归还冲绳以及60年代末、70年代初安全保障条约的续约时期，学生的奋斗目标恰好与公众的注意力一致，因此，学生组织的作用在短时期内格外引人注目。1968年，他们挖空心思关闭了东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在农民因土地被征用建设东京附近的成田国际机场而与政府展开旷日持久的斗争时，学生偶尔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场斗争开始于

1966年，造成了一些偶然事件。但是，没有任何政党希望同学生中
283 的行动主义者发生关系，因为后者采取暴力行为。总之，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已经退出公共事务的主要舞台，沦为政治斗争中无关紧要的角色。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极端主义者寥寥无几。但是，对现行体制的运转方式却存在着普遍的不满，而且矛头自然主要是针对执政党的。公众期待和谐与意见一致，讨厌决策过程中常见的街头游行示威和国会中对未决问题的无休止争论。支持反对党的人对自民党的长期执政感到失望、气愤，他们错误地把自民党执政解释成剥夺他们发挥作用的机会。有些人为选举过程和政党组织同人际关系密不可分而感到苦恼，他们希望这一切都应按问题而定。大多数人因严格的选举法规不断受到蔑视和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不合法的投机取巧策略而感到不快，他们希望光明磊落。关于贪污腐化的指控不胜枚举，人们强烈地感到政治是肮脏的。

外国人经常误解日本人对贪污腐化的指控。日本的政治腐化其实并不比其他许多国家普遍，可能远不如美国地方政府的类似情况多。在日本几乎没有收买选票的事件，因为日本实行秘密投票制，需要大量的选票(一般要有5万张以上)才能赢得众议院的一个席位；收买选票是不切实际的。国家官僚机构并没有被贪污丑闻所玷污，因为尽管政治家和地方官员有时遭到怀疑，但不是怀疑他们盗窃公款，而是怀疑他们以政治好处为筹码接受贿赂。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款项主要出于竞选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中饱私囊。

在日本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主要问题是合法与非法的政治捐款界限不明。可以报销大量开支的企业界人士慷慨地款待政客和官僚，这虽然令人生疑，但和日本人嗜好送礼一样被看作是人之常情。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政治家都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大量接

受并扩充选举基金。企业公司和工会组织可以进行政治捐款，但合法的政治捐款与行贿受贿之间的界线始终含混不清，造成许多疑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两起著名的“贪污”案都牵涉到1972年至1974年担任首相的田中角荣。田中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巨头。人们认为他随心所欲接受政治捐款并用金钱扩大政治影响。在美国的水门事件丑闻启发下，有家杂志披露了他的“金钱政治”，这导致他于1974年辞去首相职务。

另一案件始于1976年2月。当时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有人指控洛克希德公司曾支付给日本高级官员巨额贿赂，以影响他们作出决定购买该公司的飞机。这一战后日本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最大丑闻导致了国会的长期危机。田中和其他一些政治家以及不少企业界人士遭到起诉，最后都被判处有罪。田中和其他政治家为防止自民党陷入困境而退党，其中只有一人重新当选国会议员。不过至少在1985年田中身患重病以前，他一直是自民党国会议员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象这两件牵涉到田中的重大贪污案是极其罕见的，但公众仍然强烈地厌恶政治。贪污腐化和政治渎职始终是战后日本政治生活的一个特征。这对自民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为它既是执政党，又是大企业的政党，而大企业被认为是贪污腐化的主要根源。日本已经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反贪污腐化法，但收效甚微。

从占领中期以来，左派和右派间最激烈、最明确的争论一直是外交政策。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其后日美关系又很密切，因此日美关系始终是争论的中心。这个问题反映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在本书第六编详加论述。

在社会问题和基本人权方面，制定有生气的创造性政策的机

会一直是很多的，但反对党并没有很大作为。工业增长与社会福利间日益增加的不平衡、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住房、道路、排水系统和公园以及高等教育等公共设施投资不足，这一切都造成了严峻的问题。日臻完善的医疗保障条件和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产生了照顾老年人的新问题。所有政党至少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已造成了可怕的拥挤和污染。除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以外，日本人开始关注飞机场的飞机和高速公路的汽车所产生的噪音污染。高层建筑遮盖了相邻的住宅和公寓，那里的居民强烈要求日照权。阳光对于日本人的生活十分重要，它不仅在冬天提供热量，而且还可用于晒干衣服（日本大多数家庭有小型洗衣机，但没有地方放置干燥机）。这一切威胁着日本人的生活质量，日本人将其统称为“公害”。

老龄化、大学资金缺乏等许多社会问题都遭到反对党的抨击，但缺乏明确的解决方法。环境和生活质量受到威胁，激起更为激烈的反应，但也缺少相应的对策。由于这些问题集中在城市，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选民反对自民党。他们的大部分选票不是投给社会党，而是投给共产党和公明党。公众认为这两个党的组织比较完善，更有可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然而，城市反对党的选票却因此更加分散，从而削弱了它们向自民党挑战的力量。但是，城市选票的转移确实促成反对党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从自民党手中夺取了对城市地区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公害问题，根据其性质，基本上是地区性的。这类事件不胜枚举，但引起全国注意的事件屈指可数，如九州海滨城市水俣的近海水银中毒事件。因为大部分案件被作为地区性问题处理，所以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地方政府及其权力的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的不是全国性政党，而是称为“地方居民运动”的地方性特别组织。这些组织只关心某一专门的问题，如造成污染的工

厂、在当地修建核电站或工业区的计划、当地飞机场引起的噪音等。50年代和60年代的市民运动关心全国性问题，如美国军事基地、越南战争等，结果为全国性政党所操纵。"地方居民运动"与此不同，总是想方设法排除政党的介入。他们知道，政党的参加会使运动失去地方的一些支持，而且将不得不与自民党政治家和不关心政治的官僚打交道。实际上，自民党对地方性问题作出的反应几乎与反对党一样快，而且往往捷足先登，抢在反对党利用这些问题反对自民党以前就加以解决。

288

总的来说，日本非常迅速而有效地对污染问题作出了反应。1971年内阁设立环境厅，此后两年内通过一系列法院的判决，确立了一条原则：污染者必须赔偿所造成的损害。1979年① 水俣案的终审判决和其他土地标界法律加强了这项原则。与此同时，日本也通过了制止各种形式的公害的强有力的法律，并得到严格的执行。因此，环境质量已经大为改善。例如，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比1975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在天气好的时候从东京一直能够看见、但因汽车和工厂放出的烟雾而几乎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富士山，又一次举目可见了。日本人处理公害的记录与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优秀。自民党已经将这个引起争端的领域缩小到最小程度，尽量不使其发展成为政治问题。

第二十九章　政治风格

289

批评日本式民主制度的外国人常常不能正确评价它所代表的非凡成就和所体现的民主制度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当代日本

① 原文如此，本书第二十四章(219页)为1973年。——译者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民主制度的一次伟大的延伸。曾经是民主制度的国家，如西德和意大利，重新获得了民主；在中东，以色列建立了小型的民主国家；城市国家新加坡也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不过处在铁腕人物的领导下。此外，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也正在努力争取民主，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日本的情况与众不同。在战前军国主义者的民族主义炎日下，扎根不深又不彻底的民主制度枯萎了。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新巨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得到全民族的热情支持。

外国观察家通常不能欣赏在日本所发生的一切，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民主制度是按照西方人陌生的方式运转的。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因素，如竞选和国会的公开辩论，在日本几乎完全不存在。团结在政党旗帜下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日本政治制度的许多显著特征，如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蛊惑人心的言辞和国会中的冲突等，令人讨厌。然而，外国观察家没有认识到，充满个人色彩的广泛的竞选活动、政治盟友与对手间频繁的幕后协商、以及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大众传播工具的长篇政治评论，已经抵销了这些令人讨厌的特征。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也没有意识到，尽管日本人对政党普遍怀有疑虑，但他们实际上比美国人更积极地参加投票。在地方性的政治问题上，个人的活跃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的人。这一切因素使日本的民主制度充满活力，不管它在外国观察家的眼中是多么含糊和不完美。

290

然而，必须承认，与英语民族国家相比，日本的民主制度仍然扎根较浅。因此，担心他们对民主的“内在”感情并不那么强烈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不应该忘记，日本人的投票经验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非常成功地运行着。除了极端主义分子外，日本人坚

定不移地支持民主制度，特别是1947年宪法。尽管这部宪法是美国人起草的、有些词语听起来离奇古怪，具有异国色彩，但日本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今天，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称1947年宪法为"和平宪法"，并引以为荣。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坚决支持这部宪法的可能正是那些反美的左派人士。

外国观察家也许会认为，如果日本社会少一些团体倾向，多一点个人色彩，那么民主制度将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基础。但事实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就日本与西方国家相比而言，即使日本多一点个人色彩似乎也不能很好地适用。因为日本缺少种族、语言、宗教、地区和阶级等社会裂缝，而这些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构成了复杂的因素。与许多西方国家相比，卷入针锋相对的政治意识形态争端的日本人要少得多。反对党的大多数选民并不是招徕选票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奉者，而只是动摇不定的现政府政策的抗议者。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一个政党倒向另一个政党，包括执政党。与此相似，构成自民党农村选民核心的个人关系也是相当灵活的，这种个人关系毕竟是日本政治生活中正在褪色的一个特征。

战后许多年来，人们对日本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曾经缺乏信心，日本人自己尤其如此。以前，日本的民主制度步履蹒跚，右派和左派间的差距和互不信任曾是不可克服的，自民党失去多数党的地位，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指日可待的。人们曾经设想过，政权突然移交给社会党多数派或左派政党联盟，而政权的迅速更迭或者新领导人内部的分裂将会引起动乱。有些人甚至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将发生极右分子的政变。

但是，事物都是变化的。所有政党都转向中间立场，因此任何可能出现的执政党的更迭都不会造成许多根本性政策的变化。现在看来，由于过去10年自民党的复兴，它丧失政权也成为相当遥远的事情。如果自民党真的丧失政权（总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变

化），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将是中间派政党联合执政，政权更迭引起的变化将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西方大多数稳定的民主国家也可能出现巨大的政治转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日本，持中间立场的稳健大众战胜了政党领导人间的分裂，从而给民主制度创造了一个极其稳定的政治前景。

总之，日本的民主制度看来与任何西方国家一样灵活、合理、有效和稳定。这个制度不会因领导人和政策突然发生巨大变化而动摇。日本人强烈地厌恶美国总统所普遍追求的、或者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所表现的那种充满非凡魅力的领导，相比之下，日本的制度似乎黯然无色且极迟缓，但就民主制度而言，政策缓慢而有连续性的变化看来一般比突发性的政策转变更为安全。而且，如有必要，日本的制度也可以迅捷地动员起来。日本令人惊奇地崛起成为超级工业大国并迅速而彻底地处理污染问题，表现得非常出色。日本政府克尽职守为人民服务，日本的政治体制卓有成效地将公众的意愿转化为政治行动，这在世界上也许是无与伦比的。总之，我们必须承认日本的民主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只有进一步考察日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我们才有理由加以品头论足。

第五编 经济

第三十章 近代以前的经济

近现代时期日本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也许是成功地创建了一个高效稳定的民主制度。但是最令人刮目相看、被人惊呼为“日本的奇迹”的非凡成就是，日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三个工业和贸易大国之一。过去，日本的艺术家和狂热的士兵被视为这个民族的代表；现在，人们则把日本商人看作是这个国家的象征。今天，日本这个词令人联想到的不是富士山和安藤广重① 的版画，也不是旭日旗和三呼万岁，而是工厂、机器人和不断从船上卸下涌入美国公路的汽车流以及无处不在的夹着公文包穿梭来往于世界各地机场的日本商人。

日本人很早就表现出许多使它在近现代时期获得了经济成功的特性。其中一个特性是他们勤奋工作的倾向，另一个是他们重视正规教育。此外还有他们孜孜不倦的毅力和掌握困难技术的技巧。尽管农业以及钢铁冶炼技术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日本人迅速赶上了早一千多年知道农业、早数百年懂得冶金的大陆国家。他们很快掌握了错综复杂的水利控制工程和水田插秧耕种技术。8 世纪的奈良大佛和13世纪的镰仓大佛在世界铸造史上仍然名列最大铜像之列。到了12世纪，日本制成世界上最优秀的钢刀。七、八世纪时，日本人掌握了中国的编织和刺绣技术以及精美的木

① 安藤广重(1797—1858)：日本江户后期的浮世绘画家，著有《近江八景》等。——译者

结构建筑技术，并获得了许多当时欧洲人还不知道的技术，如造纸，并在8世纪，用木刻技术印刷了成千上万的佛教护符。伴随着中国的新技术浪潮而来的中国式绘画和其他优秀技术，也被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和技巧所吸收。这样，在仅仅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就从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工艺优秀的国家。它还重新构造了原来按照中国模式设立的制度，使其适应技术的迅速发展。

16世纪时，在葡萄牙人惊叹日本工匠的技巧的同时，日本人迅速采用了他们颇感兴趣的西方技术。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葡萄牙人的枪炮受到日本人的特别注意。1542（或1543）年，日本人第一次看到枪，30年后他们已经生产了大批滑膛枪，并且进行了某些细小的技术革新。早在1575年，火枪集团纵队就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实战。

后来，由于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日本人在技术上落后于当时正在跨入科学时代和早期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尽管如此，19世纪时西方人仍然对日本高超的冶金、陶瓷、作为艺术和技术结晶的彩色版画以及其他一系列工艺技术表示震惊。对于西方人（尽管不是大部分西方人）来说，很明显，如果有机会，日本人是能够迅速掌握西方技术、学会生产与西方产品相媲美的机器制造品的。

* * *

日本人跨入近代时期时，不仅具有经济所必需的工作技能和良好习惯，而且具备许多不可缺少的制度，这些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达的形式。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和单一的全国市场。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所有的封建领主都被迫将很大一部分收入花费在藩国外，用以维持设在封建首都江户（今东京）的庞大机构和支付每年一次往返江户的旅费。这要求他们在藩国内生产数目可观的剩余产品，如大米和一些地方土特产，还有九州

南部的萨摩和琉球群岛生产的糖，以销售给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剩余产品或者直接船运到江户，或者运到大阪。大阪位于濑户内海东端，是日本西部巨大的货物集散地。江户和大阪成为日本的两个经济中心，前者是东日本的经济中心，后者是西日本的经济中心，今天仍然如此。早在17世纪，这两个城市中一个城市米价的涨落会迅速波及另一城市，使那里的价格立即受到影响。

商业、银行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制造业，都以江户和大阪两个城市以及距大阪不远的天皇旧都京都为中心。早在17世纪初，一些商家就以这几个城市为中心，将活动扩张到其他许多地区许多行业，如酿酒、批发零售和银行业。虽然货币制度尚未统一，但金融财政机构非常发达，主要的零售商店规定了固定价格，没有在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的讨价还价现象。这类发达的零售批发商店，后来顺利地演变成现代大型百货商店。

大型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控制在创业家族手中，但经营管理则逐渐由终身服务于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实际上，整个企业是家族的延伸，雇主和雇员间保持着强烈的相互忠诚意识。经过19世纪中叶的动荡时期而保存下来的近代以前时期的大公司屈指可数，其中有17世纪时在江户和大阪经营干货店和钱庄的三井；但是德川时代旧公司的精神，在当代企业中仍然发挥着作用。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城市大商人和大批农村中间商的商业活动，为日本跨入现代国际经济时代作了充分准备。许多武士阶级的观念也起了这种作用。他们在明治维新废除封建特权和世袭俸禄后孤注一掷，想方设法谋求生存。新政府鼓励他们从事制造业、银行业和商业。许多武士投身于实业界，有些人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甚至在旧的统治制度下，一些武士已经变成了准商人。他们在藩国的经济部门工作，管理货栈仓库、交通运输，推行专卖制度，在贸易和消费中心销售剩余产品。

298 武士企业家的典型例子是四国土佐藩出身的岩崎弥太郎。他想方设法担任了土佐藩在长崎的经济代理人，攫取了该藩所余船只，以此为基础开创了后来仅次于三井的现代日本巨型企业三菱公司。但是，并非所有从商的武士都取得如此的成功，其中很多人以失败告终，命运十分凄惨。然而，大部分产业新巨头不是出身农民和旧的商人阶级，而是来自武士阶级，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与政府中的同事有密切联系的缘故。

众所周知，日本的邻国，如中国和朝鲜也具备许多与日本人相同的才能，如勤奋工作的精神、先进的工艺技术和发达的商业组织等，他们也同样重视正规教育，这无疑是日本人后来取得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299 但是，它们缺少某些促使日本人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并进而赶超西方的观念。例如，中国人和朝鲜人比较漠视外部世界；不能象日本人那样觉察到西方对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威胁的严重性。此外，它们缺乏日本人那种向外国学习的历史意识，既不感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学习西方的可能性。他们企图按照传统的方式存在下去，竭力避免一切变革。它们很少像日本人那样敏锐地意识到追赶西方的迫切性。

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日本捷足先登，在技术和制度上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这个事实从此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虽然中国和朝鲜后来也开始行动起来，但日本已先行一步，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非西方国家，并在当代世界上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300

第三十一章　战前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日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保全本国经济，以避免掠夺成性的外国人的侵犯。当时，还谈不上在技术上赶上西方。

德川幕府末年，列强强加在日本政府身上的一系列条约，剥夺了日本人对本国进口关税的控制权，制定了平均约5%的税率。这种关税太低，无法在西方廉价的机器制造品的冲击下保护本国的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日本与世界金银兑换率的差异也造成严重的黄金外流和物价混乱。只是由于西方货对日本公众普遍缺乏吸引力——现在的状况与此极其相似——以及由于枯萎病冲击欧洲的养蚕业而暂时造成对日本丝绸和蚕卵的巨大需求，才使日本得以避免彻底的经济崩溃。

明治政府于1868年掌握政权后，立即寻求挽救经济的方法。政府建立了现代经济制度——全国性的货币制度、现代银行机构、西方式的税收和国家预算制度。它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修建铁路、改善港湾设施、建设工厂，向日本学徒传授技术技巧以及一般的西方科学知识。政府还不惜血本派遣年轻有为的人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技术。政府废除了封建的等级制度，使各种社会背景出身的有雄心的青年都可以在商业世界一展身手。人民尤其是下级武士和富裕农民的子女反应非常强烈，他们看到在旧社会制度下他们不可能得到的机会已经对他们敞开大门而欢呼雀跃。他们蜂拥进入学校去学习西方的商业技术、新技术和英语。英语是学习西方技术和参与国际商业的重要工具。

虽然19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如火如荼的发展，但到70年代末期由于推行野心勃勃的大规模改革和清算旧统治阶级的武装反叛，耗尽了庞大的资金，日本经济实际上已濒临破产。严肃认真的财政紧缩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与此同时，日本为经济现代化所做的巨大努力也开始显出成效。由于现在国家实现了统一，先进技术传播到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得到巨大增长。1882年，私人资本创建的大阪纺织公司规模庞大，足以参加世界市场的竞争。伴随着该公司的成功而来的是私人资本大量涌入纺织业。除了战 301

略性的军事工厂外，政府出售了它所创建的模范工厂。这些企业在私人经营管理下实现了资本化，并开始赢利。各个产业部门相继走向繁荣。

日本工业是以比较高的增长率起飞的；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支付的巨额赔款，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向日本的工业品出口敞开大门。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以及20年代末的股票市场崩溃，也冲击了世界其他地区和日本。但是，由于30年代死灰复燃的军事扩张的刺激，日本经济又恢复到迅速上升的趋势。

现代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沿着西方早已确立的古典模式进行的。农业生产的增长、交通电信的改善以及高度中央集权化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工业成功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首先是在棉纺织业，其次扩张到其他轻工业，最后扩展到重工、化学工业。早期的出口品质量低劣，"日本制造"的标签几乎是次等货的同义词。日本的产业还不能与西方历史悠久的产业并驾齐驱，他们不得不向亚洲的贫困国家寻找主要市场。但是，日本与西方间的质量差距逐渐缩小，到3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

* * *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已经形成了某些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不同的经济特征，这些特征到今天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有一段时间，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被认为是过去的封建时代的残余和终将被超越的日本经济不成熟的标志。但是，战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特征又被认为是日本人与西方人进行不公平竞争的邪恶阴谋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日本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经济特征，是日本的早期组织模式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应付新问题而作出的独创性发明。这些

302

特征值得我们进行研究，合适的地方还可以模仿，而不应该加以鄙弃和谴责。

现代日本经济的一个特征是日本人所说的经济“双重结构”。这是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共有的，但日本由于产业化速度快而显得特别突出。德川时代以来，日本的许多行业，包括农业、小手工业、大量的服务性行业以及大部分零售业等只有微小的变化，这些行业构成了日本经济的低层次。向大型企业提供零部件、由家庭成员或准家庭成员的学徒从事劳动的小机械生产，也属于这个层次。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个基础顶端的是进行高度机械化生产的高层次的新型大企业。这两个层次的规模、生产率、工资和利润等都存在着差别。起初，高层次的大企业雇佣的工人不多，但因发展迅速而从低层次的中小企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尖锐差别引起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未充分就业的人有剩余，低层次上生产率低的工人，也压低了高层次的工资。

但是，这种情况最后发生了逆转。战后，日本产业取得巨大的成功，劳动力普遍短缺。高层次的大企业的巨大生产率使低层次的中小企业的工资得到了提高，但大企业同时也因为要向生产率低的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而背上了包袱。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农业。今天，农业虽已高度机械化，但农场规模小，农业仍是不折不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慷慨的价格补贴使日本大米的价格高出世界市场价格5—10倍。从经济上说，生产大米对日本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是，家庭小农场是国家的基础这种感情仍然缠绵不断，日本自己必须生产主要粮食（尽管日本粮食总供应的大约一半依赖国外）这种陈腐的战略考虑仍然根深蒂固，因此，日本人决心维持本国的农业，而不管它对整个经济造成多么大的负担。

304

日本的零售体制效率低，在这方面它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日本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比较少，也比较小。日本人虽然拥有小汽车，但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缺少足够的停车场。空间的缺乏使日本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不能像美国流行的那样代替零售商店。因此，日本人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夫妻店式的小零售商店和非常复杂的批发系统。对于日本经济来说，空间不足是一个严重的不利条件，这势必使经济水平低而耗资大的小型企业形式继续存在。

战前和战后日本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大部分雇主和雇员间存在着紧密合作的契约关系。这反映了近代以前日本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组织模式和日本民族的集体组织倾向。在处于日本双重经济中较低层次的中小企业中，这种雇主与雇员间的密切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详细探讨的，这种关系逐渐蔓延到半数以上的大企业中，使日本的产业具有一种家长式色彩和人情味，而这通常是其他国家的大企业所缺乏的。

战前和战后日本经济的第三个特征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政府和企业始终是对手，企业总想逃避税收和政府的控制；但在日本，产业是在政府的热心鼓励下成长和繁荣起来的，因此企业学会了寻求政府的保护和指导。20世纪初，企业已经变得强大起来了。只是到这时，它才对政府的干涉感到不满。但是从这时起，企业已经通过国会和政党等手段影响政府的决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经济的崩溃再次促使企业处于政府的保护和指导之下。近几年来，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虽然已经大大削弱，但两者间仍然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政府和企业的敌对关系相比，日本的政府和企业在本质仍是伙伴。

305

* * *

战前日本最引起外界注意的与众不同的经济制度是所谓的财阀制度。"财阀"是贬义词，意为"财政金融集团"，尤其是指某些巨大的金融、商业和产业联合体，但并不很严格，一般也用以指战前日本的大型企业。按其规模大小，20世纪20年代的四大财阀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三井、三菱以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的采铜冶炼公司的住友和19世纪80年代作为银行机构而设立的安田。后来有些公司加入这个行列，他们被称为"新财阀"。新财阀特别参与了与军事有关的产业和对日本征服不久的"满洲"（中国东北）的开发。

财阀逐渐控制了双重经济中较高层次的大部分大企业。19世纪80年代，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将企业出售给有财政实力、并向政府领导人保证有企业经营能力的少数个人，从而加强了财富与经济力量的集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指责廉价出售政府财产是企图创造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但是，如上所述，这是政府面临财政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而且，政府早就开始怀疑大企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了。20世纪20和30年代，财阀成为众矢之的。社会公众，尤其是军队的支持者谴责财阀是日本社会中的西方式的堕落因素，是玷污议会制度的人，是日本帝国的守财奴式的背叛者。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反复攻击财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源，并以此为理由勒令解散财阀。控股家族对财阀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被以没收的形式剥夺了，大型联合公司也被分割成构成该公司的各个公司。但是，在按照美国传统的反托拉斯方式分割财阀总公司以前，军事占领当局就已经停止了所推行的改革计划，这使原来比较大的财阀下属公司得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占领结束后，这些公司又逐渐恢复旧名称（安田银行变成富士银行是一个例外），并以松散的非正式联盟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在日本，它们今天被称为"系列"。 306

由于系列集团的存在，许多观察家断言财阀制度已经复活了，

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系列是俱乐部式的组织，其成员在从事其他事业以前，可以寻求该系列其他成员的援助和协作，因此系列内部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相互默契。但是，系列企业间的关系决不是排他性的，也不存在核心所有权和过去财阀企业间曾经存在的严格控制。其他关系，比如与同行业各公司集团间的关系和与经团联等综合集团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日本人仍然对旧的财阀制度念念不忘，但财阀制度本身早已荡然无存了。

在战争爆发前的鼎盛时期，典型的财阀基本上处于创业家族领有的核心控股公司的控制之下。控股公司控制着许多主要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又控制着一系列更小的孙公司。这种金字塔式的控制，在西方也是屡见不鲜的。日本别具一格的特征是，控股公司往往没有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所有权，有时只拥有小公司的10%的股票。控制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如下属公司可以完全依靠总公司的银行、船舶和贸易设施。兼任经理普遍存在；经理人员流动于财阀各下属公司之间，仿佛他们是统一的官僚机构的成员一样。隶属于大财阀总公司的优势和声誉是显而易见的。财阀总公司与近代以前的封建藩国极其相似，弥漫着一种对领导人的强烈的个人忠诚意识。年轻的管理人员加入一个财阀企业并终身为该企业服务。这是与日本更早期的社会极其相似的日本财阀制度的特色，也仍然是当代日本的最大特色。

当代美国的联合大企业是由毫不相干的各种公司联合组成的，但所有权相同；日本典型的财阀与此不同。财阀是经济活动演变的自然结果，因此可以更恰当地称之为联合公司。它们往往以向联合公司的各种活动提供资金的银行为中心，其职能体现在一种垂直的关系中。例如，一系列的独立公司可能开采同一种矿石，

307

并把矿石制成产品，靠联合公司的船舶运到海外出售，又通过联公司的“综合商社”购买整个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原材料。这一切活动

的各个阶段都得到联合公司的银行的财政支持。

财阀联合公司的活动程度和性质，可以用当代许多重要公司仍然使用“三菱”的名称加以说明。三菱系列企业有：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地产、三菱瓦斯化学、三菱重工、三菱金属、三菱矿业水泥、三菱造纸、三菱油化、三菱人造丝、三菱制钢、三菱信托银行、三菱邮船等。三菱联合公司（财阀）以航运业起家，但航运公司并未产生“三菱”这个名称，而是称为“日本邮船会社”(NYK)。

日本财阀制度和整个战后经济体制的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组成部分是“综合商社”。这是为满足日本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创造性发明。起初，日本的大企业严重依赖原材料进口和国外市场，但日本的公司规模小，资金不足，并且缺乏关于国外经济状况的知识。这使他们意识到要集中资本和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以及从事国外贸易的经验，依靠一个专门机构代替势单力薄的公司进行海外购买和销售。综合商社应运而生。财阀的综合商社主要是为联合公司的下属公司这样做的，其他综合商社则为某些特殊领域的一切公司服务。

综合商社提供了个别公司无法匹敌的世界性优质服务和从事贸易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商社经营种类繁多的业务，但仅从中取得微不足道的利润。起初，商社的活动几乎只限于日本的对外贸易，后来扩大到国内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能够提供专门服务，它们开始经营许多与日本毫无关系[illegible]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在一段时期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以上是由10大综合商社创造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一些完全能够经营自己的对外往来的巨型公司得到发展，综合商社的作用减少了。

308

长期以来，财阀制度的影响一直是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来说，财阀所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巨大集中，在许多方面无疑是有害的。但是，财阀没有产生现代联合大

企业所造成的那种分散性的经济畸形，也没有产生垄断制度所导致的那种荒谬的经济后果。任何财阀都从未在任何重要的经济领域取得过独占地位。财阀实际上经常发展相互之间进行刺激性竞争的对立企业。有时，少数财阀和其他大公司在某些领域形成实质性的控制，但在时代的潮流压力下，这种控制会转变成短时期内不无益处的卡特尔。财阀所造成的资本集中，为将资金投入特别有前途、但只有经过很长时期才能赢利的风险性行业创造了可能条件，否则这种投资是无法实现的。最后，所有者集团的狭隘性，再加上日本传统的节俭精神，促成了高比例的再投资和增长。虽然 30 年代政府在军部的统治之下实行干涉，将日本的大部分经济力量挥霍在劳而无功的海外军事远征中，但财阀制度下的日本确实为日本近几十年来的惊人增长建立了牢固的工业基础。

309

第三十二章　战后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还没有在经济和技术上完全消除与西方的差距，而冲突及其后果又大大扩大了这个差距。1931年以后，日本人沉湎于军事冒险，1937 年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1941年挑起对美国和英国的全面战争。日本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商船和城市几乎全部被摧毁。摆脱战争后的日本，是一个遭到大多数国家唾弃的戦民国家，而它要生存就必须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日本缺乏大部分自然资源，甚至无力自救。最后，美国人激进的改革计划引起严重的分裂和动荡，以至少数有财产的人也不想从事长期投资。唯有黑市繁荣昌盛。大部分日本人饥寒交迫，整个经济濒临崩溃。从明治维新艰苦创业以来，日本处于最无希望的落后于西方的时期。

日本的恢复比西方所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都要慢得多，直到1949年美国推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停止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随后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向日本购买了大量军需物资，经济恢复才开始出现。起初，经济恢复进展缓慢，但由于日本具备经济恢复的强大基础：高水平的教育、熟练的产业大军及其优良的劳动习惯、大批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商人以及旨在重建经济的政府官僚，速度逐渐加快。政府瞄准某些基础产业，如造船、煤炭、钢铁、电力、化肥和化工等，作为最初的投资和奋斗中心，并平稳地协调各企业。195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312 日本经济以加速度的步伐增长。事实证明，1960年池田勇人首相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的十年计划是严重的低估。日本的奇迹正在稳步地出现。

战后，日本在出口方面最早取得成功的是那些受到近期战争刺激的行业，如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小汽车和重型卡车等，这些产业都得益于战争时期开发的技术。造船也是为了应付战争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曾经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因此它于60年代开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油轮，把它们用以运载最主要的能源石油就不足为奇了；为此，从波斯湾经新加坡到日本港口的整条航线都经过特殊设计，以容纳这些海上庞然大物。

然而，总的来说，日本再次遵循了典型的工业发展模式，虽然这次速度要快得多。纺织品是战后最初主要的出口产品，后来由于新兴工业化地区，如台湾和印度，也进入了纺织品领域，日本人才将出口的重点转到钢铁和机械，如摩托车、小轿车和牵引车，并进一步打入电子行业，在电脑和某些高技术产品领域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者。他们还在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日本开始出现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却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到80年代

末期，日本不仅消除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而且看来很快就会超过它们。

* * *

1950年以来日本经济的辉煌成功，首先应归因于日本社会的性格、战前日本的经济经验以及日本企业组织的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后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考察。然而，人们常常将其解释为本质上是由比西方工资水平低造成的。首先，日本的工资的确相当低，但这实际上主要是战后初期劳动生产率的反映。总的来说，低工资限制了国内市场，对经济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财富，不如说是一种累赘。由于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率的提高，工资也同步上升，达到美国的1/2、2/3，最后与美国持平。由于近期日元对美元升值，今天日本的工资也许高于美国。但是归根结蒂，劳动力支出只代表生产力价值的日益缩小的部分。日本的经济成功，基本上必须归结于其他因素。

315

事实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前经济机器遭到的巨大破坏对战后的经济增长是一个促进。旧工厂或者被空袭所摧毁，或者因缺乏替换的零部件和劳动力而被废弃。这些工厂不值得重建，取而代之的是比美国和欧洲的老工厂先进得多的崭新工厂。财阀制度的废除使日本经济摆脱了传统的运行机制，因为这种机制已经变得过于僵化而不得不加以变革。意义更为深远的是，财阀巨头的解职使新一代企业家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而动荡的时代使改革者和勇敢者得到奖赏。战前的小企业和众多的新企业繁荣昌盛，有些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重要公司。松下、佳能、夏普和 YKK 世界最大的拉链生产商是前类实例，本田、索尼和三洋属于后者。

虽然日本人在日本的经济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首要作用，但这并不排除偶然的外界影响的重要作用。已经提到的朝鲜战争是一个比较小的因素，美国的军事占领则是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因素。

虽然军事占领当局推行的激进改革阻碍了初期的经济恢复，造成企业界的动荡不安，但许多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具有极其有益的长期影响。日本人自己不可能在战后初期的动荡年代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推行这些措施。1949年的经济紧缩和解散财阀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刺激是最好的例证。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一系列坚决明确的民主改革：新宪法、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彻底的农 316 地改革等。尽管这些改革的经济效益微不足道或者根本没有，但它们为民主制度造就了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

美国的卷入在另一方面也不无裨益。它使日本消除了巨额的军事防务负担。二战后，日本人回避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美国与日本既是邻国，又是从前的敌国，美国人对野蛮残酷的日本军队记忆犹新，乐于看到没有武装的日本。然而，世界局势不允许日本完全没有防务力量，因而美国作为军事占领力量自然填补了这个空白。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人则承担在日本及其周围维持庞大军事设施的费用。因此，在其他大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4—7％，有时甚至更多用于军费开支时，日本人却几乎没有防务 317 开支。即使后来他们建立了规模有限的自卫队，日本人也规定了一条原则：把军费开支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这种安排使他们能够将税收保持在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的水平上，将研究和开发活动只用于对经济有益的事业。

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遭受如此彻底失败、经济受到如此重创的日本会崛起而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竞争者。他们更担心的是，处于经济赤贫和政治动荡状态下的日本的经济生存及其国内稳定。因此，美国尽其所能，非常宽宏大量地处置日本，促使它恢复经济自立。起初，美国为防止饥饿而提供紧急经济援助，后来又为日本的出口敞开美国市场，并允许日本保持严格的进口限制以保护其所谓"婴儿"产业。美国人还向日本人提供有用的技术。美国

的私营公司以微利向日本公司出售报废的技术，以为这是意外横财，而从未考虑技术的分享终有一天会反过来使他们陷入困境。日本人因此得以迅速缩小技术上的差距，他们凭借新型的工厂以及高出一筹的企业组织和市场技术，很快发展成为令人生畏的经济竞争者。

对日本的新生工业经济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战后美国及其盟国创建的国际贸易环境。他们作出巨大努力，消除了国家间的障碍，世界性商业繁荣昌盛。这就是因国内资源贫乏而严重地依赖国外市场和资源供应的日本成长的环境。日本不用回到建立自己的经济帝国的老路上去了。

开始，许多国家不愿意日本加入世界贸易共同体。美国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在日本扮演了占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形成了一种家长式的荣誉感。但西方人仍然感受到近期战争的辛酸苦辣，不准备欢迎日本加入他们的集团。日本的邻邦对日本征服者记忆犹新，害怕日本恢复为军事大国。只有美国人支持日本成为世界共同体的完全成员。1955 年和 1964 年，美国分别帮助日本取得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资格。从1975年起，日本成为每年一度的西方首脑会议的 6 个（后来增加为 7 个）主要民主国家之一。

319

欧洲人对日本的敌意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在最近的战争中倍受苦难的国家澳大利亚突然于60年代意识到日本正在变成它的主要市场这个事实，从而采取与美国相似的温和态度。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把日本视为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和技术的最佳源泉。今非昔比，日本制造品的质量已比战前时代大有改进，到80年代，“日本制造”的标签在各个领域都是优秀的标志。日本不仅成为举世公认的名副其实的经济巨人，而且是生产各类产品的世界领袖。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与西方并驾齐

驱，同执牛耳了。在许多人的眼中，日本是取得经济成功的一个范例，也是未来的一个先行者。

320

第三十三章　雇佣制度

日本经济上的成功在西方引起一种真正的神秘感。许多国家认为，日本掌握了某些秘密的并且可能是不公平的经济手段。日本必须改变这些手段，以使其他国家得以在平等的经济领域展开竞争。更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人发展了其他人可以学习和效仿的神秘技巧。这两种观点都是大错特错的。日本人确实具备一些外国人知之不多、并且总的来说对日本有利的特殊的经济特征，然而这些特征是日本社会内部自然演变发展而成的，虽然对西方人来说是离奇的，但怎么也谈不上神秘。这些特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日本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终身雇佣制度。对于经理人员来说，这是从近代以前时期延袭下来的制度。大公司通过对大学（通常只限于少数名牌大学）毕业生进行考试，选择未来的经理人员。成功的候选人成为公司的终身雇员。最初几年，他们都受到全面的培训，一般是在日本或到国外从事高级研究，或者担负各种工作，以扩大他们关于公司的知识。最有前途的人可能被授予最有挑战性的职务。

同年应聘的人员，在大部分时期保持工资和职位的同步增长。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在同龄团体的成员或者年龄比较轻的人领导下工作。只有到该群体接近顶峰时，最有才华的人才被选择为总经理，其余的人则退休——退休年龄一般为55岁——尽管其中许多人继续在主要为公司提供零部件的下属小企业担任名誉经

321

理职务。

中央政府各省、厅和机关也普遍采用这种选择、培训、晋升和退休的制度。官员退休后往往担任政府或企业的顾问，而后者居多。这类顾问职务薪水很高，但并不负责具体工作。

日本的整个雇佣制度既有弊端，也有很大的优点。这种制度即使没有消除同龄群体之间以及跨年龄跨地位人员之间的分裂、竞争和冲突，也往往改善了这种状况。下属不能超越无能的上级，上司也根本不用害怕才华横溢而雄心勃勃的部属。没有人想表现自己的个人才华和富于进取性的领导才能，因为害怕被别人看作不安分守己。所有官厅工作人员都把自己视为官僚队伍的一分子。领导人仔细地与部属协商，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特长，因为他们的成功会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声誉。下级也敢于畅所欲言，同时给上司以全面的支持，而不管后者的能力怎样，甚至昏庸无能。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使官僚队伍中出类拔萃者脱颖而出的平稳的协商制度。全面的协作依靠各级经理人员的齐心协力，各级人员也各尽所能。

下面我们来考察外国人通常迷惑不解的日本式企业和官僚机构的决策过程。美国人对比较独裁的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习以为常，因而对自下而上的日本的决策过程感到惊奇。这种现象与所谓"禀议制"有密切关系。根据禀议制，文件通常是从低级官僚到高层官僚广泛传阅，他们分别在文件上签名盖章，表示已看过并基本同意。这与美国官僚机构中的请示制度或散发备忘录的制度不同，许多例行公事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但这种制度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也不是制定高难度的高级决策的唯一方式。

日本决策过程的真正特殊之处，是在取得意见一致的决策以前进行细致、全面协商的制度。这种协商称为"根回"，其字面意思是植物移植前剪除根须，引申为事先疏通。日本人不是在高层由

322

个人决策，而是同部属进行广泛的非正式协商，产生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具体反映在部属起草的禀议制文件中。然而，最终决策仍然必须由最高层的小群体或个人作出。总之，所有有关人员事先对决策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卓有成效地付诸实施。如果没有这种事先通融，要突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这种共同决策的过程以及年龄群与官僚队伍的紧密内聚力确实存在严重的弊端。它延缓了决策过程，使局外人尤其是外国人难于适应。一般说来，外国人不仅日语说得不流利，而且对日本式人际关系缺乏充分了解，不能长期与日本的官员相处而有效地工作。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变得更具有国际性，最高级领导层与外国人间协调的困难，将变成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

323

另一方面，日本经理人员的终身雇佣制也在减少内部冲突、确立个人对公司或政府机关的巨大忠诚方面具有优越性。日本人一般不用工程师、电子专家、销售经理、经济学家等专业职称来表明自己的身分，而是根据公司或政府机关来确定自己的身分，如丰田、日本钢铁、日立或大藏省的职员。他们总是自豪地佩戴公司徽章，在经常交换的名片上特别注明自己所属的企业或机关。这种强烈的忠诚的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 * *

经理人员的终身雇佣制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在大部分军事组织和许多政府文职机构如美国外交部门中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将这种制度扩及劳工则是日本绝无仅有的特点。人们通常以为这是前近代日本社会的残余，但实际上是带有浓厚的现代色彩的发展。早期日本的机器生产和西方一样主要是纺织业，也和西方一样主要是由青年女性临时工操作的。在日本，大部分工人是想积蓄嫁妆的姑娘，她们住在公司严密控制和年长妇女严格管理下的集体宿舍中。

在技术上要求较高的冶金业的工人是和西方的工人一样经常变换工作、视价出卖自己的劳动的男子。本世纪初，日本雇主开始认识到这种技术工人是比较稀少的商品，有必要给予各种特权（主要是工作保障）以控制他们。吸引这种劳动力的最有效方法是将工龄与工资挂钩，使他们不会轻易离职。具有一定学历的年轻有为的人，进厂时跟许多非熟练工人一样，工资待遇很低，但公司出钱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给予他们职业保障，并按工龄的增长稳步地增加他们的工资。

终身雇佣制尽管先在经理人员中实行，但本质上既适用于经理，也适用于职工。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的终身雇佣制才开始受到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大公司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制度成功地使工人同经理一样，树立起对公司的忠诚意识。经理人员和白领工人与在基层工作的职工团体或质量检测组织和衷共济。职工及其经理结成紧密团结的小团体，都以他们的特殊团体的成就为荣，监督产品质量，集思广议，改革工作，革新生产过程。

324

尽管经理人员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比较高，经理和职工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他们在工厂中经常穿同样的工作服，戴同样的工作帽，在同样的公司食堂就餐。公司向他们提供住房。有些公司在最初的在职培训中就向他们大量灌输公司意识，并以唱公司之歌开始一天的工作。公司如同家长一样关怀经理和职工，鼓励上下级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上司还经常扮演部属的私人顾问角色。大公司拥有对公司团体开放的度假村，并组织运动队、野外集体活动和其他活动，以加强公司的团结意识。青年职工和经理人员各尽所能，以公司为自己生活的中心。企业十分成功地使他们树立起个人从属公司的意识。

虽然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是因为公司对劳动力的需

要而形成的，但这与日本人的基本观念即群体意识完全吻合。这个制度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不无益处的副产品，造就了一支以自己的产品为荣、乐于加班加点工作的忠诚甚至热诚的劳动大军。许多工作人员，尤其是低级经理放弃假期，其目的大概是为了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工作的重要性吧！与大多数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工人们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检查他们的产品，因此外部的检查是无关紧要的。

工人感到，他与公司的密切关系满足了他对团体成员身份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来的工资的稳步提高又满足了他对自己人生各阶段——结婚、生儿育女、教育子女、最后准备退休——的经济需要。这种制度比19世纪的工业主义更富有现代性和人情味，那时工资主要是由技术和能力决定的，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日本的工资制度与现代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工资制度相似，与其把它视为其他许多工业化国家仍然可见的旧式工资制度，不如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工资模式。

325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又是一种缓和失业浪潮的力量，而这种浪潮给现代工业化世界造成了冲击。如果某个公司不再需要某些特殊生产领域的工人，公司就想方设法对这些工人进行培训，使他们从事公司的其他工作。甚至在公司面临劳动力总过剩时，公司也竭力保证为工人提供各种就业机会，直到劳动力过剩自然消失。

当然，这种做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上也对工人有利，因为他们既不用担心失业带来的经济后果，又可以避免自尊心的丧失。对于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社会乃至公司来说，这种做法也不无益处。它保证了个人对公司的忠诚和公众对企业的善意，从长远来看，也不增加经济负担。因为失业工人必须得到某种方式的支持，如免税，而归根结蒂这是由公司自己负担的。失业的代价最终总是要支付的。

看来，日本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终身雇佣制。日本的失业工人有时仅达其他工业化国家失业人数的很小比例。甚至在经济危机时期，(如70年代的石油冲击时期)，失业人数也没有显著的增加。当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不断繁荣。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失业人数少在某种情况下带有欺骗性，因为女性失业者不列入劳动力的统计中。但是，毋庸置疑，日本的雇佣制是它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年功序列工资制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刺激因素。一个生机勃勃、迅速增长的公司拥有一批人数多得不合比例的工资较低的新雇佣的青年工人，一个停滞不前的公司一般只有一批年龄较大而工资较高的劳动力。因此，这对快速扩张产生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日本企业的增长孕育着更大的增长。不管价格和需求怎样，工资都是固定价值，不是通过解雇的压力就可以轻易降低的。这个事实有力地阻止了生产的任何下降。自然的压力有助于扩张，而不利于紧缩。

326 如上所述，日本的雇佣制度听来几乎田园诗般美好，但也有严重的局限性。对于双重经济中低层次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工人和通常被排除在该制度外的大多数女性临时工来说，终身雇佣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小零售商店和小工厂的工人也没有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的保障。每个大型制造业周围，都汇聚着大量小型承包合同公司，作为其加工厂。这些承包公司向大企业提供它所需要的零部件，但对工人没有提供任何制度上的特权。甚至在大公司内部也有被排除在制度外的大批临时工，不管他们的契约关系实际上维持多久。各种各样的外围工人仅得到较少的金钱利益，并且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只有大公司的精英工人集团才能充分享有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的特权。

然而，即使在这类工人中，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从50年代

末到7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劳动力充足，公司能够通过雇佣相对廉价的青年工人。特别是那些在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而实现快速增长。快速增长对公司当然是有利的，因为它降低了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是，后来人口的增长减慢，青年工人的数目减少，年龄较大的工人在产业大军中的比例上升。一般说，所谓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价值上升，因此公司的快速增长不那么容易和有利了。

青年工人也开始感到日本的雇佣制度不像他们前辈认为的那样有吸引力。遥遥无期的经济奖赏对现时的勤奋工作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感召力。他们渴望更多的个人生活自由，觉得公司的家长式态度有些令人窒息。他们对公司的忠诚意识也不那么强烈了，许多人，包括年轻经理，希望调动工作，这在他们的长辈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高度复杂的一整套工资制度也转向更加重视技术和生产成果，逐渐脱离对资历的绝对依赖。换言之，这种制度正在出现腐烂的征兆。

然而，总的来说，日本的雇佣和工资制度是稳固的，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内基本上不会变化。由于劳动力普遍不足，中小企业的低工资不断向大企业的高工资靠近。尽管日本的整套雇佣和工资制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明显的腐烂，并且将日益与西方相接近，但更可能出现的似乎是，西方的雇佣和工资制度进一步接近已取得明显成功的日本模式。

327

* * *

日本的雇佣和工资制度影响到日本工会运动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工人运动即以战前虽遭镇压但意义重大的工人运动为基础，在美国军事占领当局的鼓励下蓬勃兴起，甚至一度企图接管工业的控制权。但是，由于后来美国占领当局反对这种行动，日本工人也满足于工资的迅速增

加，工人运动的战斗性才减弱了，平静了下来。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

在日本仅有1/3或更少的工人参加工会组织。这个数字与多数西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明显高于美国。工人首先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公司的终身职工，而不是专门技术的掌握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与公司的活动息息相关。因此，日本的大部分工会不像西方的工会那样是跨公司的产业工会，而是包括所有工人、甚至常常包括低级经理人员在内、局限于一个公司的工会。这种工会可以称作企业工会，以区别于“公司联盟”，即由公司控制的、人为创建的工会。日本的企业工会是完全独立的组织，其目标是在反对资方的斗争中捍卫工人的利益，并参加每年一度的争取工资的“春斗”运动。

企业工会通常联合组成包括某行业所有工会在内的更大集团。有些企业工会又构成全国性联盟，这些联盟关注全国性问题，而不是地方性问题。如上所述，规模最大的“总评”主要是由政府雇员和白领工人组成的。这类工人工资的提高可能更多地依靠政治行动，而不是市场。因此，总评所属工会往往像初期那样重视政治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党乃至共产党的支持下进行政治活动。第二大工会联盟是基本上由私营企业的蓝领工人组成的“同盟”。它重视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在政治上支持民社党。比较小的工会联盟和独立工会一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大部分私营企业的普通工人基本上只对自己的企业工会感兴趣，而对全国性联盟漠不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工会认识到，自己的福利依赖公司的成功。他们知道，如果工人的旧工作已经过时，公司将对他们重新进行培训以从事新工作，因此，他们和他们的工会都不会反对技术上的进步，而这种状况在西方有时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他们也认识到，如果生产率和利润没有增长，公司将难于

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虽然他们为分成而斤斤计较，但他们的要求很理智，完全符合公司的财政状况。在日本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日本工人工资的年增长率大约达到15%，这是一个令人皆大欢喜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的低速增长和负增长时期，工人及其工会同样是理智的。

工人及其工会也象资方一样不愿看到罢工和怠工，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也必须为丧失利润付出代价。因此，许多罢工纯粹是象征性的。工人在早晨开工前短暂地进行罢工，这样既可以表现自己的力量，又不会减少生产。名副其实的罢工时间一般都很短。声势浩大的罢工只有在整个行业崩溃、全部工人失业的时期才会发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是1960年的三池煤矿罢工。当时，罢工者不得不对自己的要求作出让步。近几年来日本浪费在罢工中的劳动力要比西方少得多，只有美国的1/3或英国的1/4。 329

日本的工会在以各种方式满足工人的要求的同时，也为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作出了贡献。它们是日本经济的重要财富，是日本整套雇佣和工资制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当然，在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其运行状况也是良好的，如同今天这样。很明显，日本的雇佣和工资制度是现代日本在经济上取得非凡成功的原因之一。 330

第三十四章　企业组织

331

高水平的企业组织是日本经济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经济的这一侧面在西方尤其鲜为人知。人们经常提出日本企业的所有者是谁这样的疑问，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占领当局以资本税的形式，实际上没收了大部分的剩余财富。从本质上

说，回答是国家，即人民大众。

成功的新企业家、拥有城郊土地的农场主以及拥有有发展前途的地产的人，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但是，典型的持股人并没有领有或控制大部分公司，相反，大公司是由不拥有所有权的经理人员负责的，他们处在向该公司提供大部分资本的金融机构的严密监督之下。如果存在所有权的话，那么所有者就是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债务股票率有时高达20—80%，这种状况在西方是很危险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信贷机构的背后是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反过来它又得到政府债权、税收和个人储蓄的支持。这样，归根结蒂所有权纯粹属于国家。

因此，大部分日本企业不必像美国企业那样担心四分之一的底线。它们可以专注于市场股票的长期稳定和增长，而从利害关系来说，这对于公司终身雇佣的经理人员和寻求贷款保障和长期收益的信贷机构是最重要的。因此，日本企业家更关注能带来更多银行贷款的良性增长记录，而不是有助于新企业资本增值的立即见效的利润。美国经理必须注意股票价格和四分之一的底线，日本经理则可以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态度，想方设法维持公司的良好声誉，以确立一个增长的基础，尽管在10年内可能没有收益。增长和收益是他们退休很久以后的事。日本企业的这种长远眼光使它能够实行一种更为理智的增长路线，这可能是日本企业超越西方企业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332

金融机构在为日本非同寻常的增长提供充足的资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引出下面的疑问：他们从哪里取得这么多的金钱？答案首先是处在这些金融机构后面的国民政府的信用贷款，其次是日本经济的巨大成功，它大大地增加了资金来源。但是，关键性的第三个因素是日本人民在各种情况下，甚至在战后初年的经济匮乏和以后的消费挥霍时期，都有强烈的储蓄嗜好。美国人习惯

以住房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使用信用卡或其他形式的信贷，在债务中生活。而日本人则不同，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俭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保障计划不完善和退休金比较低的情况下，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种节俭传统基本上是历史上长期的赤贫生活造成的结果。6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实际上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40%，即使是今天，个人储蓄率也达15%左右。欧洲的储蓄率约为7%，美国更少，只有3%。相形之下，日本的储蓄率是很高的。企业公司不必卑躬屈膝地要求投股人入股，可以将更多的利润投资于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其程度比西方通常所能做到的要大得多。

税收和工资制度也是按照鼓励储蓄的方式制定的。税收政策比较有利于那些将利润用来再投资的公司，而不利于那些分红利润的公司。规模较小的邮政储蓄尽管利息较低，但可以免税。老年工人的工资较高，这是考虑到储蓄以备退休后的生活而设计的。整个工资制度具有鼓励各年龄层次的人进行储蓄的特殊功能。每一个雇员每年在元旦和中元节有两次收到公司送来的红包，其数目视公司利润而定，一般相当于一至三个月的工资。由于大部分雇员习惯靠月薪生活，这些红包很容易转为储蓄。

* * *

334

如上所述，日本实业组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与政府间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在近代时期就已经存在。有些美国人夸大这种状况，认为日本政府与企业秘密地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实体，他们称之为“日本公司”。这种说法夸大其辞，因为政府的控制受到限制，企业则渴望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但是，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关系与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的传统是政府和企业势不两立，互相敌视。

在近代以前，实业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会瓦解理想的封建制

度的东西。但是，19世纪中叶，明治政府为了追赶西方而成为企业的倡导者，商人也满意地接受政府的领导和援助。然而，经济迅速发展，以至于某些人认为企业势力大增，足以与政府分庭抗礼，甚至发号施令。最后，30年代，军部领导人迫使大部分商人成为政府的侍女，尽管他们愤愤不平，但又不得不唯命是从。

在美国军事占领时期，财阀的解散，《禁止垄断法》的颁布，公平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从美国借鉴的机构的建立，使经济活动自由的观念传入了日本。然而，实际上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从未削弱过，因为险恶的经济状况使这种控制成为必不可少，正如美国人所推行的社会和政治的彻底改革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样。

美国占领当局的改革者认为他们的改革是一种临时性措施。但是，其中许多改革成为日本政府与企业间永久关系的新起点。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代替战前商务省的通商产业省（通产省）实施的。经济企划厅制定广泛的经济目标，通产省确定各产业的具体目标，从许多方面指导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官僚机构通过控制外汇和发放技术进口许可证，严格监督新技术的引进，千方百计为那些能够最卓有成效地利用新技术的公司，按照最优惠的条件获取最先进的技术。同时鼓励取得同样技术的两三家公司进行竞争，以避免日本国内形成垄断。在必须削减生产的时期，通产省协助组织业务萧条的卡特尔，并在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出口时协助组织出口卡特尔。它还鼓励小公司合并成大公司，以改善整个经济活动。

335

如上所述，税收政策是为鼓励那些增长前景美好的产业而制定的。日本银行实行的政策确保资金能充分流入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其他各省给予产业以行政指导，引导公司投资于生产率最高的产业。通产省等政府部门的“指导”没有法律效力，但企业家乐于接受，因为他们知道通产省和其他各省、厅有许多奖励或惩罚

的行政手段。

政府就是以上述各种形式在指导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上所述，政府首先是精心选择某些基础产业予以鼓励，后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又转向鼓励更先进的产业部门。它的战略是根据相应条件的变化平稳地转变方针。早在60年代，当南朝鲜、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凭借其具有决定意义的低工资而在世界产业舞台上脱颖而出时，日本就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它又摆脱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如石油）并引起严重污染的重工、化学工业，转向以知识和技术为特征的高技术产业。日本高水平的教育和科学技术使它遥遥领先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并与西方最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政府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是减轻某些产业衰落所造成的困难。除农业以外，政府坦率地承认必须使工人从没落产业转移到具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并对整个转移过程予以援助，如采取某些政策鼓励重新培训工人使他们能够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降低公司计划的生产规模，使其适应形势的变化。日本政府的作用与美国政府的作用截然不同。美国政府屈服于代表那些没落行业的国会议员的压力，想方设法提高消费品价格，并对强有力的经济部门课以重税，以此为代价维持经济中的不健康因素。由此可见，日本政府促进资源流入生产率最高的产业，而美国政府则竭力为生产率最低的行业保留资源。日本的战略自然促使增长速度较快，并造成了较为健康的经济。

336

* * *

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并非全是政府指导的结果。官员和其他人一样，在预测未来时也难免犯错误。例如，日本的汽车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政府既没有给予任何援助，也没有估计到这种情况。然而，在进行经济指导时，政府是理智的，它鼓励私营企业按

照实际情况发挥经济上的首创精神。因此，日本与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同，它允许企业自由地摆脱政府的失误，开发那些政府所忽略的行业。私人的首创精神与政府的援助和指导之间的关系很和谐，并且可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佳均衡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不自始至终是单向性的。大企业，即日本所谓的“财界”，与其说是政府的傀儡，不如说是政府的伙伴。政府给予财界指导和援助，但也征询财界的意见。势力雄厚的“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在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决定了政府领导人的命运，尤其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同友会”（经济同友会）主要是由比经团联的首脑年轻的企业经理组成的，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日商”（日本商工会议所）代表中小企业，“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是处理劳资关系的中央战略机构，这两个组织的作用比较有限，它们主要为利益比较狭隘的企业服务。

近年来，政府对产业的指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关系看来都已日渐削弱。由于日本的工业越来越强大，它不需要也不能容忍政府任何形式的控制，同时，外国向日本敞开了经济渗透的门，337 它们反过来也要求在日本得到公正的待遇。这就要求政府放弃过去实行的许多控制。日本政府被迫放弃外汇管制、大部分进口关税限制和通产省的技术进口许可证制度。政府的领导作用得到实际扩大的是公害（污染）控制。70年代初，政府在公众的鼓励下着手处理公害问题。日本政府的公害控制措施与其早期的做法不同，未能得到企业界的欢迎，因为其目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迎合社会需要。政府曾优先关注经济增长，并为此与企业形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但是，现在政府响应大众的呼吁，不仅重视生产的数量，而且强调生活的质量。实业家始终不变的动机则是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因而与政府分道扬镳，逐渐失去日本战后经济的英雄地

位，并且日益被认为是反面角色，如主要污染者和拥挤的制造者。高效率的政府与生机勃勃的充满竞争的财界间的合作关系大体上会延续下去，但是旧式的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不大可能复活，这种伙伴关系曾是战后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双引擎发动机。

* * *

日本企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集团关系的力量。正如集团关系充斥日本社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种关系也弥漫了实业界。管理部门的成员把它的所有上司、同僚、部属都看作是终生必须与之密切合作的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一般不会被其他公司的高薪厚俸所诱惑。中途辞职另谋高位者，会被当作是与集团不协调的人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的人。这种制度使带有分裂性的领导权变动和带有伤害性的人际竞争缩小到最小程度。领导人间冲突较少，内聚力比较稳定，使公司受益匪浅。

由此而产生的团结意识可能是日本的日常管理费用比美国低的原因之一。日本经理的工资无疑比美国经理低，他在公司持有的股票也比美国少得多。唯一的例外是比较新的家族公司，但即使是这些公司，在继承税很高的情况下，可以继承的所有权也不会太多。在日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金钱，而是声望的表征：大型的公司住宅、小汽车、汽车接送、豪华的办公室、丰厚的支出帐目，而格外重要的是，在具有全国性重要意义的公司中担任高级职务。总之，在日本，我们看不到在美国公司中屡见不鲜的过高的工资以及你争我夺的大批官员。 338

由于日本公司的管理官员形成目标类似的终身俱乐部，因此他们和衷共济。除非公司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并处于债权银行的控制下，领导人一般是从俱乐部中最出类拔萃的成员中选拔的。担任主管职务的可能是全面熟悉公司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的工程师或科学家，而不是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销售部经理或来自某些较

大公司的着眼于获取短期利润而不是长期发展的财政专家。由这类领导人领导的日本公司，往往坚守他们最熟悉的生产或销售行业，注意该行业的进一步增长，而不是扩散成追求短期利润的联合大企业。

日本的企业经理不太注重取悦于持股人的快速赢利要求，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扩大公司的市场和赢取国内外声誉的长期增长上。这是实现个人目的和公司目标的最佳途径。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因为个人报酬显然只有在公司成功的时候才能取得。而经理人员在下述观点上是一致的，即只有通过长期努力，公司才会获得成功。这类观念与美国人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醉心于在高薪厚俸的公司中谋求个人的成功，并通过快速赢利表现个人的效率。它们恰好符合日本从长远眼光制订经济计划和追求经济成功的民族动机。

集团协作倾向也渗透到公司间的关系之中。如上所述，同一行业的公司通常组成协会，协会又构成全国性的"经团联"的组成部分。从财阀联合公司时代延袭下来的系列集团的企业，其相互间的关系往往比与其他公司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长期协作和个人间的友谊与信任，在决定公司的合作伙伴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说明日本大企业的运行机制时，不应过分强调个人间相互尊敬和信任的重要性。请客送礼、联姻以及高尔夫球场和有艺妓出席的晚会（下级经理则在酒吧）上的消遣娱乐都可以加强友谊。339 这种私人关系超越只是列举细节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在企业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实业家酷爱温馨的私人往来，而避免冷酷的法律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宁愿避开法律诉讼，而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日本企业平均聘请的律师只有美国的一小部分的原因之一。结果，企业节约了大量聘请律师的开支，大大减少了企业间冲突的程度。

重视个人友谊超越了公司间的关系，并且渗入到企业与政府间的协作中。在战后日本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协作成功的一个原因是，除了一些白手起家的新人以外，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基本上出自同样的名牌大学，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朋友，或至少是象征性的朋友了。

* * *

正如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战后日本的工业体制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其领导人是领取薪金的"企业官员"，其倾向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增长，而不是个人的薪水和公司的短期利润。金钱赏罚比较平等，整个国家福利被看作是主要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优秀方面的混合物。它接受政府的指导，而没有完全为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所控制。同时，不管政府怎样试图计划和控制整个经济，也不能抑制经济的成长。企业自由和激烈竞争有广阔的天地。经济和谐而卓有成效地运转，使那些有文化知识和实践技术的人从全国各地的学校和企业的公开竞争中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日本经济洋溢着增长的活力，互相对立的公司间的竞争使他们生机勃勃。毫无疑问，日本经济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值得我们研究，并仿效其中合适的方面。但是，必须指出，日本经济的力量在某些方面来自其他民族不可能或者不愿意模仿的特性。

然而，最后我们必须记住，不管日本的经济如何成功，它也有严重的问题和弱点。谁也不能保证未来它会像过去那样平稳地运转。日本经济的许多最有效的动力显然已经开始衰退。年轻人缺少他们前辈那种对公司的毫无疑问的忠诚。工资压力日益增大，结果是生产费用扩大，生产率下降。日本人不愿意像美国和北欧国家那样看到移民或"客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这种态度使它更 340

难于补充低工资劳动力，但也使它得以避免民族多样化所带来的某些棘手的社会问题。

对于日本人来说，问题最大的领域是对外贸易。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谨慎地栖息在一块狭窄的经济暗礁上，依靠粮食、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因此在同样程度上依靠支付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工业品的出口。当日本还是一个从战争废墟上恢复起来的经济弱国，而整个世界经济又刚从近期战争的破坏中有力地重建起来的时候，日本的快速增长拥有充分的空间。但是，当代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而世界明显地跨入原材料过剩的时代，它在获取原材料方面已没有什么困难，但在寻求出口市场方面却遇到了严峻的困难。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凭借它们比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将日本从纺织和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驱赶出去。日本不得不向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领域发展。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和西欧等比较富裕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同样也在殚精竭虑地维持这类生产。他们不会像过去那样以牺牲自己的产业为代价，允许直接具有竞争性的日本进口货继续增加。例如，近期美国每年对日本有500亿美元以上的贸易赤字，这是绝对不能继续下去的，必须在引起更为强烈的危险反应以前就通过谈判加以控制。

和大部分贸易对手相比，日本的关税并不高，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比较低。但是，其他国家认为日本通过阴谋诡计维持非关税壁垒，造成了一个攻击外国人的经济竞技场。他们还相信，日本人可以通过把更多的生产力用于繁荣自己的国家，特别是改善住房、道路、排污系统和满足其他社会需要，从而削减出口的努力并保持自己的活力，这样可以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利益。

但是，日本人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状况。他们非常危险地依赖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他们对世界性的石油短缺和日本几

乎无能为力的世界性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日本的通货膨胀(在70年代曾一度飞涨到26%)记忆犹新。他们不会忘记1973年美国突然实行大豆禁运，而大豆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食品。这类事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脆弱感。他们敏感地认识到他们缺少生产自己的粮食的能力。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维持高增长率，以便自己在与某些难于预测的灾难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他们将贸易顺差归因于其他国家不愿意改革经济体制，并且不能像日本商人掌握外国语言、了解希望出口货物的国家的经济需要、掌握做生意的方法那样学习日本语，开拓日本市场。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重要的是，日本经济的首要问题在于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几乎日本所有严重的问题都是由此引起的。日本留给自己的是一个成就辉煌而幸福的国度。但是，在历史的这个阶段，日本显然已不能孤立地存在；它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之一。下面我们将探讨日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

第六编 日本与世界

347

第三十五章 战前的历史情况

日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性和失去这种联系的严重性，是贯穿我们全部论述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有时仅是一种副旋律，但在近期成为响亮的主旋律。只有在大量的原材料流入日本和相应的制造品从这里流出以支付这些进口、同时世界和平与全球贸易又为这种巨大的货物交流提供了可能条件的情况下，那么，1.2亿左右的日本人，或者其中的一半，才能生活在他们狭小的列岛上。在不胜枚举而又日渐复杂的困扰人类的问题上，日本人必须能够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进行有效的合作。缺乏这个条件，他们所有的其他技术都将无济于事。适当的国际环境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良好关系，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然而，无论是日本人自己还是别国人，都认识到国际联系是日本最薄弱的环节，这个环节却是日本赖以生存的基础。日本人过去的经历没有为他们与外国建立交往作好准备，他们的宝贵财产，如强烈的自我意识、非同寻常的单一性和组织严密的社会等，在当代往往成为他们面向世界的障碍。他们的语言与其他一切语言大相径庭，这是他们与其他民族间的一个巨大障碍。打个比方说，日本人本是技术高超、所向披靡的棒球运动员，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邀请去参加网球锦标赛，当然显得无所适从了。

对于日本人来说，对外关系成为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战后，当他们正在出色地处理国内问题时，突然发现

主要的困难是与此不同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仅仅在过去的20年中，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个事实的全部重要性。在日本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对外关系或者对他们无足轻重，或者只用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就能驾驭。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 348

直到6世纪，一直有大量移民经朝鲜进入日本，日本在军事上卷入朝鲜半岛可能与此有关。但是，在以后的近1000年间，日本与外国人的交往微不足道。和平地输入中国文化，是日本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既没有对外战争，也没有外国移民。贸易逐渐增长，随之出现了日本人的海盗活动。日本的海盗活动是在14世纪从近邻的大陆沿海开始的，后来蔓延到东南亚。16世纪时，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出现在日本，他们是作为商人和传教士来到这里的；但是到17世纪，他们就被驱逐出境，其宗教也从列岛上消失了。从此，日本进入了两个世纪的人为孤立时期，它只与中国人、朝鲜人和荷兰人进行少量的受到严密的监督的贸易往来。从6世纪到19世纪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人只经历过两次对外战争：13世纪中国蒙古族统治者两次不成功的入侵和1592年至1598年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不成功的征服。这种长期未受外国入侵和没有国外军事冒险的历史记录，在所有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19世纪中叶，西方世界敲响了日本锁国的大门，要求进入列岛进行贸易。对于日本人来说，对外关系从此确实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日本人被迫开国，他们紧急行动起来，努力获取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经济技术，以保护自己免受西方的欺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对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依靠传统的民族单一性以及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采取其他民族开始面对西方技术优势时没有采取过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然而，日本人被迫加入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危险世界。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强国不仅吞并弱国，而且相互争夺战略优势。对于日本人来说，为了赢得安全保障和完全独立，军事实力和工业力量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们极其重视发展强大的陆海军，并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日本人认为，如果被另一个敌对大国控制的话，朝鲜半岛就是刺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尖刀。为了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他们打了两场战争，第一次是1894年至1895年的日中战争，第二次是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并且两战两胜。日本帝国从战争中崛起，它包括了台湾、朝鲜、满洲（中国东北）南端以及萨哈林（库页）岛南半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东亚既是独占鳌头的经济大国，又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它还在大战期间将其军事优势扩张到大部分中国，通过战争手段取得了德属北太平洋岛屿以及德国在中国沿海省份山东的租借地。

349

大约在这个时期，日本人关于对外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给日本既带来了安全保障，也造成新的脆弱性。日本军事力量赖以建立的工业基础和人口的增长，使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依赖外国的供应来源。铁矿石和其他重要矿物资源都仰仗国外，陆海军赖以运转的石油基本上来自当时称作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西海岸，人类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和农业肥料——大豆来自满洲（中国东北），一部分大米来自朝鲜和台湾。随着工业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日本也将进一步依赖外部世界。

但是，世界形势已经日益变得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扩张了。西方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拖得精疲力竭，它们呼吁停止对外征服，并在国际合作中寻求安全保障。因此，日本的任何扩张都会遭到世界的谴责，而不是钦佩。在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日本未来

扩张的最大希望中国，民族主义精神方兴未艾。抵制贸易和民众反抗使帝国主义扩张要比过去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也更加不容易了。

在这种形势下，20年代的政党内阁在财界的强大压力下放弃了军事扩张。财界不喜欢高税收，也害怕军事扩张损害其国际贸易。日本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撤回远征军，大幅度削减国家预算中的军费开支，并且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同意按照日本海军对美国的两洋舰队和英国的世界舰队3：5：5比例限制主力舰，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人在维持了他们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的同时，试图通过国际贸易和以威尔逊[①]总统的理想和国际联盟为标志的和平国际秩序，为其扩张中的经济寻求到安全保障。 350

1931年，日本军部开始征服满洲(中国东北)，从而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把日本拖回到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上。对此我们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考察这种剧变的原因。国内，尤其是军队内部对政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满，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大危机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危机极大地激化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紧张状态，使日本人担心日本会因为其他国家推行限制性贸易政策而被排挤出世界大部分地区。有些人认为，西方列强已经满足了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并且由于拥有大量殖民地而可以比较容易地摆脱世界性大萧条，但却哄骗日本在取得足够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地以前放弃扩张。他们还认为，白种人已经将世界上有吸引力的开阔土地，如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据为己有，但却出于傲慢的种族原因将日本人拒之门外，从而像过去一样把日本人禁锢在他们狭小的列岛上。

---

① 威尔逊(1836—1924)，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曾在一战末期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译者

满洲事变① 导致日本向中国发动进一步扩张。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发生了更多的冲突，最终引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以中国西北为根据地的共产党政权压力下，终于挺身而出，反对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虽然日本军队取得节节胜利，占领了中国的许多领土，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以他们辽阔国度的腹地为基地，坚持抗战。日本的战争机器陷入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泥潭中。日本人希望找到击败中国抵抗的出路，继续扩大战争。但是，它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导致美国对日本加强经济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日本和纳粹狼狈为奸，日本企图独霸亚洲，纳粹则妄想主宰欧洲。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行实质性的石油禁运，迫使日本在发动对美国的战争和恢复原来的状态两者间作出抉择。日本选择了进攻，它虽然在开始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1945年以全面崩溃告终。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外国征服者的统治之下。

351

第三十六章　中立或结盟

战后，日本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中。他们成为国际弃儿，一贫如洗，灰心丧气。他们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军事实力。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个人和民族的简单生存。当他们终于又重获独立并且逐渐繁荣起来而成为经济大国时，他们发现，人口的增长和产业的飞跃发展，使他们远比以前更加依赖世界的资源和贸易。但是，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时，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帝国主义扩张显然是不可能的，唯有和平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贸易才能保证日本未来的生存。

在日本小帝国中，朝鲜、台湾、满洲和库页岛等被剥夺了，甚至它的固有领土千岛群岛也被剥夺了；琉球（冲绳）群岛也一度被剥夺。此外，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蓬勃高涨，帝国主义征服无疑是痴心妄想。仍然存在的帝国主义大国，很快发现他们已经保不住他们领有的殖民地了，甚至连统治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殖民地也保不住。虽然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陆强国能够保持对臣服的人民所居住的毗邻地区的控制，但所有的海洋帝国很快都土崩瓦解了。有些殖民大国，处心积虑地维持它们的帝国，如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大多数国家自愿放弃了殖民地并承认新的国家。情况既然如此，不管多么保守的日本人也不会痴想去进行帝国主义的征服。

对于日本来说，唯一可能的选择是一个贸易相对开放的和平世界，这是显而易见的。起初，日本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态度和炽[352]热的和平主义精神，基本上是对战争恐怖及其所带来的苦难的一种感情上的反应，但这种态度逐渐演变成了理智的信念。随着战后感情的消失，以及没有经历战争的新一代的成长，世界和平对日本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强烈的理智的信念继续保持不变。今天，日本人比任何民族都要更热烈地献身于和平主义。这是他们的伟大理想，得到他们感情上和理智上的支持。

只要日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处于外国的军事占领下，对外关系就不成其为问题，而且大部分日本人也只能同意需要世界和平。但是，随着日本重新获得独立并逐渐成长为经济大国，对外关系问题便应运而生。在一个分裂成你争我夺的国家和敌对的军事阵营的世界，日本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和全球的和平，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呢？日本应该置身于任何类型的战争之外，并且尽量避免卷入国际争端，对此没有人持怀疑态度。因此，在广泛的赞同下，日

本政府采取了"低姿态"（日本人是这样描述的），并倾注全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但是，形势很快就明朗化了，冷战的鸿沟使日本必须在两者间作出抉择：或者通过与美国紧密结盟，寻求安全保障；或者摆脱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严格但无保障的中立。如上所述，在此后20年的日本政治生活中，中立或结盟成为主要的争论问题。执政党认为日本需要紧紧依赖美国，与美国合作，处于反对党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年来却极其严肃地指出，"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指美国）"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日本人民的主要敌人。

1951年，美国决定在没有苏联和中国参加的情况下先行与日本缔结单独的和平条约，同时签订一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独立后的日本保留军事基地，美国则承担日本的防卫义务。就这样，美国人将中立或结盟的问题强加给了日本人。在美国人看来，这两项条约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军事占领已经无补于事，继续下去将危及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是，缔结包括所有各派的和平条约，显然不可能达成。邀请中国参加是困难的，因为美国及其盟国对于中国哪个政权真正代表中国有意见分歧。美国承认国民党中国，而英国和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国却承认当时正在与美国作战的北京的人民共和国。另外，看来很明显，莫斯科和北京不会同意美国认为必要的和平条款。美国在日本保持军事基地问题尤其如此，对美国来说，军事基地对于支持美国在朝鲜的军事优势，对于保护没有防卫力量而暴露在危险状态下的日本，显然都是不可缺少的。

353

日本保守的政治领导人不仅理解而且也持有这种观点。芦田均首相率先倡导继续保持与美国的防务关系，其后任吉田茂首相也支持这种政策。即使比较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承认需要有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并在这个问题上与左派分道扬镳。然而，其他反对派集团强烈地反对条约。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已经从解放者

变成了敌人，因为美国人希望促进经济恢复而停止在日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消除了使日本经济社会主义化的可能性。他们更多地同情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们才是真正抗击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和平阵营”。他们觉得，《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其所容许的美国军事基地，不是赋予日本安全保障，而是给日本带来危险。因为他们担心美国军事基地不可避免地会把日本卷入美国的战争，使日本成为另一方报复的目标。他们还认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践踏了大多数日本人引以为荣、放弃战争的宪法，蹂躏了他们在国际冲突中保持中立的热烈愿望。

这种态度具有巨大而广泛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许多保守派政党的赞同。尽管自民党的经济记录证明了它的主要实力，但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它的最大弱点。对日本人来说，中立显然比与任何一方的消极结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大片的美国军事基地，尤其是东京周围的许多军事基地，始终是一种社会刺激因素，侮辱了日本的荣誉。美国军事人员不可避免地卷入不愉快的事件和犯罪活动，而最初美国军事人员只服从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这种制度使人联想到19世纪令人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军事基地占用了可用于其他目的的上等土地；而其延长跑道的建议，比如 1954 年决定在东京附近的立川美军空军基地的砂川延长飞机跑道，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示威活动。世界其他地区也许担心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柏林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压力，日本人却漠然视之。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祖国的美国军事基地和军事人员是使他们想起昔日可憎的军国主义的主要事物。 354

日本对美国的核武器特别敏感。日本人是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两颗原子弹的受害者。1954年，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岛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放射性尘埃降落到日本的渔船“福龙丸”号上，造成一名船员死亡。这一事件被夸张地称为对人类的第三

次原子爆炸，引起大规模的群众骚动。每年8月6日，即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那天，在广岛举行的纪念大会，已经变成了反对美国和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规模游行示威。1961年以后，由于各反对党之间开始分裂，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也开始引起日本的关注，美国才逐渐不再成为示威游行所反对的中心目标。

日本人的核敏感(有时称为"核过敏症")不限于核武器，还包括核电站和核推进器。60年代，日本开始小心谨慎地使用核电站生产商业用电。这一发展对于能源短缺的国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日本总是遭到激烈的反对。这些反对起初基本上出于政治动机，后来更多地来自那些不愿与核电站为邻的地方居民。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舰也是主要的攻击目标。只是经过多年慎重的谈判并保证安全之后，日本才于1964年允许美国的核动力潜艇驶入在日本的海军基地。即使这样，美国核动力潜艇开始进入日本基地时也导致大规模的示威。后来，形势终于平静了下来。但是，1968年越南战争又造成日本群情激昂，骚动迭起；这时，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访问日本，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日本也曾经尝试制造自己的核动力船只"松"号，但是，这项事业由于政治上的冲突和灾难而被弄得精疲力尽，最后在1974年因为没有一个港口同意作为该船的国内港口而以失败告终。

在整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日本的政治生活基本上以军事基地问题、反核示威游行和反对安全保障条约为中心。如上所述，1960年的条约修改，造成了战后日本的最大危机。修改条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旧条约的某些条款与日本这样一个完全独立国家的地位不协调。旧条约允许在得到日本政府的请求时运用美国军队镇压日本国内的暴动；它还规定日本人不能控制美国的核武器，而这是日本公众痛心疾首的。此外，它没有规定终止条约的日期和手段。1960年的修改，取消了在日本使用美国军队的条款，并

355

且规定条约有效期为10年，任何一方可以提前一年通知对方废除条约。关于核问题，新条约及其他附属协定规定，在与日本政府进行事先协商以前，美国不得对其部属在日本的武器装备作出重大变更。用更直接了当的语言说，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得到日本的正式同意(大部分人认为日本决不会同意)，美国不能在日本装备或储存核武器，甚至不能将核武器带入日本。事先协商意味着日本人享有否决权，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美国为了在日本以外（如朝鲜)进行直接的军事行动而使用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

这些修改自然得到日本领导人的欢迎。但是，除了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组成民社党的社会主义者以外，反对派力量决定反对批准新条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旧条约虽然更不好，但它是美国强加在不自由的日本身上的；而新条约尽管有所改善，却是已经自由的日本心甘情愿接受的。各种外部因素也激起公众骚动：如美国间谍飞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的U-2飞机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美苏首脑会谈的取消，又如岸信介为了使新条约在预定的6月19日艾森豪威尔访日前生效而在众议院强行通过该条约。反对派强调这是首相的反民主行为，无异于美国干涉日本内政。结果就是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动乱。

* * *

然而，新安全保障条约一经生效，政治局势立即平静了下来。在此后几年中，围绕中立或结盟的争论也不再那么激烈了。因为新首相池田勇人在国内政治上采取了"低姿态"，并通过他的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日益增长的日本的繁荣。 356

这个时期，另一个防务问题也不再是众矢之的了。由于政府明显地违反宪法第九条①，以自卫队的名义创立陆、海、空军，一场

①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译者

冲突产生了。1950年，驻日美军地面部队匆忙投入朝鲜，阻挡北朝鲜的进攻，为此麦克阿瑟命令日本人创建一支国民警察预备队接替驻日美军的地位。日本政府重建日本的武装力量，并在军事占领结束后加以扩充。1954年又进一步扩充，并命名为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防空自卫队，置于防卫厅的指挥下。

保守政治家显然感到日本自己应该拥有一些防卫力量，但是，由于财政和政治原因，他们希望将其维持在小规模的水平上。吉田茂及其继承者以宪法和公众的态度为理由，坚决拒绝美国要求日本加快军事建设和更大地发挥自卫队的区域性作用的压力。最后，美国政府接受了日本人的观点，即鉴于日本的政治气候，最明智可行的选择是，日本拥有一支非常有限的军事力量，因为日本的邻国担心日本恢复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自卫队总兵员25万人，以后虽有增加，但数量不大。

相对来说，自占领以来，日本的防务预算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防务费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略高一点，先是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比例上下降到略低于1%，后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增长到现在的1.004%。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防务开支，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苏联和中国大约达到10%。相比之下，就使日本节省了大笔开支。另一方面，当代日本的经济规模庞大，这意味着日本的军费开支实际在世界上占第七位，维持着一支薪金高、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陆海空力量，这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是十分强大的。日本的空军实际上是亚洲最优秀的空军之一。但是，日本的军事力量根本无法与苏联或美国相比，在数量上也只有中国的1/20，远不到台湾或南、北朝鲜的一半。

357

日本的反对党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创建自卫队，他们害怕复活战前的军国主义，认为自卫队明显地违背了宪法。公众舆论起初也强烈地反对自卫队，因为自卫队的创建践踏了大部分日本人

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情感，而多数日本人是向往非武装的中立的，他们希望以此赢得其他国家对日本崇高的和平主义理想的尊敬，并不向日本发动进攻。麦克阿瑟曾不合时宜地提出过把日本变成“亚洲的瑞士”的理想，许多日本人也渴望日本成为瑞士那样受到其他国家尊敬的中立国家。瑞士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背着沉重的军事负担，但日本人看来对此并不十分了解。非武装中立始终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口号，虽然共产主义者更加现实地相信国家的军事力量，只要军队是在他们政党的控制之下。

许多年来，公众对自卫队的态度一直是相对敌视的。由于反军国主义的感情和和平主义的力量，防卫厅始终不能升格为防务省。在日益繁荣的经济条件下，工资竞争逐渐激烈，自卫队因此难以扩充兵员，虽然实行征兵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而，在过去的 358 20年中，公众对自卫队的态度大大缓和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害怕自卫队会导致战前时代的军国主义复活。自卫队本身也完全按照模范的标准行事，保持低姿态，避免卷入任何政治事务。在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从 1959 年起，最高法院的判决承认，国会对宪法所作的重新解释，即宪法关于自卫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看来公众也接受了这个解释。最近几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公众强烈反对自卫队的任何扩充和自卫队在国外发挥任何作用，但是，绝大多数人支持自卫队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

* * *

尽管6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局势相对平静，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关于中立或结盟的争议再次出现高涨。1965年后，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日本将会因为与美国的关系而卷入战争的幽灵再次出现。电视和报纸的详细报道使战争的恐怖活灵活现。日本人和

世界其他大部分民族一样，同情那些在自己的国土上为抗击外来的美国干涉者而战的越南人。日本人将这场战争与他们过去在中国的错误行径相提并论，并将遭到美国空袭的北越人与不久以前在美国轰炸下的日本受害者等同起来，反对越南战争的市民运动和有组织的学生示威游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有些由反对派领导的地方当局(如横滨市长)也采取行动，阻止美国使用在日美军基地向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军队供应物资。

大约与此同时，又爆发了反对美国继续对冲绳实行军事统治的骚动。冲绳问题一开始就是作为被美国统治的日本固有领土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战前，冲绳县(根据其最大岛屿命名)是日本最南的县，它占琉球群岛南部2/3的面积。琉球群岛居住着日本民族的一支，由于长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他们说着一种在 359 形式上与日本语非常不同的语言，在文化上与日本人有某些差异。他们有自己的国王，但是在 1609 年被九州南部强大的封建藩国萨摩藩征服后，成为萨摩藩严密控制下的附属领地，虽然琉球国王继续向中国纳贡，以此作为萨摩藩维持秘密对外贸易的一种手段。琉球这种不正常的地位，导致 19 世纪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群岛的主权之争。1874 年，中国同意对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员以及日本为镇压台湾土著而进行的军事远征支付赔偿①，这个争端以有利于日本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中，美国浴血奋战，占领了冲绳，并决定保留整个琉球群岛作为它在西太平洋的主要军事基地。但是，美国人很快发现，台风的频繁袭击减少了琉球作为海军基地的价值。1954年，美国将群岛北部归还日本，但继续占领冲绳县。因为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军事力量集结在西太平洋，而

---

① 即1874年10月日本明治政府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北京专约》。——译者

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使美国无法自由使用在日本主要岛屿上的军事基地，因此冲绳群岛上的军事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增大。由于日本已经限制使用在日美军基地，而反对党一旦胜利，有可能取消全部美军基地，因此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就成了美国的军事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美国，冲绳人的态度开始都是矛盾的。他们对其他日本人怨气冲天，因为这些人把他们看作是低贱的乡巴佬。在大战期间，冲绳是日本唯一发生过真正战斗的地方，因此其居民比其他日本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但是，美国的军事统治者对开放地方自治非常吝啬，他们的异族色彩和飞扬跋扈，逐渐使冲绳人意识到他们终究是日本人。冲绳回归日本的运动在冲绳群岛上兴起，并在60年代末期开始得到其他日本人的热情响应。这时，日本人已经恢复了足够的富裕和自信，有可能关心仍然生活在异国统治下的近100万冲绳同胞的命运了。这种感情震撼了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和反美左派的心灵。因此，冲绳成为日美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即使不摧毁，也将削弱日本与美国的联盟。 360

60年代行将结束时，除了归还冲绳和越南战争这两个问题外，又出现了可能导致政治骚动逐步升级的第三个问题，即新安全保障条约问题。因为新条约的第一个10年有效期将于1970年6月19日到期，届时会出现修改或者废除的问题。反对派对1960年的条约危机记忆犹新，他们期待着1970年成为这样的一年：通过他们的再次努力，结束日美联盟。

然而，期待中的危机并没有出现，因为日美两国政府都没有提议修改条约，因此也不需要国会批准一项新条约。如果提出一项新条约要求国会批准，将会给反对派提供一个具体的攻击目标。实际上，两国政府都估计到新条约难于获得批准，所以虽然他们希望

看到对条约的某些修改，但都不敢进行修改。

冲绳问题在演变成危机以前也消失了。美国意识到冲绳问题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和1970年在反对党心目中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国许诺在几年内将冲绳群岛归还日本。1969年11月21日，尼克松与佐藤荣作首相签订的一项联合声明宣布了这个决定。联合声明还规定，冲绳群岛一经归还日本，适用于日本主要岛屿上的美军基地的限制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冲绳的美军基地。美国作出这些让步是因为它看到冲绳的局势会危及总的日美关系。而且，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冲绳的民族回归主义感情可能渐渐妨碍冲绳美军基地的使用。1972年5月15日，冲绳群岛终于归还日本。冲绳政治紧张的焦点很快就从美国及其军事基地移开。日本中央政府怎样处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这个最偏僻而在经济上又最落后的县，成为政治紧张的新焦点。

即使越南战争也不再成为问题了。因为美国从1968年起停止增加在越南的军事力量，接着开始逐步撤兵，于1972年撤退完毕。因此，60年代末期可能引起日美关系危机的三个问题，到70年代初期都已不复存在了。

中立或结盟的所有问题，实际上已丧失了原有的力量，但它仍然是自民党和反对党的一个重要的正式分歧。偶尔有些具体问题也会激发旧的感情波澜。例如，1974年，美国一位退休海军上将在讲话中提到进入日本港口或通过日本领海的美国海军舰只携带核武器是否违反不将核武器“带入”(introduce) 日本的规定。问题的焦点在于“introduce”一词的精确含义，日本人把它译为“带入”。美国政府的解释是，该词比“transit”(运输)的意思要固定得多；日本公众则只对它作非常严格的解释。

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再次引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威胁性暴力行为，因为整个对美关系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1975年大选

时，社会党公开支持现存条件下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其他大部分反对党也逐渐予以认可，或者至少是心照不宣地予以默许。1976年大选时，所有政党都没有选择《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竞选的主要问题。

*　　*　　*

20世纪70和80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使中立或结盟的问题不再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几十年与美国结盟的经历并未使日本卷入美国的战争。看来，美国也不可能在东亚或东南亚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冒险。结盟除了遭到共产主义大国的口诛笔伐外，没有造成什么不良的结果。而且，即使共产主义国家的攻击也逐渐消失，并且最后停止了。中国和苏联的分歧扩大，两国在冲突中都寻求日本与美国的支持。70年代，苏联人开始了所谓“微笑外交”。现在，苏联和中国都担心，如果没有与美国缔结的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将会走进对方的轨道，或者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批评安全保障条约的左派人士发现，他们遭到了釜底抽薪的命运，尤其是在北京开始赞扬而不是谴责安全保障条约的时候。

1971年，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计划中的中国之行，这标志着东亚局势的决定性转折的到来。1972年2月，尼克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非正式关系，后来又升格到在外交上完全承认北京共产党政权，取代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些步骤使日本政府得以消除最激烈的一个国内问题和日美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 362

1952年，吉田茂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美国代表明确声称，如若不然，对日和平条约很难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反对党敦促政府承认北京，并且得到大部分日本人的同情。但是，当其他许多国家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自民党甚至背道而驰，继续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方

面是因为尊敬蒋介石，他在战争结束时对待日本很宽宏大量，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前殖民地台湾拥有重要的贸易利益。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承认北京会危及日美关系。1972年美国改变立场后，日本也愉快地使自己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给予北京（取代台湾）以完全的外交承认，但仍与台湾维持非正式的关系。中国大陆和台湾航空公司的飞机分别停留在不同的日本机场。尽管日台关系出现了新的冲突，但两者间的实质性贸易关系和其他往来受到的影响很小。这样，日本与美国间的一个主要的紧张根源也消除了。

1972年的中美和中日两项联合声明都将台湾问题束之高阁，留待以后去解决。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这种见解：台湾是统一的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并不反对美国人对台湾承担防务义务，并继续（尽管暂时地）承认台湾。他们认可日本与台湾的贸易和其他往来，默认台湾与中国实际分离可以暂时继续下去。但是，大陆中国人对统一的感情一直很强烈，而台湾的2000万人，尤其是占人口5/6的土著台湾人决意不加入共产主义的中国。由于台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实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还承担着军事义务，而在同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正专心致志地从事革命性的变革，因而统一问题的解决看来是相当遥远的事。在80年代，台湾问题显然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威胁东亚的和平。日本人和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大体相同，这也是促使他们增进团结、减少分裂的一个原因。他们协调一致地支持心照不宣的所谓“一中一台”政策，这可能会促使这种局面在未来继续存在下去。

363

日本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其最近的邻邦朝鲜。1000多年来，朝鲜半岛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紧密的统一体。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地将其一分为二，朝鲜战争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裂

状态。北部的 2000 万人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统治下，这个政权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但它对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南方的4200万人生活在军事政权下，这个政权基本上是独裁政权，它野蛮地压制人权，但却得到美国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的军事保护。40年来，朝鲜半岛始终是东西方之间冷战前线最有爆炸性的潜在地区之一。

与北朝鲜不同，南朝鲜继日本之后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相当富裕的工业大国，与日本和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然而，不可避免的冲突日益动摇着它的内部稳定性，因为军事政权要维持独裁，而受到高等教育的富裕的人，基本上是城市人，却要求尊重人权、更多地分享民主体制下的统治权。南朝鲜的内部不稳定可能会导致秩序的崩溃，而这将引起北朝鲜的干涉，从而造成美国、中国和苏联的卷入。战略上很敏感的日本人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对他们来说，美国在南朝鲜的军事存在无疑是日本安全的最大保障。他们觉得（尽管很少说出来），美国的军事卷入使日本受益匪浅。它使日本公众可以在几乎不用顾及南朝鲜的政权和军事问题的情况下，大胆地参加与南朝鲜的大规模贸易。

虽然存在着贸易关系，但是，朝鲜与日本之间公众的态度始终是不友好的。朝鲜人对日本过去的殖民政策和在日长期居住的朝鲜人得不到平等待遇义愤填膺。由此产生的抗议和挑衅行为致使日本人把朝鲜人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这中间还夹杂着日本人对前殖民地臣民的下意识的藐视态度。日本政府作出半心半意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基本上没有成功；然而，从总体上说，近几年来日本人和朝鲜人相互间的态度慢慢地改善了，这也许是因为陈旧的观念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 364

在日本，战后初年以来由于对朝鲜分裂的态度不同而产生的尖锐冲突也已经缓和了。当时日本政府支持南朝鲜，大部分在日

朝鲜人则支持北朝鲜，他们基本上对日本政府持反对态度。现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来也降低了。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倡导交叉承认，即日本和美国承认北朝鲜，中国和苏联承认南朝鲜。总之，美国在南朝鲜的军事存在卓有成效地减少了日本人对朝鲜半岛政治或军事局势的不安。

引起日本人的强烈恐怖和憎恨的国家是苏联。这两个国家间的敌意可以回溯到18世纪末，那时两国竞相开拓日本北部的群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大大加强了这种敌意。后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加入对日作战，成千上万的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受到长年禁闭，这样，对苏敌意感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又进一步加强了。战后初年，日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把苏联视为假想的和平斗士，那种坚定的友谊减少了日本人反苏感情的流露。但是，最后共产党也转向民族主义而反对苏联，社会主义者则因为苏联的核武装及其对东欧卫星国的野蛮镇压而被弄得尴尬不已。

现在，间或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是日本人最厌恶和最害怕的国家。在引起日本人厌恶这一点上，只有南朝鲜才能与苏联匹敌。相反，中国自始至终都颇受日本人欢迎。历史上的尊敬感和文化上的亲近感，有助于说明日本人对中国和苏联态度的差异，但是不应该忘记，即使南朝鲜与日本人有着更密切的血缘关系，前者也并未因此而更受后者的欢迎。

70年代，日本人的苏联观曾一度缓和。他们幻想大规模地开发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石油和森林。但是，这些计划与西伯利亚的艰苦现实——遥远的距离和不毛之地很不协调，并且又与苏联僵化的组织机构相冲突，因而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反苏情绪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开始高涨起来。其一是苏联在东亚集结巨大的海军力量。苏联舰只只有通过全部或部分地由日本控制的海峡才能进

入公海，但它们拥有位于北海道以北的鄂霍次克海可以作为一个安全的活动区间。今天，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自卫队充其量不过是在他们所希望的美国援助到来以前短时期内抵抗苏联进攻、保卫日本列岛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保护以日本为圆心、半径1000海里的日本航海线的一支力量。袭击日本航海线的国家可能也是苏联。

“北方领土”问题是日本对苏联怀有敌意的另一个焦点。1875年，俄国和日本达成协议，俄国放弃对库里尔（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以放弃对萨哈林（库页）岛所有的主权作为交换。但是，1945年苏联占领了千岛群岛，并且从此抓住不放。起初，只有一些从这些不毛之地被驱逐出境的日本人以及来自邻近北海道的渔民和海藻采集者，对这块主权属于日本但为苏联占领的土地感兴趣，但到了60年代末期，大部分日本人觉醒了。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已经逐渐恢复了自信心；政府希望转移人们对冲绳问题的注意力，也可能是一个刺激性因素。当时，冲绳问题是日本列岛另一端的一个棘手问题。日本人并没有声称对整个千岛群岛拥有主权，只是对从北海道就可以看到的千岛最南端地区表示主权。北方领土包括两个比较大的岛屿国后岛和择捉岛以及较小的色丹岛和一些小岛即齿舞群岛。日本人群情激昂，要求收回这些领土，苏联却充耳不闻，甚至拒绝考虑归还这些岛屿。这样一来就将导致苏联漫长边界上的一系列领土问题接踵而至。北方领土争端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无关紧要，但它已成为改善日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并且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对苏敌意。

* * *

中立或结盟曾经是日本外交政策的热点，但到80年代，这个热点已经冷却下来，化为一堆灰烬，任何其他问题刮起的风都可以将它吹走。这个问题虽然还潜伏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言辞中，但认真对待它的人寥寥无几。尽管政治家们战战兢兢地避免

提及结盟，并且选择“伙伴”这个委婉的词代替生硬的“结盟”，但是

366 显然，日本已经成为由工业化民主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的核心成员，在这个国家集团中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人们有时小心谨慎地谈论“北美、西欧和日本”，但是，已经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日本了。当人们谈及“西方”时，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无意识地将日本包括在内了。

1975年11月，六个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法国的朗布依埃举行首届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日本首相非常自然地与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首脑平起平坐。加拿大由于经济力量比较小，后来才加入这个国家集团。除与防务有关的会议外，对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来说，第一世界国家的重要会议没有日本出席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在日本，即使反对党也没有反对这些明显的结盟迹象。日本人生活在一个与战后初年不同的年代里，这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成为第一世界的成员国，基本上是它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上加入这个集团的结果。日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问题与第一世界其他国家相似，它的绝大部分科学和文化往来也是与这些国家进行的。它的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在许多方面成为这个集团的活动中心之一。世界10大银行，有8家是日本人的。日本将近一半的贸易是与第一世界国家进行的，剩下的贸易主要是与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台湾和南朝鲜这类想方设法按照日本模式跨入工业化世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像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世界的经济附庸。唯一重要的例外是中国，它大约占日本对外贸易的6％，而苏联则只占1％稍多一点。

许多日本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与其他第一世界国家极其相近很不高兴。他们希望日本更多地保持与其他工业化

国家的旧差别，或者少点“西方”色彩，多些“亚洲”特色。但是，现实与怀旧感情终究有泾渭之分。在任何方面，日本都更加远离亚洲国家，而日益接近西方标准。这或许是人们可以事先预料到的。年轻人并不像他们的长辈所迷恋的那样，感受到“亚洲”(实际上通常指中国)的感情魅力。他们认为与西方一样并没有什么过错，或者，他们是觉得使西方人象他们一样也没有错误吧！正如最近有一个日本学生惊叫道："噢，美国也有麦克唐纳面包店吗?" 367

中立或结盟曾经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但现在已缩小为日本防卫作用的发挥问题。鉴于他们的战时和战后经验，绝大部分日本人一贯坚决反对核武器，仇恨各种类型的军事大国，并且以他们的非战宪法为荣，拒绝在海外任何地方使用日本军队。如上所述，大多数日本人只赞成自卫队维持在目前的水平上，尽管很难想象会出现使用这样规模的军队的环境。这支军队能够在短时期内击退对日本的常规侵略，但这种进攻在当前的战略条件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日本受到进攻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很快会弹尽粮绝。因为这支军队虽然可以在近海击退企图登陆作战的敌军，但对于一个依赖伸展到几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商业生命线才能生存的国家来说，这种有限的防御能力是没有意义的。

公共舆论妨碍自卫队发挥它所能发挥的两个职能。其一是作为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东亚防务集团中的骨干力量，但这是大部分日本人深恶痛绝的想法。南朝鲜和菲律宾等邻国也不会予以支持，它们可能是这种联盟的成员国，但对日本过去的残暴统治记忆犹新。其二是向联合国提供维持和平部队。日本人对他们过去的错误的海外冒险非常敏感，甚至连这种有益的活动也不加考虑。

日本经济资源雄厚，技术能力高超，军事实力有效，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必然使其他国家认为日本可能会发展核武器。当然，日

本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而且，它已在某种意义上将其核选择公诸于众了。日本电力的相当一部分是由核电站生产的，它在核武器运载工具生产最困难的领域——火箭方面也很先进。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成为核俱乐部的完全的成员是轻而易举的。许多外国人，尤其是日本的邻国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战争贩子的狂热铭记不忘，他们确信日本终有一天是会迈出这一步的。

然而，日本人自己一贯坚决反对核武器。他们的这个想法，从36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什么变化，世界其他民族对核武器的态度也日益与他们接近。无论是处理对美关系，还是他们本国的政治事务，任何与核事务有关的事物都是敏感的问题。他们持这种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除了核讹诈的危险外，核武器对于一个面积狭小的核大国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即使是核超级大国也需要有广袤的国土，才能在一次严重的核攻击后求得生存的机会。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只会被彻底消灭。不管日本的核武库多么强大，它也只能空欢喜一场，因为在本土被摧毁后，它只能从游弋海上的潜水艇进行反击。况且，世界上多一个核超级大国并不会对它自己或世界的安全添砖加瓦。日本回避核武器，并且将资源用于其他更富于建设性的目的，这无疑是更高明的选择。大部分日本人将继续保持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分析表明，具有相当规模而又很有效率的日本自卫队，除作为警察后备力量和在日本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时发挥作用外，并没有明确的使命。实际上，他们最重要的职能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他们赋予日本人一种朦胧的安全感和某种荣誉感。他们像羊毛毯一样提供了舒适，但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保护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自卫队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确实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他们正在发挥着这种作用，尽管没有任何条约规定，也没有大肆渲染。日本的海军舰队正常地参加与美国海军的

联合行动，许多年来两国空军也一直密切地协同行动。

令人惊奇的是，近几年来人们议论纷纷的不是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而是美国作为盟国的可靠性。人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意义提出了疑问。批评家认为，在核战争中，美国会为了伦敦而不是东京去冒牺牲纽约的危险。这种判断显然包含着种族感情。怀疑论者也许是错误的，但他们不会忘记，不久前美国表露出的对日本的关怀并不是很诚挚的。他们记得，1971 年尼克松突然完全出人意料地宣布计划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而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向紧张不安的日本政府保证，在事先通知东京以前，美国不会突然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感到被出卖了。两年后，华盛顿突然禁止向日本出口大豆，而不管大豆在日本人的食品中是何等的重要，这使日本政府大为恼火。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态度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因此，对美国人所承担的义务的可靠性一直持怀疑态度。

369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4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立或结盟曾经是日本的核心问题，但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有些方面已经转移了热点。实际上，现在没有日本人相信共产主义国家是“和平阵营”，也绝不希望与中国或苏联结盟。中立仍然富有感召力，但在今天，完全非武装中立和仅仅将安全寄托在联合国上则被看作是遥远的幻想。一定规模的自卫队、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务力量合作和不言而喻的美国核保护伞，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公众往往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围绕在日美军基地的冲突现已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美国抱怨日本以美国纳税人的钱“免费乘坐”防务车，三番五次敦促日本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日本则继续按照自己缓慢的步伐前进；但关于防务问题的争端从未达到严重地步。日本人早先曾担心美国会把日本卷入美国的军事冒险，现在日本人却害怕美国对日本承担的义务不够强大。中立或结盟问

题几乎已经成为过去事物的镜中物。

370

第三十七章　贸易与经济依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25年，日本的对外关系看来是以对美军事关系为核心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通过对外贸易恢复国民经济。经济增长实际上凌驾于一切之上。但是由于人们普遍同意这一点，以致于直到中立与结盟的争论减弱、贸易巨大增长使它突然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以后，它才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今天，如果提及日本的对外关系，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会首先联想到贸易及其造成的冲突。

由于战后日本严重地依赖国外原材料和世界市场，因此，对外贸易是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的。起初，日本的贸易对象基本上是美国，但后来逐渐恢复了与邻国的经济往来。早在1952年，日本就与台湾建立了全面的关系。1954年，它又以与缅甸签订了一项协定为起点，开始向邻国支付赔偿，这些赔偿基本上是用日本的制造品支付。1965年，日本与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开辟了迅速增加与南朝鲜贸易的道路。到60年代末，日本几乎已经成为它所在的世界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它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飞速增长，其大量制造品开始流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非共产主义国家。

贸易条件的好转促进了日本的经济起飞。日本所需进口的原材料供过于求，而它能提供的制造品在世界各地却供不应求。日

371

本还得益于有利的时机。战争使高效率的新工厂取代了已被摧毁的工厂，这些新工厂比西方陈旧的工业设施更加先进。消费大量

原材料的新工厂建立于海滨，常常是建立在不久以前才填海而成的土地上。因此，原材料（如铁矿石等）可以从船上直接卸到工厂的一端，而成品（如钢铁和机械等）则可以从另一端直接装运上船出口。与此同时，与陆上交通相比，巨型油轮和集装箱货轮使海洋运输费用直线下降，同时使岛国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比更多地依靠内陆交通的国家占优势。

这些因素，加上日本人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高水平的教育、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赶超西方先进国家的决心，使日本国民生产的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0%左右。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日本人口的增长率急剧下降，但是，许多年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大约是世界其他地区增长率的两倍。40年代末期，日本还是一个经济上难于生存的半饥饿国家，但到了80年代，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与美国和苏联并列的世界三大工业巨人之一。 372

* * *

产业的巨大扩张，既给日本带来好处，也给日本造成了困难。污染问题到60年代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拥挤而紧张的住房问题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日本为了经济生存而日益严重地依赖于外部世界。在二三十年代，这在日本人眼中就已经是一种岌岌可危的状况，并促使军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征服建立日本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次冒险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但是，即使征服侥幸取得成功，日本人也会发现它的大东亚帝国到今天也不足以提供日本经济所需要的所有原材料和市场。

许多人认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来自对外贸易，但其实只有1/10左右。不过，这是举足轻重的1/10，因为它提供了日本能源的大部分（石油）以及日本所需要的一半以上的粮食和饲料。石油来自中东，粮食和饲料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遥远的地区。如果不进口这些物资以及一些重要的金属材料和

其他物资，日本的整个经济将陷于瘫痪。许多小国的对外贸易在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新西兰和丹麦这样的小国，因国内市场狭小，不能发展汽车制造业等许多产业，因此必须进口和出口更多的产品。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业国，日本必须拥有一个与12200万人口相称的庞大的国内市场。与其他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较低的经济大国相比，日本的原材料供应不足。例如，虽然美国与相邻的大国加拿大存在着共生的经济关系，但它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大约只有日本的一半，而且大部分贸易是与它严密控制下的国家进行的。日本基本上依靠遥远的市场和国家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只有1/4左右的贸易是与3000英里内的国家进行的。它 373 的商业生命线伸展到自己不能自保的地区之外，到达中东这样它无法加以控制的动乱地区。日本经济存在着不稳定性。1973年第一次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石油危机，作为一个破坏性力量，也冲击了日本国内。

随着日本的富裕和经济的强大，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期待也更多了。在其他国家看来，日本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它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发展，而不愿为世界整体的经济或政治健康作出贡献。人们轻蔑地称之为“经济动物”。如上所述，美国人埋怨日本“免费乘坐”美国付钱的安保车。据说，法国戴高乐总统曾说：池田勇人首相不过是个半导体推销员。

日本的一些邻国害怕日本通过经济手段建立它用武力未能建成的“大东亚共荣圈”，他们重新用敌意的眼光看待日本。所有国家都希望日本更加慷慨地对待比较贫困的邻国，早期的战争赔偿给日本带来了长期广泛的贸易利益，接受国却没有得到这么大的好 374 处。日本人得到的名声是唯利是图地盘剥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时却小气吝啬。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对东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却激起了反日骚动，这使日本人大为震惊。亚洲人对同样是亚洲人、但

却有社会排外性而冷酷无情的日本人义愤填膺。他们希望从日本人而不是从大相径庭的西方人那里，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更大的帮助。

日本领导人逐渐认识到，由于他们在世界上的经济领导地位而造成的其他人对他们的期待，并试图予以满足。他们认识到，日本的军事负担较轻，因此有更大的余力进行其他更大的援助。日本政府变得比较慷慨大方了，它向和平组织派遣志愿人员、设立来日学生的研究基金，并按照足以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相匹敌的规模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要克服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岛国狭隘性而将良好的愿望变成预算开支，那是很困难的。日本政府没有如愿以偿，而发展中邻国对日本的抱怨声也仍然持续不断。

与此同时，甚至在日本与关系最密切的贸易伙伴——其他第一世界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增长比这些国家快得多，反复打破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除了对第一世界，日本面临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它必须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许多不发达国家则由于太穷而买不起日本的高质量产品，它们只愿意卖多少买多少。共产主义国家出于其本质，总是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日本与共产主义的第二世界进行的贸易还不到日本对外贸易的10%，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进行的。因此，工业化民主国家成为将近一半的日本高质量产品的唯一市场。但是，在高精密制造品方面，这些国家更多地是日本的竞争者。它们向日本出口农产品，这曾经抵销了制造品的进口。但近几年来，它们的农产品出口常常因为世界性的农产品过剩而减少了。

未来几年，欠发达国家肯定会扩大向先进国家的粗加工品出口，但其人口增长可能继续造成人民的贫困，从而不能大量购买第

一世界国家高价的高精密的产品。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相互间仍将

375 是主要市场，它们将为市场利益相互展开竞争。它们可以像过去一样，通过互相接受对方的产品谋求生存。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增长过快，如日本过去那样，都要受到巨大的压力。如果意义深远的世界经济增长没有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世界，特别是象日本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长期经济前景无疑是黯淡的，高度工业化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也可能升级。

如上所述，战后初年美国没有想到日本会成为一个厉害的经济竞争者，因此，允许将美国的先进技术以优惠的价格转让日本，漫不经心地开放市场接受日本货，而且同意日本为保护其"婴儿产业"而限制进口。然而，早在50年代末，麻烦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了。由于日本的纺织业等领域工资低，再加上日本的工艺优秀、企业组织更严密、储蓄率和再投资率比较高，因此大量日本货源源不

376 断地涌入美国，以至于对美国的某些产业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美国的消费者受益匪浅。美国的造船、纺织品生产、钢铁、电子和汽车制造业等行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些产业部门几乎被摧毁。重工业领域的"惰性区"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失业的美国工人开始强烈抱怨他们的工作正在被出口到日本。

欧洲国家与日本的贸易从战后初年起就受到许多限制，因此遭到的冲击比较小。但它们与日本联合起来对美国施加压力，要求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那些日本人工资迅速上升的领域，尽管日本已不再富有竞争力了，但其他亚洲国家很快取而代之，既对日本的生产商，也给美国的生产商造成压力。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亚洲"四小龙"南朝鲜、台湾以及城市国家香港和新加坡脱颖而出。他们与日本人一样有着相同的中国儒教背景，其中比较大的南朝鲜和台湾，实际上是在作为前日本帝国的组成部分时开始工业和教育现代化的。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

亚等人口大国步其后尘，马来西亚、泰国，可能还有菲律宾也将接踵而至，成为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纺织等比较简单的领域。毋庸置疑，在日本率领下，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经济区，同时可能是世界上经济冲突的最大根源。到80年代，美国的贸易更多地是跨越太平洋流向西边的东亚，而不是经过大西洋进入东边的西欧。

* * *

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已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将从经济上并且可能从政治上危及世界。战后日本人最初操心的是维持生计，后来担心的是卷入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冒险，但现在他们认为，主要危险是世界贸易的崩溃或他们的经济孤立将造成经济毁灭。怒气冲冲的美国以及日本的其他第一世界盟国，可能实行限制性贸易措施，使日本陷于困境。或者，日本的邻国也许会向它倾泄他们的恐惧和仇恨。这些看来都是可能发生的。日本人对自己的非凡成就沾沾自喜，同时又忧心忡忡，害怕外部世界不公平地选择日本作为歧视对象，他们因此而受着煎熬。

自然，许多年来，人们已经想方设法改正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令人不安的贸易不平衡，但尚未取得显著的效果。早在50年代末，美国就说服日本通过卡特尔协定(这在美国是违法的)“自动”限制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但是，其他东亚国家轻易地乘虚而入，填补了空缺，这使日本人大为恼火。在电子、钢铁、小轿车等其他领域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最后，忧心忡忡的日本人，甚至在没有受到美国压力的情况下，就心甘情愿地采取限制出口的措施，尽管其结果也并不令人满意。日本政府在国内鼓励增加购买外国货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377

外国人十分肯定地认为，日本从国外进口少，是日本政府实行

各种限制的结果。起初，情况的确是如此，但越到后来就越不是这样了。过去，日本人放弃关税限制和其他各种控制的速度，要比其贸易伙伴要求的慢得多。他们往往要等到一个新产业已经稳固后，才取消保护性的限制措施。但是，现在，日本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维持在与其他大多数第一世界国家相等或较低的水平上。然而，贸易不平衡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80年代中期，美国每年的对日贸易赤字达到500亿美元，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有一个时期，贸易不平衡主要被归咎于不合理的兑换率。从1949年到1971年，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一直是360:1。在这个时期，日元的价值显然被低估了。1971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也无济于事。到1987年，美元对日元的比值大约只相当于1971年的40%，但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效果；专家们解释说，这些效果只能慢慢地体现出来，即使到那时，效果也将是微不足道的。

日本的大部分剩余资本投资于美国，用以建设巨型工厂、与汽车制造和其他公司成立联合企业，购买旅馆、办公楼和其他不动产，设立银行和其他债券机构。两国的经济已经融合到令人惊奇的程度。美国的一些州因为工业沦落而强烈反日，但其他州的州长却希望吸引日本人的投资。他们挤进通向东京的道路，并热情洋溢地欢迎日本经济代表团。

379 日本不仅与美国，而且与工业化世界的许多其他地区存在着贸易不平衡，这基本上是不健康的，并且可能是严重的贸易冲突乃至贸易战争的根源。双方都认识到必须对此进行某些修正，但不清楚应该做些什么。日本人认为他们腹背受敌。一方面，低工资的亚洲国家最终会将日本排挤出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美国等专门从事高技术生产的发达国家则对日本加强贸易限制。他们感到，在最后决一雌雄的时候，美国这样一个拥有丰富自

然资源和技术的国家，将胜过资源贫乏而又可悲地处于腹背受敌地位的日本。因此，他们觉得，即使不加以扩大，也必须维持他们所拥有的任何竞争优势。

日本人还认为，大体上说，美国人对美日竞争中美国的失利要比日本人负更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指出，美国人放任其工业企业萧条，目光短浅地只注意快速赢利的活动而忽略健康的长期增长，造就了一支缺少教育、不够勤奋并缺乏忠诚意识的劳动力大军以及臃肿的高薪上层管理机构，在发现已经毫无指望地落后于世界市场以前，几乎没有注意到国外市场。美国人深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他们强盛的时代，他们相信世界的其他地区将继续渴望美国的产品，因此想当然地认为海外市场是有保障的。他们没有开发适合国外顾客的产品，既不研究外国的商业活动，也不学习外国的语言。简单的例证之一是，他们没有为日本人生产驾驶座在右边的小轿车，因为日本的交通规则与英国一样，汽车是靠左行驶的。同样，他们制造的电冰箱也不适合日本人的公寓。实际上，直到几年以前还没有外国商人会说日语。正如日本人喜爱指出的那样，如果他们按照美国人进入日本市场的方式进军美国市场的话，那么他们对美国的贸易恐怕不过是出口纸扇一类的东西。

大多数美国的有识之士会接受日本人的大部分批评，但他们观察根本性问题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他们谴责日本的非关税壁垒在更大的程度上造成贸易的不平衡，并且认为，尽管现在大部分关税壁垒已经消除，但是，数不胜数的日本式小规则和规定仍然存在，这些规则、规定极大地妨碍了外国对日本的出口。这类指责包 379 括许多复杂的专门性问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但是它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日本人对于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小动作习以为常，基本上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累积起来将产生的严

重后果。这是一个需要日本人采取更加慎重和更加彻底行动的领域。

美国人谴责日本人运用狡诈的手段排挤外国产品，并且不愿意购买外国货，这也许是不正确的。日本人感到日本货比进口货优秀，并且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但是，实际上，长期以来普通大众出于好奇和时髦原因而偏爱进口货，正如美国人偏爱法国葡萄酒和香水一样。日本产品广泛使用英文商标，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表面例子。

外国对日本出口的最大障碍可能是日本的企业组织以及日本公司那种向有老关系的公司购买产品并且偏爱与系列集团的公司做生意的倾向。日本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这种状况，而这种状况已经根深蒂固了，不太可能迅速改变，因为其起源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在美国公司学会在日本按照日本方式活动并建立起密切的企业集团联系和热情的个人关系的时候，有些公司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 * *

过去，国家的安全是以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来军事攻击的能力衡量的。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国内非常稳定，受到其他任何国家攻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了日本无能为力的世界性核毁灭外，它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世界秩序或全球贸易的总崩溃。总之，传统的安全观念已经不怎么适用于日本了。

日本能够采取重大行动的唯一外交政策领域是，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关系及在经济上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贡献。在这方面，巨大的经济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国家，已经成为扭转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与其同类的工业化民主国家间的经济不平衡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过帮助消除那些包藏危险冲突的领域，建立一个更加切实可行

的货币体系，造就井井有条的市场秩序，来阻止贸易限制和可能发生的贸易战争，并为这个国家集团创造比较平衡的增长过程，它无疑可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即使其结果是减缓日本的快速增长率，但与过去日本为了安全保障目的而进行的军事冒险相比，这仍不失为一项比较可靠的投资。

日本的庞大经济还可以用于促进欠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样它们最终就能完全加入第一世界经济。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是世界长期面临的最大、最坚巨和最不可缺少的使命。日本的财富和技术还可以用于帮助解决威胁性的全球生态平衡和世界人口增长问题，否则，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毁灭人类。

一个找到了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的途径的日本，也会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既它能促进解决世界上不断增加并且威胁到日本稳定的政治问题。没有人能够断言未来将会怎样，但是一个经济上强大并受人尊敬、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日本，可以比一个富裕却不受信任、并且在心理上孤立的日本，对它自己以及对世界的安全保障当然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促进建立并维持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日本人将会采取大胆而果断的行动，发挥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但是这种行动方针是他们生存的唯一希望。

从国内情况来看，日本是一个非常强大和旺盛的国家，但它面临严峻的外部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经济上的，甚至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日本的国际经济问题带有危险性，因为日本与对它抱有怀疑和恐惧的其他国家之间未能相互理解和交流。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充分的交流手段而造成的技术问题，但比较严重的心理基础是由思想观念和习惯的巨大差异构筑而成的。日本所面临的真正严峻的问题就在于此。日本在整个历史上体验到的孤立及由此形成的独特性，结果变成了今天日本必

须与之斗争的主要课题。

381

第三十八章　语言

人们可能认为语言是一次要问题，或许最好作为前文"背景"或"社会"的一个部分来考察。但是，就日本而言，作为它最为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作为决定着它与有助于塑造本国整个未来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个因素，语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也许日本语令人着迷，但是，我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日本人运用日本语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技巧。在这方面，仍有某些神话需要修正。其中一个神话是，日本语不精确，容易引起误解。的确，日本语可以是模棱两可的，但只有说话人需要这样做时才会如此。人们使用英语同样也可以含糊其辞，但是，由于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达成意见一致，而不是鲜明地表示尖锐的不同意见——"让我们讨论实质问题吧！"——因此，他们更喜欢使用委婉的表达方式。在需要精确的时候，如起草法律和解释技术程序，使用日本语可以像使用英语一样精确。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人在书面表达时喜欢建议性的有时甚至是模棱两可的风格，而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喜欢水晶般的明晰。但是，这种差别是由对文字的偏爱，而不是由语言的性格造成的。

另一种神话认为，日本语具有多重性。这是一个谬论，因为日本经过近现代时期的教育，几乎已经消除了大部分方言读音和强烈的地方发音差别。即使在比较早的时期，日本语也不比德语和法语更分裂。语言多重性的根源之一，也许在于日本语中礼貌和礼仪的层次之间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存在的，比如，"劳您大驾，请问现在几点了？"和"嘿，哥们，现在几点？"，

382

只不过这种差别在日本语中特别突出而已。其原因有二：一是在日本不久以前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和年龄差别是举足轻重的。二是日本人常常省略句子成分，特别是省略从内容和礼仪层次上已经很清楚的主语。

这与印欧语系语言形成鲜明对比。印欧语系的语言必须包括可能是完全多余甚至荒谬可笑的成分。在英语中不能使用通称名词，如“house”(房子)，只能使用较为具体的名词，如“a house”(一所房子)、“the house”(这个房子)、“the houses”或“houses”(这些或〔一些〕房子)。即使讲英语的人也已经抛弃了其他印欧语系的语言的“性别”，他们发现，把椅子定为阴性——la chaise——或把铅笔定为阳性——le crayon①——并且注意两者只能使用相应的阴性或阳性修饰词修饰，这种区分是荒谬可笑的。在另一个极端，日本人认为当内容或礼貌分寸已将主语表达清楚时，就没有必要详细说明“我”、“你”、“他们”了。在重视年龄、强调集体的日本，谦卑、礼貌或中性的形式，往往已经提示了主语。因此，“いらっしゃる”是“你去”，“まいる”是“我去”，“いく”是“他们去”。外国人也许觉得这令人摸不着头脑，但日本人对此却很清楚；这些不同的表达形式也不包含不同的语言意义。

认为日本语是多重性语言的神话，其主要根源可能是对文字和语言的混淆。日本语的文字体系包括2000多个大部分有多种读音的汉字和起源于汉字的两种拼音体系，即“平假名”和“片假名”(统称“假名”)。这种复杂的文字体系就使得日本语可能成为当今世界上任何地区所普遍使用的最困难的一种体系，但这并不影响日本语的统一性。就文字体系而言，难度足以与日本语相提并论的语言可能是拼写极其不规范的英语，但英语的统一性并没

---

① 所举“la chaise”，“le crayon”为法文，“la”为阴性冠词，“le”为阳性冠词。——译者

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在日本语中，名词以及动词和形容词的无变化（活用）词根往往写成汉字，发音则根据相应的固有日本语读音，或者根据从汉字的古代发音演变而来的现代读音。大部分汉字至少有两种不同读音，有些多达 10 种以上。确定一个正确的读音，常常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助词（在日本语中，其位置实际上在后面）以及动词和形容词的活用（变化）部分，一般写成平假名。片假名基本上用于 383 记录外国名字以及非中国语和朝鲜语起源的因而无汉字的词汇。假名音节（一个假名代表一个音节）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它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但今天实际上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日本语。真正的问题是由汉字造成的。9 年制义务教育只教授 1945 个汉字，而更高水平的教育需要更多的汉字。

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日本人怎么能容忍这种需要死记硬背并且极其困难的文字系统？其他民族已经恰到好处地改变了他们的文字体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越南人抛弃了中国的汉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尔其人采用拉丁字母代替了传统的文字体系。罗马字（日本人对拉丁字母的称呼）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日本语书写体系，而且向罗马字的转变也始终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悲惨时代，罗马字才被广泛用于印刷物。现在，这种转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汉字在日本语中具有极其稳定的美学价值，而且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要抛弃它谈何容易。在构成缩写名词、精炼的口号以及短小精悍的标题等方面，汉字也大有用武之地。

然而，保持汉字的另一个理由却正在消失。那就是汉字曾经发挥过的从文化上把东亚联结在一起的作用。汉字是东亚民族共享的儒教文化的共同基础，就像拉丁文在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汉语、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的许多词汇在书写上曾经是相同的，虽然它

们在四个国家的发音完全不同。现在，古老的统一体已经不复存在，越南人根本不使用汉字，朝鲜人越来越多地运用他们独立发明而且非常优秀的拼音体系谚文①代替汉字。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对汉字进行了简化，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简化字。只有台湾人和一些海外华人仍然使用传统的汉字(繁体字)。朝鲜、日本、越南的教育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中文进行的，因而使用汉字进行书面交流曾经非常有效；但是，今天这种交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而且汉字无助于语言表达。例如，中国的黄河在汉语和日本语中都写作"黄河"，但在中国念作"Huanghe"，而在日本却读作"Kōka"。"毛泽东"在日语中读作"Mōtakutō"，日本的城市"大阪(Osaka)"和"横浜(Yokohama)"在汉语中分别念作"Daban"和"Hengbin"。

汉字具有文化上的统一力量的伟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84 它在日本的作用也开始减弱了。几乎在所有日语书面材料中，尤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连环画、小说和广告等，假名在逐渐取代汉字。日本人经常给产品取英语名称或假造的英文名称，例如Sony(索尼)和Datsun②在日语中就没有恰当的对应词。在未来的许多年内，汉字无疑在日本语中仍将是极其重要的，但可能会慢慢地减弱，主要成为学术性的和官方的文字。然而，与此同时，日本文字体系的多重性仍将是一个明显的障碍，会给打字机、文字处理机、电脑、信息电子传送器以及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带来很大困难，但这并不影响日语本身的统一性。

* * *

日本人总是以想象中的文化尤其是语言纯粹是土生土长的为

① 谚文：15世纪时朝鲜创制的拼音文字，现有40个字母(21个元音字母，19个辅音字母)。——译者

② Datsun是一种日本小轿车的牌子，一译"日本牌小轿车"。有的日本人认为Datsun中的Dat是"脱兔"二字的对音，sun是一种爱称，意思是形容汽车开的快。——译者

荣，但这种语言从一开始用于书写，实际上就像英语一样肯定是一种混合物。对于法国人和其他徒劳无益地防止外国语影响的民族来说，这或许是令人痛苦的，但大部分日本人却泰然处之。如果他们高兴，他们会指出，英语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混合性是任何语言的活力和灵活性的标志。日语从容不迫地引进、修正、采用外国语词汇和短语可能是它最大的长处，同时绝不削弱日本文化的力量及其根本性的单一性。

原始日语可能已经是各种朝鲜方言与汉语和其他语言相混合的产物，甚至在6世纪汉文及其文字系统开始充斥于日语以前就是如此。传入日本的汉语受到彻底的修正和吸收，到9世纪，演变成一种混合语，具有固有的日本语结构，但在词汇上受到汉语的重大影响。在以后几个世纪，经过进一步增加源于中国的词汇量，日本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了，其中很多词汇，尤其是学术用语，更多地溯源于汉语，而不是日本语。

不久以前，第二次语言冲击波席卷了日本，这个冲击波来自西方。它开始于16世纪葡萄牙语及此后的荷兰语的零星词汇，到19世纪，变成了一股浪潮。日本人接受了现代科学的伪古典的希腊和拉丁术语，德语在医学领域、法语在艺术领域的贡献尤其突出。但是，大部分词汇直接来自正在成为新的国际贸易语言的英语，这些词汇是由美国和英国的教师和商人带来的。到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者企图扭转这一潮流时，得到广泛使用的英语词汇已有几百个了。随着美国的军事占领和后来日本进入国际市场，又有几千个英语词汇进入日本语。英语词汇在日语中变得非常流行，对于一个世纪以前只懂日本语的人来说，当代知识分子的交谈、电视广告，甚至许多家庭闲聊都是难于理解的。

人们也许会设想，在这种大规模地借鉴世界上两种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后，日本人将能够充分与外部世界进行语言交流，许多

385

外国人也将找到掌握流利的日语的捷径，但情况并非如此。日语的基本结构几乎没有受到汉语或英语的影响。绝对出人意料的是，汉语和英语都已变成由语序决定意义的语言（如"猫看见狗"或"狗看见猫"①），而日语仍然是一种严格的胶着语（粘着语），结束词是动词或形容词，它们与具体说明时态、语气、礼仪以及句子的因果、被动、否定、疑问等关系的附属成分结合在一起。汉语和英语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因此，人们按照汉语的语序可以说出不难理解的洋泾浜英语。但是，如果将日语的语序也用于汉语或英语，则会令人莫名其妙。例如，简单的动词 kaku（"書く"，即"写"）可以通过胶着而扩充为 kakaserarenakattaraba（"假如不强迫〔他〕写的话"）以及其他许多形式，这些都不能直译成汉语或英语。

即使从汉语和英语借用词汇也无济于事。日语使用的汉字是借用早已过时的古代读音，并且为了使其符合无日语的发音规范而弄得面目全非了。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汉字也是不容易理解的。只有像"台湾"（Taiwan）这样非常特殊的名词，才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就英语而言，比较多的词汇是相同的，但也绝不是大部分。由于日本人发不好英语中的"l"和其他几个音符以及所有以辅音结尾的音节（"n"除外），因此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错误发音。这样，我们就看到，ライオン（raion）代表 lion（狮子）、ホーム（hōmu）代表 home（家），缩写词プラットホーム（purattōmu）代表 railway platform（火车站月台）。日本人还发不好大部分辅音组合，因此把它分裂成许多单独的音节。比如，サルトル（Sarutoru）是法国哲学家和小说家让-保罗·萨特的日本语名称。 386

①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汉语语法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列举较为复杂的例子如"我不吃羊肉；羊肉我（可）不吃；羊肉我不吃（吃牛肉）"（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

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日本人赋予许多外来语以变化了的含义。ハンドル(handoru)意为方向盘，来自 handle(柄、把手)；クラクション(kurakushon)意为汽车喇叭，来自过时的 klaxon (电喇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利用英语词汇造出来的词。クーラー(kūrā)来自 cooler(冷却器)，意为冷气设备；ナイター(naita)来自 nighter，意为在灯光球场举行棒球夜间比赛；グリーンカ・ー来自Green Car (绿色汽车)，意为火车上的头等车厢；如前所述，サラリーマン(sarariman)来自 salary man(靠工资生活者)，意为职员。英语词汇往往被缩写成日语中讨厌的多音节词，这虽然令人莫名其妙，但常常富有创造性。ゼネ・スト (zene-suto)是 general strike的缩写，意为总罢工；パン・スト(pan-suto)意指 panty stockings，美国人一般称之为panty-hose(连裤袜)；ベースアップ(bēsu-appu)即 base up，意为全面提高基本工资，这一词很有用，但在英语中没有合适的对应词。我们应特别注意さよならホーム・ラン(sayonara hōmu-ran)① 这一有趣的词，从道理上讲它可能是指棒球比赛中决胜负的第九场的后半局的本垒打。对于英语民族的人来说，这种词当然是不容易理解的。日本人沮丧地发现，他们日常应用的成百上千的英语词汇，对英语民族的人来说仿佛像希腊语或日语一样。有人戏称美国和英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成的两个国家，其实这种戏语用于描述“日本式英语”更为恰当。

* * *

除了文字体系非常复杂以外，对于生活在日本并与其他本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来说，日语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媒介。日本人可以通过翻译利用整个世界的文学和思想著作，正如其他任何民

---

① 该词前半部分源自日语，意为“再见”，后半部分源自英语(home run)，意为“本垒打”。——译者

族所做的那样。但仅仅这样已经不够了。现在，日本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主要关心从西方吸收新知识的国家，它已经变成世界领袖之一，深深地卷进了世界的经济与生活。日本人与讲其他语言的民族间的语言交流已经变得至关重要。现在，日本人必须能够熟练地用外语进行会话和写作。

人们也许希望世界上其他民族从语言上向日本人妥协，但这不太可能发生。由于会讲日语的人很少，它的语法与大部分其他语言差异太多，日语不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当然，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学日语的外国人确实更多了。学习日语的中国人、朝鲜人、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人数大增，但总人数仍然不多。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语言只有英语一种，法语勉强算得上第二种。只是因为礼貌，更精确地说是由于政治原因，俄语和汉语才成为世界性语言。这意味着基本上要靠日本人自己克服他们周围的语言障碍。

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已经证明，日本人并不擅长学说外国语，甚至也不擅长精确地领会外国语口语。在世界各地，人们听到这种评论都会倍感奇怪，并把它与日本人在其他一切领域的出色技巧相比较。看来，只有英语民族的人与日本人一样笨拙，这或许是因为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远离讲其他语言者的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他们都受到讲这一世界性语言的妨碍。在英语民族的人想方设法学会几个残缺不全的外国语词组以前，其他人已经掌握了流畅的英语。

地理孤立也同样妨碍着日本人，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严重的障碍。其中之一是日本人不擅长发音。对于他们来说，其他大多数语言都是一种难于辨认和重复的可怕声音，正如一个英语民族的人很容易混淆法语的“u”和德语的变元音(amlant)一样。

与此相反，对于英语民族的人来说，日语中严重到混淆意思地

步的发音问题是比较少的。英国人在读某些音节时发音过重，这使日本人捉摸不透，因为他们的语言中实际上没有重音。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英语民族的人忽略了长短元音之间和辅音之间的差别。“此处”(koko)意为“这里”，如果将元音拉长成为kōkō，则表示“高校”即“高中”。同样，“北”(kita)意为“北方”，如果将辅音t拉长成为kitta，则表示“切”。但是，日本人非常善于理解外国人，即使这两条规则都被违反了也无伤大局。例如，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将日本的第二大城市Ōsaka(大阪)错误地读作Osaka，而日本人仍然能够理解。

日本人学习外国语和外国人学习日语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障碍是，实际上很少有人讲像日语这样的胶着语。印欧语系语言流行于欧洲大部、整个西半球、苏联、西亚和南亚许多地区，包括印度次大陆大部，并且被许多在语言上四分五裂而不能拥有自己统一的国家语言的前殖民地国家采用为官方语言。世界其余的大部分地区讲汉语或闪米特语①，它们与印欧语系的语言有共同之处。因此，在学习英语和其他任何世界性语言方面，日本人成为少数没有特别优势的民族之一。在结构上与日语有明显联系的语言只有朝鲜语、蒙古语和土耳其语，但选学朝鲜语的日本人寥寥无几(虽然有更多的朝鲜人学习日语)，而学习蒙古语和土耳其语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对于日本人来说，要建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往来，面临着巨大的语言障碍。

388

*　　*　　*

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人在推进现代化的大部分事业中取得如此成功，因此他们能够解决学习外国语的问题并取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始终如此，他们的失败是值得注意

① 闪米特语：西亚和北非使用的语言。通常所称的“闪米特语”是一个语族，主要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阿拉米语、马耳他语等。——译者

的。要看清日本人近年来在学习外国语方面的笨拙表演，最好的方法也许是考察一下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

19世纪中叶，日本人面临与西方人生死存亡的冲突。那时，他们迅速地掌握了英语，并渡过危机求得生存，开始攀登技术上的平等地位。日本人小心谨慎地聘请美国和英国教师，利用美国教会设立的许多学校，使用主要从美国进口的教科书，并且派遣大量有前途的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些政策，从而渡过了关键性的年代。许多年轻的日本领导人已经能够大量使用英语会话（尽管有时是离奇古怪的），并且按照优美的斯宾塞风格书写典雅的英文信件。

然而，到了20世纪初，掌握英语口语的能力已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日本人已经培养了自己的教师，创建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包括大学教育体系；而且，通过日文书籍或日译本也可以学到一切必要的科学知识和外部世界知识。日本及其帝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学生可以通过非欧洲语言受到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的地方。许多中国人成群结队到邻近的日本留学。日本的学校制度被认为是日本的成功之路。由于开支太大，大部分外国教师被辞退了；最优秀的日本学生也不再到海外留学了；他们往往是到了不容易学习外国语的年龄才到国外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实际上，日本人开始蔑视说外国话的能力，认为说外国话只能说明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英语圃解”(Eigo-zukai)（使用英语的人）成为一个贬低人的词。

389

除了那些希望推敲外国原著而不是依赖往往极不可靠的译本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外，学习外国语已变成无关紧要的事了。外国语教学也成为一种僵化过时的制度，它只强调晦涩难懂的语法和传统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了会话和可能有用的当代英语，这使学生感到索然无味。人们由于发现英语和数学在考试中容易评定成绩，

因此在关键性的升学考试中颇受重视。对于数学来说，这种做法的结果有助于日本人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平；但对英语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使教学进一步陷入语法和传统教科书，脱离了会话和当代英语。英语课常常成为过关考试的准备，而不是学习一种生动的语言。

日本人的英语能力逐渐下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排外主义时期降到最低点，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战后日本人显然必须掌握国际交流的语言时，他们只能从这种低水平起步。他们从那时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迫在眉睫的领域。今天，日本的许多科学家精通英语，参加了世界性的科学组织。成千上万从事对外商业活动的日本商人也通晓他们在国外取得商业成功所必需的外语，涉及外交事务的官员也获得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译本往往是逐字逐句转录而成的（“直译”），经常把原著弄得面目皆非；现在，比较优秀的新译本基本上取代了旧译本。过去，译员是极不可信的。我曾经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译员翻译时犯了个小错误，致使答非所问，这一答案反过来又被译错，结果使原来的提问者以为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心脏必定是按不同的方式跳动的。这种谬误现在极其罕见；有些译员甚至还精通同声翻译，这几乎是一种奇迹般的日英对译技巧，因为这两种语言的句法大相径庭。

390

虽然近几年来日本人在掌握外国语方面确实取得了重大进步，但这只是部分现象。除少数青年政治家外，日本政治家只能说几句不足挂齿的社交英语外，几乎没有人能说任何一种外语。大部分学者、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往往看外语著作很困难，那些关心科学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人是例外。普通民众除能讲一些哗众取宠的词语外，不愿讲英语。只有为数很少的日本男女公民向外部世界宣传日本，或者直接了解其他人关于日本的言论。在国际会议上，

同样的面孔反复出现，很少有新人出现。这对于世界上的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实。大部分日本人基本上生活在他们的语言高墙之内，其他人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则只听他们希望从国外传来的声音。这里没有宽松的交换意见的方式，而只有通过交换意见才能够与外部世界进行真正的文化交流。

* * *

由于大部分日本人至少在初中和高中受过6年正规的英语教育，其中许多人以后也继续接触这种语言，因此，他们掌握这门语言方面的糟糕记录，应被看作是浪费脑力的可悲事例。当然，如上所述，他们遇到困难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日本仍然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除了在一些城市和旅游点外，西方人极其罕见。大部分日本人长年乃至终生没有与外国人进行任何重大接触，也几乎完全没有实践外语的机会。结果，孤零零的一个西方人可能会被蜂拥而上的学生所包围，他们试着用他们学的最基本的英语说："Harō Howatto izu yuā nēmū？"（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当然，这种情况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好多了。因为那时西方人更为罕见，他们在日本儿童眼中仿佛是妖魔鬼怪。战后美国士兵充斥日本各地，后来数量可观的商人和学生又进入日本，从而根本改变了这一切。但是，说英语的人仍然为数不多。在日本各地出现了数千所的英语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是为了帮助学生通过关键的英语考试，还为了帮助他们理解和讲述规范的现代英语。在日本有数百名西方青年在这种学校或自办学校任教，以取得经济报酬，好在日本生存下去。许多日本青年通过聚精会神地收听美国的远东电台而学会了漂亮的发音；（远东电台是美国的一家军用电台，其目的是推行许多并没有多大文化意义的计划，因而无意识地为日本人学习英语这一有用目的出了力）。日本青年一有机会

就如饥似渴地学外语，成绩相当出色。他们与日本人糟糕的英语记录无关，后者更多地是由官方英语教学设施造成的，这种教育设施妨碍了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

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障碍是政府学校制度中的大约5万名英语教师，他们大都不会讲地道的英语。对于任何制度改革，他们都感到威胁。此外，整个学校制度认为，目前教授的英语有利于考试，尽管实际上很少教授有使用价值的英语。在学校制度背后的是文部省的官员，他们与任何地方的官员一样，很少希望变革。整个制度都根深蒂固地反对改革；而且，令人遗憾的是，政治家认为，领导改革对于个人利益没什么好处。孩子们不表示意见，父母也看不到自己曾经忍受过的旧制度有什么不对，而整个学校制度更是联合反对变革。许多人认识到应该有所作为，但很少人有首倡改革的兴趣和力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充分具备了语言改革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对于他们来说，外国教师已不再是费用昂贵的了；日本能讲英语的青年为数不少，他们准备仅仅为了并不太高的薪金而工作；日本人十分富裕，有条件到国外旅行和学习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电子设备，其他国家发现，在外语教学中这些设备非常有用；国外已经发明了速成外语教学的新方法；日本学生也热衷于学习外国语。英语俱乐部在大部分大学和许多高级中学中很流行，它们表演英语戏剧，并举行英语演讲比赛。企业公司和政府官厅常常拿出一些钱派遣有前途的人选出国学习几年，其主要目的是完善他们的外语技能。如果具备一个经过改革的教育制度，不用额外的代价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缺少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身居要职的人准备把各种解决方法汇成一个合理的体系。

392

* * *

虽然存在着上述各种可能性，日本人学习语言的成绩却很糟

糕，这不能不使人怀疑，问题的要害是日本领导人和公众对此缺乏兴趣。这种看法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许多日本人不愿意掌握流畅的英语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担心，过于精通外国语会削弱日本人的独特性。甚至还有人认为，日本青年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语言技巧。这种情感虽然表露得模模糊糊，但是相当普遍。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日语似乎格外与众不同，而日本民族的独特性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累赘。他们知道，荷兰青年学习英语和德语两种最相近的外国语，并没有削弱他们使用荷兰语会话和写作的能力。那种认为日本人仅仅因为学英语就会失去其日语能力以及日本人的独特性的想法，是滑稽可笑的。

然而，这种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既想保持独特性、又要实现国际化的不同愿望。独特性与国际化是当代日本的一对矛盾，语言问题则是这种矛盾现象的最显著例子。如果日本人要超越语言障碍，并且在世界上发挥其他因素迫使它必须发挥的作用的话，这是一个必须优先解决的课题。

当然，现在出现了许多旨在改正这种状况的措施，其中有些措施尤其明显和简单。就拿对于日本人特别困难的发音来说吧，英语和其他外国语的发音应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学习，因为儿童时期可以自如地接受外国语的发音。聘用讲外国语的日本人担任教师，在幼儿园教授歌谣和游戏，并且在电视、电台播放娱乐性儿童节目，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事先消除发音困难。利用儿童时期学习语言的非凡能力，可以将英语教学的许多时间从高中转移到初中，在那里，英语学习会被看作是乐趣，而不是负担。同时，高年级的课堂时间可以用于更复杂的学习。这样，在年纪更小时学习外语还可以使它成为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有用工具，并因此把它变成一项更有趣味和更有意义的科目。当然，全部重点应从传统教

科书和为了考试而教授的语法转到有用的现代英语和会话上来。这种转变不仅不会增加课时负担或减少日语科目的学习，而且还会成倍地增加学校英语教学的效果。

语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成千上万名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日本儿童的潜在作用问题。这些儿童由于父母被派遣到海外供职，有一段时间是在国外成长的。日本人希望防止这些儿童失去他们的母语和极其困难的文字技巧，这种愿望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目前特殊的周末学校和补习班体系看来是可行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儿童差不多都精通一门外国语，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稀有财富。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国家的潜在财富，但却常常不被这样看待，甚至还被视为麻烦的问题和令人困窘的事。因为这些儿童的海外经历和外国语技能使他们与其他日本青年有所差别，所以，为了保证他们不出现与其同龄人的差异，他们往往小小年纪就被送回日本。实际上，他们回国以后总是要被洗脑，以消除其外国语技能的一切痕迹。对于男孩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要通过普通的考试关。女孩得到比较宽宏大量的处理；由于人们并不期待她们真正有所作为，因此，她们的外国语技巧作为可能有用的礼貌才艺，是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的。

一个比较理智的解决方法或许是鼓励这些男女儿童在国外生活时期尽可能完全掌握一门外国语。日本应创建特殊的学校，以保证他们回国后能够在弥补国外生活期间失去的正常日语教育的同时，保持其外语技巧。其次，在最著名的院校，包括东京大学，应该为他们设立国际学院。政府机关和大企业或许会发现，这种国际学院的学生至少和那些受到正规教育的学生一样有用。他们无疑也会证明自己更能适应今天的日本所必须扮演的世界领袖角色。

此外，国际学院还有另一种作用。如果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能够在使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工具的日本学

校中受到高等教育的话，那么，他们将大批蜂拥到日本。日本也将开始在教育上发挥领导作用。因为除了缺乏语言能力外，日本完全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外国学生在日本也有助于日本人本身的国际化，并且还会把日本的影响传播到比现在要远得多的异域。

现在，日本人正开始做出许多有希望的努力，以跨越语言障碍，将重要的国际因素引进日本的教育；然而，这些努力还处于早期阶段，是小规模的，表面的和试验性的。例如，关心学校外语教学的社会名流不够多。日本表面上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国际性国家，但在世界主义的光环下，它却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孤立国家。这主要是心理上的问题，并且可能是有关当代日本人形象的最重要的事实。这个基本上是潜在的因素，将是本书最后一章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日本果真独特吗？难道它注定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国家、一个国际上的弃儿吗？它是否正在按照其他大多数重要国家的方式行进在日益国际化的路程中？换言之，它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袖吗？

第三十九章　独特性与国际化

395

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语言障碍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因而恐怕也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但在这下面潜存着一个模糊得多并且困难得多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的实际地位与他们自己的独特性认识之间的矛盾。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领袖之一，但他们却认为自己是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独特民族。他们沾沾自喜，几乎达到傲慢的地步，同时又对他国人抱有惴惴不安的心理。他们既是世界的领导者，同时又是国际上的孤独者。这种情形不仅对于其他人，甚至对于日本人自己来说，也是捉摸不透的。于是，围绕着"日本

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70年代爆发了一场“日本人论”的大争论。现在，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使“国际化”一词成为日本人的口头禅。几乎每一个组织都想把“国际”包括到它的名称中去；每一个人都把“国际化”挂在嘴上，尽管谈论者并不了解“国际化”概念的确切含义。

日本人的独特性意识基本上来源于它的与世隔绝的漫长历史(起初是自然的，后来则是自己强加的)、它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异乎寻常的语言、独特而困难的文字体系以及牢固的集团组织模式。这种集团结构的基础是组织严密的家族，家族之上是地域共同体，地域共同体之上是封建藩国或者现代公司，其顶点则是在地理、语言和文化上与其他一切国家大相径庭的国家。对于日本人来说，世界明显地划分成两个部分，即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东亚文化圈、基督教世界、甚至人类种族等范畴，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某件事物是日本的，或者不是日本的。

对于大部分现代民族来说，国家、语言、民族和文化等概念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区别的。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同义词。在近代以前，世界上所有说与众不同的日本语、按照别具一格的日本方式生活的人都居住在日本列岛。这个国家除了日本人以外，实际上没有其他民族生存。仅有的例外是，在日本北部有少数土著阿伊努人；在九州有一些中国人、朝鲜人和荷兰商人。但是，所有这些人无疑都是外人。“内”与“外”的分界线是十分清楚的。根据语言、民族、文化和国家区分，一个人或者是纯粹的日本人，或者根本不是。日本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部落。即使从中国和西方大量引进政治制度、文化和语言，借鉴外国模式，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引进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全体日本人共同享受的混合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并没有改变日本人的独特性。

396

试向全世界的人发问：你是什么人？最初的答案也许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学生、穆斯林、女人、农民，或者就是一个人。但是，即使在今天，每个日本人几乎都会回答：我是日本人。任何初次出国的人大概都会惊叹自己民族主义感情的力量。但是，与世界上大部分民族相比，日本人更不会丧失他们的民族意识，哪怕是暂时的。他们始终认为自己不仅代表个人，而且代表着整个日本民族，别国人会根据从他身上所得到的印象，形成对日本民族的看法。一个扬名于世界的日本人，他的名字，譬如说叫山本广志，对他自己和朋友都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他是给日本带来荣耀的一个日本人。即使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民族主义狂潮中，西方国家的竞技者也比日本人更注重个人名誉。日本人完全为代表国家的荣誉感所支配着。

* * *

在日本人的自我形象中，民族因素至关重要。他们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纯粹的"血统，尽管早在历史发展初期，在日本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混血迹象。我们通常把种族歧视看作是白种人与其他种族间的一个特殊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世界的普遍性问题，而在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比在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严重。日本人将对于种族、文化和国家的感情融为一体，因此他们对种族的态度变得格外强烈。他们几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与其他人不同的人种。 39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与西方人有过重要接触的日本人为数不多。16世纪他们初次遇到葡萄牙人，19世纪他们见到更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当时的反应仍然有些大惊小怪。日本人厌恶西方人的蓝眼睛和"红头发"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日本蓝眼睛和"红头发"都是妖魔鬼怪的标志。他们也厌恶西方人裹在毛料服装里并且由于（根据日本人过分讲究的标准）不经常洗澡而散发汗臭

的躯体。西方人的食物中动物脂肪过多，引起一种刺鼻的强烈体臭。“奶油臭气”至今仍然是一个指令人讨厌的西方事物的词汇。当然，从那时起西方人的服装式样、食物以及洗澡都已发生了变化，但是日本人仍然有些讨厌西方人的多毛躯体，种族差别意识也一直根深蒂固。就我所知的许多异族通婚事例中，家庭反对（如果有的话）最激烈的几乎总是日本家庭。

日本人对黑种人和深色人种的态度比对白种人的态度更为恶劣。在今天，白种人的蓝眼睛和“红头发”已经变得倍受尊重了。在美国占领军到来之前，日本人几乎与黑种人没有任何接触，他们往往用有些好奇和反感的眼光看待黑种人。在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大部分日本人下意识地站在多数白人的立场上看待黑人民权问题。与黑人长期经历的不公平待遇相比，白人在应付这个为数众多而又迥然不同的少数民族时所面临的困难，给他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人们会设想，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体格与日本人大同小异，并且不易区别，因此他们在种族上可能比西方人更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今天，也许更多的日本父母会接受美国女婿或媳妇，而不会容忍中国女婿或朝鲜媳妇。日本人对大约70万朝鲜人的种族歧视是很残酷的。这些朝鲜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输入日本从事奴役劳动的朝鲜劳工及其后裔。虽然实际上已经过去了40多年，这些所谓朝鲜人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都已经日本化了，但是，日本人却在法律上极力阻止他们取得日本的公民权。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认为，与朝鲜或中国移民的后裔通婚，就像与残留下来的仅占总人口2%、被不合理地视为贱民（部落民）的日本人通婚一样，会玷污他们日本血统的“纯洁”。日本人对深色的东南亚人和南亚人的种族歧视更是变本加厉。在过去20年中，东南亚动荡不安。在这期间只有几百个东西亚人在邻近的日本获得永

398

久居住权，这与在地球另一边成千上万地接收东南亚难民的白人国家形成可耻的对比。

日本人对邻近种族人的态度与欧洲人有明显的差别。在欧洲，国际通婚，尤其是贵族间的国际婚姻是屡见不鲜的，阶级比国籍和细微的体格差异更重要。英国皇室主要是德国血统，尽管家族名称已经从汉诺威改为温莎，从巴登堡改为蒙巴顿了。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的外孙，他们相互间能用英语交谈。在东亚，异族通婚只发生在港口城市的下层社会中。

东亚的种族主义最明显地表现在对待混血儿的态度上。在朝鲜和越南，美国士兵与身份一般都很卑微的当地妇女所生的子女往往遭到残酷的歧视，被地方社会拒之门外。黑人混血儿的处境比白人混血儿更为悲惨。这两个集团的最大希望是为所谓种族主义的美国收养。战后日本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一位曾为这些混血儿创办孤儿院而倍受尊敬的日本母亲，只希望这些孤儿最终能在亚马逊河的文明边疆地区找到新的安身立命之处。家庭背景较好的混血儿一般能得到正常发展，但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美国社会，而不是在日本社会。

日本人严格地将所有的人分成"我们"和"他们"两部分，这种两分法给那些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造成特别的困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两分法影响了那些短期生活在国外的日本人的子女的教育。对于美国的日本移民来说，第一代移民心平气和地加入美国的下层社会，由于受到种族歧视而未能成为美国公民。1941年日美战争爆发时，他们逆来顺受地同意迁徙到美其名曰"重新安置中心"的地方，实际上是被监禁在集中营。他们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失去了在美国西海岸的农场和家园。他们的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则义愤填膺，但对美国往往忠贞不渝。因为他们无法接受那种 399

或者完全忠于日本，或者彻底背叛日本的非黑即白的生硬主张，所以将全部忠诚给予要求较少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威夷的日本青年组成了美国军队中最勇敢善战、功勋卓著的小分队。第三代日本移民已经变成典型的美国人了；他们想方设法学习日本语（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懂得日本语），坚定不移地要求少数民族的权利。在美国，美籍日本人的成就差不多遥遥领先于这个国家的其他少数民族集团。3个日裔美国人曾经同时出任美国参议院议员，占美国参议院总数（100席）的3%，而日裔美国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0.5%。当外籍日本人作为新国家的功成名就的公民访问日本时，他们不是“内在的”日本人，而是“外来的”外国人。对于他们自己和日本人来说，这一点都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生活在日本的其他亚洲人难于跨越虚构的“种族界线”和实际的“文化界线”而成为日本社会的名副其实的成员的话，那么，西方人要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人非常友好，他们热情洋溢地款待西方人，只是由于空间狭小、令人困窘，才很少邀请西方人到家中作客。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西方人才会受到不愉快的歧视。例如，由于担心他们吵闹或造成其他顾客拘束不安，有些酒吧将他们拒之门外。由于西方人总是受到盛情的款待，因此他们不知道怎样回报才好，从而感到困窘不堪。

但是，日本人的盛情款待是以西方人作为来访者或至少是作为局外人的假设为前提的。一个群体接受一个西方人成为群体的真正成员是难以想象的。西方人作为外表的装饰品可能被捧为名流，但没有人需要他成为一个完全的成员。一个对日本了如指掌的西方人会遭到日本人的警惕。到他已经完全习惯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时，日本人会感到惴惴不安，称之为“不正常的外国人”。真正精通日本语可能会引起近乎敌意的情感，而拼写几个蹩脚的词组却能得到热情洋溢的赞扬。日本人认为，外国人永远不应

该忘记，他们毕竟是外国人。

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大相径庭。美国人一般认为，任何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都渴望成为美国人，而且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日本人则认为，外国人永远处于"我们"和"他们"之大分界线的另一边。日美两国政府间的一次文化会议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态度的差别。我记得，在那次会议上，"美国人"，包括在日本工作的美国人、日裔美国人以及一个长期在美国执教的日本人，坐在桌子的一边，桌子的另一边则坐着在日本土生土长、货真价实的日本人。

400

许多生活在日本的美国人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们始终被日本社会拒之门外。有些专指外国人的词带有下意识的轻蔑含义。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那时有时听到明显带有侮辱色彩的称呼，如"异人(异族人)"、"毛唐(毛夷)"。使用最多的是中性词，如"西洋人(西方人)"，指所有的白种人。官方使用的"外国人"指一切外国人。今天，"外国人"仍然是官方用语，但已经被非正式地简称为"外人"，即"他人(局外人)"。"外人"这个词强调了日本人思潮中的排外色彩，它反映许多令西方人义愤填膺的轻蔑含义又死灰复燃了。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对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近邻不用"外人"的称呼，他们根据国别区分。但是这种具体称呼往往比"外人"带有更强烈的贬抑色彩。

* * *

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两次大规模地向外国学习，这可能加强了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民族感情。先是在早期发展阶段，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日本人两次发现自己被淹没在先进技术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浪潮中，开始来自中国，后来来自西方。日本人每次都不得不发奋图强，努力赶上先进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民族特殊性意识得到了加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最终都回过头来大胆地重新坚持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人们对通过贸

易、渗透以及短暂冲击而来的外国影响并不重视。但是，日本人却从借鉴外国和本国反应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整个历史。他们热衷于仔细区分什么东西来自中国或西方，什么东西是日本固有的。只要他们认为是日本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大加赞赏。

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摇摆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日本整个社会的那种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倾向和他人判断凌驾于个人爱好之上的特征，都加强了这种特性。日本新闻记者和普通公民经常征求西方人的意见。其实，许多西方人对日本过于无知，并没有什么值得听取的意见。人们记得，不久以前，敏感的美国人在来访的英国名人刚刚下船到达纽约时，就问他们觉得美国女人怎样？相形之下，日本人就没有这么坦然了。如果日本人意识到别人正在观察他，就显得非常不自然。不管是出国留洋，还是进行一项新从外国传来的体育项目或活动，日本人都会谨小慎微地梳妆打扮，循规蹈矩地照章办事，无论是打高尔夫球、网球，还是参加鸡尾酒会。他们强调做事要像模象样，这经常有碍于他们把事情做好。他们的扭怩感肯定无助于学讲外国话，因为学外国语要有一定程度的放荡不羁，而不是张口结舌地追求完美。

自卑感是孕育民族主义的天然土壤，这在世界各国毫无例外。北欧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初高涨是由于北欧与地中海古国相比而产生的落后感激发起来的。美国早期显然是西方世界边缘的一个未开发的弱小国家，正因为这样，那种自命为大国的爱国主义才在美国应运而生。民族主义浪潮在非西方世界彼伏此起、汹涌澎湃，这显然是对西方优势所作的反应。

日本人的经历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英国人。英国人早期强烈的民族主义可能来自与日本同样的根源。英国人由于屡次受到外国军事和文化入侵的蹂躏，从而形成了与日本人同样荒谬的自

豪感和独特意识。这种共同性可能是由他们相同的岛国位置造成的。日本人往往将他们与众不同的观念称为"岛国根性"。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观念是不合时宜的，正如"岛国性"对英国人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样，"岛国根性"最终也将给日本人造成不良影响。

日本早期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与中国比较而产生的自卑感。的确，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且是儒教先哲的故乡。但是，只有日本才是"神国"。日本从6世纪到9世纪长期如饥似渴地向中国学习，这给它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随着日本人消化他们所引进的事物并且将其转化成他们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直到19世纪才开始转为优越感，因为他们刚刚扩展了力量和财富，并且非常成功地处理了现代的问题。但是，即使在那时，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也包含着对中国的辉煌过去的缠绵不断的敬意。

402

一般说，"赶超西方"的口号体现了日本现代的民族主义。由于要赢得西方法律和社会的承认，日本人自然要下决心在个人和民族两方面达到西方的标准，以取得西方对他们的赞扬。这种决心，加上他们期待集团赞扬的传统，使他们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显得有些呆板和笨拙，也使其他人在与他们交往中局促不安。西方人觉得日本人在与其他人交往时循规蹈矩、生硬冷淡并且举棋不定，相形之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则表现得热情洋溢、轻松自如。日本人的这种形象不管正确与否，对于他们将要扮演的世界角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日本人经历了两次时间不长，但却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的时期。他们每一次学习西方，在最初阶段都是无批判地模仿，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功，从而使他们以后能够抛弃无关紧要的引进物，转向重新光大日本许多固有的特性。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周期。开始，他们从西方寻

求日本民族生存和未来发展的一切答案。但当他们掌握了基本经验后，就怀旧地回归自己的文化，认为日本文化才是产生日本优越的真正的根，西方技术不过是起刺激作用的肥料而已。仅仅几十年前日本人还公开承认自己落后，但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强调自己比其他人优越了。

如今，第二个周期即将结束。当外强中干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时，美国仿佛拥有日本所需要的全部答案。但是，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和灿烂辉煌的创造，日本人很快达到了新的繁荣和社会幸福。在许多领域，日本开始超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日本已经有点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了，他们开始蔑视比他落后的国家。例如，美国的生产率增长缓慢，劳资纠纷不断，日本人称作"美国病"。

403 自卑感和优越感决不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这两者密切相关，相互之间易于转化。也许在近现代时期日本的经历特别紧张、激烈，因此他们的自卑感和优越感才显得格外强烈。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日本人不得不两次殚精竭虑地赶超西方，这在日本人的心灵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所有日本人都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自豪。现在，有些日本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傲慢和恩赐感，这是不难理解的。

日本人有时声称，他们的自卑感和优越感与他们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识没有联系。但是，对于一个对等级秩序如此敏感的社会来说，这种说法是难于被人接受的。今天，日本人无疑是平等主义的民族，但人们却经常能够听到"日本第一"或"世界第一"的说法。美国从日本进口的最流行的T恤衫的商标是用汉字写的"一番"(第一)。如上所述，大部分日本人对于大学、公司以及几乎一切事物的名次排列都非常清楚。如果他们不将同样的优劣观念也用于国家，那才是咄咄怪事。

日本人与美国人一样喜欢进行民意调查。当然，影响国家名次排列的因素很多，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方式以及应答者联想到的具体问题。因此，要确定整齐划一的国家名次是不可能的。然而，日本人的基本态度是不言自明的。独占鳌头的自然是日本，首先因为它是日本，其次因为它已成功地将现代技术与日本传统美德融汇贯通。日本之后是美国和形形色色的西方民主国家，如法国、英国、西德、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日本人认为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与美国相似。其后是中国，不管它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如何，但却拥有辉煌伟大的过去。日本人投中国的票就象西方人因为文艺复兴的传统而投希腊、罗马的票一样。再后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其中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排列在前，因为它们都是日本的重要贸易区；印度接近中间；排列在后的是文化上与日本差别最大的中东和非洲国家。最后是南北朝鲜和苏联，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日本人所厌恶的。 404

在上述国际名望的排列中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名列前茅的国家都是在生活方式上与当代日本大同小异的西方民主国家，种族和历史经历同日本相近的国家却名落孙山。有些日本人也反对这种排列法，但他们的影响不大。20世纪初，艺术史学家和哲学家冈仓天心曾经一本正经但却大错特错地宣扬“亚洲一家”，其他哲学家也群起响应，但普通民众对他们的呼吁漠然视之。30年代军国主义者鼓吹要清除西方的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和道德沦落，解放亚洲，但是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在亚洲其他地区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甚至在日本国内也未引起很大兴趣。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泛亚细亚主义，但普通日本人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始终偏爱西方民主国家，对世界欠发达地区兴趣索然。

* * *

日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有时使日本受益匪浅。19世纪中叶，虽然内部存在着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但是日本人没有想过与外国人携手联合，来反对日本人整体的最高利益。日本的领导人与许多新近创立的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他们始终如一地完全献身于日本，没有想过在国外积蓄个人财富。随着国家开始渡过危机，并达到国富兵强的目标，日本人也并非不希望获得自己的财富和荣誉，但他们仍然继续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深重灾难中，民族主义又帮助了日本人。大部分日本人被迫为生存而苦斗，但几乎没有人为了生存而想过出卖国家利益。很多人终于又富裕起来了，但他们的富裕是给日本人带来繁荣的巨大成就的一部分，没有日本人会为了躲避将来国内可能发生的民族灾难而把自己的财富储存到国外。在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冰清玉洁的民族主义是屈指可数的。

405 然而，民族主义并不是只给日本带来好处。它有时会使日本人从自卑感走向极端的优越感，从而跨入可悲的危险境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所发生的那样。它还加强了日本人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的感情，使他们担心过分地学习外国甚至与外国接触过多都会削弱日本人的日本性。英语教学问题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如上所述，由于这种观念，日本人在这方面失败了。有些专家一本正经地建议，外国语与其多教，不如少教。他们认为，由少数日本人接受良好的英语训练这种做法比较有效，大多数人既然学不好英语会话和阅读，就应该节约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其他事业。这是一种高明的见解，但它忽视了实际的需要，因为日本如果想要发挥它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就需要有大量能够有效地运用外国语的日本人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这种见解的潜意识就是上述那种感情，即懂得太多的英语会削弱日本民族的日本性。这种见解赞

同恢复日本人的心理孤立，而心理孤立乃是日本人的致命弱点之一。对于一个现今变得强大的日本来说，危险的是日本色彩过浓，而不是太淡了。

在日本，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的钟摆式摇晃正在逐渐消失。战后最新的周期是从可怜的自卑，经过死灰复燃的自尊，达到傲慢的自满以至某种程度的排外主义。这个周期进展非常缓慢而且相当平和，感情色彩看来要比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 30 年代更早的周期淡薄得多。也许日本人正在超越他们历史上的自卑感—优越感阶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是日本对外关系日益稳定的一个良好先兆，也是日本越来越具有充任世界领袖的能力的标志。

日本人或许可以克服他们相对于西方的自卑感和由此产生的优越感的反作用力，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日益认识到自己错误地把西方技术与传统美德截然对立起来。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也会得到同样的认识，从而缓解全部的自卑感—优越感问题。起初，所有现代技术都被说成是西方的，未受西方影响而可确定为日本的或者东方的东西所剩无几。但是，实际上只是根据时间顺序，现代技术才是西方的，而从性质上看不是这样。在当代西方，没有因现代技术而发生变化的事物寥若晨星。正如我们与我们17世纪的祖先有泾渭之分一样，日本人与他们的祖先也有天壤之别。现代技术确实发源于西方，但技术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农业的传播以及青铜和铁的使用并没有使有这些文化都成为发明该类东西的这些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发明的纸、印刷术、火药、瓷器以及官僚制度等的传播，也没有使其他国家在文化上从属于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社会既属于西方民族，也属于日本人。日本人使用蒸汽机只用了西方人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越往后技术发明的时间差就越小。今天，这种时间差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不看技术上的变化，日本人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正如美国人

406

还是美国人一样。

文化上的差异经常像过去那样显著。西方历史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但在今天的日本信奉耶稣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2％。如上所述，这个比例比1600年时的比例还小。在受到现代技术的影响方面，日本和西方沿着相同的方向前进。两者在教育制度、政治体制、产业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于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日本人来说，日本与西方的所有明显差异感都已荡然无存，还保留在人们意识中的那些差异感已经无关紧要了，它不过赋予每个国家一种富有魅力的特性意识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想方设法削弱民族主义色彩，使它减轻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民族之一，这是不无道理的。日本的学校教授的世界知识也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学校要多。日本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大量讲授日本本国的知识以外，还教授西方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试问除日本外，有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全面包括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呢？在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教育内容往往很少超出西方的范围；在前殖民地国家，关于宗主国的知识的教育或许已被取消，但关于本国知识的教育尚未健全。无疑，日本的教育也忽略了世界广大地区，但它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重。

407

日本的生活与其他国家的生活一样富于国际性。日本人像其他民族一样通过报纸和电视，对国际事务了如指掌。日本科学家在所有尖端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学者非常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世界流行的风尚、服装的款式以及时髦的事物都会风靡日本，而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速度更快，规模更大。在日本，西方音乐的演奏，其作品之多，水平之高，如同在西方音乐的故国一样。新年佳节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已成为日本全国性的嗜好。日本人对全世界的艺术品津津乐道，倍加欣赏。在日

本的城市，人们可以品尝到西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美味佳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日本传统与西方标准的实践的结合，因此它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许更富于国际性。

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热情洋溢地献身于国际主义思想，并且断然否定民族主义的权威。战后初年，日本人厌恶民族主义的一切象征，如国旗和国歌。即便在今天，日本也不像大多数其他国家那样，经常悬挂国旗，国歌《君之代》也极少演奏；如同美国在体育比赛前演奏《星条旗》那样，孩子们只是在收看体育比赛时才从电视上听到《君之代》，他们产生了错误的联想，以为那是"相扑之歌"。在日本，"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个邪恶的字眼，除了极右翼分子使用外，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传统用词，其汉字构成意味着"国一家一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国家主义的一般性代名词"种族主义"，在我听来带有更邪恶的含义。"民族主义"来自英语是最保险的中性色彩的代名词。

如上所述，高级政府官员参拜国家神社，如供奉神话中的皇族祖先天照大神的伊势神社或祭奠为国牺牲者的东京靖国神社，都引起公众的激烈争议。参拜神社所导致的争论不仅涉及民族主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宪法所禁止的国家与宗教的正式关系问题。起初，政府官员小心谨慎地躲开这些神社，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因为神社不仅与日本悠久的历史密不可分，而且往往还是引起人们对历史兴趣盎然的风景胜地。日本政府官员躲开神社，就像美国的政治领袖回避弗农山庄① 和林肯纪念堂一样不自然。政府领导人已经逐渐开始正式参拜这些神社，虽然基督教徒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仍然反对这种举动。

---

①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诞生地。——译者

日本在其"和平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它的防卫力量相当有限，完全没有进攻性力量。对于一个重要的国家来说，这使它在世界上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日本坚定地尽量避免加入军事同盟，不使自己卷入任何国外的军事和政治争端。它反复宣布忠于联合国，给予联合国始终如一的支持。这些国策得到了日本人民的绝对支持。

408

* * *

80年代后期，从某些方面说日本是世界上最富于国际性的重要国家。它几乎在每个经济领域都令人刮目相看。日本的生存依赖于它与世界遥远地区的经济关系，其产品在世界各地倍受欢迎。它将传统文化与西方因素融汇贯通，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日本看上去几乎是现代国际性国家的典范。

然而，当代日本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他们已经解决了堆积如山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正在为解决这一基本上由他们造成的其自我形象的心理问题和其他国家对日本的态度问题而费神。

当然，日本人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崇，但却并未得到普遍的信任和爱戴。因为日本过去有过军国主义经历，现在又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功，人们对它感到害怕。人们怀疑它在国际政治中采取低姿态是回避责任，狭隘地企图保持自己的有限优势。日本人的低姿态在别人看来不过是阴谋诡计，而不是日本人自认为的促进和平的执着的努力。大部分非西方人认为，日本人更像西方人，而不像亚洲人。西方人则觉得，日本人无疑是神秘而危险的"东方"的缩影。欠发达国家认为，日本应该更富于同情心，更慷慨大方。其他发达国家却感到，日本对于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缺乏合作精神。发达和欠发达国家都承认日本是在经济上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但对它都不甚了解，认为它有意与大家保持距离。

缠绵不断的与世隔离感和独特性意识，仍是日本人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过去，日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技术落后、战略防御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大规模变革。现在则大不相同了，他们关心的是与世界其他民族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如果世界和平崩溃，日本将随之而灭亡；如果世界贸易体系停滞，日本的将来将岌岌可危；如果不与世界性的增长和理解齐头并进，即使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继续保持辉煌的经济成功，也可能导致灾难。这可能造成报复性的贸易限制，可能导致贸易战争，从而将世界抛进一个走向经济崩溃的旋涡。日本无疑会成为众矢之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的主要政策就是狭隘地强调自己的经济增长，而这已经变得非常危险了。日本作为一个世界领导者，必须采取一个更加广泛的目标，以争取世界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的决策者来说，国际理解并不只是无关痛痒的时髦话，而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需要。

在理智上，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状况，但他们发现自己的独特性意识难于消除。要他们放弃由语言障碍和繁荣的经济牢固地保障起来的安逸生活，去过一种对付世界和平与全球经济问题的冒险性生活，这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用戏剧性的话说，他们发现自己难于加入人类大家庭。首先是他们仍然缺乏充足的交流技巧。更为严重的则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与世隔离感。

中曾根康弘首相为后一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说明。1986年10月，他轻蔑地指出，美国的一些少数民族集团降低了美国的总体文化水平。中曾根的说法无疑表达了大部分日本人的态度，但也暴露了日本领导人缺乏应有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日本领导人也是世界领导人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着他们的片言只语，因此他们在公共场合必须慎词微言。民族差别的发言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抗议，希望日本领导人会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

日本是选择继续与世隔绝，还是选择独创性的国际化，这是一

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日本国内民主制度稳固，社会体制平稳运行，洋溢着献身和平的精神，这些加上其巨大的经济力量，可以为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作出巨大贡献。但是，如果日本继续受到欠发达国家的抱怨，并且被发达国家看作缺乏合作精神的话，经济冲突将日渐升级，进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总崩溃。当代国际事务日410 益纷繁复杂，这种崩溃很容易以灾难而告终。

只有时间才能显示出结果来，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持乐观态度。日本已经加入了由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功。他们的历史表明，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他们迎接了日本面临的任何挑战。19 世纪西方优越的军事和经济技术威胁着日本的未来，这时，他们为了争取在技术上与西方平起平坐，从根本上变革了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证明自己经得起风浪。当猖獗的帝国主义时代威胁到日本的未来时，它倾注国力扩军备战，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日本的失败虽然导致了日本现代时期的一场大灾难，但也宣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日本发现世界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自己不过是一个苍凉凋敝的国家而已时，它又一次变革了整个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而且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

今天，日本面对的重大问题是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完全合作的成员，充当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秩序的领导者。这需要日本放弃自己的独特性意识，尽力帮助欠发达国家，坚定维持世界和平，牺牲自己的某些经济优势，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稳运转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些与日本为达到早期的目标而进行的变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在过去已经成功地达到它的主要目标的国家，可以再次获得成功。

持乐观态度的第二个理由是大多数日本人实际上理智地意识

到需要更富于国际性，虽然他们在感情上可能缺乏充分准备。日本人正在推行许多使日本走向国际化的小规模尝试。由于日本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功，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程度的沾沾自喜和对其他国家的骄傲自大，但不存在旨在强化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的活动。这种企图无疑是自杀性的，即使最刚愎自用的日本人也认识到，加强国际合作才是日本未来成功的唯一希望。一个昌盛的日本只有在一个繁荣的世界中才能生存，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为了促使日本人更富有国际性思想，并且使他们跳出习以为常的民族框框，日本正在进行许多国际化教育的尝试。虽然这些努力与需要相比无疑规模小，而且效果不大，但其方向是正确的。

411

然而，促使人们相信日本将更加富于国际性，并以加速度实现国际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世代的更迭。世界上大部分重要变革基本上都是世代交替的结果。了解旧情况的老一辈完全不愿意接受的事物，没有经历过去的新一代总是无意识地而且热情洋溢地加以采纳。今天，战前的那一代人与战后的几代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心理差异，年轻的一代无疑比他们的前辈更富于国际性思想。他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漫游世界，认为自己是世界青年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毫无偏见地承认外部的世界千奇百怪。他们实际上认为，在走出日本观察外部世界并且置身其中以前，他们一直是被禁锢在日本的。他们觉得，日本的城市与世界其他城市并无不同，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正如美国人看纽约、法国人看巴黎一样，他们也把东京视为一个国际城市。那种自以为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思想是非常令人讨厌甚至荒谬可笑的。

412

毋庸置疑，在预防世界性灾难的发生方面，日本人仍然是世界的一个日益自觉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独特性与国际性之间的矛盾困扰着日本人，但这个问题将会按照有利于国际主义的方

向解决。很明显，日本的经济力量和技术会促进这一趋势。可以预料，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将在朝着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越来越接近。

索　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重新编排。下面的页码系原书页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E

F

G

H

J

K

L

M

N

P

译后记

我万万没有想到，拙译《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竟然是当代日本学大师赖肖尔教授最后的心血之作。1988年，我得知赖肖尔先生推出该书后，即与他联系翻译事宜，不期很快收到赠书和“中文版序言”等材料。1989年春，我完成初译稿，其后几经周折，延宕至今方得付梓。赖肖尔先生不幸已于1990年9月辞世，此前中文版未能出版成为译者的最大遗憾。时至今日，只能以此未能及时出版的中文版作为对大洋彼岸的先学的纪念。

《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的翻译出版自始至终是在先学和导师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赖肖尔教授的生前挚友、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先生给予了亲切的关怀。他非常关心该书的翻译，亲自审阅译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的导师沈仁安教授仔细校阅并修改了全部译稿，中文版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凝聚着他的辛勤劳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的中文版即是我们师生合作的结晶，更是导师提携学生的结果。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胡双宝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先生等为中文版的编辑和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终使该书与读者见面。作为译者，我不胜感激。

译者才疏学浅，谬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陈文寿

1991年10月于北京大学